省长专项资金项目（黔省专合字[2010]118号）

铜仁学院武陵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协同创新中心　贵州省重点支持学科『民族文化遗产学』（黔省专合字[2012]85号）阶段性成果

# 贵州明清盐运史考

赵斌　田永国　著

GUIZHOU MINGQING YANYUN SHIKAO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循察历史，探究兴衰。

任何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均能在浩瀚历史沉淀中找到其运行轨迹，只是社会经济态势发生了变化，时空产生了扭转，也即论证的前提条件发生变化，但永恒不灭的是其中的『道』，这其中涵蕴了历史更替的真谛。

盐制的历史是解读中国专制历史的钥匙，从中可以剖析政权兴盛与覆亡的规律，盐制的历史更彰显出新中国的勃勃生机，体现了国计民生的重要性。

总之，研究榷盐史可通『凝练治国之理，训立施政振邦』之旨。

# 贵州明清盐运史考

GUIZHOU MINGQING YANYUN SHIKAO

责任编辑 张明星　助理编辑 李筱　封面设计 穆志坚

ISBN 978-7-5504-1553-9　定价 69.80 元



省长专项资金项目（黔省专合字[2010]118号）
铜仁学院武陵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协同创新中心　贵州省重点支持学科『民族文化遗产学』（黔省专合字[2012]85号）阶段性成果

# 贵州明清盐运史考

赵斌　田永国　著

GUIZHOU MINGQING YANYUN SHIKAO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明清盐运史考/赵斌,田永国著.—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04-1553-9

Ⅰ.①贵… Ⅱ.①赵…②田… Ⅲ.①盐业史—贵州省—明清时代
Ⅳ.①F42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8359 号

**贵州明清盐运史考**
赵 斌 田永国 著

责任编辑:张明星
助理编辑:李 筱
封面设计:穆志坚
责任印制:封俊川

| | |
|---|---|
| 出版发行 |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
| 网　　址 | http://www.bookcj.com |
| 电子邮件 | bookcj@foxmail.com |
| 邮政编码 | 610074 |
| 电　　话 | 028-87353785 87352368 |
| 照　　排 |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郫县犀浦印刷厂 |
| 成品尺寸 | 170mm×240mm |
| 印　　张 | 17.25 |
| 字　　数 | 315 千字 |
|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504-1553-9 |
| 定　　价 | 69.80 元 |

# 目 录

# 第一章　榷盐之政——盐运乾坤全局考

循察历史，探究兴衰。当前的任何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均能在浩瀚的历史沉淀中，寻找到运行轨迹，只是社会经济态势发生了变化，时空产生了扭转，也即论证的前提条件产生变数，但永恒不灭的是其中的“道”，其涵蕴历史更替的真谛。研究榷盐史可以通“凝练治国之理，训立施政振邦”之旨。

探寻“盐运”——既是探索运输食盐的水路、陆路及点与点连接而成的盐运路线，线与线串联形成的盐运面，运输的面与面构筑的盐运网络；更是寻求在中国浩荡的历史盐道——盐政中，其永恒的经济兴衰更迭规律。所以，“考盐运”，必然先考政道。陈寅恪先生曾说，研究古人，应当“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研究历史事件，只能是放在一定的历史场景中苦心孤诣，去伪还真。我们不敢妄自菲薄，只算截片断源，呈管窥之见。

我国自黄帝“逐盐天下，问鼎中原”以来，榷盐之政，沧桑起伏。春秋时代管仲所作《管子·海王篇》为百代论述盐政之滥觞；西汉时期恒宽所著《盐铁论》“愿罢盐铁官营，毋天下争利”，理性地论证了帝国转型时期国家盐资源分配政策；唐代开元年间南通实业家张謇在《张季子说盐》中指出：“盐法公私广狭之义，以唐为大界，唐以前公诸民，主广义，唐以后私诸官，主狭义”[1]；五代十国是中国盐政最严酷的时期；北宋行“官商并卖制”；元朝“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明中叶“商专卖制”；清行“官督商销制”与“官运商销制”；民国二十年五月三十日公布《新盐法》，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对盐的产制、运销、征税、缉私等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的盐政专门法律。民国三十五年行政院颁布《盐政纲领》；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197 号令发布《食盐专营办法》。

盐制的历史是解读中国专制历史的钥匙，盐制的历史是剖析政治权力如何取得经济主导权，显现出政权兴盛与覆亡规律，盐制的历史更彰显新中国的勃

① 王云五，欧宗佑. 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中国盐政小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68.

勃生机，体现了国计民生的重要性。

## 第一节 逐盐天下，问鼎中原

关于黄帝与蚩尤的逐鹿之战，民国时期张其昀氏考证“黄帝以有熊（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县）为基础，向着黄河中游发展，以附庸蔚为大国，在山西西南隅解县盐池附近，曾大败蚩尤，发生涿鹿之役”①。涿鹿在哪里？为何发生此战？战后局势变迁如何？

### 一、盐定天下

《山海经》记载，涿鹿在今解池附近，解池东部安邑县的运城（古名司盐城）有一蚩尤城，而山西解池是中条山北麓一个内陆盐池，《水经注》云：“今河东盐池，紫色澄铤、浑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而成”，系天然结晶析出，当时每年产盐60万担，合计30 000 000千克。涿鹿之战是一场民族民生盐的保卫战。黄帝战胜蚩尤后，将国都迁至解池附近，构开国之宏模，奠华夏之根基。此后，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安邑）均衡地分布在解池周围，扼战略之要地，控民之重计——富饶盐池，以定天下之局势。

### 二、盐立政权

在整个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控盐之战”跌宕起伏，秦楚争霸，围绕巴东地区安宁盐泉与郁山盐泉展开激烈拉锯战；三国之鼎立，概因盐资源平衡分布；南唐灭亡，因失江淮盐场；前蜀王建、吴越钱镠皆因贩私盐起家立国；巴人祖先廪君，一统三峡部落，控制巴盐，依夷水边而建古巴国；唐朝后期盐枭王仙芝、黄巢起兵，最终奏响了唐政权的丧钟；江浙私盐头领张士诚十八条扁担起义，撼动了元朝政权基础。以上仅是盐历史的片段采撷。

可见，盐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催化作用，早期它影响整个华夏族的迁徙与布局，构成立国的基础要素。随着人类对盐开发利用途径的拓展，商业的兴起带来盐运的扩散，其影响因子在衰减，但民生民计之一盐法、盐制得体适用又演变为政权巩固的重要构成因素。“盐虽小，但民大”，国计民生是任何政权

---

①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6.

的立国之本。我们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曰“盐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 三、物贡代税

夏、商、周三代至唐虞，民风淳厚，“凡二千二百六十九年，皆为无税时代”①。隋文帝至唐初，其间一百三十九年，为无税期。榷盐之制始于夏朝，商因循夏，周沿袭商，周设立太宰，以九赋（“邦中之赋”、“四郊之赋”、“邦甸之赋”、“家削之赋”、“邦县之赋”、“邦都之赋”、“关市之赋”、“山泽之赋”、“币馀之赋”）敛财贿，以物贡代税赋。

### 四、“官山海”策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用其《管子·海王篇》原则，推行“官山海”之策，榷盐实施部分“专卖制度”。盐制有官制与民制，盐场散漫之地域归官制，齐整聚集之所，便于管理则归民制。于秭水（今济水）入海之处（相当于今永利、王官两盐场），召集民工起阳春止孟春时段“煮秭水为盐”，正常每年成盐3万余钟，合计384万千克。

官制为主，民制为辅，民制之盐，仍由官府收买，归官运销，寓税于专卖之中，称之为部分专卖。盐之配销，概分“内销”与“外销”。内销采用“计口授盐”，先订立全国户口册籍，按每人每月或每日配量销售。综合《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分析，采李学勤先生的观点，当时人口为49万户，最多一户10人计，合490万人，每人每月消耗0.5千克，每年齐国耗销249万千克，齐国正常生产盐量有盈余。管子为实现其“外因于天下”之理想，以盐外销作为经济武器，南输梁、赵、宋、卫、濮阳等地，同时在国际贸易中低收高买外国输入之盐，获取丰利，反辅民生。与之相较，燕国辽东之盐的利用和晋国解池之盐经营，胜之百筹。

### 五、控盐立霸

管仲于盐实施部分专卖制，内销“计口授盐”，外销实行战略物资均衡调控，以盐、铁作为运筹，开创了春秋霸业，萌发了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的滥觞，与现代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中国家干预理论体系有同工异曲之妙。

---

① 宁德，林振翰. 中国盐政纪要上［M］. 南京：中正书局，1930：48.

## 第二节　两汉两晋，榷放不定

秦国用商鞅之策，实行“盐铁专卖”制，官府控制生产，批发给商人销售，征收昂贵专卖税。

### 一、均输平准

西汉初年，仍并行不减于秦时“盐重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依桑弘羊之谏，采纳国家专卖制，政府控制煮盐、运输、销售所有环节。桑弘羊任司大农，采用均输和平准之法，“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繁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就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远，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①“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货物各以其物贵时，商贾转贩者为赋，而相贯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②通过均输、平准之国策，设置盐官三十七，分布于二十七郡区域，全国盐资源与盐价尽在政府全然掌控之中，由汉初的盐自由经济，变为统制经济。汉昭帝元六年，虽展开桓宽所记实的《盐铁论》，但其后仍行专卖制，延续六世（公元125年），无所变更。

### 二、混融专卖

王莽新朝，实行“五均六筦”，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但一部分盐由民制，需“计息出贡”，尚属征税专卖混合制。

东汉，“光武中兴，收而不罢”。除专卖之法外，驰煮私盐之禁，纵民制盐，自由贩卖，仅在盛产盐铁的郡国所属县道设盐、铁官主收盐、铁之税。章帝建初六年，也曾“复盐、铁官”，转旬之间，又“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和帝即位，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重申“罢盐铁之禁”的诏令。整个东汉盐制，其主流轨道是民营官税。从西汉延伸到东汉其盐制是混融型专卖。

---

① 化涛. 权力视域下的政策调整与思想论争——《盐铁论》的政治学解读［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09：124.

② 蒋静一. 中国盐政问题［M］. 南京：正中书局，1936：33.

## 三、监卖盐制

盐制历史聚焦三国，魏占有今辽宁、长卢、山东、河东及西北等产盐区，曹操初涉盐利始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当时直接控制河东盐池，纳荀攸之谏“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服从……”① 曹操实行监卖制，派遣中央政府官员监督盐官收取盐税，对盐销售进行管理，盐业生产放归民间，同时政府开展“盐屯”、贷民耕牛，“以盐利益市犁、牛”，将盐利用于促进农业生产。曹魏政权对河东盐池的管理在逐步加强，设有司盐都尉、司盐监丞，全局逐渐由监卖制转变为政府专营。蜀汉拥有益、梁二州之地，占川康、云南盐之利。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设置盐府，以王连为司盐校尉，收盐铁之利，以裨国用。吴有扬、广二州，尽得淮、浙、闽、广产盐之益，于东莞设司盐都尉，亦同设职位较低的司盐监丞之职。可见，蜀、吴皆仿效魏制。

## 四、榷盐禁私

晋承魏祚，一统三国，将分离的盐区，置于中央管理之下。朝廷因“预明于筹略”，杜预被擢为度支尚书，“预乃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皆纳焉”②。其中“较盐运”就是用专卖制度，规划营销，计划整理，疏通盐运。度支尚书总理全国财政，盐业只是其中掌职之一，直接治理盐务者，有司盐都尉、司盐监丞及各地县令。颁布盐禁“凡民不得煮私盐，犯者四岁刑”。但对于井盐、池盐，世族大家依然放纵行煮以获其利。东晋元帝立国江左，北方沦陷，盐专卖制不可通衡，于建武（公元317年）变通盐法，因时取宜改为征税制。

## 五、世族持盐

宋、齐、梁、陈（公元420—589年，共历169年），史称南朝。南朝盐制疏而不密，盐税与其他杂物混同，对盐业管理并无专官。世族大家把持着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命脉，占山固泽，强取豪夺，独揽盐业生产与运销。

## 六、兴废无常

太武帝太元五年（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奄有司、冀、雍、凉、青

① 郭正忠，中国盐业总公司．中国盐业史古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8.
②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8.

并幽、平诸州，华北海盐与河东解池、西北池盐，尽在其掌握之中。魏献文帝年间，甄琛献策“且善藏者藏于民，不善藏者藏于府，藏于民者，民欣而君富，藏于府者，国怨而民贫，国怨则示化有亏，民贫则君无所取，愿弛之盐禁”①。藏富于民，使盐业自由经营。随之，撤除了河东盐池等处的盐司，宣布“弛山泽之禁”。弛盐禁以后，遂被豪贵乘势占领。经孝文帝后期弛放，宣武帝景明年间收缩盐业政策，宣武帝正始三年，弛废盐禁，孝明帝神龟初年，“复置监官以监检焉”，但时隔不久，孝明帝又宣布废盐池税，被长孙稚谏止。北魏盐制“更罢更立”、“兴废无常”，演绎皇权集团与豪强贵族之间的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制约。东西魏时代，西魏拥有池盐产地，严峻税收；东魏拥有海盐产地，展开分区梳管政策，在沧、瀛、幽、青海盐中心产区，傍海煮盐，实施盐业官营，外区任民自由。北齐依循东魏旧制，北周实行征税制。

## 第三节　隋唐盐政，开阖自适

隋唐初期，为盐政史无税期。第五琦尽榷天下盐，以挽救战时经济，刘寅开创“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盐法，奠定唐朝经济的基业。

### 一、自由经济

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南北盐区重新一统，罢黜盐禁，还盐业自由经济。唐初沿袭隋盐制，依赖租调，概不征税，经历武德、贞观、景云迄止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其间一百三十九年，为盐政史上无税期。

### 二、出租收课

唐代盐产，主要有池盐、井盐、海盐。池盐产区分布于河东、关内、陇右三道区域，囊括河东、陕西、西北、新疆、绥远（今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以池盐为主，兼并岩盐、井盐。唐玄宗开元元年，在河东两池，开拓荒废，疏决水道，“幽州盐屯，每屯配丁五十人”②，设置“盐监”展开“盐屯”。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令浦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进行管制。通过“出租收课”形式，多征收实物，后折为盐钱，或

①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6.
② 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66.

输米代盐。井盐分布于川康、川北、川东、云南区域，初始屯兵开盐，后国势衰弱，无力驾驭。海盐分布于河北、河南、淮南、江南、岭南五道之产区，包括今长卢、山东、两淮、两浙、福建、两广区域。天宝以前，听民取之，主在收税，天宝末，安史之乱，颜真卿听李华建议实行就场专卖制。

### 三、战时经济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第五琦为河南等五道度支使，创立盐法，实施“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官置监院官吏对制盐散户收编，名曰“亭户”，免除其杂徭，隶归盐铁使。非亭户制盐，以盗煮论处，亭户之盐，悉数交予官府，由官府运销，若私行贩运者，以私市论罚，尽榷天下盐，将民制之盐加价十多倍售出。此盐制是针对“安史之乱”的战时经济筹措。

### 四、刘寅榷盐

唐肃宗乾元三年（公元760年），以河南尹刘寅继琦为盐铁使，先后掌理盐务十八年，创唐代盐政辉煌。刘寅确立了“民制”、“官收”、“商运”盐法，盐归民制，仍由官收，废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就场交售商贩，交价后放令出场，任其所之，无论何地，只能在盐铁使管辖范围内自由贩卖。全国盐区，划分为二，东南海盐与山南道井盐主要产盐区归盐铁使管辖，其余盐区由度支主控。与管子的区别重在：刘之法其制盐全部由民，“官海”之策则以民制为主体，官制辅助；管子之法官运官销，刘之法商运商销。为了调控市场盐价，刘寅在当时吴、越、扬、楚等地设立盐廪，储藏官盐，平价抑制，还在边远地区僻壤非产盐区域，设立“常平盐”，调剂全国平衡。

刘寅的盐制细腻、经世致用。在场产层面，确立亭户制度，提高生产技术，健全官收机构；在运销层面，确正商运原则，运用常平调剂，辅行官运为助；在征榷层面，一统全国盐价，废止苛捐杂税；在管理层面，标树监场规樽，制置巡院机构。四个层面联动改革整合为就场专卖制，使唐朝应时，岁入增加，民生安定，政治清明，市场繁盛。

### 五、盐崩政息

建宗元年，刘寅被贬，人离政休。贞元十年至十五年，王纬、李琦先后继

盐铁使，加重税收，对外号称“赋外羡餘”①，内则聚敛天下财，以供天子私用为障目，其实大都中饱私囊，导致民不聊生。唐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虽经李馔整顿，均不得顺治。直至大中五年，裴休为盐铁使，始立新法，也无法修补盐制漏隙，私枭聚啸成群。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盐私贩枭雄王仙芝起兵长垣，盐商黄巢聚众响应，延续十一年，坚克平息，但随后，藩镇割据，遂变不可收拾之散局。

唐朝兴，兴在盐制，唐朝亡，亡在盐制。由盐制的衰变，产生进奉之重、加价之弊、虚估之错、盐职杂乱、吏员繁亢从而导致藩镇割据、宦官之乱、民怨民沸、私盐枭行。俱产生政体和经济的崩溃内外合力，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 第四节　五代十国，混沌严酷

五代十国，盐局分离。各自盘剥至甚，筹划各种方法压榨民脂民膏。

### 一、产盐分界

当时产盐区域分界，淮南之盐隶属吴及南唐，两浙之盐隶属吴越，福建之盐隶属闽，广东之盐隶属南汉，四川之盐隶属蜀，晋北之盐隶属北汉，盐区控制反复更迭。场产管理与运销重在私盐之查禁，只要越界即为私盐。其间，官商并卖，官府巧立名目，如“屋税盐”、“蚕盐”②、“随丝盐钱”等，按户勒卖，极尽盘剥，人民怨苦。后周配征人口“食盐”摊于田赋之内，称为“两税盐钱”。闽行“产盐法”，视产盐高低定价，纳钱给盐。南唐行“盐米法”强行令民在常赋以外，输米三斗，贡盐一斤③。全国上下，各自为政，但严苛敛财如出一辙。盐制、盐法超出常轨，盐业生产混乱不堪。

### 二、就场专卖

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公元907—923年），五代十国开始，后梁沿袭旧制，实施就场专卖，严格控制河东盐池，朱温亲自领河东节度使，籍盐池，以

---

① 赋外羡余：指封建时代指令地方官吏向人民勒索来定期送给皇帝的各种附加税。唐白居易《重赋》诗：“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餘物，随月献至尊。”

② 蚕盐：指五代至南宋，官府在农村实行按户配售食盐的制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以官盐贷于民，蚕事既毕，即以丝绢偿官，谓之蚕盐。”

③ 1斤=0.5千克

控天下，后朱友谦持节河东，兼理盐政，设置盐铁转运使，但盐制较为松弛。

### 三、重榷强卖

后唐（公元923—936年），对河东安邑、解县两池所产“颗盐”，进行“整饰”，设置榷盐使，驻派员兵，专事巡缉，严厉惩罚偷盗与私藏。产于河北、山东两区的“末盐”即海盐，设置榷盐院，建仓贮盐，转运瀛莫诸州，以获其利。禁刮卤私煎，即使收集卤土盐水，也按煎炼盐量治罪，动辄处以极刑，非常严酷。庆州青白盐，只供本地食销。

庄宗同光二年，以孔谦为租庸使，于颗盐产区，施行官商并卖法。以官卖为主，巧作名目，强制配售，实施“屋税盐”，将州府县镇人户按照其交纳的屋税数值配给盐量强收价款。“蚕盐”对乡村人户，在二月春天育蚕时，先配给所需之盐，五月收蚕放丝期，再行交纳赊盐之钱。“食盐”按户籍计口授盐，逐年配售，只能食用，不得转售他人，“蚕盐”不得带进城镇。“颗盐”、“末盐”、“青白盐”不得越境掺杂，犯者依法治罪。明宗天成三年，困苦民情形势所迫将盐价议减。清泰二年（公元935年）在“蚕盐”上又叠增盐价。

### 四、榷盐无定

后晋（公元936—947年），石敬瑭即位，鉴于后唐盐法之严苛，昭令减价，除“蚕盐”外，诸道州按人户配征食盐钱税，以贫富差距，递级分为五等，参次征收。开放盐禁，一律通商，停止官卖，容许所配售之盐自由贩卖，对于盐户应交纳的盐课，则按当时价格折钱，免受粮贵盐贱之累。使得后晋盐法最大程度松弛化。但于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又行“过住税法”，所谓“过税”是指在关津要塞，置场征税，所谓“住税”是指城市店铺，计货征税。往来盐货，不论过往，一概征税。之后，层层加叠盐价，烦忧病民。

### 五、盐禁政亡

后汉（公元947—950年），高祖刘知远以王章为三司使，“章急于财赋，峻于刑法”①，惩治私漏之盐，铢两必究，并且处以极刑。隐帝刘承佑令青盐一石，除抽税一千文以外，还要交盐一斗。盐禁非常烦苛，达历朝之顶峰，人民百般痛苦，其政权覆亡也就提速矣。

---

① 蒋静一. 中国盐政问题［M］. 南京：正中书局，1936：78.

## 六、松紧无度

后周（公元950—960年），对于两池“颗盐”日益加紧固防，严稽私盐，将后汉一斤一两处死，变更为五斤处死。对于“末盐”（海盐），禁刮卤私煎，一斤以下，罚脊杖三十，配役三年；一斤以上，决重杖一顿，处死。世宗显德二年又规定，不计斤两，决重杖处死，显德三年，又反复无常悯民放宽漳河盐禁，后来周世宗又改征“两税盐钱”，以夏秋两季田赋与盐课均摊于两税之内带征。对于青白盐，采用抽税制。“青盐一石，抽税钱八百文足陌，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钱五百文，盐五升”。配“屋税盐”、“蚕盐”、“食盐”销售方式。

## 七、十国紊乱

吴，杨行密所建，定都广陵（今扬州）。实施“入米请盐”，即“每正苗一斛，别输三斗，官授盐一斤，谓之盐米”①，以米税盐。

南唐，徐知诰所建，立大元帅府于金陵。也采盐米之法，但淮盐产地入于周，造成民只输米，而政府不支盐之诡异。

前蜀，王建所建，以贩私盐起家，定都成都。仿效唐法，重视盐产，整顿井盐生产。

后蜀，孟知详所建，定都成都。兼并董璋，一统东川、西川之井盐，其子后因加重铸铁税钱，民怨沸腾，国政丧衰。

吴越，起于钱镠，以贩盗私盐发达，建西府杭州，东府绍兴。拥有丰盛两浙渔盐，校仿唐盐法，但田赋、市租、榷盐之税增加数倍。

闽，始建王潮，定都长乐（今福建福州）。采两税盐钱，同时加重赋税，并对盐实行“计产纳钱”称为“产盐法”。

南汉，起于刘谦，刘龑依靠父兄基业，定都番禺（今广州）。滨海产盐，未实施调控其利。

北汉，刘崇所建，定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晋中原产卤盐，但品质低劣，且产量微小，外奉祀契丹，内供应国家军队所用，盐法峻克，赋税繁重，不在后汉严酷之下。

楚，起于马殷，定都长沙。茶、谷、矿产丰茂，独不产盐，“以茶易盐”，“开市无征”，“以通商旅”，达到“易天下百货”，国用富裕。

---

① 田秋野，周维亮．中华盐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9.

南平（也称荆南），起于高季兴，定都江陵（今湖北荆州）。上贡“器械金帛”及土特产给后周世宗，明宗时，给盐三千石，其后，无以自保，用盐比较困顿。

## 第五节 宋代盐制，体系专制

### 一、产盐区域

宋代食盐种类：末盐（滨海各区所产之海盐）、颗盐（也称湖盐，产于解州、安邑连池之池盐）、井盐（也称泉盐，产于川、滇）、土盐（也称碱盐或硝盐，干旱盐碱地所产）、岩盐（也称崖盐，生于土崖之间）。

（一）解州区

包括解县、安邑两大池，及“女盐池”、“贾瓦”等诸小池。

（二）京东河北区

包括密州、登州、青州、莱州，因较其他区域产盐少，听凭灶户各煎各卖，河北盐场，分为沧州与滨州，沧州在河朔之地盐山县一带，滨州后沦陷于辽国。

（三）两淮区

1. 通州分区

宋太宗时期辖有西亭、永兴、吕四、石港、利和、金沙、余庆七个盐场，南宋时期，由于盐场荒废合并只有西亭、金沙、余庆、吕四、石港五个盐场，还有一海门岛，为官盐之地，或为军屯，或死刑获贷免者刺配充役。该区盛产鱼盐。

2. 泰州分区

北宋初期有角科场、扶桑场、虎墩场、古窑场、掘港东陈场、丰利东西场、马塘场、丁溪场、梁家垛场、何家垛场、小淘场、刘庄场。南宋时期盐场荒废合并为三大纳场八大产场。

3. 楚州分区

北宋初期有五佑、紫庄、南八游、北八游、丁溪、竹子、新兴、七惠、四海。南宋仅存五佑、新兴两场。

4. 海州分区

在宋朝与金朝政权之间反复掠夺，几经变易，南宋已非宋有了。

（四）两浙区

“熙宁以来杭、秀、温、台、明五州共领盐六，场十有四”①，仅明州就有四百六十余家“刮土、淋卤、煎盐”，不求细解，南渡以后，两浙分为东西两路。

（五）福建区

宋朝初年有福州、泉州、漳州、新化军十一处盐场、两个盐仓。南渡后，福建路不再置场。

（六）两广区

广州有东莞、静康等十三个盐场，宋史载“天圣以后，东西海场十三，皆领于广州”，南宋后缩减为九个场。

（七）蜀盐区

宋朝有成都府路（益州路）、潼川府路（梓州路）、夔州路、利州路四区域“煮井为盐”。“四路产盐三十州，见管盐井二千三百七十五井，四百五场”。

此外，还有河东永利盐，忻州马城池盐，甘肃的阶州、灵州、会州等为西北产盐之地。

对以上所罗列盐产区产量进行统筹计划生产，实施“计产行销”。如解县、安邑两池岁“种盐”（宋代产盐称“种盐”）1 526 429 石，福建福州长清场岁产 100 300 石。

## 二、管理机构

宋代管理盐产之机构，最高级为“监”，中层为“场”，低级为“务”或“栅”。低层主要职责是“催督煎制及买纳支发”，从事监督生产、衡量收购、收储存仓、公平放秤等具体细致管理工作，中级“场”是管理盐业生产的单位，高级“监”是管理盐场的机构组织，可见在管理系统层面上，“务”隶属“场”监督，“场”归“监”管辖。因地因时制宜，“监”、“场”、“务”、“栅”，设置无定制。监场官吏均由朝廷委派，后来盐场根据管理性质，细分为“催煎场”和“买纳场”两种。盐仓设置有在产盐场宇内为内仓，在交通便利、转运方便枢纽处所设置为外仓。

宋代盐产制度分为官制和民制。官制盐工称为“畦夫”，种盐民户称为“畦户”，“籍”是强迫犯罪之人种盐，政府给予工资，督促每户每夫定额生

① 田秋野，周维亮. 中华盐业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0.

产。民制者称为“亭户”，户出“盐丁”，岁课入官。蜀井盐生产民户，称为“井户”。收盐价格，视各产区种盐、煎盐之成本而定。在浙西、浙东，“亭户”纳盐登记在“手历”上，凭“手历”支钱。

三、销盐界分

宋代销盐地界制，宋朝早期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载“旧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盐，河东食土盐，其余皆食海盐”。并且有细致的划分，不尽详述。《宋史·食货志》记载：

（一）官卖区域

三京与京西之郑、滑、孟、陈、颖、汝诸州，京东之齐、鲁、沂、登、潍、淄、兖、徐、曹、郓、济、单、濮诸州与广济、淮阳各军；陕西之河中府，陕、虢、解诸州与广成军；河东之晋、绛、隰、慈诸州及淮南、江南、荆湖、两浙、福建、广南东西两路。

（二）通商区域

京西之蔡、襄、邓、隋、唐、金、房、均、郢诸州与光化、信阳各军；京东之登、莱二州；陕西之京兆、凤翔二府，同、华、耀、乾、商、泾、原、汾、宾、宁、仪、秦、陇、成、凤、渭、原、熙、河、岷、兰、阶诸州及保安、镇戎各军；河东之潞、代、忻、汾、辽、石、并、泽诸州及平安、哥岚各军及河北、西川、峡西各路。

宋代盐运销制度有以下四种情况：其一，民制（官制），官收，官运，官销；其二，民制（官制），官收，商运，商销；其三，民制，官收，官运，商销；其四，民制，商收，商运，商销。

官卖区域实行第一种称为“官般专卖制”（宋代搬作般，官运官销）。即由官府严格控制盐运销。具体县域地方上由“卫前”、“帖头”行盐之搬运管理。在江南、淮南、荆湖、两浙区域，实施漕运，疏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联结江湖六路，三十艘船为一网，由“发运使”、“转运使”督行，建网运之制，盐网搬运到县，置仓储藏，或置铺或置场“计丁敷卖食言”。宋朝官卖，也行“蚕盐”制，“以官盐贷于民，蚕事既毕，即以丝绢偿官”。

商卖区域实行第二种称为“商卖制”，实是间接官卖制性质。宋太宗雍熙（公元984—987年），辽数度侵犯河北，连年用兵，军需亏空，召集商贾输纳刍粟（粮草）于沿边境各州郡，称之“入中”（或折中），入中后，按道路远

近，折合为市价，加倍计算，然后授予"交引"或"盐引"①，持票面价格赴京师，或偿付现钱，或以盐补偿，称之"折中"。"扑卖制"由商人承投一区税收，先纳钱于政府，然后听凭其加税取价。"分销制"是商人买盐于当地官员或定月所卖月输课于当地官，然后分区贩卖，不得超过所"沽"之地。"自由贩卖通商制"，是针对河北、京东地域而论，宋太祖开宝三年四月，该地百姓免三年差役，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听民估贩，唯收税钱，不许官榷"，属宋代通商之特制。

## 四、范详榷盐

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范详针对"入中"虚估的弊端，对"盐引"制度进行改革，行"钞盐制"，分为四道程序：发钞、支盐、引运、驻卖。规定：解盐管卖地区改为通商，缺盐的川蜀地区扩大通商区域；商人请盐一律交纳现款，购买"盐钞"，盐官"即池验券，按数而出"；边界地区实行"商运管卖"；京师多设置常平盐仓储备盐，以便平抑盐价。范详改制十年，包拯在嘉祐五年估计每年为京师节省边费400万~500万贯。

## 五、蔡京聚敛

蔡京改行"换钞法"，更印新钞，收换旧钞，实施"对带"、"贴纳"，以旧钞来引盐，按比例输纳现钱几分，称为"贴纳"；换新钞仍带旧钞几分，称为"对带"。同时强化"合同场法"，将过去"一书一扎"单卷之钞，改为"两书一扎"二卷之引。一份留官府，对"引目额数"，编以字号，称为"引根"；一份"发司给卖"，称为"引纸"；如果两者"勘合"则验收发盐。

销售盐场设置于各产盐州郡，底薄给各地榷货务，商旅在州县或京师，输纳现钱，购买新引，引分两种，即"长引"和"短引"，"长引"能引往它路销售，以一年为限；"短引"只能于附近州县变卖，以一季为限。

商贾运输盐，统一标准限定斤量，以"官袋"囊贮。"官袋"与"引纸"封印严密，只用一次，严禁再用。初推行于河北、京东及淮浙诸海盐地区。蔡京政场"四起四落"，掌政十余年，出钞过多，开始用"贴现"、"对贷"法，又变更为"循环"法，也即：先卖钞，但不授盐，然后又买新钞，还是不给盐，来往循环交纳三次以上的现钱，方得交纳一次钱的盐量。极尽盘剥之巧

---

① 盐引本是封建政权的财源，但而当政者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即掠之于商。盐引又称"盐钞"，是宋代的取盐凭证，"引"是指有价证券，还可以作为"代币"流通。据《宋史·通货志》，"盐引每张领盐116.5斤，价6贯。"

谋，聚敛国财为私利。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王黼继为相，循用蔡京盐法，同时，变本加厉缩短钞期为一两个月，又出新盐钞，废弃旧盐钞，其严酷甚于盗贼。公元1126年，内外交困，遂发生“靖康之变”，北宋结束。

### 六、南宋谲局

南宋，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被金侵吞，此时，只拥有淮南、两浙、福建、广东、四川等地盐产。高宗建炎（公元1127—1130年）初期用“对贷法”，三年后，复改“贴纳法”，商贾一“官袋”三百斤盐，旧时北宋交纳十三千现在输纳十八千。高宗绍兴（公元1131—1162年）又恢复“对贷法”，孝宗淳熙（公元1174—1189年）又改为“循环”法，宁宗庆元（公元1195—1200年）推行“正支”①，按交纳先后顺序支盐。

### 七、盐政简评

纵观宋代三百余年，官般专卖为主，通商次之，交税收算再次。官般专卖形成了严密系统的管理层次体系，对生产、运输、销售进行了缜密的管理与划界，构建了封建专制的吸纳民间财富的网络，为后期传统盐制奠定了基础和仿效的模板。雍熙年又创造了“折中”制，以解决边关军需问题，范详改革推行“钞法”，杜绝徇私舞弊，适度让利于商，惠利于民，带来宋朝短暂的人和政平。蔡京初期行“合同场法”以钞请盐，解决盐利从归属地方到兼顾地方、中央财政利益平衡转型，但后期屡变钞法，益加盘夺商利，转嫁刻薄于百姓，国民深受其害，南宋溃败，朝不保夕，用“对贷法”、“贴纳法”、“循环法”、“正支法”等机巧谋一时之聚敛，属昙花一现，不可长持也。

## 第六节　辽金元盐，层叠严榷

### 一、税而不禁

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国号“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916年建年号，947年辽太宗定国号为“辽”，公元1125年

① 宋盐制，盐商用现钱向官府购买盐钞，再以钞向盐场支盐，称为正支。参阅《宋史·食货志下四》。

为金所灭。

辽国过去以塞北的土盐与池盐为主体，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后，才获得长卢盐场，在南起黄骅，北到山海关南区域渤海沿岸进行“河间煮海”。盐制简约宽松，设置榷盐院征收盐税，实行“税而不禁”的征税制，任由民制，所产之盐，除用于军需外，其余自由商运商销。效仿石敬瑭“表配食盐钱”（如上述诸道州按人户配征收食盐钱税，以贫富差距，递级分为五等，参次征收），所以辽盐价廉常倾销宋之边境，导致宋用盐钞“两书一扎”勘合以后才发“官袋”引盐。

## 二、严榷考成

金灭辽，蚕食鲸吞北宋后，于金主亮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由户部尚书蔡松年提议推行繁琐严密的“钞引法”[①]。规定其一，钞引印刷与发行环环相扣。在中都专门机构设官置库，印制钞引，将全国销售盐量登载于引上，按照引上数额制钞，以钞数反证于引量，按引支盐。杜绝宋朝钞引紊乱，虚空乱发，盐制混沌之现象，钞引只能由钞引库印刷发行，将底薄交予七盐司（金国仿制宋实行销盐分界制度，全国设立七个盐使司，分别为山东盐使司、沧州盐使司、宝坻盐使司、解州盐使司、西京盐使司、辽东盐使司、北京盐使司，一年盐产量大约三亿斤），钞上注明引数及时间。户部尚书、造钞引库司副使等凡经手之官员全部押字盖引，各路支盐处押合同用印同上。其二，钞引买卖货值相当。政府售卖引，商人运输销售。商人须在京师榷货所或在各地盐司处，按照引上盐的价值，缴纳现款，请领钞引，然后赴盐场支盐。批引由盐司主办，交引则由各州县主持。设置交钞库，专制“交钞”与钱并用，后来又制“银钞”与银两通用，可以凭“交钞”与“银钞”进行出纳结算。其三，场盐民制官收，严控禁流。场盐一律由官府收购，严格规定灶户纳盐课，每石收正课一百五十斤，耗盐二十二斤半，官府给予工本费，剩下余盐尽数报官，无论刮碱土煎熬，还是烧灰淋卤一概同视，犯者严惩。其中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盐价差异不等，山东、沧州、宝坻每斤四十二文，西京每斤二十八文，解州每斤二十五六文，辽东、北京每斤十五文。北京、辽东最低，因为是女真、契丹聚居之地，而西京、解州是汉人、女真、契丹、奚人杂居之地，河北、山东主要是汉人聚居之地。可见，盐税主要由汉族承担，为后期政权颠覆埋下了恶因。其四，盐区设官治理，专业系统层次分明。金世宗大定后，于各盐区设

---

① 田秋野，周维亮. 中华盐业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86.

立七个盐使司，各盐场派设管勾、同管勾、督监、督同协同盐使司掌管督理制盐与收纳场盐等事项。其五，在产盐区实行计口均课制。大定十二年，在西北地区实施计口食盐制，贫富均等。由于有些路途遥远区域，不偿运费所值，规定大户只限人二十口。太原地域为卤地，令民自己煎熬，只纳“乾办钱”，按户摊派。对于莱、密两州亏课之区，交纳丝棉等两记钞。其六，引盐装载重量，因区而殊。盐量记载于引上，引数附之于钞上，引是以斤而计，钞是以套而算，各区统一，避免出差。山东、沧州、宝坻三盐使司司盐，三百斤为一袋，每袋一引，二十五袋为一大套钞，十袋或五袋为一小套钞；西京、辽东、北京三盐使司司盐，每百斤为一石，一石为一引，四石为一大套钞，一石为一小套钞；解州盐使司司盐，每二百五十斤为一席，每席一引，五席为一套钞。如果零售则以小钞引用之。商人销盐必须要“引”、“钞”及加盖“公据”三证齐全，方可出售。其七，盐课之考成制度。金章宗泰和六年（公元1205年），订立考成制度，将各官员在职时期增亏盐课之实际账目数值，令个盐司将报表报达省部，以定其奖惩升降。

通过以上榷盐定法，金国实施“钞引法”，金世宗大定（公元1161—1189年），七盐区盐课收入为6 226 000余贯，到金章宗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盐课收入井喷达到10 774 000余贯，此计算还是在当时历史时期货币没有通货膨胀缩水前提下的结论，可见，创造了盐课奇迹。

### 三、整合盐区，集约产盐，管制设置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统一全国，其间元太宗（公元1229—1241年）掠取金地，于大都、河间、山东、辽阳地等地，设官征税，循用金盐制，世祖兼灭南宋后，通盘筹谋，全国划分大都、河间、辽阳、山东、河东、四川、两淮、两浙、福建、广东、广海十一个盐司。元成宗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又将大都合并于河间，全国整合为十盐司。对于河间、辽阳、山东、两淮、两浙、福建等区，设立都转运盐使司、委政使、副使、运判、经历、照磨各官职，掌管场灶榷办盐货等事宜；广东、广海两盐区设立盐课提举司，同时兼举都提举、同提举、副提举等官职，其职责与前相同；河东区设立解池、安邑管民提领所，委派正提领、副提领各官，辖管盐区与盐民；四川设置盐茶转运司，兼理茶务。在盐运通衢之要关，设有批验所或检验所，委派提领、大使、副使等官员专司批验盐引之紧要。在各盐区下面的盐场，又设置司令、司丞、管勾、同管勾等职位，主管督制盐、收买盐及催交盐课。全国盐务总属中央户部管理。地方盐务政令有变或出现紧急事件，则由各路御史台上呈

中央御史台，转中书省，然后交户部核议，或户部直接派员会同行省、行台及盐司官现场勘察处置。元朝渐进建立了榷盐专业、严密、系统、完整的管制体制。

元代以海盐生产为主体，施行“团煎法”（“并远场，毁远灶，立团煎煮，外立团军巡缉”，也即集约化生产，集中管理）。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关于官收灶盐规定：“诸灶户中盐到场，须随时两均收纳，不得留难，其合给工本，运官一员监临给付。若有盐司官吏，因有所克减，或以他物移易准折者，计其多少论罪，仍勒赔偿。每给工本时，肃正严访司差人暗行体察。”① 后于元成宗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再次强调，灶户纳盐须在簿上条理记载清晰，做成花名盐数，纳多少盐量、什么时间纳盐、多纳数目、给工本费多少，无一不巨细。对于盐场，规定商人严禁入内，除运盐网船与巡盐船只以外，任何船舶不得靠近港口要塞。严禁克扣灶户工本费，严防官灶私通，严防场盐私漏，立法甚于严密。

盐场工本费，因各地盐自然资源储存方式不同，开采工作力度各异，导致制盐成本差异，因此各盐区工本费区别支付定数，但各有增减。大都盐区：元世祖纪元二年（公元1265年）每引（一般为四百斤）工本费中统钞三两，二十八年增加到八两。河间盐区：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每引中统钞三贯（两贯合一两白银），二十五年增至五贯。山东盐区：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中统钞三贯。两淮盐区：元文帝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由每引四两增至十两。两浙盐区：分正盐与余盐（正盐指正常生产应该向官府交纳的定量盐，余盐指交纳定量盐以后所剩之盐），浙西，元仁宗延佑七年（公元1320年）正盐每引二十两，余盐每引二十五两，浙东正盐每引二十五两，余盐每引三十两。福建盐区：分煎盐与晒盐，元文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煎盐每引二十贯，晒盐每引十七贯四钱。广海盐区：元成宗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每引十贯。河东盐区：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每丁捞盐一石，中统钞五钱。且每个盐场规定生产定额，全由官府收购，给予维系基本生计的工本费。

从以上盐场的划分区域、盐场官制设置、盐场生产灶盐收购、盐场工本费的支付定则可见，元朝对盐场的管理有组织、有效率、有法度，实行了集约化生产方式，为元代销售盐，榷定元盐“引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① 左树珍. 盐法刚要 [M]. 宁波：新学会社，1913：78.

## 四、推陈出新，修改钞引，官饱私囊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灭南宋后，在金宋旧盐引法基础上，由简而繁，由疏而密，由局部到全局，由松散到集聚管理，进行元盐引法推陈出新，规范引法程序。规定：其一，户部主持印引，十大盐司负责卖引，权责明确。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命令各盐司亲自调度，按照销售实情，规定引额，每年送达户部按额印引，转回各区盐司收管，用本司引信关防，各行盐地区，遵照户部指示确定引价，循序依次发卖。户部专设印造茶盐引局，委大使、副使两职，掌理引造事宜。其二，关之引盐，以勘合为依据。所谓勘合，如前所述，指"官司卖引，商人买引，就皆引目额数，开写字号，编为簿册，发司给卖。每引一号，前后两券，用印钤盖其中，析而别之，以后券给商人，谓之'引纸'，以前券为底簿，谓之'引根'。凡商人到场，关之引盐，照号覆勘，验其合否，故有勘合之称。"其三，运盐支盐必须经历四道严格审查程序，首先"批引"，商人依定"引价"输纳现钱，赴司买"引"，由各盐司批给"引目"，特注明关之某场之盐，运销某地售卖等字据。第二道程序进行"掣验"，由盐场监袋、委官监装，每引额重四百斤，平均装成等重两袋，不得短斤少两，也不可超重，自盐司以下各官员重复检校，在袋面各写上职务姓名，将所装好袋盐，编号列垛，以商人先后顺序，依次支盐。起袋时，还需再次查盘验秤。第三道程序"凿角"，经掣验后，在商人"引纸"背面，批注某商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场出场，仔细比对勘合字号相同，将引目截凿一角给商人，再由盐场官点检字号、年月、批凿、印信具备，方可引盐出场。第四道程序"水程"，商人运盐销售何处，须提前呈明，由盐司发放水程验单，填明商人姓名、引数、销售地点，钤盖司印，随引目，发给照印，沿途关津，循单查验，到达销售区域，由当地地方官员，勘查盐引数目、号名，是否与水程相符，合则准予售卖，不合，如数尽缴。第五道程序退引，商人尽销完毕，须五日内将引与水程照印一同交予所在地官府，否则按私盐论处。

元朝盐制由刘秉忠、张文谦、许衡酝酿裁定，其取法于刘寅之就场专买、范详之盐钞、蔡京之"两书一扎"勘合之策，在蔡松年"钞引法"基础上而改进修正形成。以民制、官收、商运、商销为主体，同时在特定区域也并行官运官销。

元世祖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在山东、大都、河间后扩散至滨海州郡，实施"计口授盐"。主要在盐场附近区域开展，目的是杜绝私盐泛滥，至

元二十九年（公元 1292 年）规定盐场百里①之内，进行“计口授盐”，元成宗大德四年（公元 1300 年）改为盐场十里之内。全国有了商销“行盐地”与官销“食盐地”之分，但如此盐价差别悬殊，导致“食盐病民”，往往逃徙，元末顺帝（公元 1341—1368 年）开始相继罢黜。同时效仿刘寅之策，为防止商人垄断，囤盐居奇，抑制盐价，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 1284 年），卢世荣假公济私献策，以媚权贵，开设“常平盐”，在偏僻地区设仓储盐，商人输盐之不达处，减价调剂供求。规定：其一，设置常平盐局，选拔有盐业经验的诚信的两人充当大使、副使，各县再设立一局，各路户籍较多和人口稠密的集市相机设局。其二，年销售盐数量，相人口多寡斟酌，大约每年常平盐，占全国盐总额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各盐运司煎盐额盐数，先尽常平盐袋配运，次给商贩。其三，散商零落售盐，听从售卖，如果盐价增添或无盐可卖，则官为发卖。其四，局官提点发卖，不得克扣斤两，亏损穷民，所用攒典秤子人等，不得滥设。运司额办盐数，督催各场趁时煎造，毋得阙误支发。但权势之人把持行市，肯勒百姓，当时有 100 万引盐作为常平盐，盐价依然直线上升，并不惠民。于至正三年（公元 1343 年），始行废止。

为了杜绝场官勾结盐商走漏私盐或逼勒灶户增加出场斤两，元成宗大德四年（公元 1300 年）在两淮首开“设仓网运法”，具体实施指在扼要地点或交通枢纽之处建立盐仓，设置运盐官，分网运盐，商人只能赴仓引盐，不得直接下盐场支取，且制定详细规法。元仁宗延佑六年（公元 1319 年）延续至两浙，在海盐区域逐步普及实施“设仓网运法”。元顺帝至元五年（公元 1339 年），两浙运司申奏其弊“各网运盐船户经行岁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场装盐之时，私属盐场官吏司秤人重其斤两，装为硬袋。出场之后，沿途盗卖，杂以灰土，补其所亏。及到所赴之仓，而仓官司秤人又各司受贿，概不加辨，秤盘又不如法。”② 至正二年（公元 1342 年）又革罢“设仓网运法”。

## 五、钞法紊乱，国体解析

商人销售盐价每引元太宗定价 10 两银，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 1261 年）定价 7 两银，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年）改为中统钞 9 贯，每引 400 斤，九贯合 4 500 文，折合每斤盐官价为 11 文多，至元二十四年（公元 1287 年）又改至元钞与中统钞并用，每至元钞一贯相当于中统钞 5 贯，至元二十六年

---

① 1 里＝500 米。
② 田秋野，周维亮编. 中华盐业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93.

（公元1289年）附尚书省平章政事僧格之议，每引盐价定为50贯，元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盐价增至65贯，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钞法又变，印制至大钞，每钞相当一两银，相值至元钞五贯，盐价随之攀高，直至元仁宗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每引盐价增至150贯。

元代钞法有三四变，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并建元“中统”，发行中统宝钞，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称帝，取国号“大元”，次年，确立了中统宝钞的地位。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印造发行“至元通行宝钞”，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销毁中统钞版，停止印刷中统钞，形成中统钞、至元并行局面，元至大二年（1309年），又发行至大钞，元至正十年（1350年）再次发行至正交钞收拾残败之局。为时已晚，大势已失，丧钟敲响。

元顺帝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世代以贩盐为家的方国珍聚啸浙东，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盐商张士诚等十八人率领盐丁起义，史称“十八扁担起义”，四方响应，元朝颠覆。

### 六、辽、金、元榷盐体制辨析与制度经济交易成本的关联

1993年制度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诺斯指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一种合作与竞争关系，正是这种竞争与合作关系构成了整个社会，或确切地说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① 所有制定的经济制度，必须具备以下功能：降低交易费用，为经济提供服务，为合作创造机会，提供激励机制，外部收益内化均衡，抑制机会主义者行为。只有使六大功能版块相互博弈组合成优化功能，此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才能稳定、持续与良性发展。当存在交易费用时，一个国家内部权力的分配和其制定规则的制度结构，就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从国家而论，有掠夺性国家（Predatory State）和合约性国家（Contract State）。掠夺性国家认为国家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合约性国家认为国家是人民通过协商而达成合约的结果，它要为人民服务。掠夺性国家目标是追求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后者追求是国民福利最大化。一般而言，国家具有上述双重性，既具掠夺性也具合约性。这决定了国家具有双重目的：它不但要使统治者租金或收入最大化，也要降低交易费用，使国民收入最大化，从而增加税收。可见，国家是利益的矛盾体。当统治者租金最大化与国民收入最

① （美）道格拉斯斯·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域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0.

大化和谐一致时，国家就兴旺发达；当统治者租金最大化与国民收入最大化矛盾时，统治者通过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从而增加被统治者交易费用时，以至统治者利益最大化与国民收入最大化形成对立矛盾，国家就停滞或衰退。

可见交易成本构成了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基石。也是我们本题研究的焦点，从上节元朝规定“盐制—盐引法”而证，商人完成盐交易的交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组织交易成本、政治交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是指商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谈判议价、签约、履行合约等的交易成本；组织交易成本是元商人“关之引盐”，通过“批引”、“掣验”、“凿角”、“水程证明”、“交引”以及维系商人自己管理运、销盐组织系统的合计成本；政治成本是元商人打通政要关节，从政府机构买引，以及承担盐制变法与通胀货币体系三番之总成本。三者合计构成了元朝盐商的交易成本。同时还要承担机会主义者、腐败受贿官僚者所附加成本。元朝整个财政税收盐课占十分之八，可以预估当时盐商的交易成本之重，盐商随即把交易成本转嫁给普通消费民众，所以盐价元朝屡次攀高，以至达“车米斤盐”。

元朝统治者租金收入的最大化与国民基本民生利益保障形成了最大矛盾化，元朝何堪不衰之快？何堪不亡之速？

因此民为邦本，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经济发展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最关键核心要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费用。党的十八大把民生放在首位，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深水区要解决的瓶颈问题也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注意开发生产和组织技术，制度立法科学，任何使交易费用增加的立法和制度，都会降低经济总体生产力。制度良性政策，将会降低交易费用，减少劳动需求与资本运用的制度障碍，它比生产技术性革命提高成本更低，同时速度更快。建议削减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满足民生利益最大化。以上仅呈管窥之见。

**表 1-6-1 辽金元盐制、盐官、盐运盐销、盐价、官僚体系、货币体系辨析表**

| 朝代<br>系统参比 | 盐 制 | 盐 官 | 盐运盐销 | 盐 价 | 官僚体系<br>的廉洁度 | 货币体系 |
|---|---|---|---|---|---|---|
| 辽朝（公元907—1125年）延续218年 | 简而宽松，“税而不禁”的征税制 | 榷盐院征收盐税，转运司、盐务专司 | 民制，商运商销 | 史无记载，但据宋朝边境常遭辽盐倾销，可知比较低廉 | 辽史无载，且盐官吏体系简单，暂定廉洁度较高 | 开始以羊作为比价，再以帛绢，后吸纳宋朝铜钱，并且自铸，形成稳定的“宝钱制” |

表1-6-1(续)

| 朝代<br>系统参比 | 盐 制 | 盐 官 | 盐运盐销 | 盐 价 | 官僚体系<br>的廉洁度 | 货币体系 |
|---|---|---|---|---|---|---|
| 金朝（公元1115—1234年）延续119年 | 繁琐严密的“钞引法”为主体，纳税商盐制、官司榷卖制、免税供应制、折博制为辅 | 七盐司，其下有副使、判官，场管有管勾，其下有同管勾、都监 | 以民制、官收、商运、商销为主体，实行分去销售制度，沿淮榷场自由买卖 | 山东、沧州、宝坻42文每斤；西京28文每斤；辽东、北京15文每斤。 | 用人明确苛刻，制定了监察、考核制度。但史载：山东、沧州两盐司自培新课，官不经理，管勾、同管勾、都监相互奸弊。廉洁度中 | 1115—1153年逐渐走向货币交易，1154—1189年，以钱为主，钱钞并用，1190—1234年，货币混乱崩溃 |
| 元朝（公元1271—1368年）延续97年 | 元初征收六色税，其间14年循金制，元至19年用“引法”，并且形成缜密的榷盐制度 | 后置茶、盐引局，设正使、副使两名，悉归户部，而领于中书省，设八个都转运沿使司，一个茶、盐转运司，一个盐课举司，各场官形成完整管理体系 | 以民制、官收、商运、商销为主体，同时在特定区域也并行官远官销 | 元世祖中统二年，官盐价为11文每斤多；至元二十六年为62文每斤多；成宗元贞为81文每斤多；武宗至大二年为125文每斤，仁宗延佑二年为150文每斤 | 元史载：两淮盐使纳速刺丁，受贿多付商盐，贪二万二千八百锭；河间运盐使张庸盗官库钱二万二千余锭；江浙行省平章阿里等，诡名买盐一万五千盐，牟取暴利。廉洁度低 | 1260年发行“中统宝钞”；至元八年发行“至元通行宝钞”；至大二年又发行“至大钞”；元至正十年再次发行“至正交钞”。通货膨胀严重 |

## 第七节　明朝榷盐，引法紊乱

西汉桓宽《盐铁论》中贤良文学陈述了国家参与盐铁专营体制的流弊，强化了国家财政收入，而忽略民生之需求，非治国之本务；官吏扰民、吏容奸豪，势成官商勾结，百姓病苦。贤良文学与大夫之间的争辩，显性是儒家经济思想与法家经济论的撞击，实则是不同政治经济体系建构的辨析。更深层的是效率经济制度创建的探索，管制与俘获平衡点的把握与掌控。聚焦明清榷盐体制的变迁轨迹，辨析其构建的体系原则。

### 一、明朝榷盐体系

（一）整顿盐产，盐戎结合

明初循元旧制，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整顿梳理盐产，首先清查灶户，重新编造丁册，按户计丁，名曰“盐丁”，按丁计盐，名曰“额盐”。岁给工本（或工本钞、或工本米），不得私卖，凡属灶户，一律免除杂役。滨海各区及四川、云南统称“灶户”，两浙称“亭户”，福建称“盐户”，池盐地

区称“捞盐夫”、“盐池夫”、“盐户”。场产组织，另在戍边卫所、两淮地域、四川井盐产地等，配备煎盐军与灶勇，煎盐军为戍边军士担任，灶勇则是在两淮三十场盐丁中，选精壮盐丁3 000人，各场设一“百总”、十场设一“千总”统帅，每年农历三月至农历五月中旬，在汛期，防倭寇入犯海疆，有警则随军调用，无事则加急熬盐，把盐业生产制度与海防军事调派紧密结合。明朝洪武“全中国盐共计二百五十三万三千余引”①。

（二）全局总控，设置盐官

同时调整官制，设置两淮、两浙、长卢、山东、福建、河东都转运使六名；广东、海北、四川、云南分解为四（黑井盐、白井盐、安宁、五井）共七个盐课提举司；陕西盐课司一名。

（三）提高技术，世界高端

明朝科学家宋应星于崇贞十年（公元1637年）著《天工开物》“作咸”专章记载了海水盐、池盐、井盐、末盐（土盐）制盐详细工艺流程，并精细绘制了“布灰种盐”、“淋水先入浅坑”、“海卤煎炼”、“量较收藏”四幅图。井盐制作“开井口”、“下石圈”、“斧井”、“制木竹”、“下木竹”、“吸卤”、“场灶煮盐”、“井火煮盐”、“川滇载运”② 九幅图详解。当时中国之制盐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高端水平。

**二、开中稳边，军屯与商屯结合**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北部追击元兵，西面攻略巴蜀，稳定山东、陕西、河南诸郡，效仿宋朝之“折中”变通为“开中”法，令商贾输粮于边关，发送盐引，然后赴各盐场支盐运输销售，依元朝之严格“掣验”、“凿角”、“水程证明”、“交引”旧制放盐。准确而言，凡遇边关要塞缺粮食，由户部发榜招商，急赴边关纳中，首先由户部编制勘合底簿，分号而立册，一份送达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另一份发送给各运盐司或提举司，待各客商纳粮时，由收粮机关填写纳粮数目并应对给予相对引数和发放仓钞，商人再投呈各运盐司或提举司，盐场官员仔细对比验查朱墨字号印信契合后，按照引数，依据上述四道程序，下场支盐。与宋朝不同之处在“以引废钞”，与元朝相异之处在“纳粮支盐”，引相当于粮盐兑换券。

同时以“纳马中盐法”、“纳草中盐法”、“纳布中盐法”、“纳铁中盐法”③

---

① 佚名. 中国盐政沿革史［M］. 北平：盐政杂志社，1914：64.
② 宋应星. 天工开物［M］. 长沙：岳麓书社，2002：45.
③ 李洵. 明史食货志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2：78.

相继参照补充。许多商人为免征运转输之劳顿，在塞下土壤肥沃之地，招民垦荒，修建台堡，星所相连，兵民云集，聚居团保，谓之“商屯”。既解决了边关生计，又巩固了边防。后又变为“纳钞中盐法”，各地盐钞价格高低悬殊不均，钞法紊乱，陷入困局。

明初期，盐制法度严谨致密，制盐有定额，销售有区界，借以“开中法”补阙边关急需。国家盐业正常经营，运销通畅无阻。

### 三、“占中”、“抱中”破局

明成祖永乐初年（公元1403—1424年），以京卫乏粮为政治理由，悉数停止“中盐法”，只在京卫开中，无论官吏商民，淮浙每引盐输米三斗，河东两斗，四川一斗五升。遂开启“占中”、“抱中”之弊端。永乐四年，远征安南，粮草难以为继，又恢复招榜开中盐旧制，其间，出钞过多，物价上涨近五十倍（白米一石价格洪武初年为1贯，1424年涨为50贯），为了回笼货币，抑制通货膨胀，实施户口食盐法，通过销盐，计口收钞，大户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户或未成年半之。

仁宗洪熙元年，权令各处中盐，悉并纳钞。宣宗宣德三年，又停止纳钞，改为纳粮，英宗正统（公元1436—1449年），创造“兑支”一法，以解决盐场引数过多，则不敷支应，过少，则壅塞不销的窘况，在淮浙岁盐不敷支配时，可分赴河东、闽、广盐场支取，也可留守。正统五年，将盐支分为“常股”与“存积”① 两种，两浙、两淮、长卢盐场，以十分为率，八分给予守支商，按照顺序先后行支，称之“常股”，二分交官收储，当遇边境危机，不分顺序，引到即支，谓之“存积”。于是又酿成常股价廉，存积价贵的情形，存积供不应求，常股滞塞，又更行“兑支”法。淮浙不能支取，配兑长卢、山东盐。但商人一人兼支数地疲乏劳顿，则将盐引卖与就近商人及富人，从此，又产生了“内商”，即内地守支者；“边商”，即赴边中引者；“水商”，即专卖内商引盐，运销全国各地，官府为统计其数，给予水程，故称之。滋生了内守支盐，不能及时运销市场，边商中引者，盐价次节抬升，商人、官吏、权贵乘机权变，哄抬市场盐价，造成盐业窘局。

### 四、开中变质，折色困惑

明宪宗成化十三、十四年（公元1477—1478年），李敏任户部尚书，在畿

---

① 即商人中盐有不次支给者，谓之存积；有循次守支数十年者，谓之常股。

辅（京都附近地区）、山西、陕西以银两值折军饷，开“折色”先例。孝宗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叶淇为户部尚书，在全国推广尽改“本色”为“折色”①，“易粟为银”，所交银钱，尽纳国库，再分给各边防区，以解饷需。当时已积累一百万两银。但此后开中法变质尽费。明永乐年间，商人只需输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支盐一引，边关实施“商屯”后，一石粟，价格为二钱银，五分银即可得盐一引，但折色之后，需纳银三钱五分或四钱二分，相当于购粟两石，国家获八倍之利。国库充实了，但边关由于转运粮食不能及时到位，实则又生弊端。

## 五、余盐腐败，官商勾结

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清理两淮盐法侍郎李嗣奏请准许守支商人收购灶户余盐，补充正引。开此准奏后，随即卢东浙广，依例照行。正引后，有余盐。正引盐贵，且时间周转慢，而余盐，只要勘合，即可支取，且价廉。缺口大开，趋利而进，皇亲国戚，内宦外官，蜂拥奏讨残盐，以旧引买余盐。寿宁侯张鹤龄准请长卢旧引七十万引，每引纳银五分，免盐课。随之，官商勾结，分别收买各场余盐，构两淮旧引一百六十万引。宦官李广每年请拨两浙盐引5 000引，获不法之利近百万两银，为历代之罕见盐污案例。

武宗在位，权贵要员续请余盐，可用旧引十年之久。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政府颁“截角令”，所有旧引，立限追缴，引价叠增，正常商引臃塞。盐官承中环意旨，更换名目，秤盘余盐称“所盐”，开中未尽之盐谓“零盐”，以契谋私。把过去“常股”存积之引盐，皆改为正课，照例折银，商人纳银八钱，买一引。世宗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增添空发盐引，每正盐一引，可买余盐二引，正盐未派发，先占余盐，余盐日日增，正盐月月累，商人与灶户俱陷入困境。奸邪狡诈者，需求“权力寻租”②，籍引为据，勾结盐官与灶户，越场收买，私制私贩，且对灶户盐课折交现银，每引三钱或两钱银，而发放工本由于钞货贬值，名存实亡，灶户只能选择卖私盐，以求救济。此际

① 明初实行开中法，以方便边境开发，效果良好。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弊端太多，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改行折色法，商人向盐运司交纳一定的银两，便可直接以盐引事食盐贸易。自实行折色法之后，徽商大肆进入两淮盐业，“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

② 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权力寻租是把权力商品化，或曰以权力为资本，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即通常所说的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此处狭义指盐商与明朝政府官员之间暗箱交易。

官收场盐法规已坏，私盐盛行，空引赘存。

### 六、袁世振榷定“纲网”运销制度

神宗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法疏理道袁世振，以“正引现支，挎销积引”为导矩，疏通积引，其规为：把商人所领盐引编写纲册，淮南为十纲，淮北为十四纲。“淮南以‘圣德超千古凤凰扇九围’十字编为册号，编为十纲；淮北以‘天杯庆寿齐南岳，帝藻光辉动北辰’十四字，编为十四纲。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行旧引者止于收旧引本息，而不令有新引拖累之苦。行新引者，止于速新引超掣，而更不贻旧引套搭之害。两不相涉，各得其利。”①此法一出，开创了中国商专卖制之滥觞，十字纲册订立，留给商贾，永乐年年，据为“窝本”，引就变革为引商的“根窝”或“窝本”，在十纲册上挂名之商，永占“引窝”，具有世袭延续性，才有专买专卖权利，无名者不得参入。政府无盐支商，令盐户将应纳盐课，按照引数交银，称“仓盐折价”，交毕商人自发组织，赴场运购盐。由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官专卖引法，变政改革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此法延续至清朝。

### 七、盐法崩解

熹宗天启（公元1621—1627年），阉官弄权，肆意搜刮民脂民膏，每引盐价五钱之外，附加余盐、遂饷银、挑河、募兵、赈济等多种名目税课，每引涨至三两八钱。思宗崇祯（公元1628—1643年），重加剿练诸饷，益加盐价，每引五两六钱，六两上下。商民在官府压榨下，只有行私盐之贼，导致私盐猖獗，给事中黄承昊之辈屡加调整，明替暗换，盐制成决堤之势，盐法崩溃。

左树珍氏评论“有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循用引制。自成化以前，重在开中，而坏于存积；自成化以后，改为折色，而坏于余盐。其间权要内宦紊乱盐法者，亦不可胜纪。终明之世，变而日下；迨至末季，时事危急，虽欲加以整理，胡可得耶?”②。

---

① 曾仰丰. 中国盐政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② 田秋野，周维亮. 中华盐业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88.

## 第八节　清朝榷盐，波荡起伏

### 一、清朝行盐区域

清朝《食货志》扼要记载，台湾有五个盐场，行销本府，蒙古、新疆多产盐，满足自需，内地十一大盐区列表分述如下：

表 1-8-1　　　　　　　　清朝全国行盐表

| 盐　区 | 盐　类 | 行盐区域 |
| --- | --- | --- |
| 长卢旧有十二场，裁为八场 | 海盐 | 直隶、河南两省 |
| 奉天旧有二十场，分整为九，日本占金川滩地，为八 | 海盐 | 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 |
| 山东旧有十九场，后整合为八 | 海盐 | 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 |
| 浙江三十二场，分隶浙江、江苏 | 海盐 | 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 |
| 两淮旧有三十场，裁为二十三 | 海盐 | 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 |
| 广东二十七场 | 海盐 | 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 |
| 福建十六场 | 海盐 | 福建、浙江两省 |
| 四川州县二十四产盐 | 井盐 | 西藏、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甘肃 |
| 云南二十六井 | 井盐 | 本省 |
| 河东盐池分东、中、西三场 | 池盐 | 山西　河南　陕西三省 |
| 陕、甘盐池 | 池盐 | 陕西、甘肃两省 |

### 二、针对盐产盐销的管理

在生产销售管理上，清朝废除开中之例，把明之“边商”①、“内商”、

① 指边地的盐商。明弘治以后，凡凭引行盐的盐商分边商、内商、水商三类。边商缴纳盐课，领取盐引，并照官定引价将引售与内商；内商专买边引，下场收盐上滩，并照官定盐价将盐售与水商；水商多是销岸商贩，专收内商食盐在指定引岸行销。清代，以上三种名目均废。但四川引盐运销云南、贵州两省的运商则仍称“边商”。《明史·食货志四》记载：“一人兼支数处，道远不及亲赴，边商辄贸引於近地富人。自是有边商、内商之分。”清顾炎武《富平李君墓志铭》记载：“数传至君之曾祖讳朝观者，为边商，以任侠著关中”。

“水商”，裁掉“边商”，组织成“场商”和“运商”，“场商”专门从事囤买场盐，卖予“运商”，而“运商”领引交纳货款，专门从事行销盐。“诸如引商、岸商、两广之埠商为‘运商’，长卢之坨商、两淮之垣商、浙江之运商、河东之坐商，为‘场商’也”或占岸者曰“业商”，租引者曰“租商”，代租商办者曰“代商”，业商凭借一纸虚引，坐享巨利，租商、代商层层盘剥，奸诈百出，盐官籍资筹款，私下索费。可见清朝场盐的出产，悉数尽归商收，商人主行运输、销售，主体为就场专卖制。

### 三、修调“纲网法”制度

清初，对明朝“纲网法”之弊，进行修正调理，由户部颁发不定额盐引，凡商认领盐引，需要按年交课税，照额运销盐，不得转租转让。如果盐课未交足，额数未运清，即刻革除该商“引窝”，另招募商人填充。虽将明末各种巧色名目盐课，进行罢黜，但不久即行增课增引，以解决军饷浩繁之需。至康熙三藩之变，行二引之盐，纳三引之课，连销带征，还是盐引停滞，再加上各级盐差官员，层叠巧立名目，违法间接私自派税，国家亏课，黎民受困，清朝盐弊起于顺治康熙之端。

世宗雍正悉数洞察其中弊端，颇具整饰之决心，实施许多举措。诸如：严禁盐官例规，予以废除，酌留归公，商人随引带纳；对于长卢、两淮各区之网商，实行滞岸引盐，畅岸通融代销，作为一时权宜调剂；对于广西由于地缘偏僻，改商办为官运管销，福建则裁商废引，盐课摊归各场，由州县征解，县域附近和边远地区进行官卖制，四年后，又更改为就场专卖，广东场盐改为官收，裁废场商，仅留埠商运盐办课；甘肃土盐因为倾销官引之盐，将引课纳入地丁，按数摊征，废引裁商，随民自由贩运。同时将东登、莱州、青州三府，删除商销，改行民运，应征课额。雍正整理盐制过渡时期，但大都采用一时之权宜之计，未治得根本。

### 四、“报效”、“加价”、“加耗”，导致盐法混沌

乾隆时期，用费广奢，军饷开支需要，大型庆典开支，工程费用，俱由两淮、两浙、卢东各商捐输，动辄数十万、百万两银。南巡数次，差费浩繁供应，皆取自于商，而盐商勇于报效，官府就奖励职衔，同时批其“加价”，后准其“加耗”给予优恤，作为调剂其资金周旋。“加价”徒以病民，加之后，盐价就直线上升，遂不能再减，人民受累；“加耗”紊乱盐法，商人籍以大包捆扎，任意夹带，报盐耗损，正盐拥塞，私盐就盛行，盐法乱也。商人偶然缺

少本金，内府发百万帑金借予商人，俾资周转，称滞为“帑本”，商人则交利息，谓之“帑利”，商人承受课项、帑利与报效款三重压力，积欠过多，各省盐务陷入泥潭，呈不可收拾之局面。前清盐制坏于乾隆时期，其根源起于“报效”。从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至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七十一年间，仅两淮引商报效盐款已经达到二千六百余万两之巨。

嘉庆、道光年间（公元1796至1850年），报效军需，河流水利经费，连续两次大量征缴，商人累赘重重，不堪负担。各省盐务因势利变，如“陕甘盐课改归地丁，云南就场征税，广东改纲归所，河东改行招商，山东之官商并运”①。唯独两淮引多税重，为专商把守，该期每岁两淮应行纲盐一百六十余万引，淮南仅销售五十万引，亏课银五千七百万两，淮北只销二万引，亏课银六百万两，盐务局面混沌，商业疲惫，民生困苦。

## 五、陶澍改盐制

### （一）改盐制之前的弊端

两江总督陶澍洞察秋毫，明晰是非。概述两淮滞困局：两淮商人上交科税有正项、杂项、外支、带款等，商人自用度有引窝、盐本价、捆绑、运费、辛工、火足诸等，总商另立外销、活支、月摺、岸费等名目。导致本重价悬，销售停滞，转运困乏，积引累赘。官府不得已销售一季，让出本纲，分限摊补，每纲支解之款，又不得停缓，只有上纲下纲征收之银，腾挪活用，借垫补塞，同时连征带补，使得商人盐成本愈益加重，盐引自然滞销。同时私盐猖獗，既有枭贩，更重是商运官盐，装盐江船之夹带，商人于正盐之外，报耗卤无课之夹盐，与盐官狼狈，既有包内之私（捆盐出场，多带重斤），又有包外之私（以盐抵当江船水脚船价，或船户不领脚价直接向商厮埗头行贿装盐，目的是借公装私）。抵达汉岸，抬价居奇，停船挨卖，以狭道窄路自窘，而私贩转得顺畅，称“整轮”；穷年守候，销售无期，于是在后面的船，钻营靠前，与被越船主合谋，将待发之船的盐偷卖，轮到后船时，已经无盐可卖了谓之“过江龙”；更有甚者，将船凿沉，以毁灭偷卖之痕迹，谓之“放生”，奸弊丛生。引不能逐年销尽，课税焉能年清年款，为了弥补亏空，自然滋生奸诈，以预纳、减纳、贴色、贴息之名征收，或折减若干，添为正数，其中贴色、贴息作为加色、加息之数，奸商巧占便宜，而国库衰减。报效款项也有内诈，开始循规，后衍变为乃先由运库垫支，再分年带征，积欠累累，故库存正款变为商人

① 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78.

骗取议叙之用，商捐之名，徒为虚纳。总商肆意叠加岸费，汉口每引一两四钱，与其他办公费用相加，一年计二百多万，全由库内垫支，然后摊派于众商家，其账目混淆，诡混开销，造成库亏。在扬州，新院上任，修理衙署，置办公务用品，一切开销，竟用至十万两，俱由总商经手，浑水入私，且捏名假造册冒支饷银，如：总漕、总河等虚名，巡抚衙门以缉私犒赏为名虚套饷银。京外各官，闻财而进，谎托可知，对汉口一岸，托名游说，暗收其贿。尤其总商托名办公，以“不敷”二字作为侵吞护符。对于连征带补，预纳、减纳之活套乱搭，挪前后移，把自己亏欠，转嫁他商，帑本、帑利，而本银已经化为乌有，所纳者，不是原商，尽为他人赔偿。关规之用度，连本全摊，任意牵连，胡作非为。主要弊端凸显在三个层面，一曰“浮财”，二曰“夹带”，三曰“私贩”。

（二）淮南、淮北票法盐制章程

针对上述旧制所带来的漏洞，拟定十五条章程：裁减浮财；删减窝价；删减繁文；慎重出纳；裁减商总；酌核带销；积欠宜缓；宜恤灶丁；实给船价；严究淹消；疏浚运道；添置岸店；亟散轮规；整饰纪纲；淮北另筹。[①] 道光十二年（公元 1832 年）奉准在淮南实行，同时将两淮盐政裁撤，改陶氏兼管为专管。

淮南盐务大致整理成序，转战淮北，淮北主要是黑费增多，为地方土棍挟持，地方官吏与黑恶势力勾结染指其间，针对症结，拟定十项章程详细如下：“一是由运司刷印三联票，一为运署票根，一留分司存查，一为民贩行运。按道里远近，立限到岸，听其销售。运盐出场，由卡验放，不准越卡，也不准票盐相离及侵越别岸，违者并以私论。二是每盐四百斤为一引，盐场照钱价合银六钱四分，抽税照商运科则酌减三分之一，计银七钱二分，加办公各项经费五钱二分，合计一两八钱八分，此外不得分毫索取。其捆工包索，听民贩自行经办。三是各州县招徕民贩，由州县给照赴场买盐。其附近海州者，即在海州请领，俱赴场大使衙门呈照请票。每票买盐，自十引至百引以上为一票，近场地带酌量变通，海州赣榆以百斤起票，余淮一引起票，以便民食。四是于各场中建立局厂，共设立五局，以便灶户交盐，民贩纳税。五是民贩买盐出场，必须经卡经卡查验有无夹带，然后分赴指销口岸销售。六是临兴场所所属之唐生、兴庄、拓旺三疃，陆路既艰，水路隔绝，另遴委妥员驻扎青口，专卖办理仓盐、渔盐之收税给票事宜。七是运道必须肃清。向来水陆私路之地棍土豪，索

---

① 陈锋. 清代盐政与盐税［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84.

费包送。今改行票盐，民贩一经纳税即系官盐。地方官吏应认真查拿匪棍，倘若有抢盐讹索情事，从重办理。八是缉私以防河为扼要，责成厅营督帅文武汎官严密稽查渡船，以缉私源。九是畅岸运商如因引地毘连，虑及票盐侵越，准予认销旁边滞岸票盐，以保畅岸。十是票盐多系民人贩卖，资本不多，各衙门不得向民贩索取陋规。如胥役兵丁借端勒索，一经民贩讦告，或别经发觉，即严行究办，以除积弊，而肃鹾证。”

（三）陶氏具体措施

道光十二年（公元1882年）七月正式启动实施，简洁归纳为“归局不归商，改道不改捆”纲领，所谓“归局不归商”是指废除专商“纲网”，打破“窝本”盐制，在盐场设局，灶户把盐交予盐局，由官给价收购，盐贩则交税纳款于局，直接领盐行销，不必为专商控制。“改道不改捆”诠释为变更旧有貢墹淮所之网盐运输线路，改行王营减墹渡河入湖泊，每包一百斤左右，出场不准改捆，直达销地，降低民贩成本，减少抛耗。如此一变，票法成本仅及纲盐一半，民贩蜂拥而至，盐船络绎不绝，千帆竞发，三百里盐路拥塞不堪。数月收税三十万引，数十年积盐旬月罄尽。

（四）陶氏盐改拓展

第二年二月（公元1883年），陶氏察票盐功效显著，于二月十日奏请纵深推广湖运畅岸，在安徽寿州五县，河南罗山六县，一律招商贩运，改行票盐。并针对销运进行微调，税价由每引一两八钱八分，增为二两零五分一厘。销区放宽限制，但只能在实施票盐销区四十二州县范围以内，违者按私盐治罪。由于票盐销地推衍，商贩踊跃征购销盐，需盐倍增，私自加价预买场盐，场商贪图盈利，修复废池并新开盐池，合计四千六百余面池，且预售过多，导致盐不偿贩，亏欠累累，陶氏悉知其害，厉行“归局”，不准私自交易。此际，商人争纳盐引，共达四十九万引，除有盐可贡，尚溢出收银三十几万两，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悉数补济亏欠，清结账目。并补充规范，一切归局派买，先课后盐，究出抬价卖空之弊。两年后，定“验货”之法，具体操作如下：由各要贩先将应交之款若干引呈验后存分库内。再具体统筹结算，倘若浮于盐，银则当即退还，盐则折扣均摊，禁止私托不良竞争。

（五）陶氏盐改功绩

陶氏票法，由道光十二年至十九年止，销票盐331万余引，较定额172万余引，溢出销盐159万余引。八年之间征纳税银337.9万余两，课程倍于售

额。魏源评述“利国、利民、利商、利灶，为数百年所未有”[1]。票法革除了中饱私囊的弊习，把利益还归商贩；网商销盐疲惫不堪，票法凝聚散商合力，调动销盐效率；过去网商，要经各方蛀虫侵蚀，而散商各自独立经营核算，以达防泄补漏之功效。网埠口岸规费繁琐勒索，而散商呈涣散之势，无从销售索取；网商本重费赘，增夹带私盐之隙，而散商本轻费简，可以解化为官府并兼之利。票法打破了商人持引窝垄断盐贩之旧矩，同时一定程度上开放了销盐的界限，在销界之内，州县可以自由流转贩卖，革除专商专引之弊，要课场内俱已收纳，为就场征税，为有限制的自由贸易。

### 六、战争盐难

清咸丰（公元1851—1861年）初年，户部陈疏票法与纲法的优劣，请各省盐务效仿两淮行盐，虽所建议未被采纳，但河东、浙闵改行票法，不久，太平天国运动，盐法患难，票法随之成为历史的浮萍。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止，战乱约十五年，沦陷六百余城，波及中国一半，导致淮南、长江梗塞，盐运不畅，裹足商贩，两浙灶户逃亡，四川自流井遭受蹂躏，河东行盐节节被阻，备受骚扰，陕甘地区花马池盐塞不能出，朝廷行战时盐法，减税平价，销界自然破除，官府也只有因势利导，八方疏浚。

### 七、曾国藩“保价”与“整轮”两策的实施

清穆宗同治三年，克服金陵，长江畅通，盐道舒行，两江总督曾国藩依照旧有票法，参考网法，拟定新章，把散户聚合为整，专招豪商，规曰：凡是在湘、鄂、赣三岸行销贩盐者，五百引起票，称“大票”；行销皖岸以一百二十引起票，谓“小票”。大票约需五六千两银子成本，小票约需一二千两银子，导致民贩力殆，丧失陶氏原解精神。同时在鄂湘西皖四岸设立督销局，由两江总督委派江南候补道员兼理总办，以湖北、湖南、江西各盐员担任兼办，但皖岸只设总办，其中淮北督销局以正阳盐厘局长兼任总办，于仪征设扬子淮盐总栈，由道员做总办，凡督销局仪栈之总办，必须一年更易。但改定新章后，出现新问题，盐额少而商人蜂拥而至，不能均分，又依照过去验赀、掣签、减折之法，并且推出“保价”与“整轮”两策，“保价”指盐商销盐到岸，由盐局

---

[1] 陈其泰，刘兰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魏源评传（上）［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88.

经理，按照市场滞畅，酌量销售行情，核定盐价，称“牌价”。“整轮”是指盐船抵岸，首先赴局挂号，按照船抵先后差次，列榜局门公示，依序发售，亦谓“轮档”。

## 八、李鸿章两淮盐制的梳理和循环纲法与厘盐制的无奈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李鸿章任两江总督，认为验赀、掣签、减折之法，尚存流弊。为了化解商人额满不得引盐之困境，令已认引之商贩，预纳后运盐厘及报效捐款，将原请商名续运后网之引，实行循环积运，不增新商贩。如果不愿续运数商，则另招补足。在鄂湘两岸预厘，东岸每引一两，西岸每引二两。报效款西岸每引一两四钱，皖岸每引一两，鄂岸六钱，湘岸五钱，殆清之后，始发环运咨文，获后即赴扬州总局投咨挂号，每引预交一半盐价，经核查无误，按投咨先后，排开网买单次第。如若违反限期不投缴者，引票扣运一次，杜绝机诈，待售出本网一票之盐，督销局再发予下网之一票咨文，循环往返，定为世业。首先在淮南展开，接着在淮北遵例报效。两浙也随之改变章程。整纲以一百引为一票。招商认领，按引缴纳捐，发放执照，世世代代永续循环转运。

## 九、晚清盐政，一盘散沙

自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朝廷规定票商以一年为断，每年每票除缴纳正杂课厘外，每年尚需按年捐银一次，作为票本，上则捐款一千两，中则捐款八百两，下则捐款六百两。后实施改为按引摊派，淮南八万两，淮北两万两，票商由此据本行专盐之利，专商擅利伴随清代终结。

厘盐两淮立矩始，全国各省竞相效仿，光绪之年，叠层交加，厘价合计超越正课，盐价伴之倍增，正盐日贵，私盐就倡行。官不敌私，俱废引岸，形势所迫，又不得收拢聚集，转归官办，主要由地方州县领引办运，同时设立专卖局，以局办补充。光绪末年，黑龙江之吉林创设行省，广东湖桥改行官运，江苏的淮徐六岸、江西之建昌五岸，改行官运，长卢之永七岸改行官运。晚清盐法，各自为政，紊乱无章。演变为官运官销、官督商销、官运商销等多种盐制并存的复杂格局。宣统元年，于中央设督办盐政处，筹谋统一划权、清理、规划、整顿事宜。宣统三年升级为盐政院，辖统全国盐务，但值武昌起义，旋即裁并度支部办理。

## 第九节　明清榷盐体制中管制与俘获经济理论的勘查与启示

### 一、管制与俘获经济理论的要点

管制和俘获是人类经济社会极其普遍的现象，管制和俘获是政府管制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管制同其他国家权力相比较，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和任意性。管制是政府依据各种法律、规则或制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行为，是一种强制性的管理，具有垄断性的特点，其对象慑于政府权威而被动地服从和接受。经济活动复杂多样，而法律规则却无法一一具体规范无遗，管制当局往往采取原则性、灵活性的规范对现实情况进行相机处理，因而，政府管制权力的行使具有很大自由性。政府管制还具有特定性。政府管制也是公共产品，因为政府管制针对众多经济主体且作用于所有被管制对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同时，政府管制这种公共产品又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可以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对一些利益集团有利也可能对另一些利益集团不利。因此，管制就存在了特定性。各利益集团在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上，竞相争夺政府管制这种公共产品，并产生出政府管制的不同效用或效果，这些都决定了管制俘获问题的普遍性。

而"俘获"（Capture）是一种政府主动或被动采取的行为，通过使用管制政策的方式，保护那些非法的、不道德的、不合规定的或非公众利益的活动。或把"俘获"定义为"掳掠"和"掠夺"，一方获得资源，而相应的成本由他方非自愿地负担。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对管制俘获解释为"'管制俘获'是指被管制的产业控制了管制机构的政策"。斯蒂格勒、佩尔兹曼等人得出结论："被管制企业为了寻求垄断利益而采取各种行为，在政府管制高层上所产生的效应，政府管制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产业对管制的需要而产生效应，即是立法者为产业所俘获；而管制当局最终会被产业所控制，执法者为产业所俘获。"[①] 其主要俘获方式有：一是立法俘获。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群体或个体为了其自身利益，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秘密、期货型的个人报酬，以影响法律、规章、法令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是上层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立法俘获是体现更隐蔽、更高级、更"合理"和"合法"的非正当利益合理的追求，

① 李晖，孙长青．利益集团政府行为与管制俘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126.

是以法谋私的行为。二是执法俘获。集团或个体，公共或私人部门，为了自身利益对政府官员施与复杂方式的个人私酬，故意扭曲现行法律、规则和规章的执行，它主要表现为下层腐败或小腐败，是一种以权谋私的行为。政府管制机构享有社会事务的管制权，管制执行权一旦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以及私人利益所俘获，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权力蜕变和异化，执法的过程就会变成实现某种利益和经济收入的过程，借管制执行牟利。三是变式俘获。产业在没有向政府官员提供提供秘密行贿情况下，通过企业自身所具有的产权、市场规模、市场力量以及与政府部门的利益相关的优势，从而对法律、法令、规章系列政策制定实施施加影响。

现实中的政府并不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由于政府官员与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利益存在千丝万缕的牵连，政府管制措施不得不向相关利益集团倾斜，各种出台的政策措施表象层面是获得大众公允，其隐性实质层面是利益集团的利益与政府部门的利益均隐含在其中，或者说是彼此博弈平衡的结局。政府管制与其说是为了公众利益，更透彻地说是特殊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弗里德曼将管制俘获形容成“一只无形的政治之手”，而赫尔曼和考夫曼将之描述成一只“掠夺之手”。因为它为政客和官僚从国民经济中掠夺不正当利益开辟了漏隙。

当我们深思明清榷盐体制时，可审视其中无形政治掠夺之手的操纵，其演绎着管制与俘获的运行轨迹伴随历史的演进。

## 二、明清榷盐体制中历史管制与俘获的体现

明初实施“开中制”，经过严格的“掣验”、“凿角”、“水程证明”、“交引”四道程序方可放盐，同时以“纳马中盐法”、“纳草中盐法”、“纳布中盐法”、“纳铁中盐法”进行补充校正，以“商屯”充实了边关的给养，随之更改为“纳钞中盐制”，朝廷出钞过多，大肆聚敛民财，钞法紊乱，悉以带来开中制度的紊乱。在“开中制”实施进程中，京卫开中，无论官吏军民，皆许中纳给盐，如此一来，权势豪强霸占盐引，遂开虚假“报中”、“占中”之弊端，是明显的“执法俘获”陷阱。为了疏销盐，又将支盐分为“常股”与“存积”，由于“存积”盐享受快捷支盐的官府政治通道，再次陷入立法俘获与执法俘获的叠加陷阱。“余盐”、“残盐”立法等于是权贵集团通过管制与俘获获得立法与执法的缺口，得到了“权力寻租”的捷径，盐法已坏。袁世振通过一时权宜之策，创造了“纲法”，商贾可以永续性占据“窝本”，世世代代享有专买专卖权力，无疑为中国盐政历史上一大亮点，同时也使盐体制掉入

更深的经济陷阱，其实质是实施“成本垄断战略”或称“管制勒索”。明朝后期，阉官当道，更是大开“权钱交易”之门，“掠夺之手”肆意蹂躏盐法，国纲盐制全然腐化。

清朝首先在明朝销盐分界划定的基础上进行了明确的产盐、销盐区域划分，是均衡地方利益以及各利益集团倾轧的结果。同时对网纲法进行改良，实行不定额盐引发放，在各层盐商中间，制造竞争局面，将“引窝”变为灵活归置，但虚引却成为利益集团争逐的目标，实际是管制与俘获的对抗和协调。伴随乾隆时期报效款项的扩增，各种加价与加耗名目返还给商人，实则是盐商俘获成功的体现，推行“帑本”更是商人无本生利的开辟，但商人承担课项、帑利与报效款三项重压，管制与俘获的天平，倾向政府官僚。盐制也就失去了对商人和平民的公平。陶澍票盐，其基准点是在政府官僚、商人利益集团与消费大众之间设置利益公平原则。后期曾国藩逐渐篡改票盐原意，行大票与小票盐，在专商利益得以保证的情况下，以“保价”、“整轮”两策，厘清利益集团内部的无序，李鸿章加重报效盐款与盐厘，利益集团在付出“寻租投资”成本的前提下，重新又获取了垄断地位，俘获政府管制继续永续循环运转。清朝盐制陋习百出，在管制与俘获演变进程中，重新回到了明朝盐纲网制度的起点。

## 三、如何粉碎制度租金体系，建立租金消散机制

“如果说制度是游戏规则，那么利益集团就是玩家。”① 经济学家诺思慷慨陈词，游戏则是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管制与俘获，其实质是制度的寻租行为，因为任何一个体制社会都会存在缺陷，都存在大量制度租金创造机会，解决俘获的措施是粉碎制度租金体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租金消散机制。

### （一）最低限度控制自由随意裁量权

应该将政府在市场上的主导管制处理的额度尽量裁减，才能控制管制主体行为，自由支配管制越少，受法律约束就越多，就能减少当然性的市场主观行为，更能为大众公共事业奉献，社会更加繁荣长达。首先，管制应该以法制为先导，政府市场行为法制化。要强化这点就是把“权力关在法律的笼子里”，构建法律笼子，需要健全政府管制和立法程序，按照相关法律建设管制机构，按照管制法规的行政程序自行管制。做到政府管制立法的规范化，做到政府管制司法过程的社会化。其次，政府应该限制、放松管制，做到有限、有效管

---

① 袁庆明. 新制度经济学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38.

制。要时刻警醒“国家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实现政府有限管制，杜绝政府越位行为，政企分离、市场经济与政府管制适度分离，把相关企业变为独立面向市场的经营主体，切断与政府机构利益链条，同时放松管理，放手让具有市场调控和发展成熟的企业自行完成市场的调适，由保护性管制，上升为激励性管制。

（二）建立健全缜密的约束制度

目标是实施对管制者的管制，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完善政府管制监督制度，内部监督，外部审核，全民监督等，同时建立成熟公民社会，拓展政府的开放性、透明性和政策持续稳定性以及政策可预测性，扩大全民参与政府管制活动，使置于阳光下运行的政府能规避特殊利益集团的俘获寻租，同时也增加权力寻租的成本，让管制与俘获两头断链。

（三）树立政府行为中“公益”精神的取向

因为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具有培植、示范、升华、威慑、引领、导向性，必须树立公益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社会奉献精神，树立服务于民生工作意识。杜绝把私人利益巧妙伪装为公众利益而立法型掠夺。

我国正处于转轨发展高速时期，而管制俘获问题形成的陷阱有增无减，政府管制机构运用其所掌握的权力维护某些部门、行业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城市公共设施的瓶颈，民办教育事业难以维系，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生产事故频繁发生，大量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政府在电力、城市供水、邮政、国家铁路、航空运输、有线电视等领域存在国家或地方政府垄断与民生需求不相契合之处。历史告诉我们，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可能由于管制俘获问题的存在，在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下陷于停顿或者迷失方向。

---

① 卢现祥. 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6.

# 第二章　贵州明清盐政之格局——盐运体制变迁考

## 第一节　明朝榷盐，开中折色

在贵州榷盐历史的演进中，自明初洪武六年（公元 1373 年）“开中”制正式拉开序幕，以“纳粮”与“中盐”并举，“开中”与“屯田”并行之策勉力支撑贵州卫所。明弘治以后，由于“占中”、“报中”之赘生弊端，盐课“开中”渐层败坏。弘治五年（公元 1492 年）贵州和全国同步，悉数尽改“折色”制，肆售盐引过多，又用“余盐”补仓，全国盐法大为紊乱，贵州也陷入无序状态，万历年间推行“纲法”，开启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

### 一、贵州明朝以前盐法混沌

贵州经济文化发展较为缓慢，政治军事战略位置在中央政府地位不高，其经济活动，或属“过境式开发”，或属“代理式开发”、或属“间接开发”、或属“曲线性开发”[①]。“贵州《禹贡》荆、梁二州徼外。元为湖广、四川、云南三行中书省地”[②]。可见，元代时，贵州分属四川、湖广、云南三行中书省。至明永乐十一年（公元 1413 年）设贵州布政使司，方为贵州地区行省建制之始。明以前，贵州不是一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区域，因而无行政管理自主权，无独立管理食盐之权，更不可能形成具有适合贵州本地经济发展的独立盐政。

① 田永国，罗中玺，赵斌. 贵州近现代民族文化思想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06：126.

② 张庭玉《明史》志二十二.

《华阳国志》在记述贵阳盐政时云："……汉晋之间，牂牁即已无盐。迨至唐末，有分地食盐之政，而牂牁为羁縻州，为化外州，于盐政无与焉。元初顺元重开，盖食滇盐。"① 可见明以前，榷盐混沌，定则不强。

## 二、贵州"开中"实施

贵州明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时期，增设了军事、行政权构。其后陆续建立二十四卫，二直隶千户所。由于大量增加兵员，驻军达二十万之多，置配"三分守城，七分屯种"，致使粮饷猛增。洪武四年勒规："令商人输粟于边，给以盐引，令其赴场支盐自行贩运"。为解决军需民食、增加税收，明政府规定商人必须押运粮食到边图地区，由政府登记缴粮的种类和数量，付给价款后，折算应支盐数量，发给运销凭证，由商人到指定的产地采购食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如前章所述，实施"开中"制榷盐之法。

## 三、贵州引盐的运输体制——开中流程

"开中制"全过程，可以分解为："报中"、"守支"、"市易"三个连环有机过程。"报中"，即商人按照政府榜文要求的开支项目，将军需物资转运供给驻军，而从官府领取"盐引"作为置换，原则上凡有驻军必须报中；"守支"，即商人完成报中任务后，凭引到指定盐场守候支盐，明朝在全国设立两淮、两浙、河间长芦、山东、福建、河东等地六个转运司，设广东、海北、四川、云南等七个提举司，各大盐场分属其下，规定商人必须凭引到指定盐场兑盐；"市易"是商人将盐投入市场销售，并转化为货币赢利的最终环节，其销售必须在官府指定范围内，并且在官府严厉的监督之下完成。出于边防报中之急需，盐商必须有随调随到的大批粮食，并且必须把粮食及时运送到各卫所，为了节省采购粮食的运输费用，盐商大都在贵州直接募民垦田，称之为"商屯"。其运作循环图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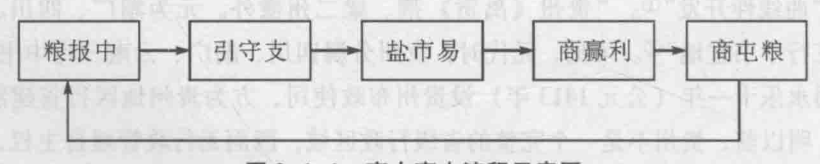



图 2-1-1　商人商屯流程示意图

赴贵州盐商所中之盐，盐源广泛，有淮浙盐、川盐、云南黑白盐及安宁

① 常璩辑. 华阳国志［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32.

盐。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榷定“中盐则例”。具体实施将盐引分发各卫所，大引400斤，小引200斤，募集商人运粮到卫所置换盐引，转返到指定地域购盐，再转销军民，以求解决贵州既缺粮食又少食盐的窘况。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开中”正式拉开序幕，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征滇缺粮，遂先定普定、普安、乌撒三卫、乌撒、乌蒙和普安“开中”，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毕节卫继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赤水、层台二卫承接“开中”，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铜鼓、五开系列卫所相继展开，明永乐年间，普及所有贵州卫所。

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朝以“纳粮”与“中盐”并举，“开中”与“屯田”并行之策，使食盐输入与粮食自产自足勉力政策性支撑贵州卫所。销往贵州食盐，此时以淮盐为主，川滇盐次之，偶尔潜进湘湖盐。这是明廷的政策性调配结果，虽然川滇盐运距较近，但两淮、两浙“煮海为盐”产量颇丰，累累积压，急需疏引，明廷抬高川滇盐中纳数，刻意降低淮浙盐纳粮置盐引数额，导致川盐中纳数额相当于淮浙盐四至五倍。但所有商贾皆趋利而进，淮浙盐运途遥遥，而川滇盐就近中纳，川滇盐即使中纳数额较高，也相较淮浙盐成本低下。贵州都司及卫所官员和盐商强求压低中纳数额，户部曾准将川盐降至一石五斗，滇盐降至二石以下，但淮浙盐确实积压滞销，迫于压力，朝廷坚持旧议。政策性引销抵挡不了商品价值规律，川滇盐入黔依然如滚滚洪流。对黔民而言，主要相盐米比价，“米轻盐重”，黔民疾苦；“米重盐轻”，商贾失利，就不“纳米中盐”。演绎着朝廷、商人、黔民利益的博弈。盐米折合比例按朝廷政策性指导，食盐的不同产区销区以及盐的质量等复合因素来确定。《明实录》中洪武、永乐两朝有关贵州各卫、商人用粮食换取“盐引”的前期材料引录如下：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年二月，户部奏定商人纳米给盐之例，“普安纳米六斗给淮、浙盐二百斤，米石五斗给川盐二百斤；普定纳米五斗者给淮盐二百斤，米四斗者给浙盐二百斤，川盐如普安之例；乌撒纳米二斗者，给淮、浙盐皆二百斤盐亦如普安之例”①。洪武十五年十二月，户部奏定安宁盐井中盐法，凡募商人于“乌撒、乌蒙二府米二石八斗……普安府输米一石八斗者，皆给安宁盐二百斤”②。洪武二十年（公元1388年）十一月，“命户部募商人于云南毕节卫纳中盐，每米二斗给浙盐一引，三石给川盐一引”③。（注：‘引’是元、明、情三朝的计量单位，明时有大引、小引之分，

① 《洪武实录》卷一四二。

② 《洪武实录》卷一九七。

③ 《洪武实录》卷一九七。

这里的引指小引，每小引 200 斤）。盐米交换比例是明代中央政府用行政手段制定的。但这种规定亦可根据当时的需要，特别是军需用粮的缓急情况进行调整。如《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二十二年（公元 1389 年）因军事需粮紧急，将普安原来的粮盐折合比例改为“纳米一斗五升者给淮、浙盐二百斤，纳米一石五斗者给淮盐二百斤”。

**四、开中盐米折比区域比值**

明朝中期在贵州围绕以下几种情形采用政策性的重点倾斜“中纳盐粮”：在“平越、清平、都匀三卫苗贼出没之地”，储积军粮，以备征剿随时调配；在地理位置重要制衡的边境之地，如普安处贵州、云南二省交通要塞，较大军事行动事发卫所处召商纳粮；经常缺粮的卫所，如平越、都匀、普定、毕节，“中纳其盐”，以求“配搭均平”。

开中制一直沿袭到景泰、成化、弘治年间。附表如下：

表 2-1-1　　景泰年贵州开中纳粮盐引数表

| 时间 | 开中缘由 | 开中入库 | 实纳米数（石） | 开中折比 | 实引盐数（引） |
|---|---|---|---|---|---|
| 景泰元年十二月 | 备粮 | 贵州在城并平越（福泉）、清平（凯里）、都匀三卫仓 | 60 000 | 以每升米两斗计 | 淮盐 200 000<br>浙盐 100 000 |
| 景泰三年五月 | 缺军粮 | 平越、都匀、普定（安顺）、毕节四卫 | 19 000~20 000 | 仙泉进盐每引 2 斗 5 升；上流九井（犍为）每引 3 斗 | 川盐 71 080 |
| 景泰三年十月 | 缺军粮 | 平越、都匀、普定、毕节四卫 | 38 000 | 叶池、黄市、滂井每引 4 斗；通海、新罗、永通上井兼云安、罗泉每引 3 斗 5 升；福兴、龚义、广福上井兼郁山、大宁每引 3 斗 4 升 | 川盐 109 000 |
| 景泰三年十二月 | 储积军粮 | 贵州在卫仓、平越、都匀、普定、毕节卫仓 | 15 000 | 贵州在城仓及平越卫仓，每引 3 斗下井每引 3 斗；都匀、毕节二卫仓，每引 2 斗 5 升；普定卫仓，每引 3 斗 5 升 | 淮盐 50 000 |

表2-1-1(续)

| 时间 | 开中缘由 | 开中入库 | 实纳米数（石） | 开中折比 | 实引盐数（引） |
| --- | --- | --- | --- | --- | --- |
| 景泰四年七月 | 剿捕播州反叛 | 贵州各仓 | 46 000 | 云南黑白二井盐，每引5斗5升；安宁井盐，每斗4升；淮盐3斗5升 | 滇盐、淮盐100 000 |
| 景泰五年十月 | 储粮 | 贵州普济（普安州）等仓 | 22 500 | 淮盐每引4斗5升；浙盐每引3斗 | 淮、浙盐各30 000 |
| 景泰六年九月 | 缺粮 | 贵州各粮仓 | 69 750 | 淮盐每引5斗5升；浙盐每引4斗；滇盐每引6斗5升；川盐每引4斗5升 | 两淮借拨盐引30 000；两浙盐53 722；滇盐41 908；四川存积盐10 047 |

（此表根据《英宗实录》之《景泰附录》参考郑维宽《明代贵州军粮来源考述》修补制订）

表2-1-2　**成化、弘治贵州开中盐引数量表**

| 时间 | 原因 | 入库 | 纳米数（石） | 开中折比 | 实引盐数（引） |
| --- | --- | --- | --- | --- | --- |
| 成化二年正月 | 缺粮 | 永宁（叙永）、普安、赤水三仓 | 45 500 | 每引6斗5升 | 滇盐7 000 |
| 成化二年五月 | 会兵征讨三都掌，军饷不济 | 普宁等所，永宁仓 | 90 000 | 滇盐每引6斗5升；川盐每引5斗5升 | 滇盐52 329；川盐106 811 |
| 成化十六年二月 | 欲征剿生苗及夭坝干黑苗诸少数民族 | 都匀等仓 | 实中77 000左右 | 每引6斗计 | 滇、川盐引合计175 600 |
| 成化十七年五月 | 镇压苗民反叛，急需粮饷 | 贵州各仓 | 23 500 | 每引5斗 | 滇盐47 000 |

表 2-1-2（续）

| 时间 | 折中缘由 | 地点 | 折计纳米数（石） | 开中折例 | 盐引数（引） |
|---|---|---|---|---|---|
| 弘治四年十二月 | 征苗军饷 | 都匀、清平诸仓 | 120 000 | 每引 6 斗计 | 淮、浙、川、滇存积盐 200 000 |
| 弘治五年七月 | 贵州军情紧急 | 都匀、清平等仓 | 40 000 | 每引 6 斗 | 滇盐 48 000 余引；川盐 19 700 余引 |
| 弘治十二年六月 | 防备米努及阿保作乱 | 贵州各仓 | 110 000 | 每引 6 斗 | 云南弘治 6 年脏盐 110 000；弘治 7 年脏盐 70 000 |
| 弘治十五年二月 | 军饷 | 贵州各仓 | 230 000 | 每引 6 斗 | 云南弘治、7 年盐 207 500；四川弘治 12、13 年盐 179 500 |

（此表根据《孝宗弘治实录》，另参读郑维宽《明代贵州军粮来源考述》修补制订）

从贵州洪武十五年所定普安、乌撒等卫开中的比价来看，淮、浙盐已行销至贵州西部，盐价比川盐、滇盐低。从上表景泰、成化和弘治年盐价比较，滇盐价最高，淮、浙盐持中。如以景泰六年循价，淮盐每引 5 斗 5 升，浙盐每引 4 斗，滇盐每引 6 斗 5 升，川盐每引 4 斗 5 升。明朝以后虽经多次调价，依然淮浙盐较低。

## 五、计口支盐与盐钞

明朝在开中制度有效保障下，对贵州开始实施食盐配给法——户口食盐法，实施强制性配盐获取食盐销售利。永乐二年（公元 1404 年），都御使陈瑛上奏言："大口每岁支盐 12 斤，小口每岁支盐 6 斤。"[①]（政策性规定：十五岁以上皆为大口，十岁至十四岁皆为小口，十岁以下概无盐供应）。永乐七年正式实施。伴随着贵州户籍的增长，户口食盐定额有所下降。除官吏、军人外，民户酌户口盐一减再减，最终停止供给。

以贵州弘治和嘉靖时期为例说明。当时在籍大口、小口人数分别为 264 798与266 920人次，则户口食盐额（小引）分别对应为 15 887. 88 引和 16 015. 20引。

具体实施"计口纳钞"和"计口纳粮"配套措施，也即采用征收"盐粮"和"盐钞"的方法，其征收比例，前期为市民"每斤纳钞一贯"，乡民"每斤

① 李三谋. 明清财经史新探［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63.

纳米四升三合二抄五撮”，后来渐变为市民“每引纳钞两百贯”，乡民“食盐每引纳米，每石折钞一百贯，每引该钞五百贯”。所有自行关支、军户、民户、官户一律并开。卫所官员，“月盐”每人一斤，盐钞由卫所勘发；官户“纳钞食盐”，钞与官俸兼行；民户食盐，以粮米或其他货物换取盐钞支盐。可见，明开中制基本解决了军户、官户食盐紧张，部分民户有了基本保障，但大多数贫困及边缘山区的民户食盐仍是困窘重重，《黔书·盐价》云：“黔无盐，故价昂，民甘食淡。”① 明晚期盐政弛废，官户冒名支盐，商贾转借倒卖，卫所囤盐私售，盐市价猛抬狠升，致使贵州盐荒。“开中”制在贵州实施变幻无常，益政损民。

由上可循，明朝贵州盐业政策由中央主管部门——户部统一征调管理，协同处理方策，重大问题须经户部直报最高统治者明皇审批，如明洪武年间由朱元璋批准“更定云南、毕节、赤水、层台三卫盐法”，此以明皇倾力经营西南，安定滇边政策相协调一致。前中期实行“纳米中盐”的运销政策，盐米兑换折合比例，具体根据明朝盐政销售政策性的倾向，战时盐政策略军需粮的缓急调整，以及食盐不同产区和质量，确定地区差价和品质差价，为了协调各产盐地输出不同的盐质，进行不同产区配盐的搭配，同一产地不同盐井的搭配。

开中制尽管以当时变化的粮盐比价估值为其依据，但在贵州现实历史场景中，由于盐粮开中的地城跨度大，盐运通道变局大，盐粮价格变动颠繁，加之吏治衰败，户部很难准确地拿捏和调节盐粮交易的比价，这就使开中商人感到米重盐轻，无利可图，致使开中制在贵州时续时断，严重耽误屯军用粮。明廷为挽救开中制的颓势，采取一系列的变通措施，由此引发了开中制形式的演变。

### 六、中期调整折色

明中期以后，调整盐政。具体表现为：其一，管理机构变化。户部对其下属部门的设置作出调整，万历三年（公元 1575 年）规定原来由各清吏司分散带管的各盐司由山东司统一带管，崇文门、临清及浒墅诸关税收则统归于贵州司。这样，山东、贵州二清吏司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家的盐政、关税的管理机关。其二，盐专卖制度演变为开中折银。由于盐粮价格波动频繁，永乐后期，出现了纳银、马、茶、帛等形式代替纳米粮的形式，谓之“折色”。至弘治

---

① 田雯. 黔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5：34.

初，户部尚书叶淇上书请求变法，朝廷采取了此建议，第二年正式命令各地"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开中折银成了定制，贵州也于公元1489年同步"折色"。开中折银，简便了程序，"使以前商业资本由银—米粮—盐—银的周转过程，简化演变为银—盐—银，商人的资本周转加快"①，但可看出盐政指向：明政府的盐法制度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为了巩固边防、开发边疆，而更多倾斜于致力充实国库，增加财政收入，以备封建统治者穷奢极侈。

## 七、末期纲运榷盐

为了更多地压榨和盘剥，设置了存积之制，即在常股盐之外设置积盐，利用盐供不应求的现实窘况和盐商迫切需要加速资本周转的商业策略，引诱之，扩大政府的盐利剥削。叠加以"余盐"填补正课之不足，明廷为了保证收入，堪然不顾盐场生产的局限，盲目大肆出售盐引，造成商人守支情况严重，所发行盐引膨胀到无法补救填仓，无奈出此下策，以求再续榷盐。

明代末期万历年间推行"纲运法"，即规定只有政府批准名列纲册的盐商，才有食盐经营运销的权利。这就进一步发展为"产盐有定场，销盐有定地，运盐有定商"。通过市场范围的划分，使拥有特权的盐商们在各自的产销地区间，操纵运销，主宰市场价格，垄断食盐的运销业务，开启了中国食盐专卖的先河，产生了新一轮有序中的无序榷盐。

综上所述，明朝榷盐体制在贵州的演变轨迹如图2-1-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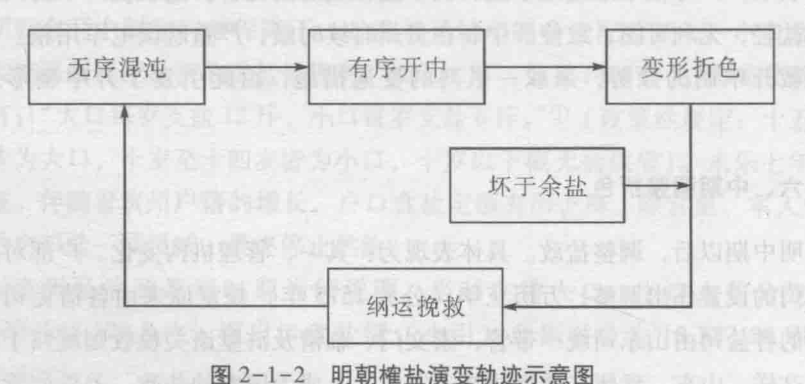



图2-1-2 明朝榷盐演变轨迹示意图

我们用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揭开此历史谜底。中国封建君权制度下

① 陈涛，明代食盐专卖制度演进研究［D］. 沈阳：辽宁大学，2007：25.

的国家是掠夺型的国家，明朝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囊括明廷榷盐主体，如转运盐使司或盐课提举司系列部门及地方衙役，整体性、系统性、地域化体制型掠夺，官员则利用权力产生腐败，通过行业行政垄断掠夺。可见，掠夺一旦制度化就具有隐藏性、合理性甚至合法性。

整个盐业制度的设计有利于少数人或既得利益集团，榷盐制度的设计更倾向于从事非盐业生产系列财富的积累。盐政部门权力毫无制约，使得利益集团的寻租之手、利益集团的寻租之手与政府的掠夺之手联合，形成掠夺型制度，三层叠加，使全国乃至贵州的榷盐之政，从无序回归到无序，因为掠夺是无定量的，从而导致掠夺体制因变量无定则，自然呈现无序态势。

## 第二节 政经融合，盐运疏浚

朱元璋曾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① 不可否认，明初在元朝经济溃烂的格局下，特别注重安养生息。大力兴修水利，激励人口增殖，提倡开垦荒地，全面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 一、政治、民族、经济融合

明代，贵州社会进入民族融合与政治融合跨时代发展提速阶段。数次大规模的西南进军和"移民就宽乡"政策，以及军屯、商屯活动，中原汉族大量迁入黔境，产生了民族和文化的混融，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重儒学教"促进了文化的大融合。贵州都指挥使司与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以及"军政分管，土流并治"② 的并举实行，促使贵州成为完整的军事与政治格局独立单元，明确且密切了与中央的隶属层次关系。贵州全方位融合于全国，从而成为全国 13 个行省之一。

建立行省，为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所迫，贵州布政司与部指挥使司根据政治、经济、军事态势发展的需要，积极组织修筑驿道，设置驿站，疏通河

① 范同寿. 贵州简史［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21.

② 《贵州通史》编委会编. 贵州通史简编.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161.

道，发展水陆运输。随之兴起一批沿江城镇和港埠。如：沅江水系的黄平[①]、镇远、思州（今岑巩），清水江流域的铜鼓（锦屏）与新市镇（天柱县翁洞），锦江流域的铜仁与省溪（今江口）；川系和西系水系乌江流域的龚滩、思南与石阡，都柳江流域的古州（今榕江）、三脚屯（今三都）。以后均成为重要的粮运与盐运水路通道节点商埠。

明代军事活动一方面是围绕贵州及湖广都司所属的部分卫所强化对境内的控制而展开行动；另一方面是肃清元代残余势力与镇压地方割据势力，平息土司之间为争夺地盘的相互火并，镇压各族人民反封建压迫起义。明朝统治贵州270年，其间战争不下百余次，战役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军事运输之繁重，非同寻常。

贵州地形崎岖，“山路阻绝，日行不过三十里，一人所携不过三斗余”，陆路交通的险阻状况改变困难重重，只有利用水运缩短陆运。为了军事通道的需要，省级官吏和邻近水道的地方官府，特别注重利用水运开辟航道。在舞阳河干流、清水江与乌江支流上，曾进行过疏治航道的策划与施工，并构建了开拓全省地理与政治中心贵阳通往乌江水道的宏观设想，经过明代的开拓，全省通航里程较前增加了二三百里，各河水运担负着繁忙的军粮、盐转运。

## 二、明朝整疏粮、盐运水路通道

### （一）贵州河流概况

贵州山高水长，河网密布，河长大于10千米或流域面积大于20平方千米河流近984条。按河流长度计，其中10~50千米河流902条，50~100千米河流49条，100~500千米的有32条，500~1 000千米以上的1条，即乌江，干流全长1 037千米。

境内河流大抵以乌蒙山、苗岭为分水岭，顺地势向北、东、南三方分流，分水岭以北属长江流域，以南属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占全省面积的65.7%，主要有金沙江支流上游牛栏江和横江、川黔界河赤水河—綦江（松坎河）、乌江、沅江上源清水江四大水系。珠江流域占全省总面积的34.3%，以干流和主要支流为主干，从西向东可分为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四大水系。

贵州山峦叠嶂、地势险峻，陆路不畅；河流切割深、落差大，河道狭隘，大河少，小河多，激流险滩密集，水路障碍多。

---

① 黄平，地处舞阳河航运上游的终点，今贵州腹地，顺流乘舟可往湖广布政司，陆路经瓮安、开州可至遵义和贵阳。明代贵州中部、北部往来湖广的客商货物在此集散，平定播州叛乱以后，河道疏通，商业兴旺，交易繁忙，成为黔中东向进出口的门户。

（二）整疏永宁河，开辟永岸

黔境明朝进行四次大型盐道疏通。早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川景侯曹震疏浚四川叙永达于贵州边境永宁之航道。同时并举以永宁河为重心，结合整修五条驿道：永宁至曲靖的驿道，建昌、泸沽、黎州大相岭一线驿道，保宁至陕西汉中府界驿道，松潘至茂州驿道，重庆、遵义、贵播一线驿道。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开工。曹震抵达成都立马征调四川都司、四川布政司及贵州都司军民开道，委托四川都司左同知、徐凯等提调官军民夫开辟泸州—纳溪—摩泥驿水陆道路；委贵州都司同知马烨调永宁、赤水、毕节、乌撒等卫军夫疏通永宁—曲靖的渠道；委播州宣慰司及重庆府调军民开通修筑播州桥道；最后，聚集四川、贵州军民开凿永宁河，最为艰难是永宁一段河道，有激流乱滩195处，峻险82处，"石大者凿之，水陡者平之"①，历经一年多的时间，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告竣，使舟楫得以畅通。永宁地界川黔，永宁卫隶属贵州都司所辖，永宁河疏通带来贵州军事通道及川黔滇驿道、盐道的畅通，由川运粮及黔入滇，俱由此经过，川盐由水路运至永宁然后转运贵州，以此而有"永岸"设置。

（三）疏理乌江干流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贵州布政使郑雯首倡疏凿乌江干流思南以下河段，并拟从省城开南明河、清水河直达思南之航道。

乌江下游支流石阡河，源出石阡府境柿坪的乱石岩，经府治及思南塘头，至江口汇入乌江。万历间，石阡知府郭原宾疏通河道以利舟楫往来，清疏石阡府至塘头河道60余里，凿通碍航险阻9处，石阡河自此通航。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83年），巡抚舒应龙再次倡议开发乌江水道以通省城，并组织渔舡、水手、石匠、兵夫沿河踏勘，酌估开凿事宜，令各衙门疏凿河中沙石，其杉木冲、震天洞、鱼子洞等处因施工艰难，拟另辟一道或在此换舟，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实现。

（四）疏通淮盐水道。

清水江为沅江上源，干流在都匀一段称剑江，都匀以下称马尾河，至岔河口汇入重安江后始称清水江，入湖南后汇舞阳河称沅江，锦江在湖南辰溪注入沅江。沅江上源五溪，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通航。到了元代，从湖北江陵沿江置水驿二十余处而达贵州平溪、镇远。明代仍然使用这一水道，并开始治河。英宗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诏准湖广五开卫（今黎平）疏通下游

①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志交通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87.

右岸支流洪州河，船可直达湖南靖州，淮盐入黔可借此水道而行。

舞阳河，源于瓮安云顶，串通黄平旧州、施秉、镇远、玉屏，于露水溪入湘，在黔阳与清水江汇合，为湘黔水路盐运通道。其险在施秉以东六千米瓮蓬（又名诸葛洞），"巨石嵯峨，横距江心，余碛磊磊，鳞次戟列。水流至此，惊波转腾，望沫飞奔"①，为舞阳河之瓶颈咽喉要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贵州巡抚郭子章倡议开凿诸葛洞，由偏桥人钱中选主持其事，历时110日而告竣，辟开大小碍航礁石，改善几处滩口，开通航槽69丈，船可上行至偏桥。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因"奢安之乱"② 急需运粮，再次疏浚，整治上游老洞及下游显灵滩曲道。

## 第三节 明朝盐运，格局初定

按照价值规律，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按照价值相等的原则互相交换。盐价决定于成本价、盐的产量、盐的质量、盐的运输费额等市场因素。但明代对食盐的供应往往按行政建制划分销区，并不取决于盐运成本。

### 一、明初盐运销格局

洪武初年，普安、普定、乌撒、乌蒙并未划定销区，所以，杂给淮浙、四川、安宁等盐。

镇远州、五开卫、思州宣慰司治所、思南道宣慰使司等地，皆隶湖广行省，从湖广运入淮盐。至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置贵州布政司后，上述地区改为镇远府、黎平府、思州府、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等6府，所辖镇远、施秉（今施洞）、永从（今从江）、安化（今思南）、印江、务川、龙泉（今凤岗）、铜仁等8县及29个长官司，又改食川盐。直到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贵州按察使应履平奏请"所辖镇远等六府，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俱隶湖广，食用淮盐。永乐中改隶四川，食用川盐。且诸府

---

① 贵州省施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施秉县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201.

② "奢安之乱"指的是天启年间，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的叛乱。奢崇明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于重庆起事，围成都达一百多天。安邦彦于天启二年二月起兵，围贵阳两百多天。奢安之乱，战争持续到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前后历时九年。

去四川陆路月余，盐商素所不至，士民经年不知盐味，乞许其仍食淮盐。”①朝廷令两淮盐官听各盐商于贵州地方货卖盐引于镇远销售，镇远以东食淮盐，以西各地则食邻近之川、滇盐。因而，上述各府、州、县、司改输淮盐得到允准，又恢复了潕阳河、锦江、清水江为通道的淮盐运输。

其余黔中各地，包括贵阳、遵义、安顺和清镇、息烽以至都匀、贵定等县，均为川、滇盐合销区。

万历年间改行“纲运法”，规定只有名列“纲册”的盐商才有合法远销的权利。据郭子章《题征路苗善后疏》记载：“贵州镇远、铜仁等府，原近湖广，向食淮盐；思南以至永宁等卫原近四川，向食川盐”。可知万历年间，贵州各地已划分以上所述食盐销区。其远销量各年不同。如：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由云南、四川等地运销贵州的井盐130 000余引；弘治四年（公元1492年）两淮、浙江、四川、云南远销贵州盐209 500余引；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四川等地运销贵州盐179 500余引。统计以上数据，每年从省外输入贵州的淮、浙、川、滇盐约200 000引。

## 二、明中后期盐运路线

盐运路线因贵州各地所处的地理区位不同，入盐路经也呈现辐散状态。以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六月郭子章《题征路苗善后疏》解析，其云：“食盐一在富顺自流井等处收买，内分运于永宁发卖；一在射洪、胡才、清平渡、杨滔溪、古井口等处收买，内一半运于綦江发卖，一半运于思南发卖。楚中盐于辰溪收买，一在镇远、偏桥发卖，一在铜仁发卖。”

明代川盐运黔的集散地为永宁（今四川叙永）、綦江、涪陵三地，由永宁走驿道销运贵州西部及西北部，由綦江走驿道销运贵州北部及贵阳、都匀，由涪陵沿乌江远销思南及黔东北。

淮盐运黔的集散地为镇远、铜仁。据清《柳州府志卷九·榷税》载：“怀远分两江通湖（广）、贵（州），商民往来，贩盐贸易，立镇抽收。”②故怀远为粤盐销黔的集散地，从怀远（今三江）经古州江（今都柳江）达古州、三脚屯（今三都县境），为粤盐入黔的路径。

明朝川盐入黔有四条路径：其一，沿乌江航道上溯至沿河、思南运销黔东北；其二，綦江上运至松坎驿，转陆运至播州各地；其三，经赤水河至仁怀

① 《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六。
② 故宫博物院. 柳州府志［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345.

（今赤水），陆运至黔北、黔西北；其四，泸州经永宁河至永宁（今四川叙永），陆运毕节、乌撒、乌蒙（今云南昭通）等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北部。

四条盐路中，只有乌江水运伸入到贵州腹地。弘治年间，四川叛将酉阳宣抚司在龚滩对“过往花盐船只抽取税银，每年获利数万”①，以及巡抚何起鸣建议由龚滩盐税中提取部分以资铜仁军饷，可见，当时乌江盐运规模非常之大。

綦江上游水量较小，在明朝盐运量不大。赤水河下游，景川侯曹震奉命进行疏浚，辟为川盐入黔航道，航载10~20千斤盐船可达沙湾塘（今赤水文华乡沙湾村），但上中游滩险密集，水流汹涌，通航困难。即使利用较好水位，也只能上溯至丙安、元厚。此二河水运仅限于贵州边境地带，进入内地全靠陆运。

永宁河疏通后，成为通往贵州、云南的要道，川盐、川粮频频运往，云贵易马然后分送陕西、河南。这条盐路线直到近代，在贵州西部地区食盐运输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

明朝中叶以后，广西各族人民起义斗争频繁，黔江“大藤峡瑶族起义”②持续时间长达250多年，航运中阻，粤盐已绝少经西系水道进入贵州。古州一带偶有商民自黎平循陆路贩运淮盐，肩挑背负，私盐“价值甚昂，民苦淡食”，贵州此区域的苗族、侗族人民“艰于用盐，以蕨灰浸水”或以芭蕉叶烧灰为卤，都习以为常。

## 第四节　商业地理，流通格局

贵州盐运只是明代商业经济总体格局中的分支体系，我们必须置于历史经济背景下，解析贵州盐运。

在政治层面上，明朝贵州封建领主土司制度、奴隶制度、原始公有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逐渐分崩离析，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土地在军屯、民屯、商屯的基础上，激活了垦殖力。中原外来农耕技术、手工技术、矿业技术广泛推广，盘活了贵州自然资源的禀赋力。水、陆驿道的开辟，城镇

---

① 曾汉轩．酉阳县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212.

② 明代大藤峡起义，以瑶民为主，以广西大藤峡地区为中心，从洪武年间开始到天启年间为止，前后历时250余年，此起彼伏，前仆后继，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0余次。大藤峡起义是广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以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起义，也是明朝中后期全国较大的农民起义之一。

枢纽体系的构建，使贵州整体商业经济空间产生了集聚力。贵州自明代起，商业逐渐与中原接轨。

## 一、贵州历史商业地理学建构

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揭示地理环境与商品流向、商品流量、市场分布、地区间商品供求关系、商业网络的空间分布特征、商业中心的兴衰位移、商业流通的地域差异等规律。

商品生产、交换都要依托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人类商业活动必须有地理环境的支撑。只要有商品交换，就存在商业的零星地理记录。战国时期《尚书·禹贡》把中国分为冀、兖、青、徐、荆、杨、豫、梁、雍九州，并且全盘解析当时主要商品的产销区域和运输路线。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第一部经济史专著，全面记述了春秋战国至西汉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概述了商品经济地域历史规律和经商致富的经验总结，在第四段重点记载了汉时各商帮的贸易区划和风俗物产。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人口、经济、物产、交通、商业和城市的分布及地区差异，也有翔实的记载和评论。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元代《九域志》、元明清《一统志》均注重商业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

司马迁的终极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十分注重人类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强调国富民强，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①。而地理环境往往又是经商致富的源泉，范蠡为越王勾践谋士，助勾践雪会稽之耻，以后“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司马迁明确强调朱公经商以陶为贸易基点能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是对地理环境的选择。

同时从宏观层面上，司马迁把全国划分为四个鲜明特色经济区，即山东（淆山以东）、山西（崤山以西）、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并且进一步划分为关中、三河、漳河、勃碣、齐鲁、洙泗、梁宋、三楚等子经济区。首次对中国经济地理实地考察后进行明确界分。

“空间格局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生产发展制约着生产分布，生产分布

① 张萍. 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25.

对于生产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反作用”，这种互动关系在经济发展历史过程中表现尤为显著。而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立足于商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是重点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商业活动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

商业活动的发展具有地域性和历史承袭性。商业市场分布与商品流通格局具有一个历史扩散整合过程。探究历史时期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网络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释当代商业景观与区域分布的历史成因是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宗旨。

以历史时期商业发展状况研究为主题的历史商业地理学具有科学内涵的特殊性。因为封建时代的经济是以国家经济为主体，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协同和对立统一构成的混融体。历史时期的商品经济是原始经济与简单小农业商品经济实体的叠加。社会经济制度的迥异，导致商业运行机制的差异，其所产生的商业文化与商品经济发展运行规律背景环境也截然不同。因为，研究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业地理将受到历史条件的控衡与制约，所以，研究历史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格局必须将其置于封建经济发展背景中去考究。历史商业地理在注重实地考察的同时，还需要借助古代文献资料研究，这是其最基本的研究手段，古代商业活动面貌的复原离不开文献记载，即使是实地考察的资料，也需用历史文献相印证。历史商业地理受文献记载以及时代背景差异的限制，则重在复原历史时期人类商业的发展面貌及其受环境的影响机制，城乡市场网络结构与商品流通格局的构成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剖析出封建时代商业发展的地理特征，解释今天商品经济发展的某些历史承袭性，为现代商业地域性网络系统的建构提供历史依据。

贵州历史商业地理，应该将“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贯穿于发展商业市场的研究全过程，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空间分析集中表现在对贵州商业活动的载体究上。而区域分析则主要剖析贵州商品生产与流通格局的区域差异，主要研究五个层面问题：一是贵州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二是贵州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三是贵州商业市场的地域分布格局；四是贵州区域商品流通格局分析；五是贵州商业发展的地区性规律与发展特征以及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

## 二、贵州明代商业地理简述

### （一）军屯、民屯与商屯，构建了贵州明朝商业经济的骨架

明朝建立，刘基“奏立军卫法”。从此“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

为了减轻国家军粮的压力，便利用军士进行屯种，开设军屯。除军屯外，还有民屯和商屯予以补给，军屯的普遍实行客观上促进了贵州农业生产的发展，构建了贵州整体历史商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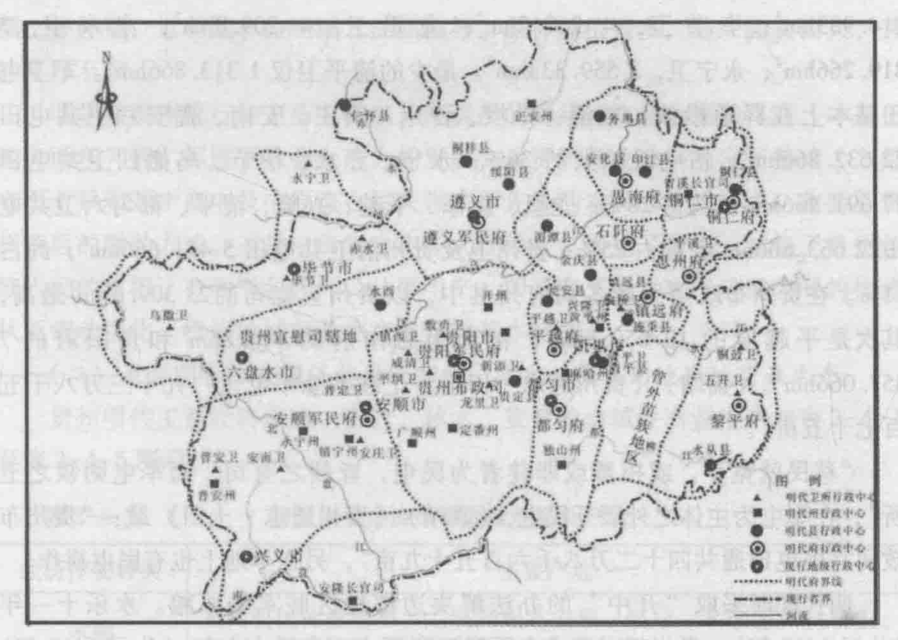



图 2-4-1　明代贵州布政使司时期所领府、州、县及卫的位置图示

贵州都司所领有：贵州卫、贵州前卫（今贵阳地区同设二卫）、永宁卫（今四川叙永）、普安卫（今盘县）、安南卫（今晴隆）、普定卫（今安顺市）、乌撒卫（今威宁）、毕节卫（今毕节）、赤水卫（今毕节东北、川黔交界处）、安庄卫（今镇宁安庄坡）、兴隆卫（今黄平）、威清卫（今清镇）、平坝卫（今平坝）、龙里卫（今龙里）、新添卫（今贵定）、平越卫（今福泉）、清平卫（今凯里）、都匀卫（今都匀），黄平千户所（今黄平旧州）、普市千户所（在今四川叙永境内）。属湖广都司有：镇远卫（今镇远城）、平溪卫（今玉屏县）、青浪卫（今镇远青溪）、偏桥卫（今施秉县）、五开卫（今黎平县）、铜鼓卫（今锦屏县）和天柱千户所。

贵阳以西的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晋安六卫，史称“上六卫”。贵阳以东的龙里、新添、平起、清平、兴隆、都匀六卫，史称“下六卫”。西北一线的乌撒、毕节、赤水、永宁四卫，史称“西四卫”。湘黔边境的镇远、乎溪、清浪、偏桥、五开、铜鼓六卫，史称“边六卫”。明成化时，驻军达 145 400 余人。

明政府规定：边地驻军，三分戍守，七分屯种；内地驻军，二分戍守，八分屯种。和平时，军队主要部分用于从事农业生产。其中屯田卫所在五万亩以上者有乌撒卫，5 662.533$hm^2$①；普安卫，5 227.6$hm^2$；普定卫，5 114.933$hm^2$；毕节卫，4 267.2$hm^2$；龙里卫，4 209.8$hm^2$；赤水卫，3 819.266$hm^2$；永宁卫，3 559.333$hm^2$。最少的清平卫仅 1 313.866$hm^2$。军卫屯田基本上在驿道沿线，威清、平坝、晋定、安庄、安南、普安六卫共屯田 22 632.866$hm^2$，占屯田总数的 36%；永宁、赤水、毕节、乌撒四卫共屯田 17 691.466$hm^2$，约占 28%；龙里、新添、平越、兴隆、清平、都匀六卫共屯田22 663.666$hm^2$，约占 25%；贵州卫及贵州前卫共屯田 5 461.666$hm^2$，约占 11%。在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司府州县中，以贵州宣慰司的23 309.6$hm^2$最高，其次是平越府的 10 650.8$hm^2$，再次为思南府的 915.8$hm^2$和贵阳府的 7 457.066$hm^2$。（嘉靖）《贵州通志·田土》记载共总军屯达“九十三万八千五百七十五亩”。

“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徒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在军屯为主体之外展开民屯，（嘉靖）《贵州通志·土田》载：“贵州布政司官民屯田通共四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九亩”，另在旱地上也有民屯耕作。

明代同时采取“开中”的办法解决边郡地区驻军的军粮。永乐十一年（公元 1413 年），贵州都司要求在所属卫所开中；永乐十七年（公元 1419 年）九月在普安卫开中；正统十四年（公元 1449 年）六月在贵州兴隆开中；景泰三年（公元 1452 年）十月贵州平越、都匀、普定、毕节四卫开中；成化年间永宁（叙永）、普安、赤水、都匀开中。

明朝末年贵州地区在当时所辖的范围内已开垦土地超过两百万亩，是洪武年间屯田 90 余万亩的两倍。

明时贵州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加，促进了粮食增产。粮食品种如稻谷、大麦、小麦、燕麦，有“麦之类五”、“豆之类十”之说，稻谷又分红稻、白稻、糯稻，《思南府志》记载衍生九类。许助《滇行纪程》说：“贵州各届产米精绝，尽香稻也。所酿酒亦甘芳入妙，楚中远不及。”安顺州、程番府、安庄卫等成了重要的产粮区。水西地区也是产粮区，洪武时期朝廷定水西每年贡粮食 30 000 石，到弘治十五年（公元 1502 年）增至 50 000 石。以遵义为例：“其地沃饶，冠于全省”，“产米颇饶，食用之余，尚多盖藏”②。籼稻有数十个品种，

---

① $hm^2$：公顷，1 公顷 = 10 000 平方米。

② 李振纲，史继忠，范同寿. 贵州六百年经济史［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186.

皆如火焰稻、香草早、云阳白、大小齐籼、百日黄、白凤仙、汉麻籼、飞娥籼、贵阳籼、麻贵阳，至笨籼、油籼、旗籼、白籼、大南籼、乌梢籼、晚谷、早谷；糯谷亦有数十种，如黄糯、竹丫蠕、金钗糯、檐尘糯、灰色糯、黄丝糯、杯杯糯、迟黄糯、白杨糯、江西糯等。品种种植繁多，结果圆实而大，其味丰厚至腴。

明朝在贵州推行的卫所屯田制，使贵州的商品经济发生质的飞跃。一是土地大面积开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贵州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屯军士兵和开中商屯及中原流亡民夫带来了先进的农具和农耕技术，改变了贵州落后的耕种方法。三是屯田制生产了大批粮食，强化了自给，减轻了贵州各族人民的负担，有利于各族人民从事生产。四是有了粮食生产地域空间的构建从而带动强化了贵州地域商业生产发育的基本结构。

（二）贵州明代主要经济作物、畜牧、林木、蚕桑的地域性商业生产

贵州明代主要经济作物、畜牧、林木、蚕桑的地域性商业生产如表2-4-1至表2-4-6所示。

表2-4-1　　明代主要经济作物地域性商业产地

| 经济作物种类 | 主要产地 |
|---|---|
| 木棉 | 贵州明代种植密布，主要产地有安顺、镇宁、水宁等州及普安、安庄、安南等卫，沿滇黔道干道分布 |
| 棉花 | 明代仅见于思南府，清代以后逐步扩展到黔西南的普安、兴义、贞丰及贵阳府隶属的罗斛 |
| 苎麻 | 全省各地均有出产，以黔北的思州、遵义、黔南的都匀及西部的镇宁、永宁等地为多，有桃麻与火麻两类，以桃麻最良 |
| 油茶籽 | 全省普遍种植，以黔北遵义府为甚。芝麻零星种植 |
| 甘蔗 | 产于镇宁、永宁、贞丰、安庄、安南、普安等地 |
| 甜菜 | 毕节、威宁 |
| 土烟 | 明末日渐兴起，见于记载的有安顺、遵义、麻江 |
| 蔬菜 | 明代各种蔬菜相继传入，安顺府周围出现专业菜农 |

表 2-4-2　　明代畜牧业商业性生产地域

| 种类 | 产地 |
| --- | --- |
| 牛羊 | 黔西北彝族地区，向来是农牧并重，（嘉靖）《贵州通志·风俗》载："（乌撒卫）牧羊为产。旧志'土人多牧胡羊，岁两取其毛以为毡而资贸易'"。黔北遵义地区亦养羊，但以山羊为主，"春夏之交，青草丰茂，毛泽而肥。食其肉，可以胜身，饮其酪，可以养性，真俊味也"。而黔南和黔西南明代未见养羊的记载。牛耕推广后，"楼上住人，楼下畜牛"已是贵州的普遍现象 |
| 猪 | 猪为农村饲养主要家畜，明代在播州杨氏土司的庄园中，有 11 处养猪场，而安顺则有大量生猪已经在市场出售 |
| 渔业 | 鱼类繁多，主要以捞捕为主。布依族、侗族、水族以渔猎为乐，人工养鱼记载最早的是播州，成化间土司杨辉有"渔潭十三处" |
| 马 | 明初，征云南需要大量马匹，常在水西、乌撒易马，每次数百匹至五六千匹不等。永乐以后规定：贵州布政司额定每年贡马 12 匹，每三年一朝，贡朝觐马 138 匹 |

表 2-4-3　　经济林业商业性地域生产

| 种类 | 产地 |
| --- | --- |
| 林海 | 黔东南的丹江、台拱、清江、黎平、古州、下江、锦屏、天柱、丹寨、都江一带，"周数百余里；旨深林大脊，林木葱茏，其木多松杉"；清水江流域，"自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杗桷之材，靡不备具"。界于松桃、江口、印江之间的梵净山，"地周六百余里，森林茂密，古木阴森，树林多松、油桐、油茶、白蜡、杉等以及柏、枫、白杨、柿、榨"。黔北遵义府，团状分布。黔西北，纵横百余里森林常见。黔中贵阳片状分布。黔西南南北盘江流域丰茂 |
| 皇木采购 | 贵州是皇木采购区。清水江流域，"迂回百余里，直上下千级，松气表兹，烟凝雾结"。"黎平之民富于木"，其他"山多载土，树宜杉"，自明以来大量砍伐，至清乾隆年间大盛，"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间者产于此也" |
| 竹 | 贵州宣慰司产斑竹、紫竹、苦竹、筋竹、箭竹、绵竹、水竹、丛竹、凤尾竹、涝湘竹、画眉竹等。遵义府产筋竹、斑竹、苦竹、慈竹、木竹、金竹、桃竹、紫竹、方仍、平竹、刺竹、观音竹等。思州府黄道溪特产一种"鹤膝竹"。毕节卫所产"罗汉竹"。此外，黎平的烟竹、实竹；平越的紫竹，都匀的方竹 |
| 油桐 | 油桐在明代记载仅有贵州宣慰司和普安州，而到了清代，黔东北有铜仁、镇远、青溪、思州、安化、龙泉、印江、松桃等地，黔东南有玉屏、黎平、麻江等地，黔南有都匀、都江等地，黔北有务川、正安、遵义、桐梓、绥阳、仁怀、湄潭、瓮安等地，贵州西部则有广顺、清镇、郎岱、镇宁、大定等地 |

表2-4-3(续)

| 种类 | 产地 |
| --- | --- |
| 漆树 | 明代产漆之地有贵州宣慰司、乌撒军民府、播州宣慰司及安顺、镇宁、永宁、普安等州，镇宁州及普定卫还用漆子压取漆蜡。到了清代种植更广，黔北地区以安化、务川、正安、遵义、桐梓、绥阳为盛，仁怀县还有漆园。大定所产大木漆列为贡漆 |
| 乌桕 | 主产区在黔北，以安化、正安一带出产最多 |
| 盐肤木 | 五倍子蚜虫的寄生树，一株每年可取五倍子二斤，用作药材，贵阳、遵义、绥阳、普安等地为多 |
| 楮数 | 取之构皮，其皮可造纸，印江、都匀、定番、郎岱、普安一带最多 |
| 油茶 | 油茶主要产于黔东及黔东南各地。黎平、玉屏是闻名的“油茶之乡” |
| 茶叶 | 《茶经》云：“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贵州茶叶优良，额定三年一贡，计金筑司 13 斤，方番司 25 斤，卧龙司 15 斤。播州茶叶获利甚多，杨氏土司设有“茶园”二十六处。黎平府产“洞茶”，“叶大而味美”。此外有独山的“苦丁茶”和“甜茶”。名优品种有湄潭苔茶、都匀毛尖、贵定云雾茶、石阡苔茶等。明代对茶的控制相当严格，贩私茶与贩私盐同罪 |
| 药材 | 《本草纲目》中所列 300 多种常用药，贵州均有出产。黔西北的天麻，黔北的杜仲，高山地带的黄连，北盘江、红水河一带的黄草，铜仁、安顺、遵义等地的吴英，都享有盛名。产量较多有：茯苓、厚朴、半夏、何首乌、金银花、桔梗、马鞭草、土当归、一枝蒿、虎耳草等，灵芝草“紫尤”尤多。 |
| 野果 | 野果中常见的有毛栗、板栗、猴栗、撕栗、狗爪、杨梅、红子、山楂、刺梨、羊桃等，遍及贵州 |
| 野生菌类 | 野生真菌不下七八百种，其中食用菌有 300 余种，重要的有鸡枞、竹荪、猴头茄、香菇、木耳、银耳、牛肝菌、羊肝茵、松茸等。贵州野生林中遍布 |
| 白蜡虫 | 白蜡是明朝土贡中一大项，以贵阳府、安顺府、遵义府最多，其次是思州、思南、铜仁、石阡等府 |

表 2-4-4　　　　　　贵州矿产地域性生产

| 种类 | 产地 |
| --- | --- |
| 汞 | 洪武年间，《明史·食货志》特别注明："惟贵州大万山有水银朱砂局。"据《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及（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等书记载，铜仁府所属省溪长官司、大万山长官司产朱砂，又产水银；思州府所属施溪长官司、黄道溪长官司，思南府所属婺川县和思印江长官司、蛮夷长官司均产朱砂、水银；婺川县有板场、木悠、岩前、任办四个矿坑；石阡府所属石阡长官司亦产水银。（嘉靖）《普安州志》载，普安州产朱砂、水银。《明史·地理志》有云："普安卫东南有都得山，一名白崖，产水银。"贵州布政司岁解水银 227 斤、朱砂 16 斤 8 两，由思南、铜仁两府员贡纳 |
| 铅 | 明代产铅之地有播州宣慰司、贵州宣慰司、乌撒军民府及思州府、都匀府、普安卫 |
| 铁 | 明代贵州产铁之地，有贵州宣慰司、石阡府、黎平府、普安州、龙里卫、乌撒卫、晋定卫、兴隆卫、思州府、思南府、铜仁府等 |
| 铜 | 《大明一统志》仅载乌撒一处 |
| 金银 | 明代始设局开采，永乐年间设立提溪长官司的太平溪金矿局、石阡长官司的落桥及葛容溪银矿局、铜仁金场局，乌撒则有天生桥、稻田坝、奈童场等银峒。播州明代土司杨爰"擅开银场，递年煎银万千余两" |
| 煤 | 煤的开采最早见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刊行的《普安州志》记载，录有一首《过普安》诗，其中有"窗映松脂火，炉飞石炭煤"之句 |
| 雄黄 | 明代志书记载，都匀府、程番府、永宁州、普安州和安南卫均产雄黄，因贵州有此特产 |

**表 2-4-5　贵州明手工业与手工作坊地域性生产（自然经济）**

| 种类 | | 地域生产 |
|---|---|---|
| 纺织 | 葛布<br>土锦<br>洞布 | 贵州盛产苎麻，麻织最先兴起，故明代贵阳府、思州府、黎平府、石阡府、铜仁府及新添卫（今贵定）、平越卫（今福泉）均产“葛布”。黎平所属洪州的葛布颇有盛名 |
| | 土布 | 明、清两代，民间又多以棉织成土布，如都匀府的“白布”、“台布”、“蓝布”，水宁、镇宁的“铁笛布”，仡佬的“纹布”，定番州的“谷蔺布”、“克度布”，独山州的“斜纹布”等 |
| | 织锦 | 古州所产“诸葛锦”，天柱、锦屏的侗族“洞锦”。花纹图案“皆所物五色而极思，藉罗执以发想” |
| | 制毡 | 明代水西、乌撒土贡之一。洪武十七年（公元 1384 年）定赋税，乌撒贡输毡衫一千五百领 |
| | 蜡染 | 明、清时期，苗、瑶、仡佬、布依等民族使用“溪洞爱铜鼓，甚於金玉，模取古文，以蜡刓板印布，入靛缸渍染，名点蜡幔。”染法创造了树脂染、石灰染、豆浆粱和蛋白染。各地少数民族均具特色 |
| | 刺绣 | 丹寨一带苗族“胸前锦绣一方护之，谓之遮肚”，布依族“女子色白而敏，工织绣”，荔波布依族穿“红绣花鞋”，依佬“绣五色于胸袖间”，花仡佬“妇女两袖绣五彩”，如此等等。苗族的刺绣最具特色，针法有平绣、瓣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多种 |
| 漆器 | | 水西的“乳漆器”在明、清时颇负盛名。这种“乳漆器”是以水牛皮作胎，涂以生漆 |
| 藤编 | | 侗族藤编的盆、罐、壶、杯、盘、坛，涂以桐油、生漆或猪血，细密牢实，不透光，不漏水乖巧异常 |
| 酿酒 | | 明代在贵州最常见的有“咂酒”，又名“钩藤酒”，“竿儿酒”，苗、瑶、仡佬、彝等民族都能酿造。黔南风行“女儿酒”。水族“九仟酒”、“刺梨酒”。传入烤酒之法，始有“烧酒”，如高粱酒、包谷酒 |
| 冶铁 | | 木佬“不务农业，专以铁冶为生，善造长刀、镖镞”。镇宁州土人“善造镖弩箭镞”，仡佬族称之“打铁仡佬”。黔东南少数民族所制“苗刀”，锋利异常 |
| 银饰 | | 自明以来，贵州铜仁、遵义、威宁等地开采银矿，而且大量白银流入贵州，苗族、布依族、彝族最喜银饰 |
| 铜鼓 | | 明代典型有“遵义型”、“麻江型”铜鼓 |

表 2-4-6　　贵州明代官营手工业和手工作坊

| 作坊 | 地域性生产 |
| --- | --- |
| 官营 | 除若干水银朱砂局、金矿局、银矿局而外，贵州市政司设有宝黔局、军器局、织造局、杂造局和冶铁所等 |
| 民间铁匠作坊 | 在成化年间，播州便可“烧炼熟铁”，“专造军器”，且“本州原有铁户八十六户，逐年自行炼铁营生”。安顺府所属的西堡长官司出产的刀，“锋利，有二镰、三镰之号，胜于他境所铸”。镇远的铁锅负有盛名。水西正德年间铸造的铁钟、真州（正安）嘉靖年间铸造铁钟，皆负有盛名 |
| 纺织 | 黔北的棉织业兴起，以遵义为盛，当时播州杨氏土司设有机院，“将民人赵其、江文仁、张川保等一百余户充机院织匠”。贵阳自明代设立织造局以来，织布渐兴。安顺素重纺织，产品有：白布、漂白布、桃红布、柿红布、皂青布、缸青布、黄青布、冻绿布数种兴义各府所属纺织日渐昌兴。思南府城有“绣衣坊”，普定卫城有“锦衣坊” |
| 酒坊 | 仁怀的茅台村，大约在明万历年间即有酿酒作坊 |
| 烧造窑坊 | 明代“烧窑”、“瓦窑”、“石灰窑”、“窑坝”一类的地名遍及全省。明洪武间有一些江西陶工迁至贵阳，在中曹司黄宽寨办起制陶业 |
| 造纸、印刷业 | 嘉靖十二年（1553 年），贵州巡抚刘大直在贵阳鱼铺湾建有纸场。明史记载的有平越卫（今福泉）、龙里卫、安庄卫（今镇宁安庄）、都匀府。石阡纸颇负盛名，《黔书》注明“石阡纸，极光厚，可临帖”。遵义出皮纸。贵州自元以来即有刻书，明、清更盛。明代主要是官刻，由官府主持、提调，募人刻板、印刷、装订、雕版、用纸、用墨不惜工本，故印刷精美大方，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嘉靖）《普安州志》、（嘉庆）《思南府志》等 |

（三）明朝贵州商业通道及运输条件

元在全国广置驿站，驿制十里或十五里设一铺，二十五里设一驿。元在全国设水站、陆站共 1 496 个，贵州地区贯通东西的陆站有 11 个，这 11 个是元时由湖广经贵州入云南必经的驿站。至明代，贵州驿道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贵阳作为贵州政治、经济中心的逐渐形成，交通亦以贵阳为中心发展，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道。（详见第四章第二节）

（四）贵州商业市场地域性分布格局

明朝洪武年间在贵州遍设卫所，永乐以后同时增设府、州、县，至万历年间合计建城四十三座。或府、州、县、卫、所的专城，或府、卫同城抑或州、卫同城。明万历以前，属于府一级专城的有：思州、石阡、思南、铜仁四城；属于州城专城的有定番、麻哈、独山三城；属于县城专城的有务川、印江、永

从、施秉四城；属于卫城专城的有威清、平坝、毕节、赤水、龙里、新添、平越、兴隆八城；属于所城专城的有黄平、普定、关岭、平夷、赤水卫前所、縻泥、阿白撒七城。到清代前期，经过大规模改土归流，黔东南地区的建制逐步完善，省境内县级以上城镇，绝大多数都已诞生，贵州高原城镇的总体布局亦已初步定格下来，同时构建形成屯堡二百八十余处。

城镇的社会空间体系是由一套行政等级所决定的“人为”行政中心；集镇组织的社会空间体系是由一套市场等级所决定的“自然”经济中心。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这两套各具特色的等级体系的派生物。明代贵州城池与屯堡大都在驿道沿线，逐渐形成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的综合体，产生人流、物流、商流的聚集，形成商业中心。标志着贵州进入商业化发展新时代。试举几城为例：

表 2-4-7　　贵州明代主要商业重镇

| 城市 | 交通区位、商业概况 |
| --- | --- |
| 贵阳 | 省会，凭借驿道与省内各地及湖广、川、滇、桂相通，成为“万马归槽”货流衡通之地。自洪武以来，官署增多，人口日繁，官户、民户、军户、匠户云集于此，五方杂处，商业渐兴。明初，镇远侯顾成指挥马悍将顺元城拓宽改建，城区向北拓展至北门桥外。明末天启年间，又在北门外扩建外城，城区扩展到今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一带。城内有通衢大街，纵横交错而成网络，并有街道通向城外。贵阳城集结内外形成了十四个坊市 |
| 镇远 | 镇远地处贵州东线交通要冲，自古为“黔楚水陆之衔，物资富饶之地”。由楚入黔，乘舟可达镇远，继续上行可至偏桥、黄平；弃舟登岸，陆路可入省城，又接东西大道可通云南。故“黔滇宦游，江楚贾客，多泊舟于此”，“辰、沅以此为上游，云贵以此为门户”，有“徼外一都会 ”之称 |
| 思州 | 位于舞阳河支流，龙江河中游，东下可通湖广，西上可往镇远、黄平，转陆运达出河口经省城或入滇；溯龙江上行至源地，陆运越过分水岭可达石阡、思南，再顺乌江而下可至涪陵入川。《明一统志》记载：思州“东连沅靖，西抵涪渝，作湖广之唇齿，扼盘瓠之喉襟，商贾贸迁，居民辐辏，实西南雄胜之地” |
| 铜仁 | 黔东北门户，下水通洞庭湖，达长江中下游；又处大江、小江、寨英三河汇聚之地，周围水路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流域内盛产水银，又有金银矿场，外地人来采购或参加开采络绎不绝。进出口物资在此集散，主要有水银、谷物、食盐、土特产等，舟楫往来，商贾云集，岿然一商业重镇 |
| 省溪 | 位于锦江通航河段上游，顺流经铜仁可通往湖南；溯源至提溪长官司（今闵孝）接陆路，西南可至石阡，西北可达思南，是沅系水道与川系乌江水道联系的又一路线，为水陆联运客货转输口岸。省溪西北有梵净山，明代为佛教圣地 |

表2-4-7(续)

| 城市 | 交通区位、商业概况 |
| --- | --- |
| 威清卫 | 为贵阳西大门，“居田者，以耕织为业；城市者，以商贩为生。务本逐末，恒相半焉” |
| 普定卫 | 普定卫为“黔之腹，滇之喉”，其民“惟贸易日趋于利”，市场上有大宗牲畜贸易，“贾人云集，远胜贵阳”。 |
| 普安州、卫同城 | 为“滇黔锁钥”。《大明一统志》载：“蛮民习俗不一，巧佞便捷，专事商贾。”不但汉族从事商业，少数民族也纷纷进入市场 |

在城市商业推动下，商业集市迅速发展。形成以行政中心所带动的商业集市，以卫所屯堡人口聚集的商业集市，以土司衙署为主导的商业集市，以驿道、驿站辐射型商业集市，以水陆联运码头为中心的商业集市，以物资集散地为汇聚的商业集市，少数民族地区以节日节庆汇集点形成商业集市，以宗教庙会为重大商业契机的市场。（弘治）《贵州图经志·贵州宣慰司》中载：“郡内夷汉杂处，其贸易以十二生肖为该市名，如子日则曰鼠场，丑日则曰牛场之类。及期各负贷聚场贸易，仍立场主以禁争夺。其附郭音，旧有卯、申二场。弘治以来，今巡镇大臣以军民生理疏阔，增子、寅、午、戊四场，并前六场，人甚便之。”形成此日赶鼠场，彼日赶牛场，日日不落空的紧凑商业集市景象。

## 三、明朝贵州区域商品流通格局分析

### （一）各级官府控制下的大宗贸易

明代贵州的商业贸易活动流通格局中，以粮、盐、马、茶、皇木采购及水银、朱砂贸易最为突出，引导整个贵州商业格局走向态势。盐有榷盐之法，马有马政之制，茶有茶法之束，朱砂、水银榷定坑治之法，管理甚严，由明各级官府官采、官运、官销。

粮食为军民生存之首要，尤其是在明朝初期，讨伐分割势力，阻止土司战乱，频繁的战争对军粮运输的需求，构成了贸易运输第一格局。举例诠释：

表2-4-7　　舞阳河军粮运输简表

| 时间 | 进军路线 | 筹粮 | 粮运 |
| --- | --- | --- | --- |
| 明洪武十四年秋 | 征南大将军傅友德领主力取道湖广辰、沅水道征讨云南 | “令郡民岁输米千石，运饷云南普安卫交纳”；“土兵供输，盐商中纳，戍兵屯田” | 利用舞阳河及镇远以西，水陆联运 |

表2-4-7（续）

| 时间 | 进军路线 | 筹粮 | 粮运 |
|---|---|---|---|
| 明正统四至六年 | 征调贵州军队远征麓川 | 所属府、州、县近贵州地方者，每年粮折布十万疋，运赴镇远府，供给贵州迤东兴隆等卫官军 | 沅水、舞阳河为主要供应运输线 |
| 明正统十四年 | 镇压贵州东部苗族、布依族起义 | “以湖广附近贵州之处仓粮、屯粮并折粮银，绢、布匹酌量糴米，设法僱运以给” | 沅水、舞阳河为主要运输线 |
| 明天启年间 | 水西土酋安邦彦起事 | “总督贵州，兼制湖广辰、常、衡、永等十一府并云南军务，兼理粮饷” | “黔饷一切仰给于楚省，自辰沅至镇远可通舟楫” |

明代马政内容包括督养、点视、印烙、编马户、交兑、发表等篇章，非常细致繁琐。《明实录》载洪武十七年“乌撒岁易马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凡马一匹给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盐如之”，“景川侯曹震言‘四川、贵州二都司于西蕃、建昌、罗罗之地易马四千二百五十匹请分给河南、山西都司将士”。可见，贵州边马贸易实施绢、盐、茶易马法和马市收买法，以图求“番马”永恒供给。

明代将茶与马贸易合一，形成全国性的茶马贸易官营体制。比较典型的是洪武体制，榷定了榷茶制度、机构设置、比价制度、金牌信符制、巡查和禁贩制度、运营制度等系列严榷手段。洪武初年，在四川永宁置茶马司，收购贵州茶叶，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在播州宣慰司置茶仓，贵州茶基本作为边茶，运往西藏。

明史记载，铜仁府“南有铜崖山，又有新坑山，产朱砂、水银”。“土产、硃砂，省溪、大万山二长官司出，水银大万山长官司出”。“万山司、北五里有新坑山产砂。惟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朱砂场局”；思州府“土产、硃砂、水银俱施溪长官司出”；思南府“务川县之长钱（山）在县东北五十里，地名板场，山前有空凼，产朱砂。泥塘（山）在县南五十里，山内产硃砂。岩前（山）在县东北二十里，山亦产砂。务川县之木悠（峰）在县（西）四十里，上有水月宫，朱砂产焉。务川县诸山，东北二十里有岩前山，产砂；东北五十里长钱山，地名板场，山前有空凼，产砂；四十四里有木悠峰，上有水月宫，产砂”；石阡府“土产，水银石阡长官司出”。明代朱砂主要开发集中在黔东北武陵山区

域，思南、铜仁等地所产朱砂，大都在湖南辰州集散，称为“辰砂”。.

明代皇木主要是通过官方直接采集、商人采木、进献大木。前述两种为主要途径，后面只是点缀。永乐四年（公元1416年），明廷修太和殿，遣少监谢安到赤水河一带采伐楠木，清人陈熙晋赞叹说：“洞深十丈锁云烟，谢监栖居廿五年。采木使臣归未得，山中开菁已成田”。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武宗朱厚熙下令修建乾清宫和坤宁宫，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公元1597—1609年），北京兴建“三殿”，采木遍及川系、沅系各河，涉及思南、石阡、思州、镇远、都匀、黎平、铜仁等府。贵州的木材均运至清水江等河流到长江，再沿长江经运河北上抵达北京、南京。

表2-4-8　　　　贵州明代采办皇木里程表

| 皇木运输起点 | 运输路程 | | 资料来源 |
|---|---|---|---|
| | 距离北京（里） | 距离南京（里） | |
| 播州 | 9 700 | 6 700 | 《明统一志》卷七十二 |
| 思南府 | 7 395 | 3 530 | 《明统一志》卷八十八 |
| 思州府 | 7 720 | 4 200 | |
| 镇远府 | 7 930 | 4 400 | |
| 石阡府 | 7 760 | 4 000 | |
| 铜仁府 | 7 800 | 4 270 | |
| 黎平府 | 6 200 | 3 750 | |
| 都匀 | 8 245 | 4 715 | |

明代几度采木之役，少者经历十几年，多者三五十年，不恤民力财力，苦役百姓，而修建宫殿坟陵，加速了王朝的动摇崩溃。

（二）乡村集市贸易活跃

农村市场全国各地称呼不一，在江西、福建、广东或称“墟”、“市”，或称墟市；在云南有些地区称为“街子”；在贵州、四川一般称为“场”、“赶场”。明代贵州农村集市，以时间界分：不定期场、半定期场、定期场、日日场。以规模界分：大场、小场和庙会。以商品种类分：综合市场、专业市场。并且出现牙行①（买卖从中说和的中介店铺）。

明朝已经建立完善的市场管理制度：确定集市地点；规定开市日期；统一斛斗秤尺；核定市场物价；征管场税。

发展至清代，贵州各府集市在1~4个的有：石阡、清江、古州、八群、

① 朱式毅. 中国商业地理学［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26.

都江、长寨、正安、麻哈、罗斛、丹江、凯里等州县；集市在5~10个的有铜仁县、安顺府亲辖、龙里、平越、都匀、思南、水城、台拱、大塘、广顺、独山、册亨、三脚屯、湄潭、毕节、贵筑、印江、清镇、安平、绥阳、桐梓、余庆等厅州县；集市在11~15个之间的有思州、都匀府亲辖、仁怀厅、开州、定番、永宁、平远、威宁、普安县、修文、瓮安、天往、安南等府厅州县；集市在16~20个之间的有大定、黔西、龙泉、安化、归化等府州县；集市在21个以上的有镇远、普安厅、镇宁、黄平、贞丰、荔波、务川、仁怀等府州县。

贵州境内广大山区，经济基础严重滞后，尤其在交通闭塞，经济凝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仍然"刻木为契"，钞法不通，钱法也并不行，民间贸易，常常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互通有无，以一般等价物如牛、羊、米、麦、布、帛、盐、银作为商业贸易交换中间介质。

（三）农村集市分布规律

根据克里斯泰勒的市场区位理论，最佳市场区应该接近于一个正六边形。美国学者施坚雅应用中心地理论分析近现代中国农村集市，并且以西南四川盆地作为典例，进行剖析，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六个区域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记录，大量的集销都正好有六个相邻的集镇，合成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尽管这个市场区域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进一步论证村庄与基层的或较高层次的市场之比，在中国任何相当大的区城内，其平均值都接近于18，如果用图解法表示，就显示出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集镇位于中央，周围有一个内环，由6个村庄组成，一个外环，由12个村庄组成。"①

贵州农村集市的区位布局基本不符合其分析框架，因为与四川盆地比较，其地形崎岖起伏较大，但契合以下规律：基层市场体系的大小与人口密度成反方向变化。在人口稀疏分布的地区，市场范围必须大一点，以便有足够的需求来维持这一市场；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则较小。

## 第五节 清朝盐运，官督商销

清代初期，废除"开中"，整饰盐商秩序，采用"坐商收盐法"和运销食盐"纲网法制"。为了安定政治局面，在贵州实施解决贵州"食盐难"的系列

①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9.

相对宽松盐政。中后期，各级盐商“报效”，准予盐价“加耗”与“加价”，盐价持续上升，加上国体破碎，社会矛盾激化，政治经济格局不稳定，盐以病民。丁宝桢盐政改革举措妥当，惠及川黔，但在盐政历史进程中，实属浮萍。

## 一、清代前期贵州盐政

清代前期的治黔政策，史学界赞之为封建时期“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成功之典范”。清朝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为了巩固基业，安抚边陲，政治层面上，继续展开明朝在水西“改土设流”，随即全面在贵州“改土归流”。经济层面上，减租免税，招徕垦殖，奖励垦荒，明确规定：“凡山头地角奇零土地，可以开垦者悉听民夷垦种。”① 免征租税，兴修水利，扩展水稻种植，鼓励桑蚕养殖，储种林木，倡办采掘冶炼，促进工矿开发，使得“省会及各州、县店铺稠密，货物堆积，商贾日集”②。通过盘活商贸集市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激活了生产力，增强了人民购买食盐的自给能力。

经济繁盛所需，必然带来交通的振兴。大力拓展交通驿道，“天下之苦累者莫过于驿站，驿站之险远最苦者莫过于黔省”，虽黔陆路险阻，跋涉艰难，但已经形成省际与省内驿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雏形交通干网，同时开凿水路盐运，清代前期，累计疏治大小河流近 2 000 里。雍正与乾隆间，都柳江兴起的有都江（今上江）等码头，清水江兴起的有都匀、下司、施秉（今施洞）、清江（今剑河）等码头，赤水河兴起的有猿猴、二郎、兴隆、茅台等码头。由此，扩展了盐源通道，为切实解决贵州“食盐难问题”开拓了崭新路径。

在盐政层面具体榷定如下：

### （一）“官督商销制”盐运定则——岸有专商，引有定额

以川盐为例，顾老把当时川盐行黔概括为“四岸三步”运销制。第一步：由运商从盐场购盐，分道转运至合江、江津、涪陵、叙永四盐岸，趸售与销商。第二步：由销商从盐岸购运至省内各销场，趸售与商贩。第三步：由商贩自销场购运至销盐点，零售与消费者。③ 根据《遵义府志》的记载：“四岸运商各十余家，悉是陕西大贾”，其“运销资本合计不下千万”④。省内销商亦大都是“川陕巨商”，本土行商不过二三户，其资本总额亦有数百万。这两级趸

---

①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 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126.
②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 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146.
③ 顾文栋. 对清代前后期贵州盐政的评述［J］. 盐业史研究期刊，1999（6）：36。
④ 郑珍，莫友芝. 遵义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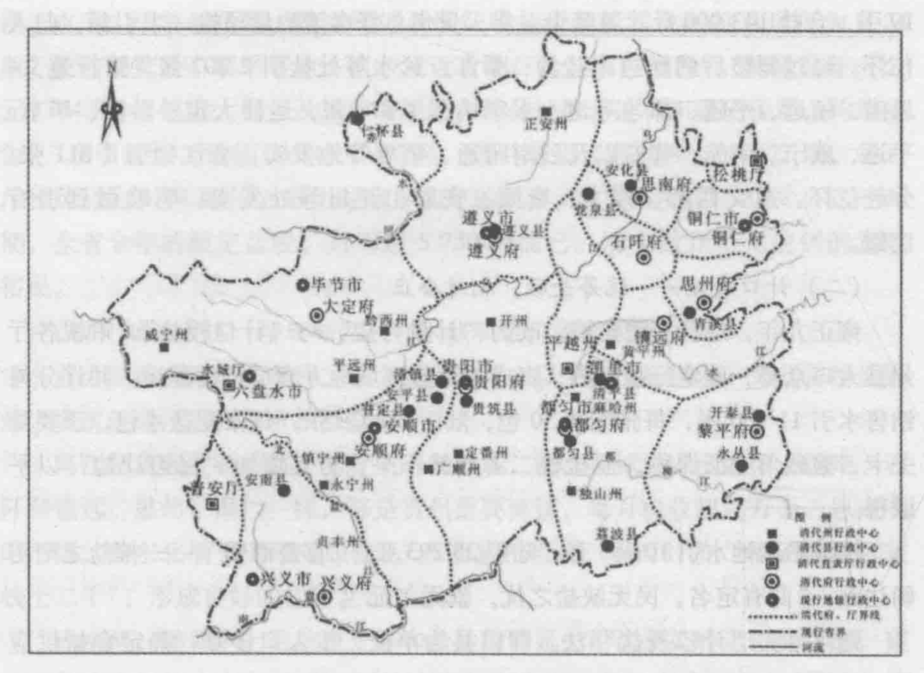



图 2-5-1　清朝贵州行政区划图

售商，既掌握进口盐源的命脉，又拥有左右供销的权威。

《清史稿》记载食盐运销方式："其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官督民销，惟官督商销行之为广且久。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①。当时的清政府，决定对川盐行黔实行"官督商销"制。即在"岸有专商，引有定额"的基本框架里，采取"商人领引，配运则归盐道，税羡经征则归州县"的办法，实施"划地行盐"、"鬻有定所"、"引有定额"的纲商引岸制度。通令各地："各处盐价，依照市钱随时起落，或遵照定价画一销卖，自有一定之规，不应随意起落。"

黔边岸配盐具体情况以乾隆六年为例，运黔川盐额定为水引 5 896 张，合盐 44 220 000 斤。其中：三台承运 250 引，合盐 1 875 000 斤；射洪承运 1 539 引，合盐 11 540 000 余斤，中江承运 129 引，合盐 968 000 斤；蓬溪承运 234 引，合盐 2 500 000 余斤；富顺承远 1 657 引，合盐 12 430 000 斤；荣县承运 1 811 引，合盐 13 580 000 余斤；资州承运 220 引，合盐 1 650 000 斤；内江承运

① 柯劭忞，等. 清史稿（卷 123，志 98），食货四，盐法。

19 引，合盐 143 000 斤。乾隆十一年，贵州总督奏请酌量预拨一半引额，归入仁怀。经过调整后的黔边岸盐为：綦江、彭水等处盐引 2 207 张，销行遵义、思南、镇远、平越、都匀等地；永宁销引 1 878 张，运往大定、黔西、毕节、平远、威宁、南笼、普安以及云南昭通、镇雄等地发卖；合江销引 1 811 张，分赴仁怀、遵义西部、修文、贵阳、安顺、开州等处发卖。明确做到引有定额。

（二）计口售盐——统筹兼顾，相对公正

雍正九年，巡抚宪德奏请，改为“计量行盐”与“计口授盐”，审视各厅州县人口众寡，确定行盐引数，责成各销盐区域地方官员招商配运。共计分摊销售水引 11 166 张，每张配盐 50 包，陆引 61 029 张，每张配盐 4 包，于要隘关卡，验截角应征课税，但盐税二者始终不平，为其增加“保边计盐”以平课税。

销滇黔两地水引 10 685 张，陆引 25 293 张。“官督商销”——榷盐之则明确达到：“商有定名，民无缺盐之忧，款无欠征”。

强化落实“计口授盐”法。即以县为单位，按人口多寡，确定食盐供应量，并指定专商，负责运销。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衙清吏正的前提保证下，体现了统筹兼顾、公平合理的原则，解决了偏僻乡区“商贾不至”，“乡间农人，每因购盐恒仆于数十里之外，耽延三数日，犹不能购盐到手”的困难。

由此初步实现了食盐供应的初步定型化，建立行盐与销盐两相协调体制，为防止进销脱节、供求失调，建立了法制保证，引无虚发，盐无脱空。

（三）恤商裕课——轻税盐政，降低盐价

顺治登基（公元 1647 年）明令户部，禁止一切额外浮收“有司征收钱粮，止取正数，凡分外侵渔、秤头火耗、重科加罚、巧取民财者，严加禁约，违者从重参处”。康熙帝并曾对商榷政策，做出如下指示：“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止何异？”康熙十七年（公元 1678 年）更加严惩“州县官克取火耗，加派私征，及司道府徇隐不报者，皆革职提问；徇纵不参之督抚，革职”[①]。可见前期，“政尚宽大，初不注重收入”。对贵州的盐税征课，更是从轻考虑，动工疏浚赤水河，为此由内帑一次拨付的工程费，相当于全省六年盐税收入的总和，由此而证之。

康熙初年，批准在贵阳、思南、石阡、镇远、安顺以及平远、大定、黔

① 田文镜，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 官箴书集成：第 3 册［M］. 合肥：黄山书社，1999：234.

西、永宁、毕节和乌撒、鸭池等处设所征收盐税，但其税则每百斤仅为0.24两，比前朝宽松。黎平等地，则“就近食湖广盐，不再缴税”。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镇远、铜仁及思州府属的大部分地区，进口川盐的税则，均规定为：“水引每张（载盐50包）3.45两，陆引每张（载盐4包）0.27两，每百斤税负只为0.04两”[1]，较上述康熙初年的税率，又大幅度减轻82%。这一时期，全省全年的额定盐税，只不过5 730两而已。切实做到了无前例的宽政裕民。

（四）疏浚河道、增设驿站——水陆联运，商贸繁华

着力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扩大进口盐源，以平衡市场供求。为此曾增设驿站，多次疏通河道，以求扩展盐源。

乌江是清代主要盐路。随着航运的发展，沿江集镇进一步繁荣，思南、石阡和镇远、思州、铜仁一样，都是贵州重要商镇，每月税收超过万金。思南当时产棉，黔东北桐子“结实如桃”，产油量相当高，当时计价“桐子五石可获钱十二千”，形成良好的盐油互市。

赤水河，随着中上游航道开辟和盐运的伸延，沿江多处转运码头兴起。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遵义府从隶属四川改属贵州。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改遵义分府为遵义厅，也称仁怀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改遵义厅为仁怀直隶厅，归贵州粮储道。早在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辟为川盐入黔口岸（仁岸），在沙湾塘设置停靠盐船码头，治所东门、北门、西门和对岸富家坳、铧剪坝、老鸦沱均修建石砌阶梯码头。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整疏赤水河后，盐船改泊东门码头。复兴场，北宋大观年间为仁怀县治所，清初毁于兵，乾隆间重建，为盐船上行的第一宿站。丙安、葫市为大滩附近船舶经常停泊发展起来的集镇，又是竹木扎筏外运的码头。猿猴（今元厚），为断航险滩处形成的中转港，赤水至猿猴、猿猴至二郎滩段的盐船在此停泊、倒载，部分食盐由此陆运土城。土城至猿猴间滩险密集，故成为猿猴至二郎滩段盐船的主要宿港和水陆联运码头，部分食盐由此陆运省内其他地区。二郎滩和兴隆滩（今马桑坪），为中游“吴公岩”不通航河段起讫的转运港，其间陆运盘驳20里，两地均建有坚实石砌阶梯码头。茅台，赤水河上游盐运的终点港，由此，陆运转销省内各地。

都柳江、古州、三脚屯在明代已具港埠雏形，后因土司地方割据势力加

---

① 中共贵州省铜仁地委档案室，贵州省铜仁地区政治志编辑室整理. 铜仁府志［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8.

强，下游西江航运中阻，发展受到限制。清代“改土归流”后，疏治河道，航运贯通，“水路合江下可通两粤”，特别是重新运销粤盐，定“古州为总埠，丙妹、永从、三脚屯分设子埠”①，促进了港埠繁荣。

古州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置厅“成水陆通衢”之地，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商人往来经商，“贸迁成市，各省俱建会馆，衣冠文物，日渐饶庶，今则上下河街，俨然货布流通不减内地”。

三脚屯，成为向独山、都匀转运食盐和货物的码头，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以其“偪近新疆，路通往来，直达两粤……兼有运上江下江兵米”，粮盐运输十分繁重。

八洛，原名浪泡，为两粤物资向黔东南沅水流域转运的水陆联运码头，据《三江县志》载：“路通永从，为黔之孔道，两粤货运均由此登陆，经黎永畅销于黔东南腹地……适当黔水支流洛溪与溶江汇流之冲，有起卸货物扼要抽厘之便，遂……移设厘局于浪泡，并改地名为八洛”②。

丙妹（今属江县镇），当四寨河口，为附近物资集散地，溯四寨河接陆运可至永从、黎平，亦可进入黔东南沅水流域。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置永从县丞一员分驻掌管。

都江（今三都来牛寨），为上游军事重镇，驻有重兵把守，建仓贮粮，雍正十年置都江厅。

（五）调整运销区划，形成合理的运销体系

康熙中期，黔西南普安、安南等州县，“川盐价贱，每斤不过三分，滇盐价重，溢于四分三厘之外”。而云南地方官，竟自违反市场规律，以行政命令，强行划定为滇盐行销区。云贵总督王继文遂即于康熙三十四年上报朝廷，朝廷奏准“令禁滇盐行销，一律改食川盐”。结束了“滇商苦于远运，黔民苦于价贵”的局面。黔东南榕江一带，原属淮盐行销的范围，由于交通不便，盐源匮乏，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广西巡抚金以“苗疆新辟”，奏准朝廷“官运粤盐至古州、永从、丙妹、三角，每斤定价一分二厘试销”。由此至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两广总督鄂尔泰又进一步改以古州为总埠，另在永从等四地分设子埠，实行“源源接运，遂成水陆通衢”，粤盐进销的主要集散地。第二年即增加引额达3 800道，合893 000斤，统一在古州同知官管理之下，分拨由盐商自由运销，并规定“每斤定价卖银二分一厘，毋许丝毫增长”，两

---

① 黄家服，段志洪. 中国地方志集成 贵州府县志辑 18 光绪黎平府志（二）民国麻江县志 嘉庆古州杂记 民国榕江县乡土教材［M］. 成都：巴蜀书社，1982：87.

② 姜玉笙. 三江县志（1、2）［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72.

年之后，再减为一分九厘。黔东地区的镇远、施秉以至铜仁、思州一带，原亦为淮盐行销区，由于产地过远，运道迂回，经常出现市场脱销、价格波动的问题。乾隆九年（1744 年），贵州巡抚纪山奏请改划为川盐行销区，并报准递增水引至 11 570 张，陆引 25 293 张，于是“三府地因而渐渍，卒食川盐”。

（六）盐运量的增长与整体供销格局的演变

雍正、乾隆时期，贵州整体食盐量供给有较大增幅，创前期历史最高点。整体盐运销格局有调整，川盐范围日趋扩大，淮盐紧缩，恢复粤盐供销。

明末清初战乱，川盐不济，清政府为了恢复川盐，推行了一套较积极宽松的政策，鼓励移民入川，允许自由开凿、自由生产和自由贩运，减轻课税等。允许四川“听民穿井，永不加课，蜀盐始盛”①，贩盐“不拘大商小贩，通行无滞”，官素不甚禁，以活穷民。这样四川输出盐多，贵州相应受益。

《大清会典事例》载：贵阳、安顺、平越、都匀、思南、石阡、大定、南笼（今安龙）十府俱配销川盐。乾隆六年（公元 1741 年），川盐入黔合计 44 220 000斤，主要由明代四条线路输入。乌江川盐水运抵达思南，由石阡转陆运；綦江水运抵达松坎；合计两江川盐输入盐引 2 207 引，合计 16 550 000 斤，运销遵义北部、思南、镇远、平越、都匀等地。赤水河水路盐运只能达到仁怀厅的沙湾塘（今赤水县鲢鱼溪），食盐须由沙湾陆运至猿猴，再转运贵州内地。乾隆初年，曾对赤水河中上游河道进行整治，整治后盐船可上溯至茅台，延伸里程 300 余里，乾隆十一年（公元 1746 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赤水河增拨川盐引额，赤水河输入盐引 1 811 引，13 580 000 斤，运销仁怀、遵义西部、修文、贵阳、安顺、开州（今开阳）等地。由四川永宁（今叙永）陆路输入 1 878 引，14 090 000 斤，运销大定、引，毕节、平远（今织金）、威宁、南笼、普安及云南昭通、镇雄等地。

清初淮盐所占份额递减。黔东铜仁、思州、镇远、黎平四府与淮盐销区湖南接壤。清初，民船自湖南洪江、芷江、麻阳等地逆水上渡，多夹运私盐入黔售卖，沿袭已久，皆为民办，素无盐引。雍正时，户部不考虑运输条件和盐运传统，只是为了增加盐课，将四府改食川盐，陆路遥远，成本增加。乾隆八年（公元 1745 年）张广泗疏请“请从民变，改食淮盐”，官盐试销以后，榷定每年从锦江、舞阳河、清水江溯运百万斤左右。但其他地域划定销盐口岸，淮盐一概不得倾销，由此淮盐总体引数递减。

---

①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自流井盐业世家［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237.

粤盐恢复运销。明朝中叶以后，黔江大藤峡瑶族起义中断粤盐线路，雍正七年（1729年），都柳江航道开通并且延展，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清廷组织粤盐300 000斤由柳州远至古州试销，远低于从陆路运至的淮盐，次年运销范围推延到沿江上下游的三脚屯（今三都）、来牛（今上江）和丙妹（今从江）等地范畴。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两广总督鄂尔达奏请招商引盐，明确粤盐入黔运销体制：以古州为总埠，三脚屯等处为子埠，由古州同知统一管理，每年引额暂定900 000斤。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增加引额，都柳江盐运量达到1 400 000斤。粤盐行私，清初都匀府原定为川盐销售区域，但须经20多站方可抵达，所以导致运销川盐盐价高昂，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商贩将粤盐煎熬成块，自三脚屯运往都匀、独山售卖。

《贵州通志·食货志》记载：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仅进口川盐即多达5 720引（按每引50包，每包160斤计）合457 600担，六年之后，即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增加到5 896引，合471 680担[①]。此时全省人口按500万人计，其年人均供应量已达9.43斤。依照贵州人民的食盐习惯，所谓"不咸不淡，一餐二钱半"，以日需五钱月需一斤计，全省全年的总需求量应为600 000担。据此，仅上述川盐运销量，已能满足其全部需求的79%，如果再加上滇、粤、淮盐的进口数，应该是基本保证了供应。这一时期，在省内食盐市场几千年第一次呈现"价不高昂，盐不欠缺"的景象，七成普通百姓基本解决盐温饱问题。

## 二、清朝后期盐运政局

### （一）官督商销——吏治腐败，官商勾结

清朝前期贵州实施"官督商销"，其实质是指盐商具体承担盐的运销，官府仅有监督掌控职责。官督商销是纲盐引岸制度下的主要运营方式，在后期其弊端暴露无遗。

官督除了体现在设官管理外，还体现在盐商行盐程序的繁琐和复杂性上。首先领授盐引，《清史稿》所记："商人之购盐也，必请运司支单，亦曰照单，曰限单，曰皮票，持此购于场"。运司支单就是盐引，有"正引、改引、馀引、纲引、食引、陆引、水引"之繁多种类，盐引是盐商购盐卖盐的凭证和许可证。"商人办运请引，文书辗转至十一次之繁。经盐务大小衙门十二处，

---

① 靖道谟，等. 贵州通志［M］. 北京：京华印书局，1968.

节节稽查，而并无稽查之实，徒为需索陋规之具。”① 支盐后还要经过“沿途盘运、解捆、掣验、抛洒”等程序，盐商经过这些程序之后，往往被勒索殆尽。官督商销的体制下，如此复杂的程序，必然导致商困及吏治腐败。同时，盐商为了摆脱层层陋规剥削之苦，必然想方设法与官府交结，“口岸卖价，不能不增。私盐毕集，官引遂至壅滞，实为盐法大害”。这些增加的成本盐商不是自己承担，而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致使官盐昂贵，民不愿意买官盐，转买私盐，从而导致行黔盐斤的岸价波动和运销量的日益下降，贵州食盐市场陷入僵局。

（二）国体破碎——战败赔款，增租加税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各地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已经濒临崩溃的清政权，既要对外支付巨额的战败赔款，又要增加军费，扩充军队，以对内进行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最后国力空虚财用匮乏，岌岌不可终日。而为了缓解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唯一出路，只在于增租加税，对全国人民进行疯狂地掠夺。而贫瘠如贵州者，其盐税征课，竟亦成为攫取的重点。

首先是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开征厘金。几年之后，又进一步扩大范围，于“盐货往来之仁怀厅设仁岸局，大定府属之瓢儿井设永岸局，桐梓县属之松坎设綦岸局，思南府属与川境交界之龚滩设涪岸局，并于黎平府属之沱口、开泰县属之流滩各设一局，盐货并征”。凡“商人运盐到岸，见十抽一，谓之大厘…… 且沿途复有半厘、小厘、毫金、落地税种种名色；又有查局、分局、验票局及地方州县私设卡局；需索苛派，层层剥削，疵弊丛生，每引一张，抽厘银五十余两”②。仅此一项，即高于引课至少一倍以上。至同治初年（公元1862年），又将额定盐税由原来的5 730两，提高到7 610两，即增加33%。按照清政府的原有规定，各地盐课，一律限制在额定数字之内，不许多征。但此时的“黔省向不遵照定制，于定税之外，各府州县无不私设关税，任意自收，横征无度，商民疲困日深”。其他的额外摊派，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中仅庚子赔款一项，即责令贵州每年认解20万两，并全数转嫁于盐价。这一笔摊款数字，竟高于额定盐课的25倍。

（三）政局不稳，盐运、盐销体系崩盘

自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起，首先在黔东南，继而在黔西和黔南地区，

① 吴海波，清中叶两淮私盐与地方社会—以湖广、江西为中心［D］. 上海：复旦大学，2007：48.

② 黄家服，段志洪. 中国地方志集成 贵州府县志辑 38 嘉庆仁怀县志草 光绪增修仁怀厅志 民国开阳县志稿 民国修文县志稿 康熙龙泉县志草［M］. 成都：巴蜀书社，2006：231.

相继爆发了持续22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而在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的战火硝烟里，“地方全行縻烂，户口逃亡几尽。其时西商（即陕西籍运商）遭害者，亦十之八九，遂各歇业不前”。一直到光绪初年，才渐次恢复到“每岸虽有数家，多属川黔之人凑资朋充，本非殷实”。由盐场至岸口的第一道运销环节，即运商实力已经大为削弱，而省内运销又由于“所过之处，厘卡林立，如布网罗”，再“加以关税之重征，官吏之苛派，土豪地棍之把持需索，商本动致亏折，往往视为畏途”。其经营户数，亦由“昔年凡二十余家”，减少到“今仅六家”。由岸口至省内销场的第二道运销环节，即销商的营运状况，同样是一幅消极冷落的景象。在此情况下，第三道零售环节“商贩裹足”。盐运、盐销链条完全断裂，川盐行黔的整体运销体系，已经处于全面瓦解的状态。

由此带来的恶果之一是：“川中边引积至八万七千有奇，未完羡截一百三十六万六千余两；计引积至四十六万一千有奇；未完税负四十七万九千余两”。总计积压盐斤49 000 000多担，减少税收1 800 000余两。

正是由于川盐进口量的锐减，以致贵州盐源短缺，市场紧俏，再加上盐税的重课，盐商的敲诈，因而由此带来的结果之二是：“向来省中盐价，每斤不过三分上下。自咸丰四年军兴以后，增至七八分”[①]，至同治初年，“因来盐稀少，商贩居奇，又长至一钱有零”，一般乡镇则“斗米斤盐”，贵州再次陷入严重的盐荒灾难中。

（四）川系盐运的后期格局变迁

咸丰年间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斗争，使贵州食盐水运的流量和流向常有变化。初期太平军席卷江汉，淮盐内运受到阻碍，黔东铜仁等地淮盐不能输入，一度运食川盐。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太平军受挫，淮盐恢复运黔。

川盐四岸的运输也有波折，军兴以来，黔省处处被扰，商人歇业，专商经营的运制受到冲击，边岸盐运失常。但食盐不可或缺，正引虽然削减，私商却可趁机贩运牟利。川南地区供应的计盐数量有余而成本较低，为走私贩私提供了方便。方志叙述边岸盐引减少的原因时提到：“边计壤地，犬牙千里，计商盐本较轻，辄以计盐倾销边盐地，边贩遂避重就轻，贪买计盐，边商亦停开正引，重重影响”。合江、南川、彭水等地盐船船户或盗卖盐，在运制混乱时乘斤，或“掺杂泥沙，诳报漂溺，串同为奸”牟利。说明正引虽然削减，盐运未尝中断，惟社会治乱无常，运量消长不定。

咸丰七八年（公元1857—1858年）贵州其他地区战乱正殷，赤水河、乌

① 靖道谟，等. 贵州通志·食货志［M］. 北京：京华印书局，1968：458.

江号军活动频繁，“各途皆阻，惟松坎尚通川路”，綦岸盐运源源不绝。綦岸入黔运道有二：一由赶水溯松坎河至大室铺，转陆运至绥阳、遵义、贵阳各地；一由赶水经羊磴河至湾塘，转陆运至正安、湄潭等地，甚至远销湘西一带。据方志记载，“戊午（公元1858年）以后，川盐漏楚，绕道由黔松坎、綦岸行盐倍常，商利大兴”，当时桐梓县境内盐运比以往繁忙，是綦江上源水运空前鼎盛的时期，每年过境的盐包数以万计。

都柳江流域雍正后期试销粤盐，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在古州设总埠，三脚屯、丙妹、永从设分埠销售后，百余年间比较稳定。咸丰年间，地方残破，停办两余年之久。至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贵州巡抚岑毓英以“民人远集，尚无商人之运盐到元埠，民有淡食之虞”为由申请恢复盐运，以粤盐抵黔饷，每年万包，运量约四五百万斤。

道光年间，已有过商贩把粤盐经都柳江，由三脚屯私运独山、都匀的情况，遭到川盐运销部门抵制。光绪年间，又出现粤盐经南、北盘江私运，向黔西南各县“搀越”的事情。

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向来通航。清咸丰以前，社会安定，广西商人曾载食盐百货上溯红水河，至北盘江百层、董青，南盘江八渡、坡脚等地转陆运附近地区出售，换取土特产。光绪年间，商贸恢复发展，水运粤盐成本低，至黔西南各州县场镇陆运距离又较近，而且地处两省边界，政府稽查鞭长莫及，故贩运私盐日益泛滥。据永岸盐局禀报：最初只在边界处零星摊卖，继则概用麻布口袋大船小船装载上驶，并假冒白糖纳厘上税。其路线是：“一由兴义之八渡汛起坡转运册亨、棒鲊等处；一由坡脚起岸，迳运贞丰、新城各州县等处；一由百层运至安南县、者相场、永宁州以及各乡场镇。”[①] 船舶载量自50担至100担不等。盐价较永岸陆运来的川盐低30%~50%，竞争能力很强，当地人民乐于购食粤盐。永岸分局认为川盐“销行疲滞”的原因，“皆由粤盐充塞所致”[②]，故向当局“呈请咨禁粤私”。从走私粤盐在黔西南销售之广和对川盐影响之重可以看出，当时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盐运的规模是不小的，对社会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 三、清朝川盐为主体行黔概况

清史稿载，“其在四川，始以潼川府之射洪、蓬溪产盐为旺，嘉定府之犍

---

① 夏鹤鸣，廖国平. 贵州航运史：古、近代部分.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第121页。
② 赵尔巽等.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02.

为、乐山、荣县，叙川府富顺次之。不数年，射洪、蓬溪厂反不如犍、乐、富、荣。方乾隆四十九年，各处盐井衰歇。有林俊者，官盐茶道，听民穿井不加课，蜀盐始盛。惟潼川难如初。且产盐花多巴少，又煎盐用草工费，致欠课七万，始议与犍商合行，以十二年为限，期满归清积欠，因请续合十二年，及期满自办。甫一载即欠二万余，于是复请续合。至道光八年，三次期满，而其厂产盐愈少，每年仅完正课，不完羡截。羡即羡余。截者，于缴课截角时交纳也。时汉州、茂州、巴州、剑州、蓬州、什邡、射洪、盐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营山、仪陇、新宁、阆中、通江、安岳、罗江、安县、绵竹、德阳、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铜梁、大足、定远、荣昌、隆昌三十一州县，因卤衰销滞，商倒岸悬，民在近厂买盐以食，正杂课银归入地丁摊徵。盖盐商奢侈，家产日衰，乃觅殷户出租于引商，名曰‘号商’。所完课羡，须交引商封纳，引商往往挪用，且官复有与为弊者。至三十年，全纲颓废。徐泽醇为总督，查积欠羡截银共二十三万七千余两，未缴残引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张。于是酌拨代销，将号商姓名入册，责其自行封。时惟犍、富边商及成都、华阳计商稍殷实，销岸亦畅，馀皆疲滞，而潼商尤甚。乃撤出黔边所行水引，交犍、富两商承办。”①

清初，川盐销售覆盖黔境全省，及滇北韶通、东川两府，后即增添鄂之八州县。清初在贵州推行盐票制度，但此时，四川局势混沌，川境人口零落，川黔盐道埂塞，票盐制度不能落在实处。至顺治八年始，在四川境内由布政使刊刷发商销盐票四千九百四十张。

随着政局的稳定，川黔通道的畅达，清廷为了增课，康熙二十五年，改由户部颁引，专设置道缺管理盐法，引归产盐州县，招商配运，分为水陆两引，合计四川共销三万八千三百一十张，但引限用一年，过期废引，销售盐区能趋近遍及，僻远之地，劳顿费资，既有越限堪虞，复有回引折阅之虑，商人大都裹足不前，致使引滞，百姓缺盐。

“官督商销”日久滋生弊端，“盐非引不能配运，引非商不能领行”，盐商滋生贪念，行业垄断严重，居奇抬价，民间叫苦不迭，官府税课无亏。延续至咸丰中叶，内外交困，东南战事兴起，黔岸盐引不行，黔民食盐窘困不堪。光绪三年，丁保桢将入之黔改为官运商销，以图补救权衡之策。

① 赵尔巽，等. 清史稿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第六节　宝桢榷盐，官运商销

自清嘉庆、道光年后，盐政败坏、引岸互掠、盐引积滞、私盐走俏、国税亏空、运商疲乏、盐旺民贱，官督商销确已腐烂，再叠加清廷与地方利益的矛盾，官僚机构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政治经济局面日益恶化。丁文诚公通盘虑及，经画周远，兼顾川黔两地经略，国家与地方利益的平衡，切实解决贵州淡食之忧，通过一系列方针策略与工程措施，迅速奏效。此举是与清朝盐政史陶澍两淮盐政改革交相竞辉的盐政亮点。

### 一、筹谋榷盐

丁文诚公——丁宝桢（公元1820—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县）人，咸丰朝进士。光绪二年九月，被任命为四川总督。

光绪三年，为了整顿盐业经济，确保四川盐政税课收支，解决贵州民众长期淡食之苦，在贵州遵义人唐炯建议下启用华联辉，召集司道等官商议恢复四川在滇黔营销市场，历时五个月，广泛听取黔、川双方意见，度权轻重利弊，最终议定川盐在黔境改革议案。

四川经过咸同农民起义，岸商四散而匿，地方官员多次招募，十年竟无一人应考，无商可稽，"官督商销"制度名存实废。

"官督商销"，领引配运归盐道，税费征收归州县，领引、配盐、购盐、销盐、征税、交各种繁杂管理费向章办事，部门杂乱，为各级官员行私费公大开便捷之径，或贪污、行贿受贿、坑蒙夹带、弄虚作假、走私偷漏、官匪联盗，各种盐税费毫无定则与定数，商人持本求利，势必将各种费用，转借取盈于黔民。

国乱土豪恶棍横行滋事，为所欲为。"如茅台村、沙滩、新隆滩、吴公岩、沙湾、二郎滩、太平渡等处，皆有豪棍私立地皮码头、过砦筏规、河规、神金、厘金及一切等项不经名目，妄贴告白，勒取商贩及脚夫、船户钱文，稍不遵从，即胁以威力……穷黎被其剥削，商贩闻之裹足，以致货难集而船户守候。"① 乌江下段沿河司（今沿河县）境也有土豪把持，狂言该处只能有田、崔九姓十三家码头，其他商号一律不得"开秤发夫"，滞碍航程，外地盐商皆

① 郑珍，莫友芝. 遵义府志（上）. 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125.

闻风踌躇不前。

## 二、榷盐宗旨

针对以上民怨商畏的恶劣情形，丁宝桢曰："官督商销，利归官与商，官运官销，权全归官，流弊皆大。惟官运商销，官商可相钳制。"确立了"官运商销"以求破局。

宗旨是"局运商销，力裁浮费，疏通引岸，禁止需索为扼要之图。且清理积引，以杜重造之盟；兼办计岸，以遏引射之渐。裁局卡，立船行以畅运销之路；严交盘，填出纳，以绝侵蚀之源。而又增核带销，以清积滞；分认奏销，以专责成"①。

《清史稿》载，"筹章程十五条：曰裁减浮费，曰清厘积引，曰酌核代销，曰局运商销，曰兼办计岸，曰引归局配，曰展限奏销，曰严定交盘，曰慎重出纳，曰认真黔厘，曰实给船价，曰删减引底者，运商向于坐商租引配盐，引给银二十余两，由商总租收，作为课税羡截，领缴引费，及官吏委员提课规费，商局公费，余数二两，分交各坐商。至是历年羡截，运商已缴，本应全革。惟因年久，姑准存一两，曰添置办票，曰酌留津贴，曰酌给奖叙。"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经清廷奏准，丁宝桢分别向山东巡抚借解银八万两，由司道陆陆续续筹拨四十二万两银，委任候补道唐炯②，总理一切盐务，另聘遵义县人华联辉（华柽坞，由于华柽坞协办成功，以后获得川盐入黔大份额专利权，立即成为贵州垄断川盐销售最大的"捆商"，获利巨丰，利用销盐资金，创办了成义烧房附属其盐号，是贵州茅台酒厂的始祖）协办盐务。在泸州设立黔边岸官运总局，督办"官运商销"一切事宜，在犍、富、射三厂设购盐分局，永、綦、仁、涪四边岸及附近各厅县设售盐岸局，相关一切给票、收盐、发商、验票缉私等事务都由总局、分局管理。分局之下，又设子局分卡，负责沿途的盘验、提拨、巡缉，以保护引路。厂局向井灶购盐运往岸局，岸局招募岸商认购盐斤，由他们到本岸各地零售。做到"引由局配，盐由局运，而商人销盐"。

举凡引底、盐本、运费、局费、黔协饷一切计入成本再发商行盐。黔盐行于川省州县官卡及一切陋规浮费全数裁免，一切无名计费概予废除。同时奏请

---

① 鲁子健．试论丁宝桢的盐政改革［J］．盐业史研究，2000（2）：20.

② 唐炯（1829—1909年），贵州遵义人，字鄂生，晚号成山老人，道光年举人。1854年镇压贵州苗族起义，捐知县入川。1862年统安定营，镇压太平军石达开部。中法战争，帅滇军不战自退，革职捕问，左宗棠解救，获释戍滇，1887年，督办云南矿务。

朝廷，贵州境内抚臣通饬局卡，凡遇行黔盐厘一律免收，其报部关税，悉照部则上纳，不许重征。并严禁各地方官设局私派，以通商路。

同时协调川黔盐税收支平溢。复奉准“四川行黔办官运局代榷贵州厘税，以黔省厘税无则为代榷而纳诸黔，由黔边四岸分局于发商盐时，引榷税十两，榷厘四两，纳于总局，转运黔省。税厘两款岁可十八万两，盐入黔境不得再榷”①。而且，还奉准“由川省每年暂行认解黔厘银五六万两，以济饷需，以后如销路日畅，盐务大有起色，再行酌量多拨，以昭核实。”

四川拨付贵州协饷由最初的一年五六万两，后来陆续增加至八十一万两。以此为条件，进一步扩大川盐销量。为此，在接受协饷的第二年，省政当局即主动提出调整食盐进销区的新方案：全省81县，除黔东南黎平、开泰（今锦屏）、古州（今榕江）及永从、荔波等一府一厅三县，准许粤盐行销外，其余各州县，全部改划为川盐行销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在黔西南和黔东地区，完全排除滇、淮盐的进销，而一律代之以川盐，也有其不尽合理一面。但此举是考虑缉私盐流窜，便于大局控制盐运销，或有合理之处。

### 三、实施方略

丁宝桢改革盐法，在具体施行中，明确提出“裕课便民”的方略，各级官府采取了以下具体举措：

（一）严格限定各岸盐商开设数目——实行运销管制

（1）仁岸四家，清朝光绪年间为永隆裕、永发祥、协兴隆、义盛隆。其中华之鸿家占“永隆裕”与“永发祥”两家；陕西张、田、刘三家设“协兴隆”，李四友堂贵州亦设有设“协兴隆”盐号；四川河江花园吴家设“义盛隆”。不久，加上民国时区长郭昆甫及本镇的商人集资开设新四号即：云胜通、大昌菜、德顺昌、同义祥，合称仁岸“八大盐号”。延续到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仁岸又新增“永盛隆”、“荣盛通”、“大昌荣”和“新记”等四家大盐号营业。后来经过华联辉、华之鸿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三家陕西客商均被官府排挤，只剩华家独自垄断。每家商号所发流通银锭分别铭刻店名，每岸银锭颜色也有差异，便于核查。仁岸银锭渗透青色。如图2-6-1：

（2）綦岸在光绪年间，盐商设立了“恒昌裕”、“全兴益”、“宝兴隆”、“义益号”、“天全美”、“大生美”等“六大”字号，专营川盐。其发售银锭皆有本号铭文。银锭为本色，如图2-6-2。

---

① 姚美玉，丁宝桢与地方民生［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19.



图 2-6-1　仁岸专用银锭



图 2-6-2　綦岸专用银锭

（3）永岸有永昌公等八大家盐号。演变为“西”、“黔”两帮，西帮包括山西、陕西、江西等地的商人集群；黔帮指贵州盐商集团，加上犍为、乐山、富顺、隆昌、自贡、毕节等地盐商。资金雄厚的盐商都云集永岸，最高时行商、坐贾盐商有五十余家。通货银锭尽皆铭文，银锭颜色暗透土黄色。如图 2-6-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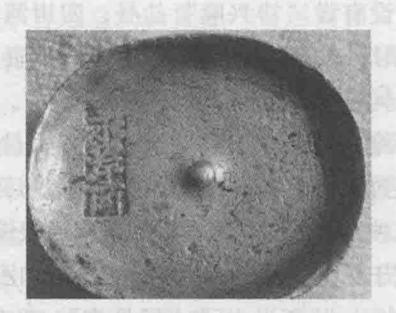


图 2-6-3　永岸专用银锭

（4）涪岸设置“天字号”、“义字号”、“恒顺号”、“恒升元”、“大兴公”等八大家盐商号。涪岸运黔要道，为四川涪陵至贵州龚滩小河，计有八百余里长，涪岸通过贵州也运销湖南的凤凰三厅。

（二）划定四岸销售区域——“专岸专销”，划定载额——“计口授盐”

黔边各岸总体由犍、乐、蓬、射等厂专配。每岸核准销售区域人口概数，依照每人每天吃盐三钱量算，划配仁岸月销 22 载，綦岸月销 18 载，涪岸月销 20 载，永岸月销 14 载，合计全省月销盐 74 载（每载重量在自流井起运时为十万零八千斤）。为了限制岸与岸之间盐商彼此倾销、串销，在出盐场时把盐熬成 4 个花色，以示分别：“仁岸为草白盐；綦岸为花腰干盐，即白底红杠色；涪岸一部分为草白盐，一部分为炭巴盐；永岸为五通桥产的炭巴盐（即高粱色）。”

（三）保边计盐——严禁倾销

为了杜绝川黔边界插花地域私运倾销，在各岸除去正常配盐以外，另配给保边计盐量，勘补足盐。仁岸配六载，销合江全县及习水一部分，綦岸配四载，销綦江全县，涪岸配六载，销涪陵全县，永岸配两载，销叙永、纳溪两县。

（四）配发盐引——厘清数值

购盐办毕纳税后，即由官运局发给盐引，每载盐十二引，每引 50 包（具体计算分解：水引每引五十包，四包为一则，半包为一色，前清官运富厂花巴盐，花盐九引为一载，巴盐十二引为一载，花盐每包库重称重二百斤，加耗盐二十斤，共重二百二十斤，到岸折耗约十斤，再转发商销；巴盐每包重一百六十斤，加草蔑五斤半作耗盐，共重一百六十五斤半，到岸以净盐一百六十斤发商转销。斤是以司马秤而论，十六两八钱为一斤）。倘若盐在水中船只失事，只要盐引保存，勘明属实，可由官运局给予免税补配盐斤。

（五）清理积引——调剂运销

有时盐场与销岸之间的对应供求不及时，或各销岸之间引额盈亏过分悬殊，导致岸引失调，可由官方批准后，调整为通融代销，采取改配改代的方法予以整盘调剂。所谓改代改配，即将滞岸的盐引改交畅岸的商人销售，或者将丰场的盐引改由歉场的岸商采购，从而达到疏通积滞，调节供需，维持场岸盐引平衡的目的。黔边自 1878 年 12 月 16 日起至 1879 年 12 月 15 日止，应行边计额水引 14 035 道，陆引 13 161 道，均已销竣，并带销积水引 6 925 道，陆引 102 道。

（六）规划运道——盐运循距

官运局指定仁岸盐由合江进口，利用赤水小河水运到茅台村；綦岸由江津属的江口进口，利用綦江河水运到松坎；涪岸由涪陵进口，利用龚滩河，水运到思南；永岸由纳溪进口，利用永宁河水运到叙永。各岸再改用人背马驮内

运。为便于水运的搬滩过坎、陆运的人背马驮，减少消耗，在产场即将盐煎成块盐（一般称锅巴盐），既便于辗转搬运，又可减少仓耗的损失。

（七）额定耗盐——错落有度

为便于计算盐价、运费，规定以盐搬盐（即以盐作运费），采取递减办法。如仁岸在合江为每包180斤，（递减至）贵阳、安顺为96斤，以84斤即作各站仓耗、途耗、运费之用。

（八）核定盐价——惠及黔民

岸盐价格的核定，根据各边岸商运盐远近的不同，运脚的差异，规定一定的幅度，由岸商自行到市场销售。沿边计岸由总局核定成本，在照本缴银的基础上，分花、巴两种盐，每引准许卖银2两至20两不等，作为商利。

售盐价格由官运局根据产场盐价与销场差价，核定趸售零售价格，由承办商按照规定价格出售。由此，黔边及近边各计岸民间食盐，“从前价贵至一百数十文者，今则落至七八十文；贵至七八十文者，今则落至四五十文，是以商民称便”。

（九）成立盐军——护佑盐运

丁氏为了确保解款、缉私、盐运的安全，降低盐运风险，令四川盐茶道署成立盐军安定营，分驻四川、贵州运盐据点，定期巡稽，沿途护送。

因为茅台是川盐入黔的口岸，匪患四处扰乱。因此，自清光绪初年起，就断断续续地有盐防军驻守。清光绪初年驻有盐防武装队，隶四川盐茶道署盐防军安定营。演变到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茅台盐商筹建盐防兵三班，隶属贵州盐务统带部。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茅台驻有贵州盐防税警第四队一分队。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扩编茅台驻盐务、税警队二、三分队，马桑坪驻第一分队。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贵州盐务税警队改编为第五区队，总部及第二十、二十六队驻茅台，第二十四队驻马桑坪。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盐务税警队改为盐警队，茅台驻两个班，马桑坪驻一个班。这些驻兵，一定程度上保卫了川盐入黔的安全。

（十）设置河工局——维修盐道

贵州河道滩险水急，陆路则崎岖难行，为便于盐运，在贵州各边岸设立河工局，专门负责打滩修路，并拨专款，购置产业，作为打滩修路固定资金。并且规定必须一年一修，三年一大整。

（十一）专设裕仓——协调盐务

为了平抑盐价，丁宝桢又在官运总局之下专设裕济仓。同时，建大盈库，调剂各岸资金。并派员专驻各岸协调盐务，安驻盐防兵勇，以防横暴，于是盐

枭奸商无法横行，官吏不能插手中饱私囊，盐运畅销，亦无偷税漏税、拦路抢劫等行为。

（十二）体恤商贾——激活盐运

丁宝桢实行盐政新法以后，由于实行的新法极为有利于商贾运销，兼之修凿河道和旱道，从客观运销条件上便于商贾，减除了以往对商贾的盘剥、勒索、重征、捐修、捐输、报效等名目，严禁私贩，保护官运。使商贾“无不踊跃趋公”，增灶添船，“各岸商人争售官盐”。而至于“现在盐价顿平，川黔各岸已有食贱之喜，私枭亦因而敛迹。今是数者征之，似已大有成效”。

（十三）裁减浮费——商销踊跃

丁宝桢在行新法之初，即奏议称：“黔省厘卡虽已裁撤，厘金由川认解，而运盐入黔，经过各关卡征收盐税及各项经费，合计每引共须纳银四五十两不等，商力实难支持，恳请咨商裁减……第不议裁革，则成本过重，加以官吏需索，书役留难，各商畏阻，不肯运盐直入腹地销售，荒废口岸终不能一律开通，于川省引课既多停积，亦于禁川复淮大局有碍……议即于川盐入黔之永、仁、綦、涪四岸，按引总征解黔一税之后，黔中各关卡概不准分厘重征，需索留难，庶能涓滴归公，不致别生疑窦。第此项收数虽较以前裁减三分之二，然必须出自各商情愿，始能照办。若商情稍有不服，即不能稍事抑勒。……该商等深明大义……黔本瘠苦，若不稍资商力，地方公事亦难办理，遂各欣然乐从。今试办两月，销行既多，盐价亦减，商民毫不间言，并据各该商情愿永远遵守官运并现议税厘一切章程办理……议革黔中一切私税，各商等知私税横征之弊尽除，仅与抽厘减累，实多情愿照办……自后川盐行黔毫无窒碍，销数日有起色。”①

由此，川盐入黔后，除报部之关仍照则上纳外，各地不准私设局卡抽收杂费和厘金，川省每年认解黔厘六万两，均摊于四岸盐本内征收，以补贵州由于裁除厘费而减少的收本。

在盐务章程中规定：“此后边计，除济楚仍旧外，所有四岸引张，无论边、计、新、旧，应由局配运，无须使费。”陋规浮费的裁革，减轻了商人的负担，有利于调动他们购盐、售盐的积极性，保障了黔边岸的畅流。

（十四）盐市复兴，商业兴旺

丁宝桢在筹办官运盐务的奏折中称：“川省户稠人众，黔省土旷人稀，但使边盐畅行，商人趋之若鹜，五六年间，黔中人民逐渐复业，口岸亦逐处兴

---

① 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四十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123.

复，其工作力役借沿途店栈为生活者，通计四岸引地不下数十万人。”①

川盐行黔，盐运沿途线路，行旅畅通无阻，商贾云集如流，贸易盘货兴旺，码头增，仓库添，店栈盛，脚夫、船夫、纤夫、船工皆汇集于此，倚盐求生。外境商民移家趋利，大都置办田地；闲置散户，团聚垦荒。盐业运输的经济集聚效应，致使沿途以港口、码头、中转栈点为中心伴随人口聚集，逐渐延展形成众多的小城集镇，繁荣了盐路商旅，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了文明开化。边缘乡村因盐运而变得富饶。黔边岸桐梓之松坎，地形两山窄道，中通一线，历为川黔交通之必经孔道，小镇南北均为川黔道中最为险要之径，本身几无出产可售又无矿藏可开，仅因濒临松坎河道，遂因盐运而成为水陆交通码头、川盐入黔重要集散地之一。光绪年间，盐商云集，仅领引认销的大商号就有恒昌裕、大全美、大生美、全兴益、宝兴隆、义益等，且多为川陕商人开设，松坎自此遂为黔北重镇，人民也为之较其他地方而富庶。随着经济发展，川黔铁路修筑，航道淤塞，铁路、公路过境，小镇遂日趋冷落，不复见往昔风光。其他如赤水、土城、猿猴、茅台、叙永、毕节、大方、沿河、思南之类无不如此，即所谓“城以水兴，水为城用”，“镇因盐旺，盐衰镇败”。

（十五）疏通四大水运口岸

盐法落在实处，必须保证盐运畅通，运销两便。丁宝桢鼎力整治四岸航道，以图克服黔道天险，裕国利商便民。

丁宝桢于光绪四年（公元 1878 年）奏称：“窃查川盐入黔，河分四岸转运一由纳溪至永宁小河，二百余里，为永岸运黔要道；一由合江至贵州茅台村小河，五百余里，为仁岸运黔要道；一由江津江口至贵州松坎小河，六百余里，为綦岸运黔要道；一由涪州至贵州龚滩小河，八百余里，为涪岸运黔要道。此四小河发源滇、黔，分流川江，皆窄狭崩崖，激湍乱石，节节有滩。自去年开办官运以来，盐船经过，每至险处，触石即漏，必须提载加纤，万分艰难，非议修淘难期畅利。现据绅耆商民等公禀，自愿集资捐款，因势利导，酌加修治，以利舟楫，俾可畅行，盐船无虞失事，而沿河穷民更可以工代赈，于边地商民大有裨益。俟此工告竣，如果经费有余，可妥设岁修河道及四岸陆行险路，以便行旅，而期久远。”② 随即展开大面积工程。

1. 赤水河河工

赤水河源出云南镇雄，蜿蜒于川黔边境，至赤水县鲤鱼坳入川，在合江汇

① 丁宝桢. 丁文诚公奏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56.

② 丁宝桢. 丁文诚公奏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59.

入长江。赤水河地质情况复杂，上游多崩岩和卵石浅滩，中游以层砂岩为主，下游因砂页岩长期冲蚀而形成浅顾和险滩，清代以前未经疏浚，只能分段通航，而且时断时续。

早在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为了解决黔铅外运和川盐入黔问题，总督张广泗奏请开河，并组织人力调查沿河滩险，于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十月动工，工程上起毕节县境的天鼓岩，下至猿猴附近的鸡心滩，纵长达400余里，历时半年告竣，费银38 642.5余两。凿通了上段天鼓岩至新滩共27滩，下段盐井至鸡心滩共41滩，新开航道300余里，船可上溯至猿猴、二郎滩、马坪及白沙河。

记忆犹新的壮举。时值张广泗在民间举贤征工，家居牛渡河畔的村民吴登举步行到仁怀厅城（今赤水市）请奏，并刺指滴血，具结呈文，承修文公岩十里长滩。吴登举率领全家十八口四处约募乡民，同心协力克服艰难，完善竣工。张广泗现场视察，拟对为开河积极献策的吴登举授以官职，吴婉言谢绝说："某未习诗书，荷公厚恩，得免罪戾足矣，敢望官乎。"张深情触动，赠"忠耿过人"四字以示奖励。吴登举积劳成疾，忧愤而死。后人为志其功，将文公岩更名为"吴公岩"。这就是贵州人民的本质特写，"不为功，不为官"，只求默然奉献，淡然清贫。



图2-6-4 吴公岩吴登举浚河碑

光绪四年，丁宝桢再次奉请，获准之后，听从赤水河总办官唐鄂生建议，"基建与养护相结合"，以节约经费，巩固工程效果，技术层面上实行"因势利导，或开宽槽口，或淘净泥沙，或捡出乱石，或补修纤路"策略。

于次年初兴工，由补用知府罗亨奎、县令鲁堃等组织实施，招雇附近工匠和农民，实行"以工代赈"。

工程整治范围由茅台下至合江，以上游茅台至二郎镇一段为主体，重点放在吴公岩险段。采取"就地分修，水陆并作"的方法，此次施工采用围堰和

爆破之法，“先凿石穴，实以火药，灌水银，泥封留窍，置药线引火裂之”①，工颇便利，施工三年，共改善滩险70余处，清理零星礁石浅碛200余处，共支银二万余两，工费由盐务总局先前垫付，各商号按盐引数额分摊，是为官商协力治河的创举。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三月，基本竣工，惟吴公岩滩段仍未获彻底改善，马桑坪至二郎滩间仍靠陆运人力搬滩。赤水河航道经此次整治后，茅台至马桑坪段能通行长15米，宽2米，水深0.6米，载重四吨的木船、马桑坪至二郎滩段因吴公岩滩炸礁后，滩坎增大，水流加急，航行更险，仍不能正常通航。二郎滩至猿猴段可通行长20米，宽3米，吃水深0.75米的木船，其中二郎滩至土城段滩漕较深，船舶可载重7.5吨，土城至猿猴可载重5.5吨。猿猴至赤水段可通行长22.6米，宽3.3米，吃水深1.3米，载重11.5吨的木船。赤水至合江段通行长26米，宽3.6米，吃水1.5米的木船，中水位时可载5吨。新隆滩（今马桑坪）至二郎滩段30里，仍由陆路转运。工程竣工后，盐务官运局拨出白银一万两给盐商生息，以利息作河道和沿河旱道的岁修费用。

赤水河使用的木船 以“四川舵笼子”② 为主，赤水至二郎滩一段使用的是耐恶浪冲击的“牯牛船”③ 和“关刀船”④。

赤水盐运航道的开通，促进了赤水河两岸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由此黔北四镇因盐运而兴起，“一打鼓，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打鼓”原名称“打鼓新场”，为黔北四大名镇之首，现称毕节地区东部城关镇，为清代苗族地区川黔古盐道和黔北重要商贸集散地；“永兴”昔名“马桑坪”，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更名“新场”，为明清“万商幅凑，百货云集，黔省一大市镇也”；“茅台”镇素有“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繁华的历史写照；“鸭溪”镇为明清时期黔北“名儒”、盐商齐聚之商业重镇。

---

① 夏鹤鸣，廖国平. 贵州航运史（古、近代部分）［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145.

② 四川舵笼子：船为客货两用，船体形状首尾上翘，舷樯较高，船的中部和尾部有两个房仓，船长约30余米。

③《牯牛船谣》序云：“牯牛船每船水手十六人，可载盐一百八十包，蜀盐以五十包为一引，计三引余。其船朴而坚，自仁怀直隶厅城下至猿猴镇，载盐者皆此船也。”此种船结构坚实，干舷较高，能经受急浪冲击。有前、中、后、尾4舱，舵用直木，船中构小台，高约五尺，司舵者居其上，底皆夹板，有大小之别，大者拖纤不用桅杆，其余相同，再小者曰老鹳飞，惟去船上之台，其与小牯牛同。赤水至猿猴用大牯牛。再上二郎滩用小牯牛。故郑珍《牯牛船歌》云：“猿猴滩西凶滩多，船非牯牛不敢过。”注：1尺=0.333米。

④ 赤水河上游至二郎滩行驶茅村船。该船形若木梭，前梢似“关刀”，又称关刀船，利用前梢后橹操纵，十分灵活。吴公岩未打通前，这种船可结队通过，载重2~12吨。

2. 綦江河河工

丁宝桢于光绪六年疏浚綦江河河道，凿通綦江至松坎清水溪段，并使航道沿松坎而延至新站段。

重点放在凿通松坎至新站间五十余里河道，以求通航，“即可由新站发短程经运遵义属板桥。将遵义之店移设板桥，使省城驮马直下板桥，板桥脚夫也可直上省城，驮马周转更为便捷。此河一开，统计由綦岸至贵州省城……运道开通，脚价减轻。黔民得以食贱，商号无虞折本……”① 遂委候补知县胡大燴负责一切开通修淘事宜，并按照仁涪岸旧章办理。当年即大举兴工，凿通至新站60里航道，通航至新站。

丁宝桢提总督津贴银一万两，交商发盐生息，作岁修费用，并立“綦岸岁修运道章程四条：一是发商生息以恤商民也。统计水程约共五百余里，盐船皆逆流而上，河中窄处甚多，怪石纵横，节节皆滩，每届秋冬水涸之际，向商号捐修，或穷民逐段挑挖，上下船帮给钱，然多草率了事。兹蒙宫保丁俯念商民，将督署津贴一款，发到各岸生息，作岁修运道之用。綦岸领获银一万两，分派各号承领，遵照每月生息一分行息，自光绪七年闰七月初一起算。每年秋、冬之交，仍雇熟悉工匠，逐段挑挖，俾运道疏通。二是委员监修兼修旱道以专责成也。綦局虽有委员二人，势难分身兼顾，修理河道，亦须秋冬之间始能动工，且船夫纤路，背夫旱路，须逐处查看，遇有坍塌，一并兼修，往返耽搁，约在百日内外，始能竣事，故须请员监办，责成始专。三是经理河工账目应由各号拣派以昭公允也。俟河工告竣，由委员经手人核实报销，以归划一而杜欺罔。四是饬具领状以昭诚信也。为修运道起见，所定行息，既属微薄，而商民又免自行捐修，故皆乐于从事。应各具领状，呈缴总局，以便稽查而昭慎重。”② 至光绪八年，松坎、新站之间蒙渡一带因崩岩而淤塞断航，又督修凿疏通，然终因山势险峻，开窄淘浅，而致旋疏旋塞，未能根本奏效。

咸丰年，綦岸盐运最盛，来自赶水以下的盐船行驶綦江上源松坎河与羊磴河却有困难，主要是两河比降陡，水量小，航槽浅，滩危密集。船民们对船体结构进行改良，创造了“软板船”盐运船。船体长10.66米，由纯木板钉合而成的特殊船体，由船首（磨脑）、头笕、腰笕、后笕、船尾（尾磨脑）五段结体构成，为了增加船体强度，头笕到后笕间，底部设有龙骨，两侧板各有5根肋子。船板用梢钉、抓钉合缝固定，用咬钉连接侧板和底板，缝间打入石花或

---

① 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 遵义市志［M］. 北京. 中华书局，1998：332.

② 夏鹤鸣，廖国平. 贵州航运史（古、近代部分）［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

草纸防漏。整个船体柔韧。软板船就地取材，经济耐用，结构别具一格，为省内外各河所仅见。

丁宝桢在疏通赤水河、綦江河航道的同时，亦对涪岸乌江涪陵至思南之间河道和永岸河道与旱道进行了疏浚与凿通，使四大岸盐运畅通并延伸入贵州境内，且水陆并举，将川盐分运至贵州全境，而致盐引行销，盐价抑降，商皆获利，民能食贱，国增税收，皆大欢喜。

## 第七节　盐道再疏，盐岸畅通

清朝期间，除了以上提及的丁宝桢重点整治的赤水河河工、綦江河工之外，清朝由于政治与经济的需要，时间上或前或后，空间上或整段或分支，分别对以下盐道进行了整疏。

### 一、乌江流域疏浚

乌江源出威宁乌蒙山山脉东麓威宁县香炉山，北源为六冲河，南源为三岔河，南北二源汇流后始称乌江。东南流向经水城、纳雍、织金、六枝等县境，至普定后折向东北流，经安顺、平坝、清镇等县境，汇入六冲河后称鸭池河；再转东北向流经黔西、修文，在修文六广段称六广河，经金沙、息烽、遵义，至乌江渡后始称乌江。往下仍往东北流，经湄潭、余庆、开阳、瓮安、石阡、思南、德江、沿河等县境，至沿河县城后再折向西部入四川境内，经彭水、武隆至涪陵汇入长江。支流主要有野济河、猫跳河、偏岩河、湘江、清水河、六池河、石阡河、洪渡河、余庆河、印江河、美蓉江等。乌江上游和中游落差大、滩险多，一般不宜航行。下游自思南至河口，水量增大，比降放缓，自古即可航行，但在贵州境内一段河道有滩险20余处，有“潮回喷怒雷”的“黔中砥柱”潮砥，有“黔境千峰走怒涛，新滩石出利如刀”的新滩，有“狂浪击岸雪花涌，怒涛震耳雷声轰”的龚滩盐道三险。

清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贵州巡抚周人骥组织人力开凿南明河、清水河以利运铅，仍因滩险复杂，历时年余而未通。

道光十二年（1833年），思南城南十里的镇江阁一带因滩险失事，知府杨以增等组织开辟左岸山径数百米。

咸丰六年（1856年），德江县境乌江左岸一次岩崩，坠入河中的乱石达数十万方，阻断航道，被命名新滩，与潮砥、龚滩齐名，成为乌江中游天险之

一。在右岸建驳道输运食盐，后因局部坍方，改在左岸，而左岸上游又有一处坍塌难行。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修复右岸运道，因涉及两岸居民运盐脚力收入，群起阻挠，旋修旋毁。后经协商采取分股招盐、四六分成、两岸共同受益的原则予以解决。至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将右岸运道再次修复。

明、清时期，乌江中游的船称歪尾或歪屁股船（亦称厚板船），船板较厚，强度好，能承受急流拍击；干舷较高，过滩不易上浪；头尾高翘，首舱设有前梢，尾部向右并高于船头，上架后梢，驾长在官舱顶篷高架上操作，视野开阔；后舱又置偏梢辅助，故自重虽大，操纵亦称灵活，载重20吨左右。道光年间，沿河县船民丁大用驾驶歪尾船至四川涪陵，开贵州乌江船舶航行下游的先例。

清水江中游的船称苗船，船体瘦长，底盘为弧形，无肋骨、脚梁，自重轻，吃水浅，配有梢、桡、篙竿，操纵十分灵活，常扎“茅把”以防浪，为后来清水江麻雀尾船的前身。

### 二、清水江流域疏通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西南改流”过程中，为了打通“苗疆”，运兵运粮，令都匀、镇远、黎平三府分段治理清水江，并疏通台拱（今台江）巴拉河。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修整干流航道及纤道，以后又疏浚黎平境内的亮江，船可上行达上游支流重安江。

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创造了一种“苗船”，形制特异，尾部窄长而上翘，船体瘦长，底盘为弧形，操纵灵活，自重轻，吃水浅，下滩时在船舷两边捆扎巴茅防治，称为“麻雀尾”。

### 三、舞阳河流域整治

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贵州巡抚卞三元承接明朝开疏，再次倡导开发舞阳河，调动平越、偏桥、兴隆诸卫官兵分段治理，整治了诸葛洞至黄平旧州一段滩险52处，改善航道130里，船可上行至冀平旧州。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又因特大洪水，使镇远府城下20里许的大王滩严重阻航，遂于次午春开槽百余丈，凿去礁石，进一步改善航行条件。镇远为水陆交通的要津，驿道、水道和盐道在此接衔接，顺江而下，经二十站即达湖南常德。

所用船只，形似湖南的“麻阳船”，“大者曰辰船，容二十余人”，“小者

曰解船，容三四人”，辰船上行至辰溪，而解船可直达镇远等处。在镇远均玉屏间，行驶着一种名为“翘脑壳”的船只，属木帆船型，首部较向可以防浪，前后有梢便于上滩下滩。

## 四、锦江流域开凿

锦江发源于江口梵净山麓，流经闵孝、江口、铜仁，在文昌阁入湖南境，于辰溪注入沅江。明代以来一直是黔北地区通往湘西的重要水道。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贵州巡抚卞三元首倡修整铜江水道，自省溪（今江口）以达堤溪（今闽孝附近），全程80余里。雍正、乾隆年间，再次疏浚锦江以通粮运和少量盐运，但下游高溶地方，险滩常常阻航。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铜仁商民与船户集资修河，在高溶开凿铜潮溶，设闸坝蓄水以利行舟，于是船可顺利到达湖南麻阳。

锦江使用的船只与㵲阳河大体吻合，如前所述，主要是“麻阳船”。

## 五、红水河流域小工程

红水河上源为南盘江、北盘江，两源均发源于云南沾益马雄山麓。南盘江经曲靖、陆良、宜良、开源进入黔桂边境，北盘江经宣威至可渡河口入贵州境，东南流经六盘水及黔西南，在蔗香汇入南盘江后称红水河，红水河蜿蜒于黔挂边界，至石龙纳柳江后称黔江，在桂平纳入郁江而称洵江，至梧州纳桂江后称西江，在广州接北江、东江入海，称为珠江。这条水道通航历史久远，早在秦汉时期便成为夜郎地区通往南越的重要通道，史称“牂舸江”①。夜郎国与中央王朝保持联系。元军自大理而出，屯兵自记，扎大筏而下广西，亦使用这条水道。明、清两代，为贵州与广西的交通要道，滇盐入黔多依赖这一航道，未见有阻航的记载，只是零星小河工工程。

## 六、都柳江流域修缮

都柳江为西江的重要支流，发源于独山的拉林、里纳，流经独山、三都、

① 牂柯江作为我国一条古老江河的名称，对它的记载最早出现于马迁所著《史记·西南南夷列传》中。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载“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司马迁多次提及牂柯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南越在接待时，“食蒙蜀枸酱”，唐蒙对从未见过、品尝过的美味枸酱感到好奇，遂问这种蜀地特产食品是从何而来时，得到的问答为“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枸酱是从南越西北方蜀地所产，经直达南越都城——番禺城下的牂柯江水道贩运而至，佐证指今北盘江。

榕江、从江入广西境，在石龙注入黔江。自明代后期，都柳江即已通航，但并不是很通畅，常为滩险所阻。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鄂尔泰力主打通都柳江，以便从广西运送粮食，遂令地方官吏会勘水道，凿开三脚屯至三洞及诸葛营至榕洞间的碍航礁渍，同时沿江岩修筑纤道以利换舟。乾隆三年（1738年），张广泗再次组织修缮航道及纤道。

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张广泗奏请开凿支流寨蒿河，打通盘埃、千列等险滩，榕江至寨蒿段80余里水路实现通航。都柳江上游的头浪、二浪、三浪等滩，经初步整治后可以通船，但必须吊滩，时常发生事故，清末始开凿新槽，行船捷便，时人谓之“胡公太平溶”。

## 第八节　政局纷乱，盐制叠生

清康乾以后，贵州大部分依靠川盐。清光绪三年（公元1876年），川督丁宝桢开办官运，以拨给协款810 000两为条件，奏准全销川盐。光绪十年（公元1883年），黔南独山、荔波等地也改为川盐、粤盐并销。此后，除黎平、开泰（包括今锦屏地）、古州、永从及原为并销区的荔波，余皆为川盐引地。

### 一、兵匪交加，盐制叠生变迁，盐运滞顿

民国之初，各省独立，引法松弛，三合、独山两县再次成为粤川盐并销区；盘县、兴义、安龙三县成为滇川盐混销区；铜仁、江口、松桃三县，有淮盐倾销。

1915年川区家运盐公司成立，改官运为官督商办，由公司专卖，次年取消公司，完全敞开，任商自由贩运达10年之久。由于政局变化，军阀自行征收盐捐，不问官私任盐运销，故滇、粤、淮盐并至，川盐销量相对递减。1927年复改为包商专运，称“认商”，“即包认省税的专商”。1933年取消“认商”制度，1935年复行包商专运，次年又彻底取消“认商”，再行自由贩运。20余年间盐制翻云覆雨叠生变迁，清末推行的官运商销已完全取消。国乱盐制焉存？多数时间均处于自由贩运之状态。

“任商自由贩运，各皆趋近避远，舍难图易”，商人皆集于仁、綦两岸。

涪岸“销区通地皆匪，盐务凋敝”，运力运量显著减少，因为乌江船型特殊，无人自备，日趋于少，盐运至少短销近三分之二。以1932年为例，沿河县境盐船仅存50余只。

军阀割据时期兵匪交加，对盐运的影响不限于涪岸销区，殃及全省各岸。据《贵州财政月刊》记载："永岸（大定境）时有股匪啸聚，（织金境）屡有劫盐事发生；仁岸脚夫拐盐潜逃，时有所闻；綦岸时多匪阻，常有劫掠；正安、安常等处被土匪围攻……"又据民国时期（1930年）档案记载：黔东边境各县盗匪充斥，时有劫掠，货物往返亦须军队护送，商旅既有戒心，船舶往来亦受影响"。由于治安不宁，行引疲滞，运额不足，川盐盐商居奇，四岸不断抬高盐价，边远地区斗米斤盐，以致"黔省有四分之一人民无力食盐"。

1930年，贵州省政府政务委员陈廷纲等提请"开放淮、粤、滇盐，使能三方进口"，广开盐路，改变川盐垄断市场和商人随便提价的状况。省政府转令建设厅办理，但社会治安未能改善，难以组织正常运输，淮、粤两盐输入有限。

1936年重行划定全国食盐销区，原来供应淮盐的天柱、锦屏县境改食粤盐，天柱商民力争贩运淮盐未果。都柳江流域各县均食粤盐。盘江流域仍以川盐为主，清末开始的粤盐由盘江输入的形势已有变化。

## 二、民国的盐运配额

运销贵州的川盐为富顺、荣县和犍为3场所产，引额都有规定。1915年成立公司，曾规定黔岸计边川盐年额为11 703引，约46 800 000斤，次年改行自由贩运，又规定犍、富二厂四岸计边川盐年额共9 959引，近40 000 000斤。除去永岸的叙永、古蔺、古宋，仁岸的合江，綦岸的綦江、南川，涪岸的酉阳、秀万山、彭水和黔江等川省各县的计盐外，入黔边盐的引额为30 800 000斤 。据《四川盐政史》载："行之数年，运岸短销甚巨，偏远之区民多淡食，甚至贵阳一带每盐一斤，付银六七角之多。盖遇匪警和战争，则皆裹足不前，不若专商之有责任非运不可也"。另据张晓梅《贵州经济》记载：富、荣场1937年放黔岸边盐707 847担，犍为场放黔岸边盐94 146担，共约40 100 000万吨。可见运输正常，引额就能用足，运量并有增加。就整个贵州而言，每年输入食盐约40 000 000斤，川盐占90%，其余为粤盐、淮盐和滇盐，各路盐运量互为消长。

1916年，规定黔岸计边川盐的引额时，对各岸引额也有明确规定：永岸为8 900吨，仁岸和綦岸约1. 3万吨，涪岸为500吨。除去计引，入黔引额永岸为6 110 000斤，仁岸1 180 000斤，綦岸10 150 000斤，涪岸3 320 000斤。

盐商趋近避远，舍难图易，各岸运量与引额都有出入，逐年亦有起伏。最初綦岸运量居首，以后让位于仁岸，仁岸实际运量比引额多，占全省盐运量的

三分之一。据1925年统计，赤水县所征盐税占贵州全省各统税局所征盐务附加税总和的45%。

## 三、民国盐运路线

川盐入黔，仁、綦两岸专销富、荣巴盐，永、涪两岸配销犍为巴盐。

### （一）仁岸盐运

仁岸运道以川境合江为起点，分段运行，水陆结合。由合江至赤水，每船可载150包（当时巴盐每包160斤）；在赤水换船至元厚，每船装40~50包；元厚换船经土城达二郎滩，每船装20包；元厚至土城为季节性通航，低水位时靠驮马转驳；二郎滩至马桑坪用人力搬运；在马桑坪又用较小船只水运至茅台。盐务管理部门在赤水、元厚、土城、二郎、马桑、茅台等地建有盐仓，供装卸中转用。

茅台以上转陆运分为五道：一经鸭溪、刀靶水至贵阳；二经鸭溪、团溪、瓮安、猪场至平越（今福泉）牛场；三经新场（今金沙）、滥泥沟（今大关）、镇西卫（今卫城）至清镇；四经滥泥沟至六广、平远州（今织金）；五经滥泥沟、滴淦桥至安平（今平坝）。

### （二）綦岸盐运

綦岸以川境江津为起点，水运至綦江后分为三道：一是换小船（每船载盐10包）运至松坎的新站，转陆运至遵义、绥阳、瓮安、平越、都匀。二是水运至新站，转陆运经桐梓、遵义、息烽至沙子哨，由此一路至定番（今惠水）、平越、都匀、独山、红水江；另一路至广顺、长寨（今长顺）、罗斛（今罗甸）。三是陆运至湾塘，往正安、湄潭、瓮安、荔波。

### （三）永岸盐运

永岸以川境叙永为起点，贵州境全系陆运，一经大定（今大方）的瓢儿井而达安顺；一经毕节发运水城、威宁、兴义、盘县等地。

### （四）涪岸盐运

涪岸以川境涪陵为起点，溯乌江经彭水至龚滩，起盐换船经沿河而达新滩，又起盐换船至湖砥，再起盐换船抵思南。思南以上换用装盐30余包的小船运到石阡。陆运分为三道：一是由彭水往正安、务川；二是由沿河往秀山、松桃、铜仁；三是由石阡经龙家坳至思州（今岑巩），再转水运至龙溪口及镇远。

### （五）淮、粤盐概况

正引粤盐由都柳江运入，至丙妹、古州、下江、三脚屯等处，再分运各

地。进入清水江流域的粤盐，入地坪河至水口，陆运黎平、达锦屏、天柱等县。侵销黔东的淮盐由沅系诸水道运入。

## 四、盐运航道整浚

民国成立后，政府对贵州的航道勘查、整治、维护以及船舶普查等都进行过策划与部署。但军阀当道，政局混乱，政府所为，均未能取得实效。盐运航道的疏浚，均由盐商发起，盐业协会及各家盐运公司共同管理支撑，盐民参与，民间力量承办。

### （一）赤水河岁修工程

赤水河盐运量大，但滩险变化频繁，影响航行，因此，盐务部门、盐商及盐船船民对河道维修比较重视。河工局管理人员由赤水县委派，岁修由仁岸盐商经办，范围包括上下游全境。1912—1915 年，由仁岸永隆裕等四盐号直接负责。此后盐制改变，废除官督商销，改为任商自由贩运，成立盐帮公所，岁修改由公所负责。盐帮公所改组为盐业公会，各段船民亦分段组成船业公会，岁修由各公会共同负责。

“自合江至茅台间大小数百滩，每年（维修资金）约需千元……若遇沿途山崩滩塞，一滩所需即达千元左右，故每年收支两抵，往往不敷甚巨，皆由盐商捐垫补助。”船民对岁修亦能积极配合。1935 年在维修茅台至马桑坪的几处滩险时，该段百余艘船共同集资襄助，完成了修缮任务。

在盐业与船业公会合作下，基本维持仁岸运道畅通。赤水县政府向省政府报告称：“自前清设立河工局疏浚河流，一切悉归该局负责办理，民国以来亦仍其旧……河流无不通舟楫之患……”仁怀县建设局亦谓“茅台河已通船……无疏浚可言”①。说明经过岁修，船舶运行大体正常，但都只限于维持通航，未能改善提高。赤水县政府强调河工局经费无多，不能大事疏浚。故余年间，搬滩驳载，驮运换船，习以为常。

### （二）仅及一半的松坎河修复工程

清末开凿松坎河松坎至新站段航道，滩险发生变化，航行困难，赶水盐船止于松坎，很少上驶。1931 年为恢复该段航运，由桐梓县政府组织会勘，提出工程计划，后因军阀内讧，工仅及半而省府递嬗，经费无着而停工，航道未彻底修缮，盐运只能勉强维持。1934—1935 年，蒋介石陈兵黔北阻击中国工农红军，致使盐商裹足不前，运量减少，航道失修，松坎以上只通至蒙渡，蒙

---

①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志·交通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25.

渡至新站又阻塞断航。

松坎以下河段经清末整治比较稳定，民国初年航行正常。但受航道条件限制，船只载量不足两吨。根据盐运要求，建造船只甚多，盛时常达六七百艘，后渐减少。1935 年初，红军长征经过遵义，国民政府调军阻击，重庆行营运输处綦江第四分站与綦江县政府饬令东溪盐商出资添造木船只。原与东溪商会及盐业公会议定以新旧船只总数的五分之三充军运，其余担负盐运。后政府军妄图一举扑灭红军于黔境，占用了全部运力运送军需品，不顾人民生活需要，将“东溪、松坎一带船只封作差用，以致盐运困难，人民淡食，销额锐减”，整修航道也就无从谈起。

（三）习水河航运开发

赤水河支流习水河，仅下游通船，上段两岸岩峭耸立，乱石杂陈，梗阻难通。民国初年，习水县绅民为发展商务集资开凿 20 里，商船可直达习水上游河段，打通了箭滩、猴子田段航道，约年再议修复，同年遭兵匪县城。后因山岩崩塌，通而复阻。

（四）开辟乌江上游航线

乌江上段航道的开辟，是民国初年商办工程之一。如前所述，仁岸川盐运抵茅台后，通常由陆运鸭溪、刀靶水、扎佐到贵阳；或经金沙大关至清镇、平坝或安顺，路程各约二三百千米。常组织运工数千人，驮马数千匹转运，盐须取出 12%左右充抵运费，运工所得只能维持简单生活。1913—1914 年，永隆裕商号曾筹划开辟乌江上游及猫跳河水道，期望由距省城近的朱昌浦（今朱昌）经猫跳河、乌江至乌江渡实现通航，以代替陆运，降低成本。为此曾由永隆裕盐号提取部分公积金，委托盐商徐屏臣主办。但因“承办工程队人员既不习于测量，又无开河经验，漫于黄滩等处施工，虚掷巨款”[1]，致一无所成。乌江上游一些滩险上的礁石，仅留下开凿的痕迹，险情依旧，无法过船，陆运方式依然如故。

1914—1915 年，思南商民刘云开、吴光廷等于文家店以上试用船只采运米粮至涪陵贩卖。两人组织开凿雷洞滩，历数月工竣，船舶往来无阻，此次施工到达余庆县属的通木坪（今构皮滩附近）后又继续上行，开拓了梁家渡、鱼翅三滩、瓦基石等处，新辟航线里，直达沿江渡。

（五）清水江绝洞滩反复整治盐运航道

清水江支流重安江的绝洞滩，自清末因岸坡崩塌断航，船只过往必须卸载

---

①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志·交通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25.

搬滩，不仅须付搬滩费，增加运输成本，货损货差也较严重。清宣统年间（公元 1910—1911 年）整治工程中断，1913 年、1916 年、1919 年，三度由商民会勘并组织治理，终因经费不足，或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等因素半途而废。1919—1930 年，当地商绅集资，清理河槽礁石，初步复航，但“未能尽出两岸危石”，以致受水流冲淘后再次卷入航槽，又形成阻碍。1931 年商民代表组成“续开绝洞委员会”，负责筹集经费，主持工务，监督生产，管理收支，采办料具，全员只尽义务，不索报酬。就工程的组织管理及资金，用发行股票筹集，商号与船民积极赞助，施工两月竣工复航。

## 第九节　传统商路，区域市场

贵州山地垂直性生态结构，形成了凝固的山坝贸易圈层体系。民族聚居的封闭性、地域的分隔性、经济结构的单纯性、自给消费层次的低档性、商业经济的落后性制约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 一、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区域市场

清朝以来，贵州虽然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清政府也予以推动，但客观而论，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市场发育速度相当凝固、缓慢。

当时制约贵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除了开发历史较晚等重要政治社会历史因素以外，人文居住环境的影响制约贵州商业经济发展。在贵州，只有少数比较大的“坝子”居住人口相对集聚，大面积的自然村寨散布于谷地和山间盆地，散居农户几户至几十户不等，切割型的高原地貌造成村庄之间的距离长短不一，通常 1 千米左右。少数民族地区村距相距更大，常见的村庄匝场镇 10~15 千米。这种极其分散式的村庄不利于地方市场之间的联系，难以形成规模很大的商业市场。

少数民族独特的生境严重阻碍大规模市场的形成。如“赶山吃饭”的瑶族、“开荒辟草，蛮夷仡佬”、高山苗、居“溪峒”的侗族在清朝均构成相当封闭的经济社会，没有社会分工，农业与手工业及其他牧业、打猎等行业紧密地结合在一个家庭组织中。在少数民族生存的社会里，基本没有商人，也不需要商人，因为他们习惯以物易物，依靠群体力量修建鼓楼、花桥和干栏式房屋。唯一与外界交流的大宗物质恐怕是食盐了，拮据困窘的家庭甚至很少购买

食盐而淡食。少数民族习俗、观念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更大障碍，因为他们坚持认为经商是可耻的行为，从而极少从事商品买卖活动。这里的人们长期过着“吃饭种田，喂猪过年，养鸡买盐”的生活。他们的生境形成了一处处“世外桃源”、一座座超然独立的“文化孤岛”，在山与山之间，既是自然的分隔，也是物流的断链，更是信息流的分割。导致商品交易范围、交易量均狭小，直接限制了市场规模的拓展。

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制约了市场一体化的推进。一般而言，流域平原型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山地高原型经济区。贵州清朝区域经济发展低，成为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的严重障碍。

虽然贵州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但其经济结构的特点也呈现出有利于市场区域专业化产生与发育的因素。如黔东南丹江、台拱、清江、黎平、古州、下江、锦屏、天柱、丹寨、都江一带，“周数百余里，皆深林大箐，林木葱笼，其木多松杉”，尤其黎平侗族人民创造了“十八年杉”的速效林，女儿初生时即种植杉木，十八年即可成材，用作嫁奁。油桐种植面积相当广泛，黔东北有铜仁、镇远、青溪、思州、安化、龙泉、印江、松桃等地；黔东南有玉屏、黎平、麻江等地；黔南有都匀、都江等地；黔北有务川、正安、遵义、桐梓、绥阳、仁怀、湄潭、瓮安等地；贵州西部则有广顺、清镇、郎岱、镇宁、大定等地。当时，安化等地“山头角遍栽桐”，铜仁、龙泉种有“木饶桐、茶”，松桃“乡民勤俭力田之外，栽桐、茶诸树”。《田居蚕食录》说：“若农家岁收桐子五石，可获钱十二千。”分别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茶叶、桐油、木材等特产交易市场。

贵州铅锌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威宁、水城、赫章、普安、遵义、都匀、凯里等地。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开采极盛时，平均每年高达三千万斤，威宁州有莲花、齐家湾、白腊、砂砾、江西构、罐子窑、妈姑、羊角、新发、白岩、马街、倮黑、黑泥、三家湾、柞子、倮布戛等厂，水城有福集、万福二铅厂，毕节县有大鸡厂，大定府有水洞帕、兴发白铅厂，平远州有达磨山的马鬃岭厂等。形成了清廷控制下的专业化锌矿交易市场。

## 二、贵州山坝交易圈与区域市场

贵州区域山间坝子与山地结体错落有致。垂直生态差异明显，立体地形、立体气候形成立体型经济结构，从而形成独特西南“山坝”商品交易圈次结构体系。坝子气候温和、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水利便利，成为中心农业区和人流聚集区。粮食以大米为主，农副产品、水产品及手工业产品等种类齐全，

形成一个经济中心，加上交通便捷，成为本地特产与外来商品的集散地域，通过辐射状向四周汇聚。山地粮食作物以五蜀黍、麦类、高粱及土豆等旱地作物为主，经济作物有茶叶、药材、烟叶及林产桐油、五倍子、果树等。山地牧业发达，饲养牛、羊、马、骡、猪等非常方便。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交易的成立。在贵州形成了独立自循环“山坝交易圈”①。圈内集市数量则根据山坝范围与人口数量大小而定，集市数量由一个到五六个不等。

具有坚韧外壳的山坝交易圈，击碎之，难也。因为主要消费品的自给程度越高，供求曲线的偏离越小，交换的主观愿望越不强烈。区城内的消费品越能自给，那么这个区城市场的封闭性壁垒越坚韧、越难打破。与流域平原区域的市场交易结构相比较，自然阻隔造成的这种“山坝交易圈”有着更强的封闭性、坚韧性和生命力。

贵州农业商品经济就是这种典型的“山坝交易圈”，从明到清一直延续到现在，上下维系几千年。民族聚居的封闭性、地域的分隔性、经济结构的单纯性、自给消费层次的低档性、商业经济的落后性制约了贵州经济的发展，窒息了贵州商业的创造性。

尽管清朝贵州较大区域处于“山坝贸易圈”，但在全国传统商业通道中，依旧有以下几条水陆商路大动脉平衡着贵州与地域外的商业连接与沟通：

其一，昆明至贵阳的滇黔驿道延伸到湖南常德，共计 1 300 余里，行程约需 35 日，为滇黔湘干道，跨省驿大道。通过这条商路，输出贵州一部分桐油、土特产。相对输入黔西滇盐，黔东淮、浙盐及汉口、湖南、江西的棉纱、大米、瓷器。

其二，贵州至四川驿道自贵阳经过息烽—遵义—桐梓进入綦江，抵达到重庆。这条驿道是连接贵州与长江上游商业中心地重庆的商业驿道，自重庆输入的大宗货物为洋纱，其次为药材、海鲜、粮食、棉、烟、布匹、绸缎。自四川输入的布帛、丝绸成为这条商路运销的重要物质。川盐销黔境内主要通过綦岸水道运输。输出的货物有遵义府的丝绸、柞蚕丝、五倍子、生漆、杜仲、牛羊皮、猪鬃等畜产品。另一条驿道就是昆明至泸县之间的一段驿道。由威宁、水城、大定各铅矿产地每年岁项及采办数额达到 470 万斤向毕节集运，经四川永宁、泸州出口转长江，入运河北上达京局，威、毕、永一线又是滇铜入京的孔道。

其三，贵州至广西驿道分两条。其一自贵阳经过龙里、平越、独山、荔

① 肖良武．云贵区域市场研究（1889—1945）［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78.

波，到达广西庆远。另一条自贵阳经过古州到达广西桂林。此是贵州与两广及香港联系的通道，黔南所需粤盐由此进入。

其四，安顺向南至兴义，然后向西转折云南，经过罗平、师宗、陆良、宜良抵达昆明，此为滇黔湘驿道。滇盐销黔，黔西土布、斗笠等产品销滇，均依靠这条商路。安顺向西北抵威宁，连川滇商路的东线。由兴义向东经过安龙连接滇黔桂驿道，两粤海产及经香港转进口的各种西洋货沿着这条商道远销云贵区域。

但缺乏大规模商业集散地，缺乏恒定性商业信息交流与互动，缺乏营造区域内中心市场，缺乏政府统筹通局、调配与规划，最终未形成规模性的商流和区域中心市场。

# 第三章 明清贵州盐政评述及私盐研究——诡谲盐政考

盐政意味着生命健康之政。贵州盐运维系着明清黔境芸芸众生之血脉畅通。盐粒晶莹剔透，细小而精致，可盐法严峻，官僚体系庞大。为了支撑政府的大厦，细小盐粒在明清榷盐的助攻下吸进民脂，变得硕大无比。

清朝田雯在《黔书》云："微蜀则黔不知味矣……又不可以舟车通，肩疮蹄血而后至，其来也不易，则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艰食者比比矣。黔民询苦矣哉！三月之忘，独藜苋肠哉。当其匮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咸，祗诳夫舌耳，非正味也。即通其饶亦止粘唇，而量腹如水之交，不在和羹也。"① 盐价昂贵，贵州人民在缺盐的苦难岁月，只能咀嚼山区俗称"朝天辣"辛辣味的辣椒，以求解无咸之味觉。

## 第一节 食盐人类，生命之本

### 一、盐是人类生命之本

《尔雅》云："天生曰卤，人生曰盐"②，是指卤水是天然的，食盐是加工净化形成。《礼记》云："盐曰咸鹾。"③《说文解字》云："盐，曰咸也"，概述盐与鹾和咸同一含义。《神龙本草经》云："大盐主治肠胃经热，喘逆，胸中病、令人吐。"陶弘景《名医别录》云："食盐主杀鬼蛊雅注、毒气，伤寒寒热，吐胸中痰癖，止心腹卒痛，坚肌骨"。《本草纲目 · 金石》载："夫水周流于天地之间，润下之性无所不在，其味咸眼，人之血亦咸腥。"表明了盐是

---

① 田雯. 黔书（1~2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5：45.

② 邹德文，李永芳. 国学经典 · 尔雅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67.

③ 刘珏欣，于江倩，丁洁如. 礼记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87.

血液中重要组成物质。

古代的人们依靠茹毛饮血或从干涸的盐碱泥土中取得盐质以补给自身的盐分。因此“泥土是原始民族的食物。自澳洲至美洲，很多人都有吃土的风俗。吃土大致是由于其中有盐质”①。

## 二、盐对于生命的重要性

现代生物学认为，盐之于人类的意义，首先是生理的需要，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它与空气、阳光、土壤、水分、火等物质一样，是人类健康生存的基础。

它是烹调食物不可或缺的调味料，《尚书》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五味之中，咸为首，所以盐在调味品中也列为第一。也是人体必需的养分，盐与血浆共同制造维持生命的养分。

成人体内所含钠离子的总量约为60克，其中80%存在于细胞外液，即在血浆和细胞间液中。氯离子也主要存在于细胞外液。钠离子和氯离子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下列几点：

### （一）维持细胞外液的渗透压

Na和Cl是维持细胞外液渗透压的主要离子；K和$HPO_4$是维持细胞内液渗透压的主要离子。在细胞外液的阳离子总量中，Na占90%以上，在阴离子总量中，Cl占70%左右。所以，食盐在维持渗透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人体内水分的动向。

### （二）参与体内酸碱平衡的调节

由Na和$HCO_3$形成的碳酸氢钠，在血液中有缓冲作用。Cl与$HCO_3$在血浆和血红细胞之间也有一种平衡，当$HCO_3$从血红细胞渗透出来的时候，血红细胞中阴离子减少，Cl就进入血红细胞中，以维持电性的平衡。反之亦然。

### （三）氯离子在体内参与胃酸的生成

胃液呈强酸性，PH值约为0.9~1.5，它的主要成分有胃蛋白酶、盐酸和黏液。胃体腺中的壁细胞能够分泌盐酸。壁细胞把$HCO_3$输入血液，而分泌出H输入胃液。这时Cl从血液中经壁细胞进入胃液，以保持电性平衡。这样强的盐酸在胃里为什么能够不侵蚀胃壁呢？因为胃体腺里有一种黏液细胞，分泌出来的黏液在胃粘膜表面形成一层约1~1.5mm厚的黏液层，该黏液层常被称为胃黏膜的屏障，在酸的侵袭下，胃粘膜不致被消化酶所消化而形成溃疡。

---

① 石奕龙. 文化人类学导论［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56.

此外，食盐对于神经可起兴奋作用，并是制造胃液和胆汁的重要原料。食盐中的钠也是人体肌肉和神经组织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当人缺乏食盐时，体内钠离子的含量减少，钾离子从细胞进入血液，会发生血液变浓、尿少、皮肤变黄等病症。就会感到疲倦、食欲减退、消化不良，进而引起精神失常，丧失劳动力。

人终其一生离不开盐，古人认为食盐问题对于人类是性命攸关的重大问题。汉代食盐被称为“食肴之将”、“食之急者”、国之大宝。古人认为盐是人类的命脉之所在。

### 三、食盐地域习惯

人体对食盐的需要量一般为每人每天 3~5 克。由于生活习惯和口味不同，实际食盐的摄入量因人因地有较大差别，我国一般人每天约进食食盐 10~15 克。1992 年与 2002 年卫生部、科技部和国家统计局做了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其中有各地区居民食盐摄入量项目，精确绘制了全国城乡居民食盐、酱油摄入量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出口味咸淡的地理分布，黔桂川滇高原属于食盐摄入量第二梯队，平均每日摄入 12. 6 克，一年共需 4 562. 5 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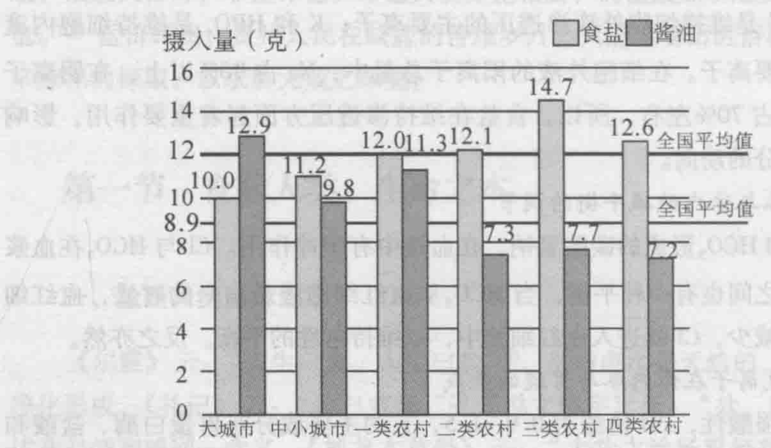


图 3-1-1 中国国家地理网制作的全国摄盐量地区图示

因而明清时代，贵州盐政的全盘控局，意味着对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进行控制，是关乎黎民生命健康的基本保障。

## 第二节　普遍盐荒，割据引岸

### 一、明清时期贵州存在普遍盐荒

明永乐十一年（1413 年），在贵州设布政使司，建立行省，“贵州为内地自此始”。但由此一直到十八世纪的四十年代，即所谓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时期，销盐量最多的一年是乾隆六年，亦只有 50 万担。此时全省人口即使按 750 万人计，则年人均食盐供应量也不过 6~7 斤，还不能满足人们最低消费需要。可见，对于不产盐的贵州而言，明清时期，存在普遍的盐荒状态，如《盐政实录·贵州区分志》所述：“黔民苦盐贵，淡食者，众且久矣。”广阔的山区人民，“累世不知盐味”比比皆是。生活何堪？生存何堪？

### 二、明清食盐贸易定则

首论明清食盐贸易，明代初期，在食盐的流通方面，实行了前述引课制。由中央户部印制颁发盐引，令商人领引纳税，持引（即是销盐执照）行盐。就是国家把所收藏之盐，按引额分拨到全国各地，令盐商遵照盐法运销，称之为官督商运、官督商销。规定引不离盐，盐不离引，无引之盐谓为私盐，对犯禁贩私（私盐）者严行盘查，严厉惩处。引商支盐必有定点、定场，盐场又必有定额。各盐区和盐场的税盐或正盐一般是个常数，由此决定了各个行盐区的盐商引目或销盐数目也一般是个常数。在常数之外，生产之盐，谓之“余盐”，需禀明户部，获准之后，在特别条件下发售。

在食盐贸易过程中，各盐商必须在限定的区域内销售，不能跨越地界自由行贩。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分布食盐，使各盐商经济保持均衡，盐区呈现割据、独立分散状态。由中央极权控制下的专盐销售，分发贵州盐引有限，且严格规范盐商盐运销售，阻碍了盐的自由流通，束缚了盐的自由流向，贵州路道艰险、盐运路途颠赘不堪，自然就缺盐销售。

#### （一）明代开中制的破裂

明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九月开始，朝廷因边地防区需粮，内地挽运维艰，遂令盐商运米到九边，以运费作引税，以粮价抵盐价。即政府将仓储之盐卖给了盐商，盐商将米粮运卖给政府的九边之军仓，以物易物。永乐时边防缺马、布、铁，于是在纳米中盐的同时，又仿以上做法实行了纳马、纳布、纳铁中盐法。其是按道路之远近酌定标准，如“盐商运往大同仓一石米，许贩

运一引盐，给延安输米七斗，许贩盐一引”①，盐政佐边政，相为表里，时人称之为善。同时盐场仓储丰富，足供引商运销，各引岸销盐商情无阻无碍，年年完销额引，完纳盐课。但到宣德年（公元1426—1435年）以后，私盐侵入引岸，官盐壅滞，盐法因之大坏，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其中原因是：盐场脱漏；余盐冲击正引；盐业的计划性不能适应财政用度的不平衡性；势要人物占窝霸引；盐商因税重本高而贸易受阻。

首先在于灶户私售场盐。由于明朝自洪熙后逐渐违反了食盐生产之自由经济的活动规律，进行不等价交换，灶户生产之盐税大增，且工本钱累跌，煎盐灶丁无以生计，川、滇、淮、粤之盐丁只有顶着死亡危险，强卖私盐。卖私多，贩私益增，盐枭则见利而蔑法，肆行偷运，逐渐两淮、川滇、川黔、滇黔等地私盐私贩蔚然成风。

国家财政税收减少，无力从盐丁手中收盐，场司专卖制也就形同虚设。于是计策转向商人来填补空挡，由商人直接下场收购余盐，又导致余盐超过正引，大量余盐转入盐枭手中，引商们也明打着盐引幌子，实际购销私盐。恶性循环，盐引滞壅，盐就自然销售不畅。

国家财政用度的不平衡与盐政的计划性产生了严重对立矛盾，而余盐又增添了盐政经济的不平衡。常股盐与存积盐的设置，又叠加了盐运销中不确定因素。权要或“占中买窝”，或以“残盐”为名买盐，或夹带中私后，相机高价出售盐引，使明朝盐业计划经济全盘分崩离析。国奸、官私、商私、民私的存在使明朝处于“盐法无法”的离散状态。

（二）明中后期，盐法离散，呈现“斗米斤盐”的状态

自明中叶以来，政府逐渐增课提税，各种名目税收累累出台，强加暴敛，嘉靖十三年，给事中管怀理论盐法之弊云“今盐价（指引价，包括引税）十倍于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盐使不行也”②，“定价太昂，息不偿本，取赢之难也”。商人在此官盐本重，销售为难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本业只有选择偷课漏税，冒法夹带私贩。

从盐业经济宏观布局、食盐收购、食盐运销而鉴，明朝盐法漏隙甚多。贵州在明朝盐政大背景下，自然食盐就营销不畅，“斗米斤盐”价格昂贵，而且比其他地域更为严重。

（三）清朝管制腐败，私盐猖獗

清代早期，在盐业生产收购管理上，真正达到了盐归盐、税归税。从场课

① 刘森．明朝官收盐制靠析［J］，盐业史研究，1993（2）：6.
② 张廷玉，等．明史：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41.

（灶课）按灶丁征收发展到主要按盐田场、荡征收，实施“摊丁入亩”制，促进了盐业资产由国产到私营的逐渐转化，调动了盐业生产积极性。政府主要控制食盐的流通区域，也即控制官商与引商，但疏忽了场商，本来场商只收买额引内之盐，或甚而收不足额引之盐，其余的盐就被灶户私售给盐贩。额引外的剩余之盐不断地变为私盐，私盐日盛，官盐积压亏本。官商不能继续领引纳课售盐，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场商拥有国家授予的收买场盐的专利权，他们以垄断地位控制收价，即低价仰勒灶户，使生产者苦于售商，乐于透私，漏税之私盐往往多于官盐。同时，运商对引岸食盐价格的把持，即以垄断而抬价，很重地剥削消费者，致庶民淡食或被迫去买食私盐，比较产地盐价与销售地盐价竟然相差二十余倍之多。

就贵州而论，清廷致力于改善盐道运输，对所有相关盐道水路及陆路通道进行了相关的整理和疏浚，譬如乌江流域、红水河流域、南盘江流域、北盘江流域、都柳江流域都展开整浚，扩展了盐源，使“川盐淮盐、滇盐、粤盐相继进入贵州市场，销售区域此消彼长，构成了清代贵州食盐市场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变”① 态势。减轻盐税、降低盐价，多次调整了运销区划，合理设计、缜密安排了盐运流通系统，使贵州进盐达到历史最高峰，后期管制腐败，榷盐之政法无定则，横征暴敛，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引岸芜秽，运销系统全然紊乱不堪，“官督商销”也即荒废。光绪初年，丁宝桢力挽狂澜，改行“官运商销”之法度，强化了盐务管理，体恤盐商与庶民，减免盐厘的征课，但在清廷内外交困的风雨残败之局中，大肆苛敛，勉力支撑，一丁文诚公何能螳臂当历史演变之车哉？悲乎哀哉！贵州盐政再次陷入混沌。

## 第三节　盐政扭曲，私盐肆行

盐只是生活必需品，正如空气、阳光、水一般，为天地自然之利，原本没有官、私之界分。但当其被纳入国家征榷范围，进入罗织成网的法定体系，灌注了统治者利益后，便有了泾渭分明的“官盐”与“私盐”。

明清贵州私盐畅行，原因有：其一，价格低于官价；其二，盐质洁净；其三，可以零售；其四，可以以物交易；其五，买卖快捷；其六，缉私不力；其

① 马琦．清代贵州盐政述论——以川盐、淮盐、滇盐、粤盐贵州市场争夺战为中心［J］．2006（1）：35.

七，盐政腐败；其八，迎合百姓消费心理。总而言之，盐政制度扭曲导致私盐泛滥。

## 一、明代私盐

在国家实施盐专卖前提下，私盐始终为朝廷所严禁，违禁者则受到严厉惩处。洪武六年立《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者绞，有军器者斩。刑部尚书刘惟谦等受诏编纂《大明律》，其中“盐法”十二条，处罚有所减轻。规定：凡犯私盐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表明明代朝廷严禁私盐。尽管有严禁私盐的明令颁行天下，却越演越烈，成为瓦解明代官盐统制体系的重要因素。

明代私盐，从全国而论分为王府私盐、内外官私盐、军人私盐、商私、灶私等诸多类型。以规模论，王府私盐和内外官奏讨盐贩卖，乃是私盐兴贩的主体。

主体私盐以王府私盐占重要份额。见表 3-31：

表 3-3-1　　明代各王奏讨盐引简表

| 时间 | 奏讨王爷 | 盐引（引） | 盐重（小引计斤） |
|---|---|---|---|
| 成化三年（公元 1467 年） | 德庄王（朱见潾） | 100 | 20 000 |
| 成化十七年（公元 1481 年） | 德庄王（朱见潾） | 两淮余盐 1 000 | 200 000 |
| 成化十八年（公元 1482 年） | 吉简王（朱见浚） | 两淮盐引 1 000 | 200 000 |
| 成化十八年（公元 1482 年） | 徽庄王（朱见沛） | 100 | 20 000 |
| 弘治四年（公元 1491 年） | 兴献王（朱佑杬） | 10 000 | 2 000 000 |
| 弘治六年（公元 1493 年） | 靖和王（朱见溠） | 100 000 | 20 000 000 |
| 弘治六年（公元 1493 年） | 徽庄王（朱见沛） | 1 000 | 200 000 |
| 弘治六年（公元 1493 年） | 益端王（朱佑槟） | 10 000 | 2 000 000 |
| 弘治九年（公元 1496 年） | 衡恭王（朱祐楎） | 1 000 | 2000 000 |
| 弘治九年（公元 1496 年） | 蜀昭王（朱宾瀚） | 3 000 | 600 000 |
| 弘治十五年（公元 1502 年） | 泾王（朱佑橓） | 1 000 | 200 000 |
| 弘治十六年（公元 1503 年） | 汝王（朱佑梈） | 1 000 | 200 000 |
| 政德二年（公元 1507 年） | 宁王（朱宸濠） | 每岁 30 | |
| 政德二年（公元 1507 年） | 伊定王（朱諟铎） | 每岁 300 | |

表3-3-1（续）

| 时间 | 奏讨王爷 | 盐引（引） | 盐重（小引计斤） |
|---|---|---|---|
| 政德二年（公元1507年） | 襄康王（朱祐樌） | 每岁300 | |
| 政德二年（公元1507年） | 唐成王（朱弥鍗） | 岁增盐70 | |
| 政德三年（公元1508年） | 荣庄王（朱祐枢） | 300 | 60 000 |
| 政德八年（公元1513年） | 寿王（朱祐榰） | 3 000 | 6 000 000 |
| 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 | 潞简王（朱翊镠） | 2 600 | 520 000 |
| 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 | 瑞王（朱常浩） | 1 000 | 200 000 |

注：①明代每斤重596.82克，较今市斤重96.82克，以此推算，明代大引盐，一引400斤，约合今238.73千克，小引约合119.36千克。②据《明实录》不完全统计。

下至太监以织造为名奏讨盐引，如太监宋玉“前后所支引盐、所卖银两、所织缎匹、俱无定数”①，而奏讨之盐冲挤盐销领域，打破明代暂时销售的盐业平衡，扰乱盐业官场经济。各级官员趁势一拥而上，奏讨“残盐”，各地域势商，趁机攀亲附贵群起奏买“残盐”，机巧盈利，成为明后期私盐主体。

太祖朱元璋定有“旗军人给盐60斤”，对立军功者行赏盐之定制，沿袭至后世，完全变质，明宪宗纯皇帝朱见深“成化二年（1466年），赏太监陈铉盐10 000引，又赏太监潘午盐10 000引。成化十六年（1480年），赏锦衣卫带俸正千户邵宗盐5 000引。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又赏太监陈链浙盐10 000引，赏赐太监梁方5 000引”②，所赏之盐，正当流入盐市场获利。

明朝体制内的私盐腐败，最终成为瓦解明王朝财政经济的反挫力。

## 二、贵州清代私盐走私渠道

### （一）清代查私律规

清王朝对犯私盐者用法极严。《刑部律例》规定：“凡犯私盐（凡有确货即是，不必赃之多少）各杖一百，徒三年。若带有军器者加一等（流两千里）。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流三千里）。拒捕者斩（监候），盐货车船头匹并入官。引领（秤手）、牙人及窝藏（盐犯）、寄顿（盐货）各杖九十，徒两年半。

① 樊树志. 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12.

② 樊树志. 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14.

（受雇）挑担、驮载者，杖八十，徒二年。非应捕人告获者，就将所获私盐给付告人充偿。（同贩中）有（一人）能自首者免罪，一体给偿。”对煎制私盐的惩处是：“凡盐场灶丁人等除（岁办）正额盐外，夹带余盐出场及私煎盐货卖吝，同私盐法。（该管）总催知情放纵及通同贷卖者与犯人同罪。凡妇人有犯私盐，若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其虽有夫而远出，或有子幼弱，罪坐本妇。”甚至对买会私盐吝，亦要治罪，“杖一百，因而贷卖者，杖一百，徒三年。”

与此同时，缉私被列为盐官及地方官吏工作的重要内容。兵部也制定了繁琐的《绿营处分例》，不断加强对直接担负缉私任务官兵的督查、奖惩。如规定：“大伙贩卖私盐至十人以上，带有军器，专汛官徇纵不拿者，革职；兼辖降二级调用。失察者，专汛官革职兼任；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皆限一年缉拿，获半即准开复。限满不获，专汛宫革任，兼辖官降二级调用。”“小伙贩卖私盐不及十人，及十人以上不带军器者，专汛官失察一次，降二级；二次降四级，皆留任。至三次者革职。”如果一年内“拿获十人以上带有军器大伙私盐者一起，纪录一次；二起，纪录二次；三起加一级，四起加二级，至五起不论俸满即升。”如此等等，颇为明细。

（二）清代私盐类型

1. 谎报盐井——灶私

以四川为例，首先分析四川井盐官报数目、盐引数和销售斤额，如表3-3-26所示：

表3-3-2　　清朝四川井盐销售统计表

| 清具体年代 | 盐井报官数目（口） | 盐引、盐票（张） | 合计销售重量（斤） | 备考 |
|---|---|---|---|---|
| 顺治八年（1651年） | | 盐票4 940 | 6 192 290 | 盐票参照雍正时水、陆引的18：85比例推算销额 |
|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 | 盐引42 557 | 53 366 580 | 同上 |
| 雍正九年（1731年） | 6 116 | 水引11 166<br>陆引11 029 | 92 277 840 | 同上 |
| 乾隆元年（1736年） | 7 704 | 水引29 018<br>陆引136 232 | 229 520 220 | 同上 |

表3-3-2(续)

| 清具体年代 | 盐井报官数目（口） | 盐引、盐票（张） | 合计销售重量（斤） | 备考 |
|---|---|---|---|---|
|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 8 688 | 水引45 997<br>陆引205 650 | 359 081 750 | 同上 |
| 道光三十年（1850年） | 8 832 | | | 同上 |
| 光绪年间 | | 水引51 065 | 455 850 000 | |

注：①根据方卓芬，方行所著《四川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中表格改编而成。②参比《清盐法志》所载逐年增加数推算外，引自吴炜等所著《四川盐政史》卷一和卷六。

上表所列盐井数，经过官府核定以后，批准的盐井，列取的销额是政府专卖“官督商销”或“官运商销”中官盐所控制销额。除此，还存在大量的私井、私盐。严如熤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说：“产盐最盛之区，额设井灶固多，私井亦数倍于官”。按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四川人口大约有2 566万人，按每人每年食盐11.5斤计，年需盐29 509万斤，连同销往云南、贵州、湖北的49个县（按四川平均每县年需盐215万斤）年共需40 044万斤，而上表中只有35 908.175万斤，那么缺少的4 135.825万斤，只有通过私盐补偿，或人民淡食。

日本的中国盐业专家左伯富的判断是：“在清代，人民食盐的消费量基本有一半来自私盐。”可循，私盐与官盐平分天下，当朝廷腐败过甚时，甚至要大于官盐。

2. 引商走私——商私

这是私盐中所占数额最大也是最难禁绝的部分，因为引商面临着苛重的课税负担，不得不走私以增加收入，同时他们又以合法身分运销盐斤，地方难以稽查。引商走私的手段是：

（1）影射重照。商人在领引配盐后，引张本应缴销官府，但商人往往不按年将残引缴销，“借以影射重配，侵占正引”。据道光二十八年（1843年）统计，“历年未缴之引，共有二十二万六千九百六十七张，为数多于额引”。商人借官府尚未将新引路发各产盐州县的机会，乃以旧引去各盐场买盐。“灶户惟知见引卖盐，而此引已经零星买过盐斤若干，在灶户茫然无知，以致商人领引一张，于赵甲处配二百斤，再于钱乙处配三百斤，又于孙丙处配四百斤。

如陆引一‘张’，只应配正耗盐四百六十斤，而已配至九百斤。”①

（2）正引夹带。贵州私盐大都通过川黔盐道输送，四川井盐每包在乾隆以后规定为一百三十五斤，但商人私自加重至“二百数十斤”。此外，商人还利用所谓“带手盐”、“赤膊盐”、“丁包盐”等名目，多购盐斤，因而引商行盐“斤数暗与引数悬殊，一引可行数引之盐”。

（3）废引配盐。原计岸销区之州县转为“归丁州县”后，引税摊入地丁，引张即已作废。但有的州县“将前项废引仍令商人领出，奸商因之贩私，书吏从而渔利。以此无课之引，改配旺厂，既不纳课，尽饱私囊。”清代末年，更为严重。

官员也很乐意容留走私。商人以私盐为利，遂贿属盐官。盐官受贿纵私，称掣流于形式，盐引验看为虚，甚至帮助伪造盐引，予走私种种方便。走私不绝，官员亦且以缉私报功请赏。倚仗特权，他们往往自买私盐，各处贩卖，从中渔利。

3. 官船行私——官私

贵州私盐来源范围广泛，但主要通过长江系川盐水运道，而官船亦往来频繁，有的官吏为谋盐利，乘机大肆夹带走私。道光九年湖广总督嵩孚指出：“回空粮船夹带私盐已经奏明查禁在案。惟查四川铜铅船只，每月一起，每起大船二十四只，向系顺流而下，并不拢卡盘查。闻得该船中舱，皆带私盐，跟随大、小船数十只至百只不等，指称预备起拨及沉溺救护等事，其实尽载私盐。一过官渡口等卡之后……分散售卖，卡员不敢过问，地方官因系铜船，亦不办理。”

《清宣宗实录》卷一六七载：道光年间，“向来川江铜铅各船，往往夹带私盐……滇黔铜铅船只，向多带私，此处枭徒兴贩，亦所不免”。卷二九七：道光年间，云南大关同知彭衍墀的铜船顺流直下，贵州龙泉县知县童恽铜船直下，不靠边卡，皆因其船中载私盐。

4. 零星私贩——贩私

这是贩私盐中人数最多的一类，多系失业之众组成。黔陷自教匪平定以来，所有遣散回籍之乡勇并贼中自投来归之众，为数甚多，此等人不敢公然为匪徒，往往亦挑卖数十斤盐，聊为糊口之计。“利之所在，走险如骛”。其所卖之所谓私盐，来源有二：“距各厂近者，固买自仕户，其途路或相隔数百里，决不能从各灶挑负而来，不过就邻近州县盐店贩卖转易，是盐贩所卖，仍

① 刘淼. 明代盐业经济研究［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129.

系商人私盐。"[1] 如：道光二十七年（公元 1847 年）四月，在安顺府属镇宁州骆家桥税关，商贩杨三、李双、周老二等贩卖漏税盐巴，被吏役查获归案，共贩卖私盐 13 挑，约重两千六百余觔（斤），此案由安顺府知府常恩亲自督办，由于案情重大，乃至惊动了总督和巡抚大人。

5. 大股私枭——枭私

这是有一定组织的走私队伍，他们公开武装贩运，对抗官府。

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四川总督奏称："在川省川东一带，水陆冲烦，私枭最火。近年来勾结益众，到处横行，又复烧香结盟，与各路会匪通气，抗官拒捕，其势惭不可制，亟须及早歼除，以遏后患。查著名巨枭，重庆以下以江大烟杆、罗贵兴、田登心、杨海亭为最。泸州以下，以谭二疯王、任韦驮、任长蛮为最。而谭二疯王、江大烟秆又系著名会匪。该匪等纠众贩私已十余年，谭、任各匪则盘踞于泸、合、江、永一带，江、罗各匪则出没于巴、江、涪、合、夔、万一带，动则号召一二千人或数百人，均置有枪、炮、器械、船，拒敌官兵。"

对于大规模的武装私贩，官兵往往"虑其拒捕或畏难，放纵"。偶有"拿获到家者，地方官吏又视非专责，姑息养奸，以重作轻，以多报少，蒙混草率，不能据实审结"。对于引商走私，官吏更是视作"规费"来源，若认真缉私，岂不"绝吾之规费耳"，道光三十年（公元 1850 年）四川总督徐泽醇奏言："川省盐务之界，甲于各省。不惟吏胥暗中侵蚀，即各处关隘设立官员，明为稽查，暗则私放，只知自饱私囊。私盐则贪贿纵放，引盐则多勒索陋规，其间种种各目，不一而足……牛华溪水运有引之盐，又复夹带私盐者，名为有引夹带，除正引外，每私盐一百包，估作四十包，每包取银一钱。如纯系私盐，每一百包估作三十包，每包取银一钱。嘉定批验所运有引夹带，每私盐一百包，估作四十包，每包取银一钱二分。正阳关运有引夹带，每引一张，约取银一两四五钱。如纯系私盐，每五十包取银多则一两，少则八钱。石佛关、姜家关运有引夹带，每引一张取银一两或八钱。如纯系私盐，视所载轻重取银，或二两、五两，钱或四千、五千不等。"[2]

这些武装走私集团，成分十分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反抗清代腐败盐政。

遵义府仁怀县丁山里三岔白果湾人袁钧棻、袁清棻兄弟，在光绪皇帝下诏

---

① 赵毅. 明清史抉微［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112.

② 《清盐法制》卷二五五，四川十二.

废科举办新学后，弃学经商，往来于东溪、温水间长期贩卖私盐。路见来二郎坝和温水设立教堂经堂传教的法籍神父范若瑟欺辱抽打中国乡童，袁清棻怒而夺之，教父反控袁清棻弟兄是“诽谤圣教”的刁民，强压温水府经厅，“非要袁氏弟兄在温水府经堂前面立一‘诽谤圣教’的石碑不可”。袁氏兄弟经此一劫，求变复仇。转而借助于宗教活动，扬言得“先天大道”，玉皇大帝已册封为佑一方安宁的“三天主”，“袁二神仙”之名不胫而走，传遍川黔诸县。进而招徕教徒上千名，神坛前高悬“反清灭洋”圣旗，光绪三十年（公元 1904 年）甲辰正月初五日起事，攻打温水场，砸毁“诽谤圣教”石碑，遭到川黔数路清兵会攻，虽经奋勇作战，终究不敌训练有素的正规清军，父子三人竭战致死，私盐组织起义遂告终结。与唐僖宗干符元年七月，盐枭黄巢、王仙芝起义，元末张士诚、汪国珍有着相同的历史脉络。

再叙民国之初，晴隆县城莲花镇水塘街王尚文，江湖名号王少侯私盐经历。青年进贵州陆军讲武堂，勤习文武，在辛亥革命战争中，晋升为黔军独立四师第七旅十三团团长，奉命在川、鄂、湘、黔四省结合部的川东秀山县驻防。在一次抓捕贺龙行动中，少侯早闻贺龙名气，十分钦佩“贺龙走私盐，两把菜刀砍了盐税局，夺了里边的钱和枪，并以此拉起了队伍”的英雄行径，毅然为贺龙解危，并赠送大洋二十块，遣派一个排的士兵，将贺龙安全送到湘西。1933 年 1 月，少侯解甲回归故里，依然干起“安南盐行”，通过走私盐渠道买盐卖盐，惠及乡亲。他分析盐巴产地有两处：一是四川的井盐，老百姓称为青盐或锅底盐；一是云南产的滇盐，也叫“筒筒盐”。于是，分别安排在安顺和富源设了两处中转马栈，每栈各配驮马六匹运盐。“安南盐行”的盐价要比其他盐号的价格低五成，吸引民众，开张立即大发利市，连关岭、普安、兴仁、郎岱等邻县的小贩，都来莲城购盐到乡村倒卖，一天就将库存五千余斤盐巴抢购一空。少侯马上增大运盐规模，分三支运输队。一次少侯亲随马队从富源返程，过胜境关进入盘县地界，遭遇匪徒拦路打劫，王少侯机智勇敢击退匪队，获乡亲们一致好评，曰：“安南盐商王将军，重人轻财有善心。生意公平一杆秤，又称盐巴又称心”。

6. 越界倾销私盐——邻私

乾隆二年十二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曰：“该属施溪司及铜仁府之铜仁县坡头一乡，有搀越湖南麻阳县境民苗二千五百九十九户，约每年食盐七万五千九百斤，以淮盐额重计算，每岁不过销盐二百二十引。”①

---

① 光绪重修《两淮盐法制》卷四三《转运门·引界》。

清咸丰以前，社会安定，广西商人曾载食盐百货上溯红水河，至北盘江百层、董青，南盘江八渡、坡脚等地转陆运，在附近地区出售，换取土特产。光绪年间，商贸恢复发展，水运粤盐成本低，至黔西南各州县场镇陆运距离又较近，而且地处两省边界，政府稽查鞭长莫及，故贩运私盐日益泛滥。据永岸盐局禀报：最初只在边界处零星摊卖，继则概用麻布口袋大船小船装载上驶，并假冒白糖纳厘上税。“一由兴义之八渡汛起坡转运册亨、棒鲊等处；一由坡脚起岸，迳运贞丰、新城各州县等处；一由百层运至安南县、者相场、永宁州以及各乡场镇”。船舶载量自 50 担至 100 担不等。盐价较永岸陆运来的川盐低 30%~50%，竞争能力很强，当地人民乐于购食粤盐。永岸分局认为川盐“销行疲滞”的原因，“皆由粤盐充塞所致”，故向当局“呈请咨禁粤私”。

《云南盐志》记载：云南黑盐咸味浓烈，达 95%氯化钠含量，生产一直维持每天出 200 品盐左右的产量。除了 84 个灶户户均每天两品盐外，每天还多出几十品私盐，这就是黑井著名的小锅盐。小锅盐是用散盐和盐水熬制而成。散盐主要是锯盐时遗留的盐屑，盐水来自于挑水的卤夫穿的编织较厚的草鞋。草鞋经常能沾上盐水，黑井人就捡去泡成水以后拿去熬，熬成以后，就偷偷地卖。小锅盐就是走私盐，不上税。积少成多，就私贩小锅盐。具体路径是：一条沿着龙川江一直向北，进入川西、青海等地；一条向西，经过大理，越过怒江，进入缅甸和西藏；还有一条一直向东，经过云南东部进入广西和贵州。

日益腐朽的清朝封建官僚体制，律令愈是苛密，收效愈不显著。各级官吏既无法抑制社会生产和需求的不断增长，也不能解决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病及他们自身贪婪成性的恶习，因而缉私如同其他条律一样，只是禁锢盐业自由发展的暂时条框。伴随时代的步伐，最终还给人民食盐自由。

# 第四章　清末民初以川盐为主体入黔销售区域及路径——盐运血脉考

贵州立省以前，疆域分别隶属川、滇、湖广。行政所属地交叠，导致趋近川蜀地食川盐，毗邻云南域就滇盐，衡通湖广区行淮浙盐，南接桂北域销粤盐。明清以来，榷划行盐运销区界。但由于历史原因，行盐习惯产生川盐、淮盐、粤盐、滇盐在贵州演绎此长彼伏的市场争夺战，最终川盐获得了主导权。民国之初，全盘开放，形成东有淮盐、南有粤盐、西有滇盐、北有川盐；粤盐分两路挺进，川盐分四岸汇黔的盐运布局。

## 第一节　盐运管理，行销界定

### 一、清末行盐及配盐

黔边、黔省属于均不产盐之地，除黎平、古州两府因与广西接壤，就近并销食粤盐，贵阳、安顺、平越、都匀、思南、石阡、大定、遵义各府元明以来，均食川盐，镇远、思州、铜仁三府原食湖南所行之淮盐，至乾隆中叶，改食川盐。原配三台、射洪、蓬溪、中江、乐至（以上配涪岸）、临厅、富顺、内江、资州（以上配綦、仁、永各岸），荣县配仁岸各厂盐。为了保边计岸，光绪三年十二月，川督丁宝桢举办黔岸官运时，并以界连黔边之叙永、永宁、泸州、纳溪、合江、江津、綦江、南川、涪州、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州县计引，并归官运，其石柱厅忠州及酆都长寿二县计引，容易与边盐相混，于光绪六年一月并归官运。

四川凿井求盐，自秦代以来有两千年历史，四川盐场有二十六场产，川南计有富荣、五垱、犍为、乐山、井仁、资中、盐源七场；地属川西合简阳、绵阳两所；地属川北者共南阆、西盐、三台、射洪、蓬遂、射蓬、蓬中、乐至、

中江九场；地属川东有大宁、开县、云阳、奉节、忠县、彭水、大足、万县八厂。其中富荣盐场占全川产盐十分之六，犍乐约十分之二，其余盐场零星生产少数。明朝增有定远、雅州、城口三厂，后已经废弃，清朝前期增有合州、铜梁，开掘枯竭，颇有沧桑之感。

黔岸配盐比较复杂，以威宁、黔西、遵义为例，“富顺原额水引二千七百七十八，新增水引一千二百八十，自富顺买盐，载至纳溪九姓司、永宁、合江、綦江、涪州，转运贵州威宁、黔西、遵义行销；荣县原额水引一千八百三十三，新增二百五十三，犍为原额水引一千七十八，陆引五千七百九十八，增水引三千三百六十八，陆引一万九千四百三十九，载至纳溪九姓司，永宁、彭水、綦江、涪州，转运贵州威宁、黔西、遵义行销；自三台、犍为买盐，载至涪州，转运贵州威宁、黔西、遵义行销；盐亭原水引三十四，新增水引五十七，载至涪州、彭水，转运贵州威宁、黔西、遵义行销；中江原额水引七十四，至中江及犍为买盐，载至涪州、彭水，转运贵州威宁、黔西、遵义行销；；蓬溪分行原额水引三百三十四，新增六十，至蓬溪及犍为买盐，载至涪州、彭水，转运贵州威宁、黔西、遵义行销；乐至分行原额水引十，至乐至买盐，转运贵州威宁、黔西、遵义行销；资州分行原额水引二百十五，自资州买盐，载至纳溪，转运贵州威宁、黔西、遵义行销；内江原额水引七，自内江买盐，载至纳溪，转运贵州威宁、黔西、遵义行销。”①

## 二、清末盐务管理机构

黔盐所需后来演变为主要由四川境内富荣、犍乐二厂配盐销售。光绪七年由富荣运往黔省盐为五十二万七百二十担，犍为有每年十七万七千六百八十担，同时为防倾销，配备保边计岸十三万九千六十担。

设立总局总揽，各事厂岸各设分局，每岸招商设店，分五八腊月为三大关，每关由厂局按引向灶照市配盐，将买本核算，每引该银若干，加以捆抬费用，进行发价。及由厂运至某岸运费，每载该银若干，报由总局，将应征税课等项，一并算明核定每斛售价，运交各岸分司，发商分销，先交成本，杜绝拖欠。岸有定地，引有额数，界限清晰，不容侵越。又于厂岸之外，设立裕济仓，为枯水期、洪水期之筹措，以平运费，设船局，以司转运，置分卡，以资盘验。周密布局做到层层稽查，织网布控，私贩不能倾销，顿时，行销畅旺，引无积滞之累赘，课鲜拖欠之累赘，但增添局所，增置员司，费用宏大，征款

① 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 大定府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0：868.

叠重，迭次加厘，依旧不能支撑庞大的盐务司员管理体系，盐价因而节节攀高，民多食贵，然区域以内，官盐以外，厘盐无售，官盐价虽昂，无虑不行，黔民虽怨，无力对抗。

光绪以前，川盐引票两种均归盐道管理，而设署在成都，丁文诚公以黔边行“引盐制”，化归官运，设置官运总局于泸州，其地势，左沱江，右岷江，内锁富犍二厂，外辖滇黔两省。川盐产场二十六处，川东、川南、川北有二十四场，据泸州，大有鞭长莫及之促，而重庆地属川东，界连川南、北，溯外水而上达川南，溯内水而上，则达川北，顺流而下，则达川东，可以达到节制场产，经管运务，兼顾销岸之地利。民国时期，晏安澜到泸州成立盐运使公署，后迁往重庆。

官运时，在购盐之厂设置五个盐务厂局机构：一名曰“富厂”（设在自流井）；二曰“犍厂”（驻四川五通桥）；三曰“云厂”（驻扎云安厂）；四曰“宁厂”（驻扎大攀场）；五曰“射厂”（驻扎羊溪镇）。官运盐少，而由商运补充之，名曰“郁厂”（驻扎彭水郁山镇）。

## 第二节　涪、綦、仁、永，四岸梳理

### 一、川盐入黔口岸及船运配置

川盐入黔之岸有四。曰涪岸：由涪州进发，转江，自酉阳龚滩入黔。曰綦岸：由綦江县进发，由江津县之江口转江，自綦江入黔。曰仁岸：由合江县进发，转江从仁怀厅入黔。曰永岸：由永宁县进发，纳溪转江，从叙永入。

各设岸局，由涪州入曰“涪岸分局”（驻扎涪州城）；由合江县入曰“仁岸分局”（驻扎合江县城外）；由綦江县入曰“綦岸分局”（驻扎綦江县）；由永宁县入曰“永岸分局”（驻扎永宁县）。另外在黔境内广设缉私卡，有兴义、独山、思南缉私卡。在沿江要地则有炮船穿梭巡察，层叠设置子局分卡，或盘验，或管船务，或换盐票，或核对盐引数目。

专设官运盐务安定水师。其一座船，十四驳船编制为管带一员，哨兵十五名，头工十五名，船工十五名，水勇一百五十名，火夫十五名，共计二百一十一人次。

## 二、仁岸入黔及运销区域

### （一）仁岸盐运线路

由富厂运达合江，再由赤水河溯至仁怀厅，经二郎滩至贵州茅台五百里，因河滩乱石嶙峋，所有水运船舶需特殊打造，民国时期由仁边公司自行设计置办木船三百五十艘，但冬季枯水期运行维艰，故盐船多择春夏之季运载，其中烂泥沟为中转点，水陆两路都能到达，盐船由合江水运至沙滩，滩石湍急，转由陆路四十里至茅台，再由水运至新场，走陆道至烂泥沟，或水顺由沙滩到新场至烂泥沟。分销三条盐网线：一是茅台镇经中华嘴、沙坝河、茅坝、两河口、翻阳雀岩、入后山、岩孔、至金沙交接后中转烂泥沟（今黔西）一地销往安顺，道路崎岖万分，均为人力运输。二是从茅台起运，经梅子坳、生界、鲁班、五马口、翻三等坡入岩孔，至金沙交接后，再运烂泥沟到安顺，多为马帮运输。三是从茅台起运，经石子坝、中米窝、岩崩口、坛厂、桑树湾、长干山、枫香，至鸭溪交接后，再运到把水，经息烽、扎佐转运贵阳。区分岸盐，仁岸盐巴为略为泛青的草白色。到民国六年秋烂泥沟盐价每包十元零五角七仙。



图 4-2-1　富荣仁边岸四川行盐图（源自《四川盐政史》）

(二) 仁岸销售区域

民国取消限制，随即形成一个东有淮盐、南有粤盐、西有滇盐、北有川盐，粤盐分两路，川盐分四岸的四面八方进口线。

仁岸销售区有修文、息烽、平坝、清镇、黔西、赤水、仁怀、习水、都匀、平塘、丹寨等十一县，贵阳、贵筑、惠水、平越、龙里、贵定、鑪山、麻江、镇远、施秉、罗甸等十一县市为仁、綦岸合销区，安顺、关岭、镇宁、望谟、紫云等五县为仁、永岸合销区。供应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

## 三、綦岸运销区域

(一) 綦岸盐运路线

由富厂运至江津县江口转运，在江津口设盐仓，由綦江转运至盖石洞、羊蹄洞，再由綦江而上。特别打造船只有三百余艘，水情变化，船只设计因水而策，由綦江至盖石洞，一段五十艘，每艘装盐六十包；由盖石洞至羊蹄洞，一段七十艘，每艘装盐四十包；由羊蹄洞至清水溪，一段七十艘，每艘装盐十包。綦岸盐巴为花腰色（白底红杠）以区别其他三岸，防止串岸销售。至民国六年（公元 1917 年）六月，每包盐一百四十余斤，销价大洋十元零八角八仙，十月涨至十二元二角五仙。



图 4-2-2　富荣綦边岸四川行运盐图

（二）綦岸销售区域

销售区主要为开阳、瓮安、长顺、余庆、桐梓正安、道真、绥阳、凤岗、湄潭、遵义等十一县，以及与仁岸上述合销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四。

## 四、永岸运销区域

（一）永岸盐运路线

永岸之毕节和瓢儿井为本岸运销中心，纳溪抵永宁之小河二百里，一年之中，枯水期时难以运行，从永宁至瓢儿井只能走陆路运输，行销安顺、大定。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水西“改土归流”。清政府以明水西宣慰司，乌撒土府，毕节、赤水和乌撒三卫，改设大定府（先设府，又改州，后再改府）和下属黔西、平远、威宁三州，毕节一县和水城一厅。即今贵州毕节地区的大方、毕节、黔西、织金、金沙、纳雍、赫章八县和水城特区等地。安平（今安顺市平坝县）、兴义、黄草壩（黄氏土司十多代，历经200多年经营成为普安州最为富裕的县，清中期建县）等县之盐，均由瓢儿井起运。此外，由毕节起运，兴义西南、黄草坝、普安（今盘县）一带，倾销滇盐，后纳入川盐体系。据实地访谈调查，民国四年，兴义县月均盐价滇盐每担十一元，川盐十四元。民国六年冬，滇盐涨至十三元，川盐涨至十八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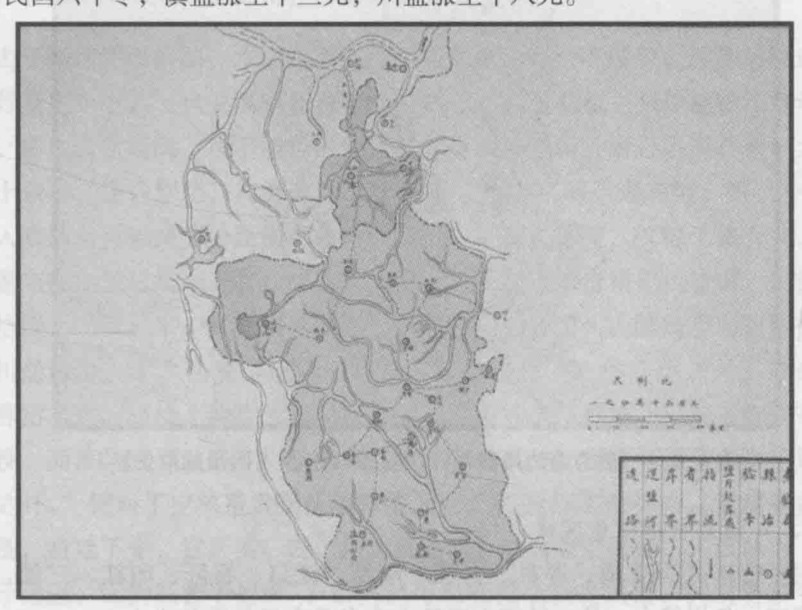


图4-2-3　犍厂永边岸四川行盐分图（来源《四川盐政史》）

（二）永岸销售区域

销售区主要为郎岱、普安、毕节、大定、纳雍、金沙、威宁水城、织金等九县，以及与仁岸上述合销区，供应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 五、涪岸运销区域

（一）涪岸盐运路线

由涪州至龚滩，小河八百余里，其通航期为每年十月至次年六月，故为补偿河道不畅之月之急需盐，必须预先运抵到岸，存仓备销，所需资本巨宏，新商只运至涪州不能入岸。民国涪边公司分号只设在沿河，由沿河分号代理，共置木船二百余艘，所有运往沿河之盐在龚滩转船，由沿河运往思南之盐，也在新滩、潮砥二处转运，运往铜仁之盐，在沿河上游数里起岸，由陆路运行三十里，再用水运。查綦边之盐，运往涪岸所属镇远、黄平、玉屏、青溪等县。导致富盐倾销犍岸，同时淮盐由湖南倾销铜仁一带。涪岸盐巴是炭灰色。民国六年冬，淮盐一百三十余文，川盐二百余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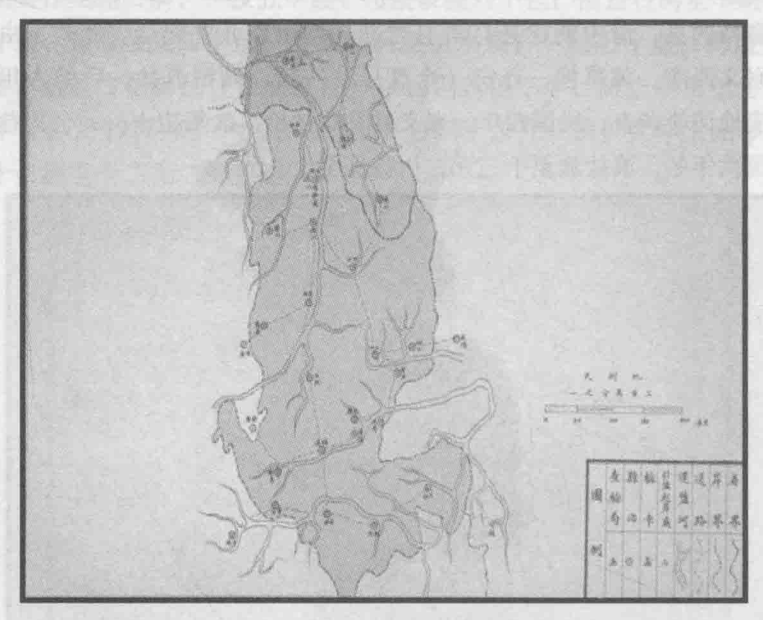


图 4-2-4　犍为涪边岸四川行运盐图（来源《四川盐政史》）

（二）涪岸盐运销售区域

主要销售区为思南、岑巩、台江、沿河、江口、石阡、印江、三穗、剑河、德江、务川等十一县，供应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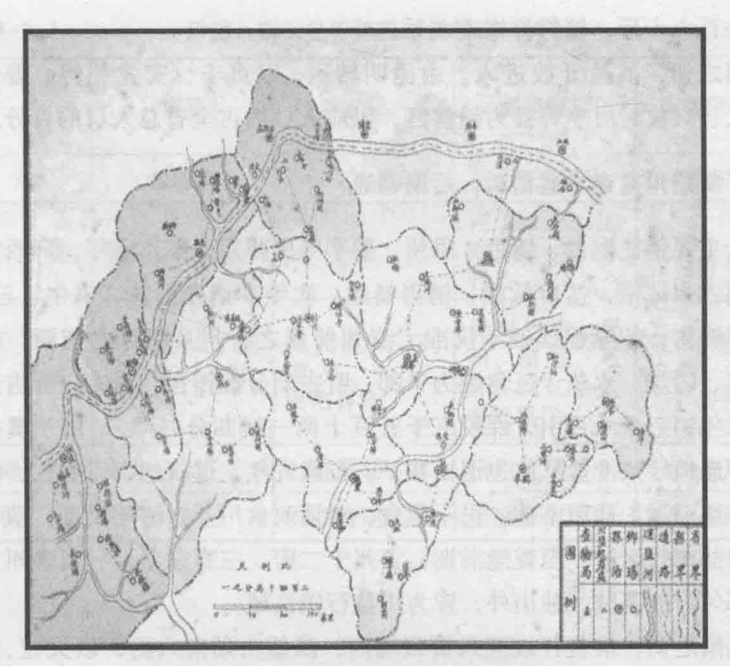


图 4-2-5　富荣涪边岸四川运行盐图

六、前期川盐夺滇盐运销，后期开放盘活。

由于横江滩石险恶，水情六至九月涨势尤危，完全不通航，运盐只能选择在十月至次年五月，且失事率竟占 15%，每年水盛涨恶机，只能由横江场旱路起运，即使通航期间，也不能径由安边直达老鸦滩，而且附近茅道石有一大滩长二十余里，船只到此，均需改陆二十五里，再行水运至老鸦滩，由此中转。滇盐入黔的运行线路为：昆明、曲靖、宣威、平彝、普安，仅销于普安州。滇盐质量当时比较川盐稍逊，盐味不够浓厚，且长期以来价格比川盐贵，黔民购买力拮据，入清以来，素有川盐倾销。康熙中期，普安州民陆琏屡向清廷提出改食川盐请奏，称“普安等地四面环苗，每年耕作，除纳正供之外，所余不足以养活家口。川盐不拘斤两，零星可买，而滇盐必须整块；川盐不拘米布兼可易换，而滇盐必须纹银；川盐价廉，每斤不过三分，而滇盐价重，溢于四分三厘之外。”同时丁宝桢遣贵州抚臣林肇元与广西抚臣庆裕交涉，划清粤盐销售范围，清廷下令，召开滇、黔、川巡抚会议，商讨普安行盐，一致认为“滇商苦于远远，而黔民苦于盐价”，协同认可普安民众改食川盐，同时将滇省额定盐税课核数照减。清中叶以后，普安州成为川盐销售区域。至民国六年九月

每包盐一百六十斤，销售价格十六元。

民国之初，滇盐开放进入。由昆明转运，以贞丰、安龙关岭、普安、盘县、兴义、兴仁、册亨等县为销售区，供应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百分之八。

## 七、前期川盐夺淮盐销黔，后期畅通

淮盐主要销往铜仁、镇远、思州、黎平等府州县。雍正十年，广西官员押解粤盐到古州试销，盐价低廉，销售畅达。次年奏请在丙妹、来牛、三角坉，各设以埠销售，乾隆朝廷四年议准"贵州所属之古州系新辟之苗疆，应以古州为总埠，丙妹、永从、三角坉为子部，听古州分拨销售，商人应听古州同知管理。每年销三千八百引，课税三千五百十两一钱四分二厘。"由于滇盐的插销失败，连锁导致淮盐从此也退出黎平。乾隆九年，巡抚纪山以铜仁、镇远所食淮盐运道艰远，盐质不佳，民不愿食，奏请改食川盐，清廷议准，镇、铜等地划归川盐销售区域。至乾隆前期，贵州十二府、三直隶厅、一直隶州，除黎平府及都匀府的荔波、独山外，皆为川盐行销区域。

在民国之初，淮盐开放进入贵州境内，淮盐由湖南入黔，以天柱、玉屏、松桃铜仁等县为销售区，供应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百分之五。

## 八、粤盐分路入黔

粤盐由柳州分两路入黔：一经长安至榕江，一经六寨至独山。以黎平、榕江、从江、下江、锦屏、都江等县为销售区。另有独山、荔波、三合等县为其与川盐合销区，供应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百分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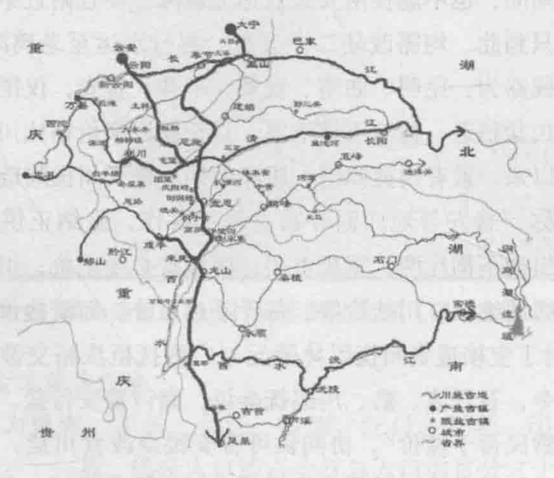


图 4-2-6　川盐入黔配岸图

表 4-2-1　　川盐入黔引盐行销区域及管理机构

| 类别＼厂配 | | 富荣 | 富荣 | 富荣犍厂 | 富荣犍厂 |
| --- | --- | --- | --- | --- | --- |
| 销　岸 | | 綦边岸 | 仁边岸 | 涪边岸 | 永边岸 |
| 行销区域 | 川境 | 綦江、南川 | | 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各县 | 叙永、古宋、古兰等县 |
| | 黔境 | 贵州遵义、贵阳、都匀各府，平越州 | 贵州仁怀厅，遵义、大定、贵阳各府 | 贵州思南、思州、镇远、石阡、铜仁各府并松桃厅 | 贵州之大定、安顺、兴义各府，普安厅 |
| 前清岸局 | | 綦岸分局 | 仁岸分局 | 涪岸分局 | 永岸分局 |
| 民国机构 | | 綦江查验局 | 合江督销局 | 涪陵督销局 | 叙永督销局 |

# 第三节　盐运万里，曲折艰辛

## 一、盐运路途遥远，跨越区域范围广阔

仁岸由四川境内富荣盐场配盐运至仁岸分局（合江督销局），水程 600 里，合江至终点安顺水陆计 1 680 里，合计 2 280 里。綦岸由四川境内富荣盐场配盐至綦岸分局（綦江查验局），水程 960 里，从江津运至终点贵阳水陆计 1 236 里，合计 2 196 里。涪岸由四川境内富荣盐场配盐远至涪陵局，水程 1 260里，或由四川境内犍为盐场配盐到涪陵局，水路 1 710 里，取中间值 1 485里，涪陵水路至远运至思南分销 2 438 里，合计 3 923 里。永岸由四川境内富荣盐场配盐运至叙永局，水程 800 里，或由四川境内犍为盐场配盐到叙永局，水程 1 200 里，也取中间值 1 000 里，由叙永运至威宁 776 里，合计 1 776 里。如果把四岸单线运输总长度相加，合计 10 175 里。此处只是简单单线计算，未包括各局域销售点，各边缘乡镇盐运路途计算。四岸启运平均里程 2 543里左右，由此可见，贵州人民取盐之困难、运盐之艰辛、食盐之珍贵。抗战以后，全国平均年驿运力指数为 4 300 万 T /km，贵州达到3 000 万 T /km，盐运占 70%约强，贵州主要运输力量集中在盐运。川黔盐运总长度堪称“川

黔盐运万里长征”，纵横跨越川境一半地域、贵州省全境。

### 二、盐运艰辛曲折，陆运崎岖陡障，水运变幻莫测

贵州山地崎岖不平是共性，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山重着山、山环着山，境内 4 057 里陆运均为历史时期因军事开辟的驿道山路。唐代诗人李白《蜀道难》的开篇云“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①] 其实“黔道更比蜀道难”，听王守仁在《兴隆卫书壁》曰“山城高下见楼台，野戍参差暮角催。贵竹路从峰顶入，夜郎人自日边来”[②]。再看林则徐在在镇远道中语，“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再看运夫劳运盐“或以担荷，或者背负，背负者一人率负百斤而赢，多者几与马力相捋，踌躇巉岩绝壁间，数十百步辄一憩息，夏日挥汗如雨，严冬身不挟纩，劳而忘寒，亦天下之至劳苦者也”[③]。

贵州河流多激流涌滩，以赤水河老船工叙说为例，有“大银滩、烧火滩、小银滩、新开滩、青滩、罗村滩、崖滩儿、偷狗滩、罐子口滩、三盆滩、岔角滩、乾沟滩、顺江铺滩、花滚滩、鱼锦滩、袁滩子、游魂三滩、刺梨滩、大熬钵、小熬钵、淋滩儿、立石滩、十八滩、宝寨滩、鱼溪滩、瓦窑滩、皮匠滩、牵塘滩、簸箕滩、大簸箕滩、大瓮滩、小翁滩、九溪口滩、高粱滩、棕背滩、太平渡滩、牛困滩、蛇皮滩、洗脚滩、牛皮滩、黄岩滩、瓢儿滩、雁滩、土地滩、虎脑滩、黄泥滩等”，航道险恶异常，水情干枯不定。

### 三、运盐手段、工具滞后，运输效率低下

整个明清运输整体水平长期滞留在驿运阶段，一直到 1937 年 7 月，四川盐务局借来汽车四辆交綦岸盐商试运川黔公路为开端，才开始使用汽车运销官盐，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盐运结构比例为“木船占 50%，汽车加板车 27%，人背马驮 23%”，商运及各支线盐运销售，均依赖人畜动力。

结果必然导致盐运效率低下，工具传统落后，运行周转速度慢，水运船除赤水河合江至二郎滩段、綦江河江津至介石洞段、乌江涪陵至潮砥段的大木船可载重二百担左右外，其余小木船只装几十担。四岸船日行平均 45 里，马日行 65 里，脚夫 30 里。正常情况下，仁岸至安顺四十五天，綦岸至贵阳三十一

① 曾月郁，周实. 李白（第 1 部）蜀道难［M］. 长沙：岳麓书社，2003：23.

② 吴震. 王阳明著述选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5.

③ 黄家服，段志洪. 中国地方志集成 贵州府县志辑 38 嘉庆仁怀县草志 光绪增修仁怀厅志 民国开阳县志稿 民国修文县志稿 康熙龙泉县志草［M］. 成都：巴蜀书社，2006.

天，涪岸至思南五十天，永岸至威宁十七天。途中遇不测事故，或匪盗，或兵祸，或水灾，或生病等，就是不定数了。

### 四、盐运盐课高、盐价高，苛虐民夫

清朝，贵州穷困不及中土一大县，但盐税种类繁多不堪。主要包括：其一，正额。康熙初年规定贵州一年盐税正额 5 730 两，道光年间叠加到 7 610 两。其二，引课。按引课税，康熙初年，水引一张征银 4.45 两，陆引 2.724 两，再加关税等项，“每张约计需银 20 两”。其三，附加。顺治十七年（公元 1661 年），特批贵阳、思南、镇远三府每百斤盐征税二钱，康熙二年（公元 1663 年），又准征税府卫在贵阳、思南、石阡、镇远、安顺、平远、大定、黔西、永宁、毕节、乌撒、鸭池等处，每百斤征税二钱四分，普安重加三钱。其四，厘金。咸丰初年开征“商人运盐到岸，见十抽一，谓之大厘”。沿途复有半厘、小厘，落地税各名色，又有查局、分局验票局、各州县私设卡局，层层派索，最后核计每引一张，过关斩将约需银五十余两。其五，协饷。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根据丁宝桢的建议，以贵州取消厘金及一切地方杂捐为条件，由四川代征盐税拨付协饷。黔省厘卡虽已裁撤，但而运盐入黔，需经过各关卡征收盐税及各项经费，合计每引共需纳银 40 或 50 两，实则协响已加，厘金照旧。其六，摊款。贵州每年摊解庚子赔款二十万两，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4 年），“奏准每引加增赔款四两。”清朝六税重加如六重大山，压得贵州人民喘不过气，每担盐折合约负担 2.65 两。

民国苛捐杂税叠叠层层，税率节节攀高。四川境内过滤一遍，即有护商费、江防费、峡防费、团防费、验票费、消磨金、军炯捐、公益捐、船捐、脚力捐、乐捐、团捐与学捐等，计有二十六种。盐场至运岸，沿途军方、政界、警处、学政、商会各有需索，杂捐合计 4.32 元，加正税共 5.92 元。贵州境内由于协饷取消，遂即自征省税，再搜刮一通，川盐每包、滇粤淮盐每担各税二两，民国二年共收入 830 235 两，超过了协饷数。

根据民国 1937 年盐务总局调查如表 4-2-2 所示：

表 4-2-2　　　　民国盐价合成表

| 销盐成本及趸售价格（以担计价） | 比重（%） |
|---|---|
| 74.15 元（场价） | 16.94 |
| 183.82 元（运杂费） | 42.00 |

表4-2-2(续)

| 销盐成本及趸售价格（以担计价） | 比重（%） |
|---|---|
| 102.40 元（租费） | 23.40 |
| 77.28 元（运销利润） | 17.66 |
| 437.65 元（趸售价格） | 100 |

由上表可见，价格反差比约 6 倍之多。从运岸到销岸，第一级趸售商转给包店，再转给拨贩，再发零售。中间转手有四级或五级，由此，零售价格至少是牌价的 1 倍。历代盐商成为巨富，数不胜数。

盐运和官办驿道机构给予民夫的报酬少之甚少。以綦岸为例：由介石洞至松坎的船夫，逆流纤挽，日行三十余里，每天除供给两餐“民夫伙食”外，所得工资只合大米 1.33 斤，陆运挑夫负重七十五斤，日行七十里，亦仅得米 1.5 斤。再论仁岸：由二郎滩至马桑坪三十五里山道险路，负重七十斤一天到达，不供伙食只付盐 1～1.5 斤。盐商的丰厚利润与民夫维系基本生活的微薄酬劳形成强烈反比，盐运效率为何不低？

# 第五章　贵州明清盐道——盐运历史文化线路考

## 第一节　文化线路，内涵外延

### 一、文化线路概念的发展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作为新的世界性遗产、保护形态，备受国际遗产保护组织的青睐。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先后承接性地召开了四次全球性重大会议。1994 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了“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首次明确“文化线路”的遗产保护概念，并把遗产保护范围由单位扩展到街区，由街区扩展到城镇，由城镇进而扩展到区域Ⅰ，由区域递进升华到文化遗产线路广阔范畴。讨论了文化线路作为世界遗产的判定，以“历史悠久——时间特征，交流广泛、连接丰富——空间特征，跨文化因素——文化特征，贸易交流、区域发展——角色与目的四点作为基准。

1998 年，在西班牙特里里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了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ICOMO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简称 CIIC），标志着以“交流和对话”为特征的跨地区或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or Cultural Itinerary）作为新型遗产理念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所认同。

2003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法国巴黎总部召开会议修订的《行动指南》中切实地加入文化线路保护的内容，把文化线路界定为：“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混合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历史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与流动，它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与地区之间人们的交流，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

价值的互惠以及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的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①

## 二、文化线路内涵和线路形态

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在加拿大古城魁北克通过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即《文化线路宪章》，标志着文化线路正式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新领域。根据《文化宪章》，文化线路可以界定为"是一种通过承担特定用途的交通线路而发展起来的人类迁徙和交流的特定历史现象，现象的载体就是文化线路的历史内容。交通线路的具体特定用途和特定的历史现象，是理解和把握文化线路遗产内涵和遗产内容的基础"。文化线路的内涵：一是具体特定的用途。不仅是普通的交通路线，它是为具体特定用途服务，或特定商品货物，或特定的政治、宗教、文化活动。二是特定的历史现象。它是特定的历史现象，不是历史事件，意味着文化线路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积累，交通路线上的往来与交往是长期与持续的，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影响和融合，形成文化线路结构，与线路相关的文物和历史关系组成一个动力系统，有特定时空要求。

文化线路中交通线路空间形式总体是线性的，围绕着出发点和目的地两个中心点因素，其空间结构表现为单一线状、网状、放射状和环状。单一线状最为普遍常见；一个出发点而多个目的地或反之，则形成放射状；多个出发点和多个目的地，则形成网状；多个出发点多个目的地往返式，则形成环状。文化线路分为水路与陆路或两者混合。文化线路与功能有形的要素囊括了人类环境的一切聚落，如：建筑、城镇、乡村、文化景观；无形要素，"即使线路部分实体道路已经消失，但所继承遗产的连贯与存在，对于整体线路具有高度重要性"。文化线路是物质和非物质混合双遗产。

文化线路在二十一世纪，作为全新的地物，被历史地理、旅游地理、文化地理等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体系纳入研究范畴。贵州明清古盐道是否属于文化线路遗产呢？首先，让我们解析其线路特征。

---

① 丁援. 文化线路·有形与无形之间［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78.

## 第二节 历史驿道，拓展盐运

### 一、回溯明清以前贵州古代交通的开发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地势起伏大，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全境山多谷深，北有西起毕节向东北延伸到四川，重崖叠峰、峭壁绝立的大娄山脉；东北有向东北延伸，分别向南、中、北发育三支，绵延起伏的武陵山脉，其中梵净山为“武陵正源，名山之宗”；西北有东北—西南向，“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①，横亘于川滇之间的乌蒙山脉；西南有巍峨雄峙北盘江岸的老王山脉；云雾缭绕、婀娜多姿的苗岭山脉逶迤于中部。其间，河流湍急，道路艰险。明谪居贵州龙场王阳明曾有“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之感叹。

贵州界定为“远在要荒”的政治地缘位置。中央政权对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区域的控制相当有限，古人把京畿之外的地方进行管理级别划分，划分规则是以五百里为率，视距离远近分为五等，称之为“五服”，其名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远在要荒”说明贵州属于距离王朝中央最边远的“要服”与“荒服”之地，地缘的空间距离使中央王权对贵州的统治鞭长莫及。

贵州在西南的军事战略位置十分关键要，其东毗湘、南邻滇、西连滇、北接川，为东征西伐、南征北战之通衢之地。

（一）战国时期开辟的“五尺道”

战国楚襄王时（公元前298—前279年），“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今贵州福泉县），以伐夜郎王”②，其进军路线水路溯沅水至且兰启岸，途经夜郎（今安顺，夜郎国之辨在贵州众说纷纭之）、宛温（今兴义），达滇池（今昆明），其战略指向是讨伐夜郎，经贵州到云南，迂回进攻秦国，但因归路截断，失败告终。这是历史上最早记载“东西向干道”。

“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南丝绸之路”途径毕节的七星关，在路旁的岩石上斑驳而清晰深达一厘米的历史马蹄印依然存在，我们田野考察一行，仿佛听见了秦千军万马强悍地踏过黔野。早在五尺道开通之前，巴蜀及夜郎人草创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的商旅之路，其中一条经僰道

---

① 周兴俊. 毛泽东诗词专辑［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② 司马迁. 全本史记大全集：第4卷［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四川宜宾）、朱提（云南昭通）、汉阳（今贵州赫章可乐）、味县（今云南曲靖）、安宁（今云南楚雄），至叶榆（今云南大理），与另一条走临沂、筰都（今四川汉源）来线汇合，一路往西，经永昌（今云南宝山），出瑞丽而抵缅甸八莫，再到印度、阿富汗等国。这一条贯穿川、滇、黔的国际化的古道，也就是最早的黔之盐道路径一段。川滇黔盐道连接了茶马古道。

古为今用，昔日军事通道“五尺道”，在明清变成了犍盐滇边第一路，黔边也输少量盐。清末举人周楚留在“五尺道”的抒怀“老鸦滩畔水弯环，铁索桥横第一关，商贾尽多滇蜀客，人民不别汉夷闲，盐船乱接石头路，巡署斜撑市外山”，描述了当时“五尺道”上的运盐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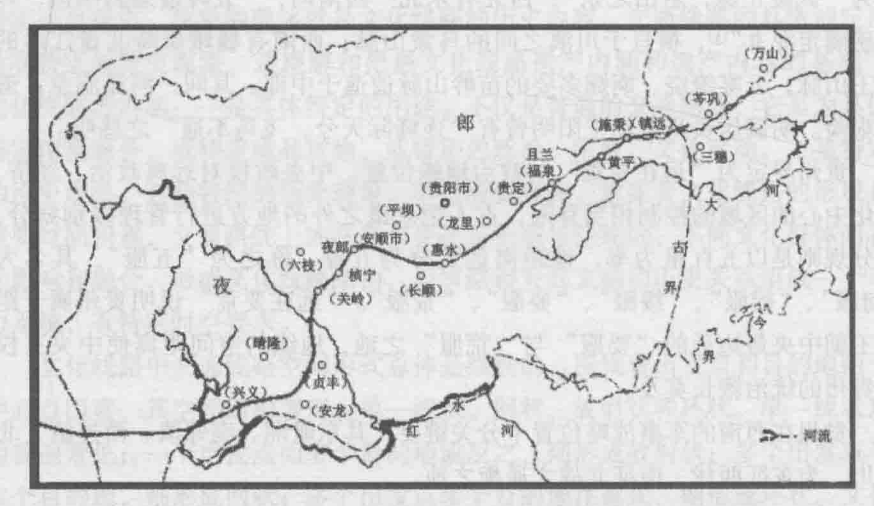



图 5-2-1　庄蹻入滇示意图

（二）汉朝开辟南北向“石门道”

汉武帝平剿南越，任命唐蒙为犍为郡督尉，累被派遣通夜郎，由此，凿通由僰道之大牂柯江的道路，将夜郎与巴蜀腹心连接了在一起，路径是僰道—石门（今四川庆符县境）—南广（云南镇雄）—平夷（今毕节）—夜郎（今安顺）通达牂柯江畔。且兰君阻塞通滇之道，武帝令征南越八校尉挥军回师剪灭且兰，贯通入滇之道。招募了“三蜀大姓龙、傅、伊、董等家族”在夜郎地区屯田，巩固通道要塞。唐蒙所修之道后世谓之“石门道”，为通贯贵州南北向大道。水经注载：“唐蒙凿石开阁，以通南中（即川滇），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尺，堑凿之迹犹存”①。

① 郦道元. 水经注［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23.

石门道拓通，中原文化逐渐渗透进入贵州，为贵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带来了激荡。目前贵州汉墓出土铁器的地方就达 11 个县之多，确证了四川盐、布、铁器在当时大量输入和广泛流传，促进了区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史记》载："当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至一石（一钟相当于六石四十，一百二十斤为一石）。"① 说明当时贵州已经通过石门道，形成较大规模的运输盐、铁、粮的商流。运输方式采用原始的肩挑背扛，工具皆为简单的扁担、背篼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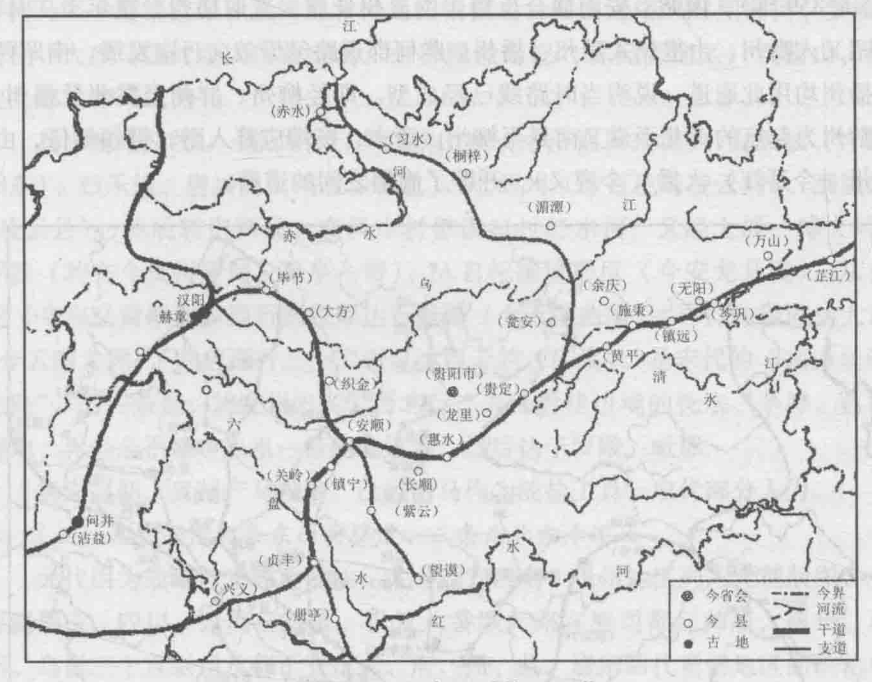


图 5-2-2 汉朝开辟的石门道

楚庄蹻入滇开辟了贵州东西大道，秦常頞修整五尺道，汉唐蒙凿通南北石门大道，为贵州古代交通构筑了立体框架，同时为川、黔、滇盐线状运输拓展了渠道。

历史长达三百多年时间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纷乱，分裂割据，中央王朝无力经营西南。因此，汉朝开创对贵州开发的良好局面由此停滞，贵州与外地的交往骤然减少，各种通道的拓展也维持原有态势，处于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

① 徐朔方. 史汉论稿［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184.

（三）唐朝延展南北大道

唐代运输以军事行动为主，朝贡次之，经济运输以盐味为最大宗，因为此时黔州有盐井 41 处，故当时川、淮、粤盐均销贵州部分地区，运输路线主要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黔州（四川彭水）、邕州（广西南宁等地）进入，此为唐代贵州主干盐道。

唐代使贵州道路持续向南北向延展。唐都督府设置于黔州，由此而逐步形成了黔州经费、夷、牂、庄四州又一南北大道。唐宣宗（李忱）大中十三年（公元 859 年），南昭、安南联合反唐，由邕州长驱，直取播州。次年十二月，南昭又入黔州，由邕州入黔州、播州。牂柯郡道路经毋敛向丹南发展，南昭两入播州均用此通道，说明当时路线已经成型。即经柳州、牂州至黔州及播州，以黔州为起点的南北干道又南延至柳州。唐末，杨端应募入黔，带领健伍，由南州（今綦江）入播（今遵义），开辟了渝播之间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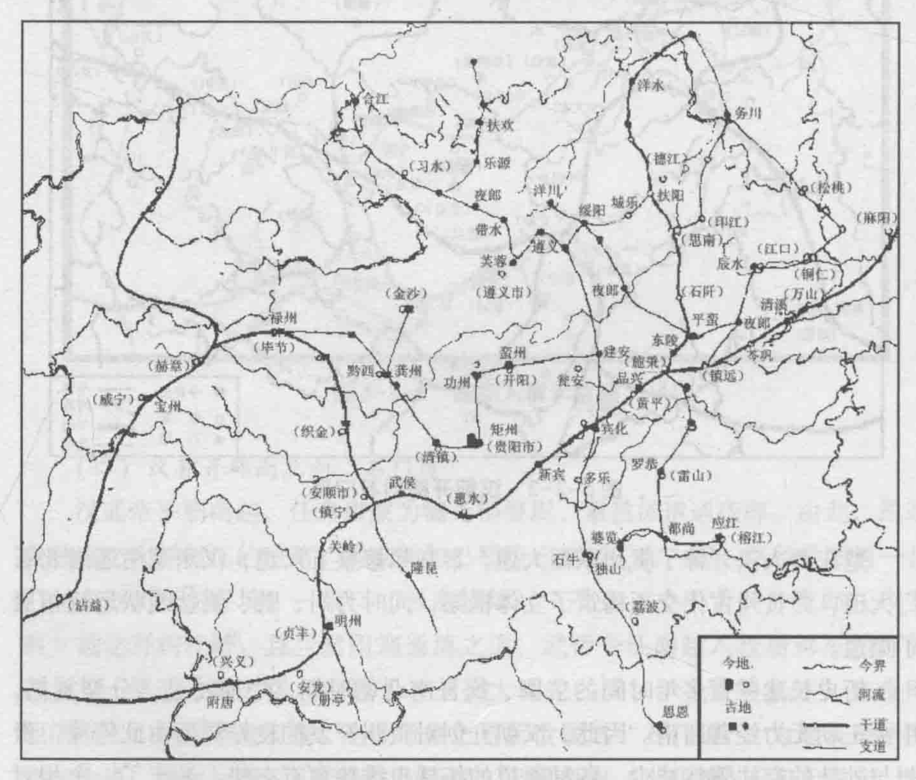


图 5-2-3　唐代贵州主要道路示意图

（四）南宋设置罗殿、自杞中转站

南宋与金对峙，失去了半壁江山。古代战争，马是不可或缺的，常言说

“兵之所恃在于马”，以前的军马都是吐蕃、西域等北方地区的马，但北方沦丧，马市废了，于是只得选择南方买马，但川马和广马都要通过贵州。且贵州向来产马，著名的马品种有“水西马”和“乌蒙马”，还有更名贵的“龙驹”。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贵州成了买马道上一个重要的中转站，逐渐形成了黔、川、滇、桂一带连成一片的南方茶、盐、油、马互市。七星关当年的“五尺道”，后即成为了元明清时的重要驿道，是川盐入黔的必经之路。

宋代贵州输马概况：播州马每年50匹销南平军；泸州南夷界马匹销泸州；牂柯马匹少量销宜山；罗甸及牂柯马匹销横山。横山是南宋时期牂柯、罗殿、自杞、大理马匹的最大销售市场。由罗殿经自杞（古宛温地区）至横山，历史上称“市马之路”。

具体输马路线。一条为：自广西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古天县（今田阳东）、归乐州、唐兴州（均在今百色）、七源州（今百色与凌云间）、泗城州（凌云县），然后转向西北，在凤山村僚渡口过红水河，又经上展、博文岭、罗扶（均在今贵州罗甸、册亨一带），入自杞国境磨巨（今安龙县境），从自杞（今兴义黄草坝）西行四程即达石城郡（今云南曲靖），再行九程即达大理（今云南大理），此道西行三十二程可达西天竺（印度），是宋代的“南方丝绸之路”。另一条是：从宜州出发，西北行，先经黔桂边境的抚水、茅滩、荔波等地，再经今平塘、惠水一带的五姓蕃，然后达于罗殿、毗那。

唐宋时期，贵州产马较多，已经用马作为驼盐工具，取代部分人力。

（五）元代兴建两条东西向驿道、三条南北向干道

元代因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大力经营西南，贵州地区列入元朝版图，分界属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设置八番顺元路宣慰司都元帅府，播州、思州、乌撒三个宣慰司及若干安抚司、府、州、县，唐宋两代贵州地区的政治中心均设在东北部的黔州（今彭水），至元代八番顺元路宣慰司都元帅府设立于贵州长官司（今贵阳），然后逐渐发展成为贵州政治中心及交通枢纽，元廷大力开拓和改善贵州地区通往邻省的大道，并在一些干线设置驿站。

南宋蒙（元）代鼎力营造贵州驿站、驿道，主观而言，主要是因为战争之需要。近宋蒙数十年战争围绕三大战场展开博弈，其一为荆襄，其二为西蜀，其三为两淮。南宋在两淮战区形成综合有机防御体系，最为薄弱的是西蜀战区，西蜀是宋蒙战争初期主导战场，而贵州作为战略要塞，介于湖广、四川、云南之间，易守难攻，因战争的持续，演化为西蜀战场之辅助战略防御战场。其为南宋防御蒙古进军的路线是：“一防蒙古军队从四川泸州、宜宾一代经播州、思州进入湖南；二防蒙古军队从经贵州黄平、玉屏进入湖南”。而蒙

古军队采用迂回包抄战略，先征服西南各民族，建立根据地，再实施对南宋的南北夹击。所以双方的战争博弈，产生了以下的驿道与驿站。

元代是历史上有记载第一个在贵州地区设立驿站，开展驿运的王朝。新建2条东西向驿道、3条南北向干道，其中一条驿道与原有路线交错成网。

其一，开拓连通平溪（玉屏）、镇远、黄平、播州（遵义）、水西（黔西、大方），至乌撒（毕节）的东西向大道。

在宋朝时期，播州与水西及黄平、平溪间已有断续连接通路，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元将宋国保攻镇远，十三年（公元1276年），爱努开乌蒙出兵湖江抵达叙州（今宜宾），荡平乌撒路，十七年（公元1280年），发兵千人协同洞蛮开道，肃清罗氏鬼国土寇之乱，拉通思播之间通道，十九年（1282年），元廷调四川、云南、湖广军进讨罗氏鬼国部族亦奚不薛，开道水西与云南驿站，连通湖南经平溪、镇远、黄平、播州、水西至乌撒的另一条东西大道。《永乐大典》载，设置湘川（今遵义南）、浪洞、重万（今重安江）、麻峡四驿站。

其二，重新开拓曲靖至普安（今盘县）、贵州（今贵阳）、新添（今贵定）、麻峡（今麻江）、黄平、镇远、平溪到晃州的东西向驿道。

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四月，四川省备右丞耶律秃答儿言："相视得经普安路迤东，罗番（今安顺）、贵州（今贵阳）葛龙俱系归附蛮夷，隶四川行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到黄平、镇远、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达江陵路。观其山势少通，道径平稳，又系出马去处，比之黎雅乌蒙驿路捷近两千里。如将云南站道改由江陵路通行，若有网远辎重货物，依旧于乌蒙水站递运，四川站赤稍得生息。"[①] 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此东西向驿道即已改线完毕，所设陆站有平溪、平地、镇远、偏桥、罗仲、麻站、麻峡（今麻江）、摩溪、南梦、德渐迷、普安（今盘县）共11处。此线由平溪经镇远、黄平、麻峡，在元军入黔时已能通行，延续庄蹻入滇路线的一部分，新改线是由曲靖经普安、贵州到麻峡一段。并在镇远兼设水站、陆站，由此路取道江陵北上或西去云南。

其三，开辟泸（州）—永（宁）—乌（撒）南北大道。

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泸州夷首领乞弟犯边。四年（公元1081年），宋廷调林广率军由泸州征讨，与乞弟军战于纳溪，乞弟败逃，由此，开通由泸州经纳溪至江门道路。

---

① 《播州杨氏史籍编年》（元——卷之三）.

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春，永宁土官雄挫起兵反元，元廷抽调四川、云南、湖广三路军队讨伐乌撒（今威宁）、芒市（今云南镇雄）等叛军，战于暮晖关、普市。十月云南军入暮晖关，湖广军从打鼓砦会灵关（黔西境）进军蔺州，四川军自长宁鲁漕进兵，三军会战赤水河，雄挫降败。泸州经永宁、赤水河至乌撒南北大道因以贯通。

其四，新开辟中庆、乌撒、乌蒙南北向驿道。

依据上述耶律秃答儿建议，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仍使用中庆建都道的水陆混合交通路线。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二月，云南行省报告元廷，叙州、乌蒙，水路险恶，舟多破溺，宜自叶稍水站出陆，经中庆，又经盐井、必撒（乌撒、毕节），至叙州、庆符，整治为驿路，设立五站。《永乐大典》又载：该路由中庆、曲靖、乌撒（今威宁）、乌蒙，至叶稍坝、庆符，至叙州。其中叶稍坝又分水道设四站达叙州，即经乌蒙（今云南昭通）经金沙江的水陆联运改为经乌撒经叶稍坝小河的水陆联运。改线所经乌撒为贵州境，设有三站：必畔（威宁南）、乌撒、阿都。

其五，开通川黔驿路播州—重庆南北向驿大道。

元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嘉特谋反，元廷急调两路大军平息，一路山西军，一路湖广军。囊嘉特进攻播州，“播州杨万户，引四川贼兵至乌江峰，官军击败之。八番元帅图楚克破乌江北岸贼兵，复夺关口。诸王伊噜特穆尔，统军五万五千至乌江，与图楚克会，囊嘉特焚鸡武关大桥，又烧绝栈道”①。至此，贵阳至遵义道路全线贯通，与播州至重庆南北向驿道相接。重庆境内设古渝站（重庆江北县）、伯节站（綦江县）、白庆站三驿，遵义境内置湘川、永安、桐梓、播川、夜郎、松坎站与之相连。

元代后期经营西南，由于贵州驿道纲运辎重物资过于繁重，人口增加迅速，又在亦西不薛（今黔西一带）设置大型养马场，食盐用量巨大，加以上京朝贡人员众多、使臣往返频繁，原有驿道已不能适应运输需求，势必采取新的措施以缓和运输矛盾：其一，以牛马作为主动力参与驿运，改变“如中庆至叙州驿道，乌撒3站，配马90匹、牛30头；渝播驿道仅古渝站至白庆站配马60匹”。其二，开辟水运，形成水路联运，同时增办水陆分运与接运驿站点。中庆经乌撒至叙州的水陆分接运点设置叶稍坝分运点，曲靖经贵州（今贵阳）至湖南晃州（今晃县）的分接运点设办镇远分运点。重要官员和急需战时物资，由陆路直达叙州或晃州；一般人员和物资运至分接运点后进行分

---

①《元史》卷三十三本纪第三十三.

流，或上船水运至叙州或晃州，或起岸陆运。这样布局，暂时缓解滇、黔、湘驿运紧张态势。

## 二、明代驿道主干网络的缔造与形成

### （一）贵州区位军事战略态势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卷十中叙："尝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达于西北，几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至冲，则沅、靖未争也；踞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矣。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而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澧阳不知其所守。鹰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一军北出思、黔，下重庆，敌疑我之驰萌也。问途沔北，顾盼长安，而天下襟吭且为我所矣！所谓以攻则强矣！如是，而曰贵州蕞尔之地也，其然乎哉！"①

贵州这一特殊战略地位，决定了明清两朝在长达五个多世纪的经营过程中，最突出的是推行军屯来改变元代八十年中在贵州推行的土司制度，转化为中央集权制度在贵州以准制度形式的实施，给贵州的政区与健全发展开辟了新路，同时为了巩固西南，大力整修军事驿道。

### （二）明代贵州驿道主干线及网络构建

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思州宣慰使田仁厚、思南宣抚使田仁智降附朱元璋，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顺元宣慰使蔼翠、同知宋蒙古归，普安府女总管适尔等先后归附明朝。十四年（公元1381年）九月，明廷命傅友德为统帅，兰玉、沐英为副帅，率领30万大军，分别由四川、湖广取云贵。同年设置统治贵州的统一军事领导机构——贵州都指挥使司。三十年（公元1397年），又命楚王等率30万大军征古州（今榕江）。次年，战争结束。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成立贵州布政使司。同年，平定思南与思州战乱后，废除思南、思州宣慰司，将其地设置8府，划归贵州布政使司领管。

明初，朱元璋重点治理云南，但把贵州稳定作为云南政治巩固的必要前提。为了强化对贵州的统治，大力发展道路交通，在整修原有道路的基础上继

---

① 顾祖禹. 顾氏读史方舆纪要京省序详注［M］. 疏达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134.

续开拓一些干道和支线，形成贵州纵横交错连通大部府州的干道网。盐运则可以通过相关驿道而畅达全省。其间共进行五次大规模开拓与整治：

其一，是自洪武十五年至二十五年，将今贵州西北部纳溪经毕节、乌撒至交水（今云南沾益），叙州经结吉（今云南昭通）至乌撤，叙州经芒部（今云南镇雄）至乌撤及贵州（今贵阳）经播州（今遵义）至重庆等驿道进行整修；开拓关岭（今花江）经安隆州（今贞丰）至安笼（今安龙）及关索岭（今关岭）至普定（今安顺）两条驿道。

其二，是安抚水西，由奢香夫人主持新开置和扩宽了以贵阳为中心的纵横贵州的五条古驿道。《明史·贵州土司传》载："香遂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九《开设贵州》载："开赤水之道，通龙场之驿。"《炎徼纪文》载："奢香乃开赤水、乌撒道以通乌蒙，立龙场九驿。"三处引文佐证。

一条向东，经龙场、贵阳、龙里、平越、黄平而达偏桥（今施秉）；一条向西，从水西出，经毕节过乌撒（今威宁）而达乌蒙（今云南昭通、宣威一带）；一条向东北，经水东过草塘（今瓮安）而抵容山（今湄潭）；一条向西北，从毕节出，过永宁而达赤水。

而第五条即在水西水东，本部则置著名的"龙场九驿"。"龙场九驿"将水西水东连成一片，连通贵州腹部与川、滇、湘的大通道。

龙场驿：为水西九驿中的首驿，奢香夫人于明洪武十七年（公元 1384 年）建。现龙场驿至六广驿之间的蜈蚣坡尚存一段古驿道，长约两千米。奢香当年修建的蜈蚣桥，因明万历年间，贵州宣慰使安国亨重修，改名"龙源桥"。桥至今尚存，位于修文县洒坪乡蜈蚣桥村南。现存之蜈蚣桥即龙源桥为三孔石拱桥，长 64 米，宽 11 米，高 9 米。两侧建有石栏，栏板 20 块，透雕云雷纹；望柱 22 根，圆雕石狮子，显得古朴、大气、壮观。见图 5-2-4。

六广驿：龙场驿西行第一站是六广驿。从龙场驿出发经蜈蚣坡、小桥到六广河边，位于修文与黔西的交界处。六广河是明代水西的三大渡口之一。六广河码头，又名阳明码头，因明末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曾游历六广河大峡谷，并留下《六广晓发》赞咏诗篇"初日曈曈似晚霞，雨痕新霁渡头纱。溪深九曲云藏峡，树老千年雪作花。白鸟去边回驿路，青崖缺处有人家。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羡九华"而得名。

谷里驿：从六广驿西行过六广河，经五显台、百花箐、一碗水、五里坝而达谷里。

水西驿：从谷里驿西行经杨柳塘、打鼓寨、官庄到黔西城东南 2 里处达水



图 5-2-4　龙场驿至六广驿之重要津梁

西驿。

西溪驿：也称奢香驿。从水西驿西行经箐头、那坝（野坝）、新铺塘（清铺塘）、杨家海、松树沟到西溪。

金鸡驿：从西溪西行经大渡河桥，到大定，经干堰、簸箕箐、乌西、羊场坝、路穿岩即到金鸡驿。《方舆纪要》载："毕节驿东南三十里里，有归化驿，又东南三十里曰阁鸦驿，又五十里曰金鸡驿。"

阁鸦驿：从金鸡驿西行经九里箐、大定城（即今大方县城）、响水小阁鸦（现属大方县大寨乡）即达阁鸦驿

归化驿：从阁鸦驿过落折河、双山、老塘、沙子哨即到归化驿。

毕节驿：从归化驿西行经梨树坪，到毕节二铺，头铺即为毕节驿——"龙场九驿"的最后一个驿站。毕节驿又是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它既是龙场九驿的终点，又是川黔滇驿道所经之地，从这里北可通达四川永宁卫和永宁安抚司，西南走吉泥、黑张、瓦甸、乌撒而达云南曲靖，南走过纳雍而达"黔之腹，滇之喉"的普定军民府。

实地调研，其中从永宁府有一古道经渡般坡、普市、狗脑壳、营盘山、半边山、丰水桥至雪山关。在雪山关顶古道一分为二，一条古道下赤水河到贵州高山铺、亮岩、燕子口至毕节，共计 180 里；另一条古道经磨盘山、红砂岩、干灰朝、过小河到余家寨、普宜至瓢儿井（今贵州大方县瓢井镇），共计 480 里。这两条大道为黔民之"盐巴生命大道"。

其三，征古州开辟两条驿道。

洪武三十年（公元 1397 年），贵州东南部昔称古州蛮的林小斯以妖术惑众造乱。明廷命楚王帧为帅，湘王柏为副，以杨文充为总兵，领军 30 万，由沅州伐山开路二百余里直抵洪州、泊里、永从、诸峒寨，分兵夹攻，平叛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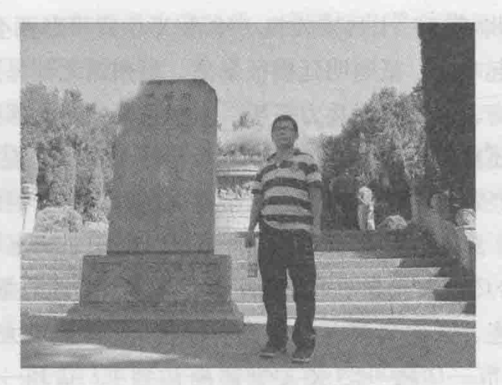


图 5-2-5　考察奢香博物馆



图 5-2-7　考察水西宣慰府

功。此次战争前后开辟靖州至古州（今榕江）、镇远至黎平两条驿道。

其四，平定播州之乱，开辟黔北驿道。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 1599 年），播州宣慰使杨铿远外孙杨应龙反叛进取四川，陷落綦江等地。次年，明廷调集川、黔、湖广、滇、陕、甘、浙明军共 20 万人，分四川綦江、南川、合江、永宁四路，贵州乌江、沙溪、兴隆三路，湖广偏桥一路，共八路协同进剿。同年六月，杨不敌，自杀，播州叛乱平息。这次战争将南川经真州（今正安）至遵义、合江经仁怀至遵义的两条大路和偏桥经余庆、湄潭至遵义的大道修复，开辟为驿道，并重建 13 处驿站（即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乌江、昌田、沙溪、仁水、湄潭、鳌溪、岑黄、白泥）。

其五，平安奢之乱，整治黔中和黔西北驿道。

明天启元年（公元 1621 年），四川永宁（今叙水）宣抚使奢崇明反叛，

云南乌撒（今贵州威宁）土目安效良，水西（今贵州黔西金沙一带）等地的彝族上层贵族群起响应，抵制明廷横征暴敛。贵州西北部驿道梗阻。明廷调集四川、贵州、云南、湘广等省兵力平叛，恢复了贵州西北部驿道及安顺至腊尔里大道的交通，还整治了贵阳经镇西卫（今清镇县卫城）至腊尔里大道。

明末贵州已经建成以贵阳为中心联络省内各府、州、卫的驿道干网：北达四川重庆、南川、彭水、泸州，东通湖广辰溪、靖州，南至广西庆远（今广西宜山）、田州（今广西田阳），西达云南交水（今云南省沾益）、罗平，西北连通四川叙州、筠连、云南乌蒙（今云南省昭道）。总驿干大道共30余条，分别是：纳溪—毕节—乌撤—交水（今云南沾益）、叙州—结古（今云南昭通）—乌撤—交水驿道、叙州—芒部—乌撤驿道、贵州—四川驿道、关岭—花江—安龙大道、贵州—云南驿道、贵阳—毕节驿道、水西—遵义驿道、安顺—大定（今大方）驿道、靖州—黎平—永从—方州驿道、黎平府—永从—古州大道、遵义—绥阳—真安州—南川大道、遵义—仁怀—合江水陆运道、遵义—媚潭—余庆—偏桥驿道、贵州—镇西卫—比喇坝大道、贵州—湖广驿道、贵州—湖广驿道、昆明—罗平—安笼—邕宁大道、思南—省溪司—铜仁—麻阳大道、彭水—务川—思南—石阡—镇远水陆通道、由白泥驿（今余庆）分岔经黄平州（今黄平旧州）黄平驿至兴隆卫兴隆站、平越—瓮安—湄潭驿道、遵义—沼潭—思南驿道、石阡—龙泉大道、思州—铜仁—乌罗大道、镇远—邛水—黎平驿道、普安—安龙驿道、普安—安龙驿道、贵州—定番州大道、水西—蔺州大道。

（三）明代驿站基本配备及耗费

《贵州通志·建置志五·驿传·明》载："龙里驿隶贵州宣慰司，驿丞员、吏一名，站夫三百三十名，马（驴）四十五匹（头），由龙里司供给一百九十二日，水东司三十七日，中曹司四十二日，百纳司四十二日，大小谷龙司共四十六日，日用白银一两六钱。铺陈十三副于宣慰司程番府出办，每三年照例徵银解贵州布政司制发。"

可见，当时明代驿站配备相应比较灵活。根据驿道路线主次差别、运量轻重及繁简程度而各相其宜。

在主要路线，各驿站设设置驿丞即站长1名，跟从办事主吏1人，运工200~500人次，马20~40匹，铺陈20~30套。在次要路线只设丞或吏1名，运工20~80人，马20匹左方，铺陈20套左右。

驿站支出经费，由各宣慰司基层土司佥点人户征差，也就是直接向民户征收。驿站每年需要四五十两白银，折合明代粮食二百数十石，沿途驿夫尽皆荡

产，驿政日趋败坏。后期贵州政局动荡，明驿站几乎空荡无人。可见，其驿政的先败加速明朝风雨飘摇之局。

（四）明朝驿道大宗运输

明代驿站体系，已可经延伸达川、湘、滇、桂，路线在深山峻谷中穿梭，人背马驮、肩舆踏步，跋涉艰难。《黔志》记载："晃州至平夷十八站，每站虽云五六十里，实百里而遥，土夫商旅纵有急，只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辰州以西轿无大小，舆者皆八人。其地步步行山中，又多蛇雾雨。"①

1. 明朝驿道皇贡情况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乌撒输毡衫1 500领。二十七年（公元1387年），贵州宣慰使奢香一次贡马23匹。嘉靖年间，贵州布政司所属司府岁贡马12匹，水银227斤，朱砂16斤，黄蜡1 570余斤。又三年一次朝勤，贡马128匹，茶芽64余斤。

2. 明朝茶、马、盐互市概况

贵州产马自古声誉很高，明廷为了从贵州补充大量马匹，除接受大量土司贡马外，还在乌撒（今成宁）增设茶马盐市。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硬性规定每岁从乌撒市马6 500匹，每匹给布300疋，茶100斤，盐亦100斤。又在广西置庆远（今广西宜山）裕民司，专以广西茶接八番（今贵州惠水、长顺一带）马匹。十年（公元1397年）七月，命户部于播州宣慰司置茶仓，贮茶换马。绥阳、仁怀的茶多贩运到四川销售。

明朝大宗水路木材置换盐运输。黔东南盛产木材，大量木材由清水江顺流筏运到湖南、由都柳江筏运到两广货变，换取盐、布和百货。明中叶以后，先后于嘉靖十年（公元1541年）、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专派大臣到川、湖、贵大力采木。史载：仅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明廷向川、湘、黔采办楠杉等木材而向老百姓征发的白银就达9 307万两，向贵州派木12 298条，银1 097 090两，较嘉靖年间增加一倍，向老百姓购买木料的价银又多被中官抽空贪污。

明朝特产换盐运输。省内各地出产的五倍子、生漆、桐油、茶籽、白蜡、黑木耳等土特产以及麝香、牛黄、天麻、杜仲、艾粉（制冰片的原料）等名贵中药材也行销国内外。部分滇铜及贵州铂汞等，也经由贵州省陆运至镇远换船运北京。输入的主要物资有粮食、盐、布匹和百货，特别是粮盐的运量很大。

---

① 王士性. 黔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5：45-46.

## 三、清朝驿道开辟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清军进军云贵，消灭残明势力，其后在平定叛乱、改土归流以及振兴农业活动中，发展了道路交通，建成以驿道为主干，县、乡道路为分支，联系府、州、县及主要乡、镇的驿道网。

### （一）战争中开辟的驿道

#### 1. 分兵进取贵州，开辟整修驿道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授洪承畴为七省经略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洪督所部与罗托等将领，沿明制重建了湖广至昆明和川黔驿道的驿站，新建遵义—水西—毕节—威宁抵昆明、邕宁（今南宁）—安隆所（今安龙）—罗平—昆明的两条驿道规取贵州。十五年（公元1658年）四月，以南明叛将孙可望为向导，统兵30众万，分三路进攻云南：多尼军出中路，取道关岭、铁索桥往昆明；吴三桂军自遵义经水西（今黔西）、七星关往昆明；卓布泰军从黔桂边境出安隆所（今安龙），经黄草坝（今兴义）、罗平州，至昆明。次年正月，三路会师昆明。

#### 2. 平乱刘鼎，开贵阳广顺大道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九月，贵州土官刘鼎叛乱，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月，丹平（今贵定西南）土育英之廉以隐匿刘鼎被讳，同金筑（今广顺一带）土官王应兆与照通，总督杨茂勋提兵进讨，鼎败逃水西被诛。此战役促进了贵阳至广顺大道的开发。乾隆二年，总督张广泗奏准设置铺递。

#### 3. 平定安坤之乱，整修黔西驿道

康熙三年（公元1554年）二月，水西宣慰司安坤反叛，清廷命总管吴三桂督云、贵各镇兵分东西两路征讨。三月，吴三桂统十万兵由毕节七星关入，生擒安坤于大定（今大方）的杓箐。转军出兵大定、乌蒙，征平响应安坤的乌撒土司安重圣。平叛过程中清军与水面叛军转战威宁、大定、黔西、织金一带，粮秣、食盐经川黔驿道转运，先远便陆广，继转运大定，为设立贵阳经清镇、平远（今织金）至大定大道的铺递打下了基础，并整修了贵州西北威宁经毕节、黔西至遵义的驿道。

### （二）中期“改土归流”及“控制西南”进程中，新开辟驿道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继明代在贵州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开始于广顺之长寨。夏季鄂尔泰令总兵石孔哈搜讨反抗者，“尽歼首从，勒缴兵器，建参将营，分扼险要，易服薙发，立保甲，稽田户”。乘势召服广顺、定番、镇宁、永宁、永丰（今贞丰）、安顺苗族千余里地域，直抵粤界。

清廷为加强对这一带苗族、布依族的统治，开辟了定番（今惠水）至罗斛（今罗甸）大道。

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清廷复命鄂尔泰、张广泗策划开展在古州（今榕江）地区实施“改土归流”，调集六省兵力自贵阳、镇远、都匀、丙妹（今从江）、黎平、思州水陆路进军，转战清平（今炉山）、清江（今剑河）、台拱（今台江）、八弓、八寨（今丹寨）、古州、丙妹等广大地区，历时八年始平息。建立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今雷山）、八寨等地方行政机构，派流官统治。为适应“改土归流”军事的需要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开辟五条大道。具体为：都匀—八寨—丹江至占州、清江至古州、台拱至施秉县同知衙门（今台江县施洞附近）、八寨—丹江—台拱至清江、古州—下江（今从江县下江）—丙妹（今从江）至怀远县石碑汛。

雍正七年（公元 1729 年），清廷批准云贵总督鄂尔泰《请另开上游新路六释疏》，将原黔滇驿道自安庄驿（今镇宁近）至湘满驿（今盘县近）间一段从镇宁州（属黄果树）改道——郎岱厅毛口渡北盘江——盘州厅蒿子卡与旧路相接。新改路线只设坡贡、郎岱、那当、舍基场、杨松、大山凹六驿。

清末改线湘黔驿道，即玉屏—青溪—镇远—偏桥（今施秉）—兴隆（今黄平）—重安江—清平（今凯里炉山）—杨老—酉阳—新添（今贵定）—龙里—达黄华驿（今贵阳市区），全程 490 里（清每里 576 米）。

清末改整滇黔驿道，即安庄—坡贡—郎岱—阿都田（今晴隆县北境）—白沙（今普安）—上寨（今盘县东北境）—刘官屯与黄华驿—威清驿—平坝驿—普利驿—以资孔驿，全程达 550 余里。

（三）农民起义沟通了县与乡，乡与乡之间的通道

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 年）正月十三日，松桃厅苗民石柳邓率万余人起义，清政府为运输军粮器仗，开辟正大营至松桃大道，并设置从思州府经铜仁至松桃驿铺。

嘉庆二年（公元 1797 年），南笼（今安龙）仲苗王囊仙（女）率众起义，云贵总督勒保率部进剿，王寡不敌众，兵败身亡，起义失败。这次战争中，清政府开通了水丰至归化的大道。

咸丰、同治年间，杨龙喜起义、红号教军起义、白号军起义、黄号军起义、上江苗军起义、下江苗军起义、仲夷起义、陶三春起义、回民起义、太平军起义等农民起义军进军路线合计约四五百条，客观上形成了黔境密植的通道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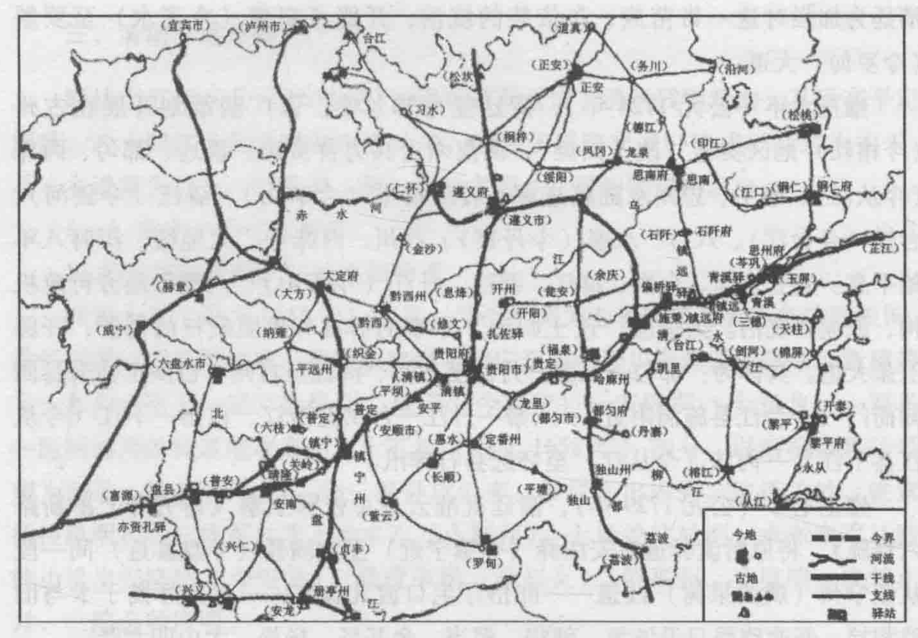



图 5-2-8　清朝贵州驿大道示意图

## 四、明清古驿道功能

驿道作为古代运送兵员、物资、辎重和信息传递的唯一通道，明清两朝均给予高度重视。

明代，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递。水马驿、递运所（或所）、急递铺并称为明代驿递三大机构。在水陆交通路线和通衢大道，按日程远近设置驿、站、铺。水马驿是驿递系统的主干，设于江河港口码头的驿站站称水驿，设于陆路，以马、骡为运力，车（轿）作运具的统称马驿，专用人力扛抬运输粮物的叫站或递运所。又设专为递送公文、通达军情的急递，因须按站（铺）换马驰行，称之急递铺。驿、站、铺的作用和任务是："宣上德，达下情，防奸宄，诛暴乱，驭边疆等项机宜，不过旬月之间遍及天下，可以立待无或后期者，实于驿传赖。"① 可见，通边情，宣政令，官吏往来及地方朝贡，运输粮食、器仗、饷银，供应一定数量的公粮，解决过往使客的饮食住宿等。驿递系统不是孤立、封闭地运行，它与明清朝社会各个领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驿递系统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盛衰存亡、战争的胜败、经济的交通运输

① 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

是否畅达。它具有显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功能。

明朝多次强调“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开一线以通云南”。“一线”非常清晰，就是从湖广向西横贯贵州的入滇驿道。中央王朝始终把滇黔驿道当做内陆边防的生命线，滇黔驿道，顾祖禹称之为入滇东道，是一条从昆明出发横贯贵州通达湖南，最近、客货流量最大的交通要道，是贵州驿道的主动脉。

驿递虽然为统治者专用于政治、军事通道，但在经济上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驿递系统输运商品，调动了省域物资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明代贵州输出的重要物资，首先是土司向皇帝的贡物，有马匹、雨毡、丹砂、水银、雄黄和黄蜡等，唯赖人背、马驮或肩舆代步，贵州驿道运输跋涉险阻重重，行旅十分艰难。

清朝在明朝驿道的基础上，进行裁减合并，脉络清晰：主驿道干线 3 条，驿站 22，里程 1 045 里；大道 36 条，铺 534，里程 9 375 里。除了以上提及的商品输入与输出外，军粮、食盐、铅铜、木材运输倍以叠加。

明清贵州盐道，均是狭义盐道，即明代川盐运黔集散地（即口岸）为永宁（今四川叙永）、綦江、涪陵三地；怀远为粤盐销黔的集散地；淮盐运黔的集散地为镇远、铜仁等。清代，川盐仁、綦、涪、永四岸，粤盐的融岸，淮盐的溯辰水、沅水、清水江盐运，抵岸到场后，再通过广义盐道，即明清阡陌纵横交织成密集蛛网似的战争时期留下的驿大道、驿小道而销散黔境。所以，贵州明清古盐道有狭义上的主要运输路线盐道，有广义上的销售网络驿道。

贵州每一条明清古盐道都内蕴了贵州深厚历史，凝练了贵州人民几千年的血泪，是“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贵州精神的真实写照。贵州明清古盐道的开辟为今天贵州的经济“外向型”振兴奠定了基础。

## 第三节　明清盐镇，史脉深重

### 一、盐镇的形成

中国《周易·系辞》已有“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 的记载。中国历史上集镇的形成和发展多与集市有关，宋代以后中国集市普遍发展，集镇也随之增多。

早在春秋，“利出一孔”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创了

① 张惠言．清代经学著作丛刊·周易虞氏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6.

中国历史上长达 2 000 多年的食盐财政之先河，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食盐税收，一直延续到公元 1931 年才结束。

伴随盐业生产商品化、规模化、专业化，在产盐之地，因为地域经济积聚的中心要素，人口大量汇聚，相关配套产业不断发展，因产盐而兴之古镇在滇、川、黔蓬勃而发。同时伴随明清盐业销售垄断化、集团化、定线化，相应产生了盐运集镇。

德国聚落地理学家 W · 克利斯泰勒认为城镇形成于一定数量的生产地中。城镇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投影，是区域的核心，城镇应建在乡村中心点，起着连接周围乡村的作用，中心地依赖于收集输送地方产品，并向周围乡村人口提供所需货物和服务而存在，克里斯泰勒通过几何的推导分析论证。假设条件有：一是在一块土壤肥力、资源分布均匀的均质平原地区，人口分布均匀，收入和对货物的需求、消费方式一致。二是交通体系统一，对同一规模城镇的交通条件相同，交通费用与距离成正比。三是生产者力求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区，消费者力求到最近处获取货物和服务。四是消费者到最近的中心地购买货物和取得服务的实际费用等于销售价格加来往交通费。克里斯泰勒认为距离最近、最便于提供货物和服务的地点，应位于圆形市场区的中心。而如果圆形市场区彼此相切，将出现得不到供应的消费者。只有当圆与圆重叠时，才能满足一切消费者的需求。按照消费者趋向于距离最近的供应点，重叠区由相邻市场平均分割的设想，将中心地圆周区转换为六边形体系。一个区域的发展必须有自己的核心，有自己延展的地域，由若干大小不同的城镇组成，供应中心地在空间上形成一种经济力，促进区域的形成与发展，每个城镇大都位于它服务区域的中央，故称“中心地”[①]。在一个区域地，中心地大小排列有一定规律，各级中心地位于六边形的中心或角上。上述是建立在四个理想化的假设条件下的经典聚落结构。对我们城镇建设体系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贵州明清乡村聚落，首先受政治、军事、经济关联性格局的影响，呈现沿驿道线状布局的态势。“州卫同城”，在卫所与治所之处汇集，譬如：全省四十三座大城镇，除贵阳外，皆为明代所建，顺然，小城镇也尽皆是卫治所之处。其次，受自然地理条件所限。贵州不是平原地域，人口集聚分布不均匀，交通线路不是规范放射状与网格状态，多数沿山谷、溪流呈现不规则带状分布，均为因地制宜式在山间坪、坝汇集镇。再次，汉族人口比较多的地域，集镇规模、数量、密度较大，且出现时间较早，集镇发达，呈现网状延展，与中

① 于洪俊，宁越敏. 城市地理概论 [M].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26.

心到边缘地等级体系构造比较明显。反之，少数民族地区，如黔东南集镇呈现点状分布，稀疏分散，民俗“高山苗，水仲家，仡佬住在岩旮旯”是其真实映照。最后，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安顺地区和黔南州在元明时期是军卫屯田的主要地区，场镇最为密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大都以十二生肖命名集镇。“全省以十二生肖命名集镇的有252个，其中鼠场九个，牛场32个，虎场或猫场20个，兔场4个，龙场36个，蛇场4个，马场39个，羊场29个，猴场8个，鸡场29个，狗场20个，猪场19个。”①

集镇内部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商业街道居于核心的地位，集镇的平面形态则受当地环境以及与相邻村镇联络的道路格局的影响，或作带状伸展，或作块状集聚，并随本身的成长而逐步扩展。

## 二、明清盐运古镇分类

根据生产盐与运销盐脉络溯源有：川盐产盐系列古镇、粤盐产盐系列古镇、淮盐产盐系列古镇。

按照空间尺度分类有：仁、綦、永、涪岸沿线系列古镇、粤盐融岸系列古镇、滇盐陆路沿滇黔驿道南北线系列古镇、溯沅水、辰水、清水江系列古镇及陆路沿驿道古镇系列。以上只是入黔的集散地古镇，同时还有道、府（州）、县分销食盐而集聚形成的古镇。

按照时间尺度划分有历史发展演绎盐镇，元代、明代、清代盐镇等系列。

按照形成原因分有：行政迁徙中心形成盐镇、地域商业集聚形成盐镇、地质灾害崩裂塌断形成陷阻盐镇等。

我们只能按照其历史保存度和在产销盐节点的关键度有选择地进行初步梳理，到达厘清盐道脉络，整合盐道网络的功能。

## 三、明清盐运节点——古镇概况

### （一）川境产盐主要销黔古镇

#### 1. 自贡盐产溯源及相关盐镇概貌

自贡位于“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南部，界于东经104°2′~105°16′，北纬28°55′~29°38′之间的中浅丘陵地带，海拔240~900米，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地貌属低山丘陵河谷类型。

---

① 侯绍庄. 十二生肖场镇名称探源及其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四川境内为贵州配盐的区域主要有自贡市的富荣和乐山市的犍为两盐场。

自贡产盐发端于东汉章帝时期（公元 76—88 年），宋代学者王象之著《舆地纪胜》中载："梅泽，本夷人，晋太康元年因猎，见石上有泉，饮之而咸，逐凿石三百尺，盐泉涌出，煎之成盐，居人赖焉。梅死，官立为祠。"①

最初采用起源于战国末年蜀守李冰凿广都盐井的钻井采卤制盐，在富顺县城开凿了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世盐井"，王象之描述"以其出盐最多，商旅辐辏，百姓得其富饶，故名"。

南北朝时期，自贡人开凿了位于贡井天池寺山下河街东岳庙菩萨位下另一口与富世盐井齐名的盐井——大公井，后更名"贡井"，设置公井镇。汉代采用"采卤烧盐"。

"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以富世盐井为名成立了四川省内第一个因盐而设置的县名曰"富世县"。富世盐井的旧址在今天的自贡市富顺县内，历史沧桑，岁月无痕，荒废多年。

隋唐时期，东部以富义盐井（富世盐井，因避太宗讳，故更名）为中心，西部产区以大公井为中心（升镇为公井县），同时，旭水河畔旭川盐井发掘，命名为旭川县。

在富义县的邓井镇，唐末宋初就已有邓姓商人在这里兴办盐业，宋代已经设置邓井监。

北宋时期，川人创新发明了"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开凿出"卓筒井"。并且成功开凿了旭川盐井和邓井。"地多咸鹾，故饶沃衍润，过于他郡。掘地及泉，咸源遂涌，熬波出素，邦赋弥崇。人以是聚，国以是富"② 是其时代产盐辉煌时期的景象之一。

明代，富世盐井的产量占全川产量的五分之一，蹿升到全川首位。伴随富世盐井、邓井盐量的递减，又勘察发掘以"自流井"为中心的一批新的 380 多眼盐井，同时并开天然气井，是第一个进行工业性开采的气水田，此时掌握了火井制盐工艺。明天启年间（公元 1626 年），自流井一带已经是井灶密布，天车鳞次攀升。

四川井盐生产者被称为灶户、井户、灶丁、灶夫，凿井、采卤、制盐工序专业化、程序化，已经进入规模化、集群化、工业化生产时代。

清雍正时期，疏通了釜溪河，开通了进沱江、入长江的运盐航道。到乾隆

① 李勇先. 舆地纪胜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1998：349.

② 清丁宝桢等纂修. 四川盐法志四十卷.

中叶（公元1835年）使用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凿出了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井（1 001.42米）——燊海井。咸丰时期，长江由于军情紧急断航，清廷迫于无奈，“川盐济楚”，市场的开辟与钻井技术、制盐技术的提升，推动了整个自贡产盐的发展，开凿了磨子井、海顺井、德成井、双福井等高产井。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四川总督崇实上奏“四川盐井近来获利数倍，富顺尤为最旺”。其后成为富顺县和荣县的分县，专司盐务，又先后称为富厂、富荣东厂、荣厂、富荣西厂，自流井、贡井合称富荣厂。盐业的亢发带动相关产业并发，当时直接和间接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数就已达三四十万人，市景“商店和井灶错处，连乡带市，延袤四十里有奇”，一跃成为以生产食盐为主的手工业城市和我国名副其实的“盐都”，被誉为“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清王朝败亡，富荣盐场独立，成立地方议事会，“地方称自贡，厂盐称富荣”。两厂辖域做了划分调整，以土地坡为界，自流井称“富荣东场”，贡井称“富荣西场”，并分别成立东、西两场署，管理盐场事务。自贡盐场盐产量占全川盐产量的60%，全国所需盐的20%。行销四川本省区域20余个州、县及湘、鄂、滇、黔四省100余州县，整体盐税占川三分之二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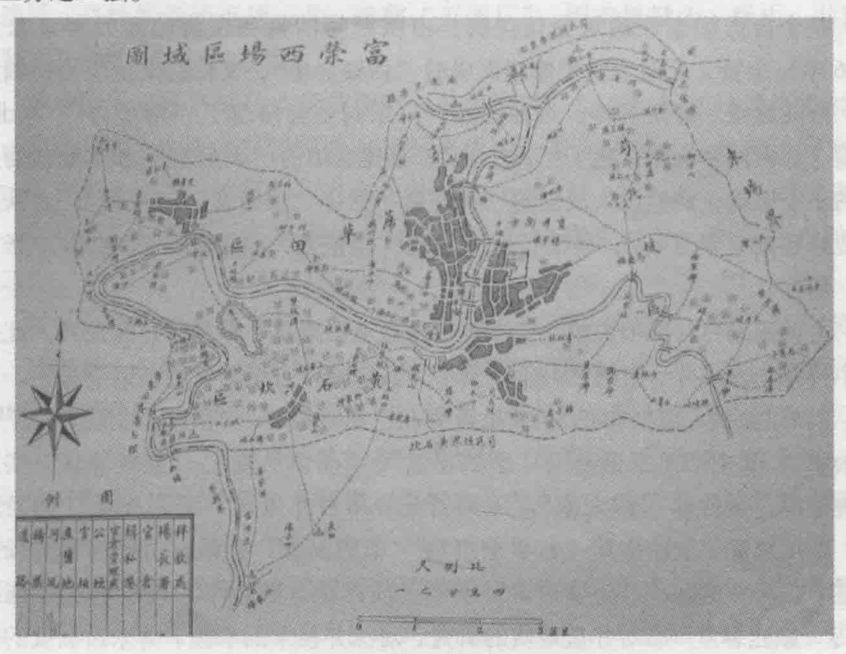



图5-3-1　清末富荣西厂盐区、盐井布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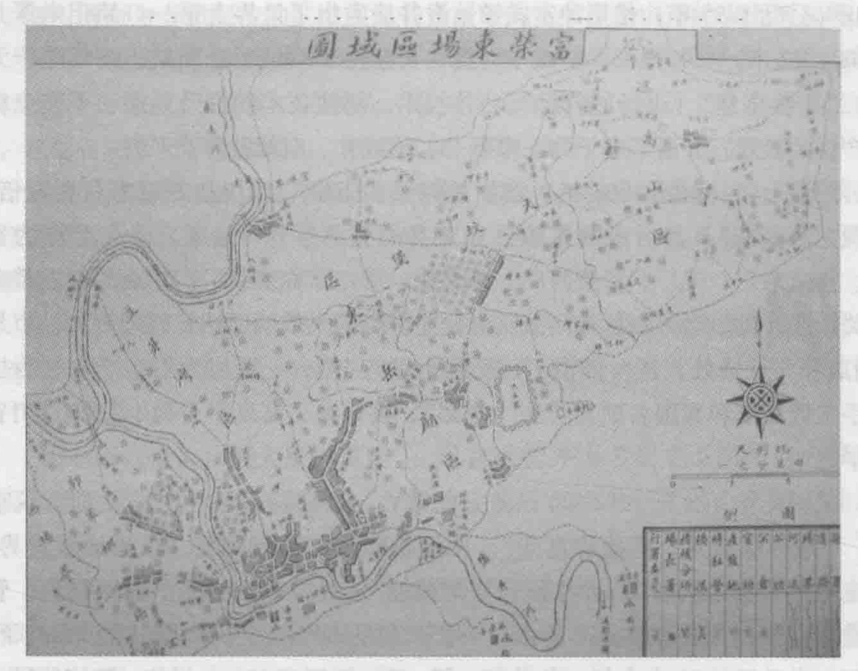



图 5-3-2　清末富荣东厂盐区、盐井布局图

整个自贡标志性建筑会馆类有：由陕西籍的盐商在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集资，历时十六年修建而成的“西秦会馆”，文化特征呈现为中轴对称、殿阁巍峨、雕梁画栋、雄伟瑰丽；广东同乡会修建了“南华宫”；湖北、湖南、江西同乡会则修建了“禹王宫”；福建会馆的“天后宫”和本地盐商兴建的王爷庙等；烧盐工人成立的“火神会”后称“炎帝会”、“炎帝宫”；铁匠行业修建的“老君庙”；屠沽行业兴建的“桓侯宫”，供奉张飞，也称“张飞庙”等。

古镇系列有：仙市古镇、三多寨、古盐道汇柴口、邓井关、古盐井。此外有小桥井、吉成井、自流古井等。其中尤其以仙市古镇为代表，以下详述。

“城以盐兴，商以利旺”，大批盐商在也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其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四大家”。王朗云是经历百年沧桑“王三畏堂”的发家人，四川总督丁宝桢称其“富甲全川”；“李四友堂”包络自贡盐场贡井以外的整个自流井地区；“胡慎怡堂”研修优质巴盐，黔边岸人民便吃上“拖拖盐”；“颜桂馨堂”靠对井盐地质的研究、对深井技术的掌握、对采卤制盐的探索，最先开发了本地区地层深处的卤气资源，短短数年间就富比千户候。



图 5-3-3 陕盐商所建自贡西秦会馆

2. 四川犍乐盐厂溯源

犍乐盐业历史源远流长，《水经注》《华阳国志》《蜀志》《嘉定府志》《四川盐政史》均有详细记载。秦时，南安（今犍为、乐山、井研、仁寿）、雒县（今广汉）开始凿井制盐。雒县之盐井于宋代（公元 960 年前后）先后停办，唯有南安之盐业由于资源条件优越，在历史的进程中得以保持下来。唐、宋时在五村、马踏井一带凿井筑灶、熬卤煮盐得到逐步开发。

元代时称永通厂，明朝继之。至清乾隆中叶（公元 1756—1786 年）于五通建桥，井灶繁荣于五通一片，遂称“五通厂”，因隶属犍为、乐山、井研、仁寿，又称犍乐、犍仁、犍井。

犍乐上下游盛产烟煤，运济便利，井卤渐旺，加之金银坎地段裕源井区域，相继开凿十余眼大口径深井，发掘出黑卤，量丰咸重，盐产盛于富荣盐厂，故有“金键为、银富顺”之称。道光年间（1821—1850 年），富荣发现瓦斯、岩盐，成本降低，产量猛增，犍乐两厂降居富荣之后，在川盐中位居第二。

犍乐盐场所辖范围分为七区：第一区辖瓦窑沱、青龙咀；第二区辖黄角井、杨柳弯、四望关；第三区辖柑子桥、羞草滩；第四区辖金山寺；第五区辖灰山井、顺河街、金银坎；第六区辖红豆坡、先家沟；第七区辖金石井、三江镇、王村、马踏井、瓦滓滩。乐场有：牛华镇、冠英场、安谷场、太平寺、蔡金场、河咡坎。井仁场有：井研城、门坎山、大水湾、乌抛弯、仁寿城、杨泗井、中坝井等。

标志性建筑有各地盐商的神祠会馆。江西人兴建万寿宫，湖北人筑建禹王宫，广东人修建南华宫，山西人扩建武圣宫或文武宫，不同地域的人屡屡建筑了陕西馆、湖广馆、贵州馆、福建宫等。两河口老桥附近竹子街，修起了江、

浙一带富商信仰的天眼通、天耳通、地心通、神足通、宿命通——“五通神”庙。本地盐商兴建了龙王庙、宴宫祠和大佛寺、金沙寺、白塔寺、观音阁、天上宫、九皇宫、川主庙、火神庙等系列寺庙。

古镇繁华景象主要集中在五通桥附近，由五通桥向西延展到牛华溪一带。故清朝嘉庆五年程尚濂作《五通桥观煎盐》诗云“井眼就在桥之西，新井乃达牛华溪”①。杜任之赠西棠司马大人诗《题五通桥盐场》语“波撼长堤万灶烟，轻舟双桨水中天。人居四望云湘外，桥隐五通山寺前。架影高低筒络绎，车声辂辘井相连。江头日暮乡心远，景仰峨眉月正圆”。

3. 自贡井出川咽喉——仙市古镇

（1）镇地理区位

1 400 多年历史的仙市古镇聚落位于仙市镇西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 104°51′~104°53′E，北纬 29°19′~29°20′N。西距自贡市区 11 千米，北至何市镇 11 千米，南距瓦市镇 10 千米、富顺县城 27 千米。

仙市古镇聚落整体布局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釜溪河绕前，后背靠玛瑙山及官山、黄金山合围区域。古镇聚落保护面积共计占地约 0. 176 平方千米。

（2）镇因盐而兴

釜溪河上源威远河（清溪河）发源于威远县两母山，流经四川省威远县、自贡市，于富顺县釜溪口汇入沱江，是明清时贡井盐离岸出川的黄金水道，仙市自然就成为黄金水道的咽喉，是自贡古盐道水路、陆路盐运枢纽，是因盐运而生的典型古镇聚落。

自贡自流井、贡井盐产区发展到清代雍正年（公元 1723—1735 年），川盐入黔四大边岸配盐大部分也由此发销。

陆路形成以自流井为中心，向四周地区放射的盐运道路，一条经过仙市连接自流井与富顺，并延伸到荣昌、隆昌等地的盐道，古称“东大道下川路”，挑盐的盐担子们由自贡盐区行至仙市玛瑙山停脚歇息。

水路航运中，盐井河（现釜溪河）流经仙市，常年回旋淤塞形成“仙滩七里”岩石滩涂。当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枯水季节，滩长水浅，盐船无法通行，必须在此“盘滩转坳”，夏季丰水期，雨量充沛，山洪骤发，船只易翻，挑夫、盐船在此候渡、候滩、停泊起载。

仙市凭借水路、陆路交通地交汇而形成因盐而兴古镇聚落。尤其伴随“川盐济楚”，明清仙市古盐道上呈现出了水路“千帆竞发”，陆路“牛车、马帮、

① 林本梁. 盐都自贡［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256.

挑夫盈途”，街道昼商贾彼邻、盐担蔽街、夜灯火通明、游人如织的壮观景象。

（3）错落的建筑群

仙市古镇布局呈现“依山傍水、仙人变阵”，“五庙一祠、正字布局、前市后宅”的古局规划。巧妙地把盐业文化、盐运文化、川蜀传统文化的文脉凝练于仙市古镇聚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血脉中。

仙市聚落选址地点介于平均海拔 276 米至 286 米的低丘区域，整体地表起伏北高南低，置前为海拔 270.3 米的釜溪河面，左右均衡坐落海拔 299.8 米的玛瑙山和海拔 305.6 米的官山，后部背落 331.4 米帽壳山。街镇泄水分流系统井然有序，局部山地气候形成良性水热循环系统。

古镇聚落主体建筑均选择性地修筑在坡度值小于 10°的较为平坦的缓地，成功规避建筑成本攀高和山区泥石流崩塌危害。聚落建筑集中在山坡的东、南、西三侧。建筑朝向选择向阳，以朝南或西南、东南方向为主，确保日照时数和太阳光照辐射强度。

上游“官帽石”盘梗河心，在釜溪河丰水期能起到阻水分流的妙用，顺河水引向对岸相对平缓的河沿，釜溪河滩涂河沿巧居仙市，靠釜溪河沿一带多硬岩峭壁。仙市新河街离水面有近 4 米高度，既有取水之便，又无水患之忧。下雨时，雨水便捷沿两侧玛瑙山和官山呈人字形径流，汇聚在玛瑙山西麓人工挖掘堰塘，既提供储水保障，又保持水土流失。使聚落整体形成前绕碧溪环流，后靠青山筑台的悠雅境致。

依堪舆而述，釜溪河岸沿线有“二十四个望娘滩”，滩滩淤积滩涂地域，可均未形成古镇聚落。仙市古镇所处堪场应属之釜溪河的“反弓水”，离“金带环抱”地场相去甚远，可有“官帽石”点立上游，风水反弓加点破解，迎势演变为正弓，绝然成就为一处“前有浩荡弯抱之水，后有高低层叠山形为屏障，左右有砂山相携”风水宝地也。

古镇街道整体平面顺应自然地形、地貌，沿河道和山脉呈弧线形分布，线条十分流畅，体现了尊崇古人“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横跨官山和玛瑙山的山麓分别建有湖广庙和川主庙，寻求均衡风水，山腰别致建有江西庙，玛瑙山沿右直上布局南华宫、天上宫。街市聚落整体形态呈扇形展开迂回串连五庙。街道由正街、半边街、河街子和羊肉巷、新河街等共计四街一巷组成，沿河依山呈线状延伸走势，构建“正”字形布局框架，举凡“三庙两宫”，皆山墙笔挺，飞檐斗拱，气势壮观。

古镇聚落因为是以盐运而形成的物流商贸重镇，因而安全筑镇置之首位：古镇街道设计为“正”字形交错分割布局，避免道路形成循环往复，将古镇

分割为四个相对独立单元。道路设计为“T”形和“Y”形交叉封锁，古镇左右分列新河街、正街，两端分别设立栅门共四座封闭点。连接新河街、正街的半边街上有南华宫、天上宫横跨街道雄峙，将半边街再截为三段，两侧疏楼下的门洞与左右街道打通相连，构成“串”字形状，形成“串庙长龙通南北，闭关锁闸各成囚”的“仙人变阵”安防体系。街道兼具“街、市合一”，沿街建筑为“前店后宅”的传统商用功能格局。

川盐运码头第一站仙市古镇的“四街、四栈、五庙三码头、一鲤三牌坊、九碑、十土地”格局历史垂悠，2007 年 5 月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选为中国第三批历史文化名镇。




图 5-3-4　仙市古镇

4. 中国的诺亚方舟——犍为罗城古镇

罗城古镇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东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 104°01′~104°24′，北纬 29°22′~20°23′。罗城古镇地处铁山北麓，铁山呈东西走向横贯于古镇中部，全镇地势也以铁山为分水岭向南北倾斜，属于浅丘地带，海拔在 460~700 米之间，相对高度一般为 40~100 米。罗城古镇辖区面积 95 平方千米。

古镇坐落在一个椭圆形的山岳顶上，主街为船形结构，属川南民居传统的穿斗木构架形式，全长 209 米，坐东向西，南北宽约 10 米。鸟瞰古镇，街面是船底，两边的建筑是船舷，中间的戏楼是船舱，东端的“灵官庙”是船尾，所以被称为“山顶一只船”。另外其形状两头尖，中间宽，像一把织布的梭子，又称之为“云中一把梭”。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罗城“船形街”图形被四川省西南建筑设计院在“广贸会”隆重展出，投标中，被澳大利亚参会方青睐选中，在洛克斯市建设了以罗城“船形街”为模本的“中国城”。“船形街”盐运古镇——罗城名扬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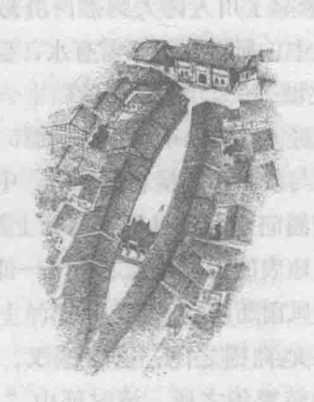


图 5-3-5　俯视船型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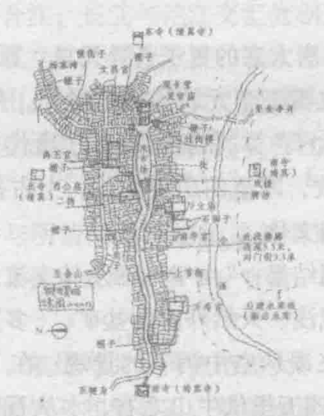


图 5-3-6　罗城平面结构示意图

罗城周边绝地无河流，离此几十里外的五通桥金山镇仅有一条河擦边而逝，自古以来成为独立于方圆几百里“旱码头”。岁岁干旱成就了老百姓口中“罗城旱码头，滴水贵如油”的谚语。罗城独具两大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黑煤、白盐，数百里粗大如桶的赤铁管道绵延纵穿罗城正街道，由此把盐矿的盐水运送到五通桥镇，镇内盐水处理厂加工制成固态井盐销往各地。络绎不绝的盐商、马帮齐聚，钱庄、酒肆等广而设之，商贸活动活跃，因此几百年来，虽然缺水，但它不仅没有衰落消失，反而昌盛兴旺成为岷江北岸重要的商贸中心。

罗城船型椭圆街西侧戏楼背面三开四柱三重檐镂雕牌坊的石柱上，楹联言“落众志以成城城依铁峰枕卧秀跨八百里巫云长驱五海，灵古今而作官纳优孟集高腔通四千年韶乐胞与万方”，“人怀有铁岭松风何需南海，到处是阳春白

雪显属灵官”。可见罗城彰显了川人博大胸襟，川蜀盐文化的深瀚广博，水早已经在罗城的盐业江湖之中，所以罗城无需有水，也能成城。

5. 有盐在先的上古之城——彭水郁山古镇

郁山镇地理坐标为东经 108°24′~108°26′，北纬 29°30′~29°31′。严家山坐落北面，南依凤凰山，东与伏牛山相接，后江河、中井河、后灶河三江交汇形成郁江，随之一路连绵涛涌向东汇入乌江，此处上溯 5000 年，当地濮人发现了当时西南地区两处流出地表的天然盐泉之一——郁山伏牛山盐泉，遂取水提盐，开启了郁山五千年的风雨历程。

此处挟“控楚连黔，地拥围之闲；抚苗绥汉，江翻溪洞之涛”之地势，虽深处腹地，依为商业中转繁华之所，清时郁山“舟楫往来，商贾辐辏，百货云集，盐、茶、油、漆诸物转运各地，而楚、黔、闽、粤、江右等省，俱通商贩焉”。

大唐四位“太子”（唐太宗的舅子长孙无忌、原高宗太子梁王李忠、唐太宗十四子李明、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均流放黔州，郁山一直为黔州府所在之地，因此民间传四位“太子”）和两位重臣（唐代史官柳芳、宋代大诗人兼书法家黄庭坚）至此流放，厚重的历史文化、上古盐丹文化与独特的地域文化叠加而生——郁山古镇文化。

李小波先生研究得到结果：“由于乌江及其支流的强烈下切，郁山后灶河与中井河一带形成了埋藏浅、天然外露的盐矿。”多数盐泉从这两条小河沿岸崖壁缝隙中溢出，形成飞瀑从空中泻下的景观。在《清同治·彭水县志》中有记载：“飞井在郁镇北四五里伏牛山之右，水从石壁中飞出，下以船盛之。”这就是“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的飞水井盐泉。

早在唐代郁山被列为全国“十监”盐场之一，乾隆二十六年，产盐 11 060 000斤，曾有“万灶盐烟，郁江不夜天”的胜景。

至今，尚存三条老街、童家祠堂、苏家院子等古建筑。

（二）涪岸入黔港口古镇

涪岸盐道：由自贡张家沱出发，经釜溪河仙市入沱江，然后到泸州、重庆，在涪陵转口岸，入乌江，经乌江再入贵州境内。

1. 盐运码头

“码头”的称谓至迟在明代出现，见于《醒世恒言》第三十六卷中“却说朱源舟至扬州，那接取大夫人的还未曾到，只得停泊码头等候”一句，其意原本指船只停泊处。《现代汉语》对码头的释意有二：一是江河沿岸及港湾内，供停船时装卸货物和乘客上下的建筑；二指交通便利的工商业城市。正是

川江巨大的盐业物流在交通便利的水岸催生了盐业码头。

川江水网发达且流域宽广，它不仅提供了大江上下、南北交通的方便，而且水运费用的低廉给古往今来的盐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明清时代，一般涉盐等大宗货物运输，靠河、靠海，时间不求紧急时境，尽量走水路，这是商家的定则。杜甫诗《夔州歌》云："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船快如风。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① 对历史上川江行盐繁华景象中的行船、船工和商贾作了形象描述。

巴蜀古镇几千年的历史的演绎，正是通过川江上的干流和支流源远不绝地进行人流、物流、信息流、文化流交汇与传递，在每一个节点上，形成大大小小的码头。

码头一般设在两江交汇之处。四川境内，金沙江与岷江交汇处形成宜宾；长江与赤水河交汇处崛起合江；长江与沱江交汇处创造泸州；长江与綦江交汇处缔造江津；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缔生重庆；长江与乌江交汇处苏生涪陵；长江与大宁河交汇处更生巫山；长江与香溪交汇处催生秭归。在川江的支流中则嘉陵江与涪江、渠江交汇处成就合川；乌江与芙蓉江交汇处成长武隆；乌江与郁江交汇处铸就武隆。

有的码头则设在水路与明清陆路驿道衔接的要塞上，如川江干流上的长寿、丰都、忠县、西沱、万县、云阳、奉节、官渡、巴东等。位于支流的此类古镇码头川蜀不居多。

川江河段，暗礁密布、航道弯曲、河流落差大、水流湍急、流量年际年内变化大。但河道边滩多坚硬岩石和鹅卵石，能就地取材，筑就码头。川江在渝宜之间，要流经以三峡为首的大大小小诸多峡谷和一百余处明暗礁石与险滩，为了卸货"拉纤过险"、"盘滩转坳"，自然就在湍急险滩处形成了为助航而形成的码头。如酉阳县乌江边上的龙潭与龚滩，龚滩乃乌江盐运水路之关隘。

让我们再次审视乌江航道：乌江（古名延水、涪陵水，元代以后更名乌江），源出贵州西部威宁县境乌蒙山东麓，有南、北二源，南源三岔河长 361 千米，平均比降 3.77‰，北源六冲河长 270 千米，平均比降 3.08‰地。两源于黔西县境化屋乡汇合后形成乌江。乌江流域跨贵州毕节、六盘水、安顺、遵义、贵阳市、黔南、铜仁等地州市的 38 个县境，干流流经六广、乌江渡、文家店、思南、潮砥、淇滩、沿河、思渠等县区所在地，至龚滩入四川省境，由涪陵注入长江。南宋以来，历为黔川盐运要道。明清朝主要港埠为龚滩、思

① 山东大学中文古典文学教研室. 杜甫诗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69.

南、石阡。思南，位于乌江通航河段的上端，深入贵州东北部地区，向南水陆兼程可往石阡、思州、镇远，往来陆路经凤岗可达遵义等地，腹地深广。石阡，位于乌江支流，石阡河向内延伸 5.7 千米处，为河谷坝地，时人谓“四面丛阻山中，一壤有轩朗之景”，田土肥沃。原以塘头为码头（距石阡河口 18 里），市场繁荣。明代后期，在知府郭厚宾的倡议下，疏通了塘头以上河道，石阡遂成为水陆码头。

2. 货龙潭，钱龚滩

(1) 龙潭盐镇寻古

龙潭古镇位于重庆市酉阳县城东南部，地处武陵山区腹地，距酉阳县城 38 千米，秀山县城 43 千米，古镇居龙潭河畔，地理位置在东经 107°57′~107°59′，北纬 28°44′~28°45′，东控笔架山，西制乌家坡，两道天然屏障之间宽约 1 千米，地势北高南低，龙潭河穿过镇区将集镇截为东西两部分。

龙潭原址梅树（又名“泥书”。于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时开辟，因此有“梅树龙潭”之称），乾隆时期因原址遭火焚，镇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迁往龙潭畔，废梅树为龙潭，现位于酉东龙麻坝子的中心。素有“东有白岩挂榜，西有龙洞堡山，北有青龙腌滩，南有猫儿镇潭”[①] 之说，清晰地向人们展示了龙潭古镇典型而独特的山水格局。古镇上两个氽水潭，形似龙眼，再加上一口大潭故名曰“龙潭”。

龙潭水路交通方便，是物资集散地，有小南京之称。凭借龙潭河、酉水河的便利，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集镇，酉阳及附近地区的桐、茶、漆、倍、棬、辰砂、兽皮、药材、等山货特产由龙潭河出洞庭沿长江一线外销，同时从川内、两广、赣、湘等地进口食盐、棉花、布匹、瓷器等日用品，转运酉阳、黔江、贵州等地内销。故与龚滩古镇并称为“货龙潭、钱龚滩”。从乾隆年间先后建成大小码头九个，而龙潭港，是酉阳明清以来东部航运吞吐量较大的重要码头，是历来川黔湘货物交流的集中点。民国三十年，除桐油、生漆大商号外，计有盐号十家、油盐杂货号八家、金号银楼九家、绸布号八家，有湘、鄂、黔、皖、赣、渝外地商家住户近 1 924 户，尤其以江西人为最。镇上有江西会馆——万寿宫，南昌义地；两湖会馆——禹王宫，两湖义地；福建——天后宫，闽中义地；衣帮——轩辕宫；船帮——水神祠；五匠——巧圣宫。诸如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复兴等各大银行一并设置于镇，大业盐业、久大盐业在龙潭挂牌，创造了龙潭古镇商业曾经辉煌。

---

① 曾汉轩. 酉阳县志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178.

古镇建筑宏观上因山势就水形，并不强调平面形态的规整，而是巧妙朴实地因借四周山景、水景作为古镇内部街巷空间的对景。这样既减缓了空间的封闭压抑感，又丰富了古镇的景观系统，同时营造了惬意的山水城市氛围及浓郁的田园情趣意境。古镇的道路网顺应古镇结构形态，呈鱼刺状，主次分明，衔接自然。古镇建筑主题为“宫齐龙头八卦井，角跨凤尾九桥溪”，镇内万寿宫、龙头桥、九桥溪、和八卦（角）井等景观无不彰显古镇独有的2200年悠长的历史风貌和积淀深厚的人文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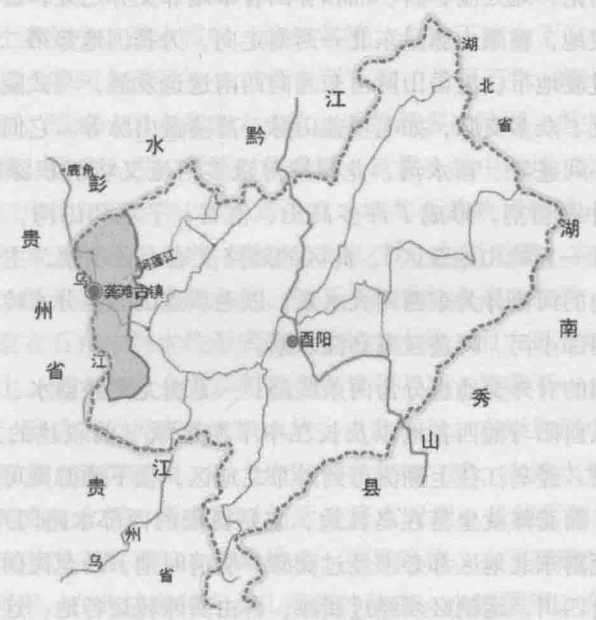



图 5-3-7　龚滩古镇的区位

（2）寻盐龚滩古镇

龚滩历经1 700多年的风雨沧桑。《寰宇记》载“涪陵郡汉复县，属巴郡，蜀立郡于此”。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按云“汉复县，三国蜀汉置，属涪陵郡，治所在今酉阳县西龚滩镇。西晋未废。”可见，三国刘备及晋国在此设置汉复县。

胡三省《通鉴音注》按云“唐之洪杜县，即今酉阳县之龚滩”，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移理龚湍，即今酉阳西北龚滩镇。宋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废洪杜县为洪杜寨。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设曾潭巡检司，辖龚滩。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酉阳改直隶州，在龚滩设巡检司。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龚滩巡检为分州知事。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龚滩分

州为龚滩县佑。民国十九年（公元1931年）改为商团合一的团总制。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废团总制为联保制，龚滩设联保办事处，属第四区（小河）辖。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酉阳县第四区政府迁龚滩镇，直到解放。

龚滩地理坐标为：东经108°20′~108°22′，北纬28°53′~28°54′，东距酉阳县城79千米，隶属于渝东南酉阳县，地处重庆市酉阳县、彭水县和贵州省沿河县契合部，坐落于阿蓬江和乌江的汇合之处。

以酉阳县而论，地处渝、黔、湘和鄂四省市毗邻交界之处，自然地理位置属于武陵山脉腹地，整条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为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倾斜过渡地带，巫山山脉由东北向西南逶迤发展，与武陵山和大娄山在此交会，形成了众多支脉，如毛坝盖山脉、菖蒲盖山脉等。它们之间穿插交错，同时乌江、阿蓬江、酉水河、龙潭河等众多河流又将沉积深厚的“喀斯特”岩溶地表冲刷切割，形成了许多高山、槽谷、平坝和山湾，自然地理称之为“鄂黔溶桂—丘峰山地亚区”。此区的陆路交通十分不便，主要以水路为主。酉阳县境内的河流分为东西两大水系，以毛坝盖山脉为分水岭，东部酉水属沅江水系，西部小河、阿蓬江属乌江水系。

因此，酉阳的对外交通也分为两条线路：一是由龙潭经酉水、沅江、洞庭湖至长江，联系酉阳与湘西各地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域（前叙述的龙潭古镇）；二是由龚滩出发，经乌江往上溯流可到黔东北地区，往下顺游则可到涪陵、重庆、两湖等地。而龚滩就坐落在乌江边，它是酉阳的西部水路门户，从重庆、涪陵到酉阳以至黔东北地区都必须经过龚滩。明清时期，乃至民国，当地输入的食盐主要来自四川，运销必须经过龚滩，再由龚滩转运各地，这样龚滩就成为了当地主要的食盐集散地。运到龚滩的食盐有自贡的灰盐、五通桥的老盐和富顺的白盐三种，均由水路运输。运输时间为每年的九月至第二年的三月。运输路线为自贡（五通桥或富顺）—泸州—重庆—涪陵—龚滩，全程细分为两段，盐商从产地把散装食盐运往涪陵，再在涪陵装包后运往龚滩。在龚滩，资金雄厚的盐商都修有盐库，用来囤积、储存和转运食盐。运往龚滩的食盐除了分销酉阳各地之外，还转销湘西、黔东北各地，其销售路线主要有三条：其一，龚滩—酉阳—龙潭—石堤—湖南里耶—湘西凤凰；其二，龚滩—丁市—小河—秀山—湖南宝庆或折向贵州松桃、铜仁；其三，龚滩—贵州沿河、思南、印江。

民国时期，日寇侵华，政府迁都重庆，“川盐济湘”、“湘粮调川”，乌江龚滩航运也是维系国民政府残局的重要生理盐水线。可见龚滩区位因素导致食

盐的销路之广以及在当地盐运经济的举足轻重地位。

龚滩镇，此处龚姓人居多，因乌江飞流龚急而得名龚湍。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龚湍所依的凤凰山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滑坡，大量岩石崩塌落入乌江之中，江中堆积的乱石达数万方之多，从而堵塞了航道，形成了断航滩。

乌江三大险滩“雄、奇、险、峻”，“落差巨大，水流陡急”，田秋奋笔挥毫“黔中砥柱”的潮砥，因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八月西岸岩崩塞江形成的新滩和此处龚滩。龚滩《酉阳县志》记载其险为“大江之中，横列巨石，大者如宅，小者如牛，激水雷鸣，惊涛雪喷，舟楫不能上下”。滩中大量乱石堆砌，其中兀立着两大孤石——“蓑衣石”和“椅子石”，高出枯水水面六米多，阻断水面，形成一米多高的大水坎，后虽经多次治理，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龚滩的险情。当地人说，明清时代龚滩人就靠吃滩中两坨“岩包子”生活。

即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龚滩有一堆乱石截断了航道，大约有数百余方，滩长269米，落差4.1米，流速7.3米/秒；左岸峭壁，右岸坡缓约45度~50度之间，滩头进口处大跌水坎，往下140米处水流向左跨，中部有大孤石两个，其中蓑衣石在中洪水位形成高1米的大水坎，而大孤石两个，高出枯水面六公尺以上，每个600余方。附近蛮石堆积甚高，重叠不一。右岸脚有鸡冠石阻碍水流，形成三公尺高的大跌水坎，由此下行，右岸和河中又有大量蛮石堆积，坡陡流急，波涛汹涌。在大堆以下有左右二漕，右漕水势漕直，但工程量大。左漕湾曲、水深，因查勘时间适逢涨水时期，只能了解滩险大概形势，对于枯水河底状况了解不够。龚滩枯水，更显险状，水下暗礁星罗棋布，将近300米宽的河床，在此结束只有十几米宽的航道，水流翻滚，在乱石中穿擅湍流之声，数里可闻。”

险滩的阻梗给航运带来了巨大困扰，乌江航道来往装载重货的船只不能直接通过，必须在此装卸换载。即使这样也充满了危险，上溯的船只必须由四五十个纤夫将船一艘一艘地逐次拉纤过险滩，向下顺流的船只也需船主协同船夫小心翼翼地放船试行，否则，稍不小心就会船毁人亡。民谣“上下船只卸载过，运输换船货堆山”就是当时真实写照。

乌江被龚滩截为上下两段，过往的船只均以此为止点，上水来自涪陵、重庆的货物、食盐以及下水来自酉阳、黔东北的农林产品、山货必须在此经人力盘驳过滩，另行装载，有的甚至只有换船才能继续航程。而这对龚滩镇和龚滩人来说，却是一次巨大的发展机会。船只不能直接通过，船主必然需要住宿和饮食，货物必然需要仓库存放和“背老二”的搬运，这样就极大地刺激了龚

滩镇的发展。古镇就沿着险滩逐渐发展起来，码头、仓库、住宅也逐渐建立起来。逐渐龚滩就成为了乌江上必经的航运中转站，崛起成为了川、湘、黔三省边区商业贸易和货物集散的中心。

从清中叶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二百余年的时期，是龚滩经济鼎盛时期。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的“改土归流”，使汉人进入了酉阳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促使龚滩的商贸市场也逐渐发展完善。渝东南地区的木材、桐油、生漆和药材等土特产需要从龚滩运往涪陵、重庆以及长江沿岸城市，同时重庆、涪陵、自贡等地的粮食、布匹和食盐等也必须经过龚滩运入并销往酉阳、黔江乃至贵州的沿河、思南等地。无限的商机吸引了重庆、涪陵、自贡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商人，他们纷聚于此，设店经营，龚滩由此民风日盛，逐渐走向繁荣。1885年汉口开埠之后，外国商人在汉口设立炼油厂，大肆收购桐油，加工后销往国外，极大地促进了渝东南地区的桐油生产、加工和销售，龚滩从中也受益匪浅。抗日战争时期，长江航运受阻，大量的货物转由涪陵——龚滩——酉阳——龙潭运往湖南、湖北等地，满足战争的需要。民国时期，龚滩已拥有一百多家各类商行，包括盐行、油行、粮行、山货行等，并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商人队伍。

在输入的商品中食盐是最大宗也是最重要的货物，每年达数百万公斤，销售范围包括了整个酉阳地区以及湘西和黔东北的一些县份。下水的货物中以桐油、生漆、粮食为最多，主要产自黔东北地区，其中桐油的输出最高达到了三百万公斤。所以各地商人纷纷在此设立商号，修建仓库，储存货物，批发零售，最多的时候龚滩发展到包罗十几家盐号在内的一百多家商行。

清光绪三年，清政府设立了四川盐务总局，清光绪十年实行“官运商销”，食盐由政府在产地收购、转运至龚滩，商人再购买运销到酉阳、秀山、湘西和黔东北各地。吸引各地的商人纷纷在龚滩开设盐号，经销食盐。当时，龚滩最大的三家盐号为陕西帮、涪渝帮开设的“天字号”、“利字号”和“祥发永”三家，三家各有资金数十万钱，各有四五个船帮支撑，每帮有船八只，三家共有船一百二十余艘，每年运盐四万余包（每包七十五公斤），垄断全县以至川湘黔边区数十县的运销食盐大权长达三十年。约在清末民初，三大盐号先后停业，继而兴起的是“裕大”盐号，它接替了原龚滩的“三大盐号”的运销业务，控制十余船帮，每年运销量四万余包，独家垄断了龚滩的盐业运销。

民国五年实行“商运商销”，经营者可以自由往返于产销两地进行贸易，这更有力地促进了龚滩盐业的发展。新兴盐号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有

“三义祥”、“德义祥”、“符合”、“裕记”、“恒升茂”、“鼎荣祥”、“祥记”、“裕通”等，后来竟发展到几十家，它们从自贡购进大批食盐在龚滩批发。各大盐号为了扩大经营规模，相继在龚滩修建盐库，囤积、储存和转运食盐，其中著名的有“董家仓”、“友兰店”、“夏家仓”、“罗家店”等多家仓库。龚滩的盐业运销繁荣一时。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长江下游的航运中断，湘、鄂、黔边区一带用盐多靠龚滩转运，龚滩的食盐转运数量更大。据民国三十二年统计，运湘的花盐 89 510 市担，运黔的巴盐 108 411 市担，供给酉、秀的巴盐 81 032 市担，共计 278 953 市担，每市担为五十公斤，总量就有约 1 400 万公斤。如此众多的食盐输入使龚滩的盐业运输非常繁忙，但龚滩的盐号却不增反减，由几十家减至几家。这最主要是由盐政的变化造成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控制盐政，改由政府专运组织商户经销，实行统购统销，计口授盐的政策。在龚滩设立“川康盐务局龚滩盐运处”及“贵州盐务处龚滩盐运处”，由“永经”、“永盛”等盐号组成的“七组盐号”垄断了龚滩的盐业运输。1941 年食盐实行专卖，1944 年又改为自由购销，由经营者自由经营。官僚资本控制的“大业”盐号取代了“七组盐号”把持了酉阳的盐市。1946 年由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度贡庭为董事长，酉、秀、黔、彭四省豪绅进行官股投资的“同益”盐号成立，与“大业”盐号相抗衡。这两家盐号一直经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统治酉阳盐业长达五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后，三大改造过后，一切工商活动都收归国营或集体经营，龚滩原来的经济基础就彻底失去了。贸易的衰落与航道的疏通，龚滩的辉煌就在盐运历史舞台中落下了帷幕。

由于彭水水电站的建设，乌江水位大幅度提升，千年历史重镇将被全部淹没。为了保护这一历史古镇，2006 年，地方政府启动了异地迁建保护，根据“原规模、原风貌、原特色、原形制、原工艺”和“保护历史真实性”的原则，将古镇整体迁建至乌江下游距原址 1. 5 千米处的小银村白水洞，迁建后龚滩古镇以南北走向呈带状布局，西部以滨江步道为界，东部是彭水至酉阳的过境公路——酉彭公路。移民安置区域（即移民新区）与龚滩古镇相对分立，并以酉彭公路为界。龚滩古镇与移民新区以盘山公路相连接，之间的坡地形成了一条连续绿化带，空间上将龚滩古镇与移民新区相分隔，还乌江盐运历史原生态。

3. 沿河银码头

沿河县位于东经 108°03′~108°39′与北纬 28°21′~28°09′之间。

秦至唐宋，历代王朝在乌江沿岸置州建县，乌江航运逐渐向上游延展。唐代，蜀盐从乌江运至思州区域专卖。明代，开辟乌江航道，凿壅疏流，在岸边辟纤道逆水拉船。明贵州巡抚郭子璋《题征路苗善后疏》载："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食盐一在富顺自流井，一在射洪、古井口等处收买，内一半运于思南发卖。"据田氏家谱记载："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郡人田秋任四川按察使时，上疏条敕川贵两台使云：'贵自开设以来，江流阻塞，盐利不得入责，官民两病'。"明王朝即敕川贵两台使"凿壅硫流，传檄喻商，货盐人贵者赏"①，"民皆东趣，往来不绝，岁获千百厘税，自是永获舟楫利"。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将盐政改为"官销商运"，划分销区，川盐主要由乌江运至思南发卖。清代，开凿险滩，修凿纤道，疏理河道，乌江能分段通行木船。《四川盐政录》载："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思南知府杨以增倡导修凿纤道，川盐由乌江水路入黔，贵州土产由乌江水路出川。"清道光《恩南府续志》载："其盐自蜀五洞桥盐井运涪入黔，两易其舟以达思南，分道散售，石阡、铜仁、镇远皆引地也，计岁销盐十数百万斤"，府县属地"唯桐油、柏油、山漆及婺川朱砂、水银可行远"，"下此则药材矣"。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板禀陈清朝廷整修涪岸航道云："川盐入黔，由涪陵至龚滩入贵州，因沿途滩恶险阻，民自愿捐资款，因势利导，加以修整，以利舟楫。"获准，于是道官派工，绅商毕赴，理清涪陵起向上400千米河道，费时3年，开凿险滩50余处，乌江航道渐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涪岸筹议岁修章程，以商筹按年缴涪局之息银作岁修补、整治、开辟运道和纤路漕口之用，自此乌江航道整治有其经费来源。清末乌江成为贵州至四川的交通要道，商船运输盛极一时。

沿河处在乌江中下游通航河段腹地，船舶上经贵州德江、思南、凤冈、石阡等县可抵余庆县大乌江镇码头，下经重庆酉阳、彭水、武隆等县可达涪陵港铜鼓滩入长江，航道长462千米。县城（和平镇）上距思南101千米、余庆大乌江码头28千米，下距涪陵港244千米。乌江在县内长132千米，从南至北流经13个乡镇，沿岸有夹石、望牌、侯家培、探沟子、洪滩、沙蛇、沿河、黑獭、恩渠、毛渡、龚滩、洪渡等港口码头。

当时沿河盐商辐辏，广布盐号，从清代初年到明国规模较大的盐号和公司有："大清公"、"万丰和"、"集利云"、"怡丰和"、"张益丰"、"悦来和"、"大生仁"、"恒丰源"、"永昌恒"、"久如茂"、"广源长"、"大义生"、"永

---

① 覃梦松. 沿河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238.

济”、“老涪岸”、“大业”等数十家。小盐号有：“字中和”、“久如园”、“祥发永”、“天子号”、“义字号”、“益康”、“益群”、“华西”等十家。



图 5-3-8　沿河乌江纤道

4. 思南金码头

思南县地处东经 107°52′~108°28′，北纬 27°32′~28°10′之间。

从南北朝时期，北周在思南遥置费州始，至民国中期，其间约 1 300 多年，思南历代为州、司、府所在之地，辖地甚宽。周边分别与印江县、石阡县、凤冈县和德江县接壤。县境地处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大斜坡地带的北部边缘，处于乌江中下游的主要航区。思南自明嘉靖以来，已经成为黔东北川盐集散地和日用品批发核心地域。清道光《思南府续志》对此作了如下记载："商之由陕由江至者。边引蜀盐，陕人主之。棉花布匹，江人主之。其盐自蜀五洞桥盐井运涪入黔，两易舟以达思南，分道散售。石阡、铜仁、镇远各府皆引地也，计岁销盐十数百万斤。"①

思南乌江水域段"峨舸大艑，唉乃相闻。百货转输，兹为大矣"。思南人张敏文在《思唐杂咏》诗中也写到："当年火种刀耕地，此日花团锦绣天。砂汞厂连金铁厂，小盐船接大盐船。"对思南清朝繁盛景象进行描绘。

自清嘉庆六年（公元 1801 年）江西商民捐资装饰万寿宫（后为江西会馆）起，先后有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安徽、陕西、宁夏、江苏、浙江、山西、四川等省商民在思南府城设庄号和建会馆。江右商民扩而广之，在府属鹦鹉溪、张家寨、许家坝、塘头、板桥、大坝场、文家店等地公建万寿宫。嘉庆、道光年间，陕西商民先后来到思南塘头开设永顺源、正顺隆、源恒顺、王安利、吴恒顺、聚茂源、会万利、张顺朝、郑源源、郑玉川十大商号，其后又

① 黄家服，段志洪. 中国地方志集成 贵州府县志辑 46 道光思南府续志 道光松桃厅志 [M]. 成都：巴蜀书社，2006：321.

增加吴国顺、吴怡顺两家。所以当时人们美称塘头为“小南京”。

至今，商脉与文脉保存良好的在思塘镇的西南隅——安化街。江西荀士英等盐商，将临江的水府祠加以扩建，于嘉庆六年（公元 1801 年）将其改建为万寿宫，成为江西会馆。万寿宫占地 2 400 平方米，临街建有石牌坊、门楼，内有戏楼、正厅和两厢。正殿后是观音堂，左为关圣殿，右为紫云宫，侧为梓潼宫。



图 5-3-9　思南万寿宫

贵州保存最为完善的思南周家盐号，其盐业建于乌江西岸卢家码头边，由石库门、对厅、两厢、正房、厨房、盐仓、花园、天井等构成封闭式四合院，有大小居室 30 余间。院内修建“有组织排水系统”，外建马头形封火墙，水往院内流，称“四水归堂”。在“周家桶子”堂屋六合槅扇门雕花门窗腰板上，还清晰留下当年雕刻的 16 个篆字：“创业维艰，守成不易。维忠维孝，克俭克勤。”门窗图案制成冰裂纹，镶嵌福禄寿禧、耕读渔樵、二龙抢宝、犀牛望月、四福捧寿、龙凤呈祥、岁寒三友、一品清廉、麒麟送子、为善最乐等吉祥图案。天井内保留着一礅大石头公平秤砣，其上砧有圆孔，面镌“斤两”等字，是当年盐号使用的标准器。

思南安化街过去错落有致地分布着 70 多家盐号与商铺，在我们田野作业走访中，至今留存民间记忆的仅存龚滩人周镐璜打拼出来的“周家盐号”、湖南人张德祥创造的“怡丰源盐号”、本土人李佑兰苦心维系的“悦兰和盐号”。

5. 600 年石阡盐运古镇

石阡地理位置位于东经 108°33′与 108°56′，北纬 27°16′与 27°42′之间。

清康熙五十五年太守黄良佐云“绕径通官阁，依山枕石阡”①，在城东五老山中修石路，城西 20 里关口坪独有石径，东西延伸为“阡”，成就了 600 年

① 罗文思. 石阡府志八卷.



图 5-3-10　黔境保存完善的思南周家盐号

古镇石阡的来源。

盐船由思南顺乌江经两江口进入龙川河，直接在石阡府靠岸。航道整治后，盐船三五天一趟，每年石阡市场销盐数万斤。乌江上的河闪渡（新发现的河闪渡遗址，凤冈境内称“新字号”，石阡境内称“大字号”。遗址上的青石古道、断垣残壁、古墓碑刻、泥陶瓦罐，印证了河闪渡曾经的繁华昌盛，向世人揭开了河闪渡的神秘面纱），在明清两代曾是川盐入阡的主要码头，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龙川河发源于县境，主河道全长 145 千米，县境河段 76 千米。中下游河段即县城至两江口，于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 1605 年）开始通航，是古代石阡的交通枢纽。尤其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龙川河航运的高峰阶段，一般二至三天即有商船抵县城靠岸。1958 年大炼钢铁，砍伐森林过量，破坏生态。1960 年后，河道淤塞，航运停止。

石阡主要盐号、盐店集中在上河街，民国初期有吉大昌、全美宫、瑞丰衡、聚兴祥、德茂衡以及熊正生、杜池阶、黄兴和等九家，尤以吉大昌、全美宫生意最为昌茂。“明国九年（公元 1920 年），军匪李德清洗劫吉大昌、全美宫、瑞丰衡三家盐号，致使其倒闭。其后姜云章、夏寿培、徐登益、姜仲武、李德全、徐文玉、杨存武、夏俊山、夏成斋、周盘兴、徐登全、马仲武兴起，延续到民国二十五年，合计上河街盐店 19 家。”①

石阡万寿宫，也称江西会馆，明称水府阁，建于公元 1588 年，历经浩劫，清雍正十三年（公元 1735 年）由知府杜理庀精心花费四年重新整修，于是有了今日辉煌。它是我国明朝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建筑群之一，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万寿宫古建筑，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东向西毗连的禹王宫、忠烈宫连成一线，全长 180 米，构成府城石阡最

---

① 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石阡县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2.

大的古庙宇群一大奇观。宫门为三门六柱大牌楼式青色砖石结构圆拱门，各门均精雕细刻，砌制而成人物花鸟图案。图案上方，各塑扁圆瓦联，系铸刻正楷立体阳文。正门顶及神龛双龙戏珠，绕护左右。宫门前旁的双狮，仰天长啸，高约 1 米，门上斗拱翼角，飞檐两边。大门内配牌楼式小殿，小殿左接戏楼左翼长廊。右接三宫——圣帝宫、正殿、紫云宫，其右配殿大门，布局绝艺工联。大门后配置小殿充作前殿，青石铺天井大院。院东三宫殿一字排列，沿石阶至各殿。各殿大门结构装饰与宫门无异。戏楼前与正殿遥遥相对，交映生辉。后与排楼结为一体，线条朴素自然。整个宫宇四周，围墙高耸，上砌双层空心花砖，蔚为端庄、大气、雄伟。



图 5-3-11　石阡万寿宫（初为江西盐商所建）

6. 涪岸盐运除以上节点古镇外，还穿插以下古镇系列，如表 5-3-1 所示：

表 5-3-1　涪岸系列古镇

| 名称 | 地域盐运特征 | 古镇图照 | 古镇特征描述 |
| --- | --- | --- | --- |
| 洪渡 | 明朝川盐入黔第一码头，地处乌江与洪渡河汇合之处。乌江土坨峡尾、王坨峡首，为两峡之结合部 | | 历史沉淀深厚，唐武德二年设县，县制 444 年，现存汉砖瓦窑群、西汉古墓群、明万历军门禁约石碑等。明清时期，以陈氏与熊氏经营盐业，俗称“陈家半边街，熊家半边街” |

表5-3-1(续)

| 名称 | 地域盐运特征 | 古镇图照 | 古镇特征描述 |
| --- | --- | --- | --- |
| 思渠 | 盐船乌江龚滩盘滩转载，逆流进入土坨峡，蜿出银童峡，与麻阳河相汇之处为思渠古镇 |  | 元、明、清属佑溪长官司，下龚滩、出涪陵、抵重庆均由此转。民国时期有华守奇、冯楠英在老街吊脚楼开设盐店 |
| 寨英 | 为涪岸入黔东北铜仁和川盐入湘的重要水运码头，以及宗教朝圣梵净山的必经通道 |  | 明洪武十八年，朱桢“赶苗夺业”在“五溪蛮”辰河流域修建屯堡碉楼。呈丁字排列的六条青石街道、古城墙、古城门、水门码头、古石板街道、八大商号及桶子屋民居、会馆等遗址尚存。有“裕国通商”、“易和兴”、“同兴昌”、“富华”、“吴祥泰”等众多盐号 |
| 淇滩 | 为黔、湘、川、渝、鄂商运集散地，是乌江盐运流往德江、思南、印江、秀山的水路咽喉 |  | 原名“齐滩”，为统治思州831年田氏祖族之地。考古发掘新石器及商、周时代遗址达七处之多。明清遗址有雄峻“万寿宫”和杨、王、肖、张四家古老“统子”，建的“巴盐仓储”地 |

表5-3-1(续)

| 名称 | 地域盐运特征 | 古镇图照 | 古镇特征描述 |
|---|---|---|---|
| 新滩 | 新滩位于淇滩上游50千米，咸丰八年，江岸发生山崩，乱石堆积于江心，航道阻障，形成乌江上“鬼门关” | | 新滩被乌江截为东西两岸，河东岸为主要商业区。其侯家坨候志和组建“水木匠”帮，专门打制乌江航道“歪屁股船”。该滩明清时期，大部分人从事古老乌江航运 |
| 潮砥 | 新滩上游12千米，为乌江盐运第四断航滩 | | 从公元1958年向上溯一千多年，潮砥称之为乌江流域“楼兰古国”。以滩为界分为两个码头。有“黔中砥柱”、宋代古墓群、文昌宫、观音阁等古建筑 |
| 塘头 | 盐运出思南沿乌江转鲇鱼峡，穿镇江阁过邵家桥，趟两江口，逆龙底河，至“万顷大坝”六县插花地——塘头 | | 明洪武十年（1337年）置苗民司，属思南宣慰司。宋朝末年形成商贸集市，明清繁华一时。建成永顺源、正顺隆、源恒顺等十大商埠字号。其下十千米有清明朝代铸就的风水迷宫、板桥乡之——郝家湾。 |

（三）仁岸入黔古盐道系列古镇



图5-3-12　清同治年间《合江县志》川黔边界山势

1. 四川合江福宝古镇通道

福宝镇位于四川合江县南区，地理位置介于东经108°48′~108°49′，北纬28°44′~28°45′之间。

前述西汉唐蒙开辟的僰道—石门（今四川庆符县境）—南广（云南镇雄）—平夷（今毕节）—夜郎（今安顺）以达牂牁江畔之道，后来由司马相如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整顿通畅的长安—成都—宜宾或泸州—贵阳—番禺的水陆交通线就途经此镇。明朝水路合江—赤水—茅台镇—仁怀—桐梓夜郎坝是西南最为重要的商贸通道之一，这条川黔盐运古栈道完全是由川黔边的背夫们用生命和汗水踏出来的生命线。

川盐古道有一条盐运捷径，总体线路为：从福宝大漕码头背盐起坡，沿大漕沟古道行程25千米到天堂坝，登红牵子岩，出川黔两省交界的武定门，在关口上，“盐老二”经官兵检验交纳过境税后被放行，沿岩半古道，下行25千米过贵州习水县三叉口乡的天水村，把川盐背（驮）到习水河，走水路下顺行梓桐、遵义，溯逆水走太平、二郎古镇。

据地方史专家吴鹏全先生考证，这条川盐古道早在唐宋时就是川盐入黔的必经之道。元末明初，大漕河福宝古渡口成为川盐集散地。清康熙时，因盐运而有新场，这个地方后来改叫福宝，成为川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条藏在福宝原始林区的川盐商道，已有千余年历史了。

福宝场袍哥文化积淀深厚，袍哥人家多。当时在镇上成年男子，如果不“嗨”（加入袍哥），别人就看不起你，认为你或者是“打烂仗”（不安分守己），或者是“冬菇儿”（脑经死板）之人。“哥老会”是流行于清末四川城乡的民间组织，分“仁、义、礼、智、信”五大堂口，每个堂口有大爷、二爷、三爷，以下为五、六、九、十牌，缺少四、七牌，据说是曾经发起时候，做了叛徒，因而取缔。仁堂成员均为公职人员和有势力的官绅；义堂为买卖客商；礼堂“刀刀枪枪”；智堂“猴猴囊囊”医卜星相；信堂是干苦力下层百姓。凡是“打流跑滩”均需到当地相同堂口拜堂，才能保一方平安。

福宝镇既是镇场，也是一个砦子，进街中央十道街巷均设有砦门，中央坝子有两道砦门，设有三座防守型碉楼，构成相对封闭的镇防环境。它是诞生在川黔盐道上仁岸第一古镇。

2. 仁岸盐道线路

自流井盐黔边第一路“合茅道”由自贡张家沱出发，经釜溪河仙市入沱江，分运到宜宾、泸州。在泸州的合江转运然后经赤水一路南下，到达赤水市，再经习水、二郎滩，最后到达仁怀县的茅台镇。仁岸盐道运输共分八段，

汇总如下：

其一，盐由自流井小船运到邓井关①，提到盐船上后，关闸等到水满，一批一批开闸放出，分引到合江岸边，便由赤水放盐船到合江提盐，内运到赤水，合江到赤水120里。

其二，赤水到元厚站，水路160里，陆路180里。此段滩大、水急、河身窄，须改用牯牛船。船的形式为双层底，两个梭耳朵，高四五尺，便于用梢条，在大滩上才经得起摩擦，旋转才灵活。每船装160斤的包150包。船到大滩后将盐起一部分上岸，减轻船身重量，便于上滩而保安全。

其三，元厚到土城站，陆路30里，水路45里。此段滩多、水急，平水时可用船运，河水稍大点，船就不能行驶，改用马驮。这段路经常有专业运盐驮马六七百匹。当时并组织有驮运工会。关于运费、途耗问题，概由工会直接与盐商商定。

其四，土城到二郎滩站，水路120里。这段水路有船一百四五十只，纤夫常有四五百人，每船装盐100包，纤夫每运盐一次，所得铜钱七八百文，可买大米一斗一二升。盐到二郎滩，全部起进仓。由河边背进仓有一里的高坡。

其五，二郎滩到马桑坪，陆路30里。此段路很崎岖，要从悬岩半腰经过，驮马不能行，只有人背。很长时间，二郎滩周围六七十里内的农民，大多数靠背盐为生。

其六，马桑坪到茅台村，陆路130里，水路150里。盐百分之九十用船运，百分之十由人背。这站有小盐船两百多只，大部分是专业的。每只船装盐六十包，需时四至五天。如遇洪水、扎水，十天半月不定。此段水路有一二大滩，河身窄，水徒，船到滩将盐起一部分上岸，船上滩后，把盐又搬回船。这段的纤夫，经常有四五百人，大多数是当地农民。每运盐一次，每人可得六七百铜钱，能买大米一斗左右。盐到茅台，全部起岸进仓堆放。

其七，从茅台站起都是陆运，全靠人背马驮。分三路：一路经石子坝、两路口、坛厂、长岗、枫香坝到鸭溪，途程140里。山大路险，人背需要五六

---

① 邓井，现在称邓井关。过去，邓井关曾因"夹岸列肆，帆拔如发"，成为川蜀四大名镇之一。邓井关位于富顺县城西部，两岸多石，石侧青龙背山，石洞甚多。两晋时期，西南古老的民族僚族（古作獠）人，时称为蛮人居住地名谓之"洞子山"，这便是邓井关最早出现的地名。后因农商贸易，商贾增多，逐渐形成小场。小场兴起之初取名"洞子场"。清初置邓井保，辖15甲，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叙州府建武厅通判署移驻邓井，称盐捕通判署，盐务机关在邓井护国桥设关征收盐税。"自贡盐舟自荣溪下驶者，于此间点验。"凡是外运井盐，必须通过这里的检查站检验查证完税后，方能加盖"关卡"图记"出口"。遂以邓家办井，及有"关卡"为志，命为"邓井关"。

天，每包运费盐五六斤，每斤盐可换大米一升左右。每天有一二千人运盐，农忙时尚有几百人背。另有马七八百匹，纯是专业。马运只需 3 天就到，运费与人力运费一样。另一路经过梅子坳、盐津河、鲁班场、五马、岩孔到金沙，途程 140 里。第三路，经打鼓新场（金沙县城关镇）、滥泥沟（黔西大关）、卫上（清镇卫城）到定番（今惠水），此路驮马多，背夫少，经常有马八九百匹，很是专业。马运 3 天即到，每包运费盐五六斤。

其八，仁怀茅台经打鼓新场、烂泥沟（今黔西大关）至安顺，每年运输盐量达二百多万斤。

由人力、船只、马匹组成的庞大运盐团队在赤水河谷挪动潜行，形成了数百年来赤水河上比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更为宏观的构图景致。

道光年间，时任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目睹川盐源源不断从仁岸输入黔省各地，但茅台至天鼓崖段已不能再行舟，不能船运到毕节界，因此他感慨道[①]：“天鼓崖根舣棹无，疏河方略未全纾。金钱四万当年清，付于行人唱鹧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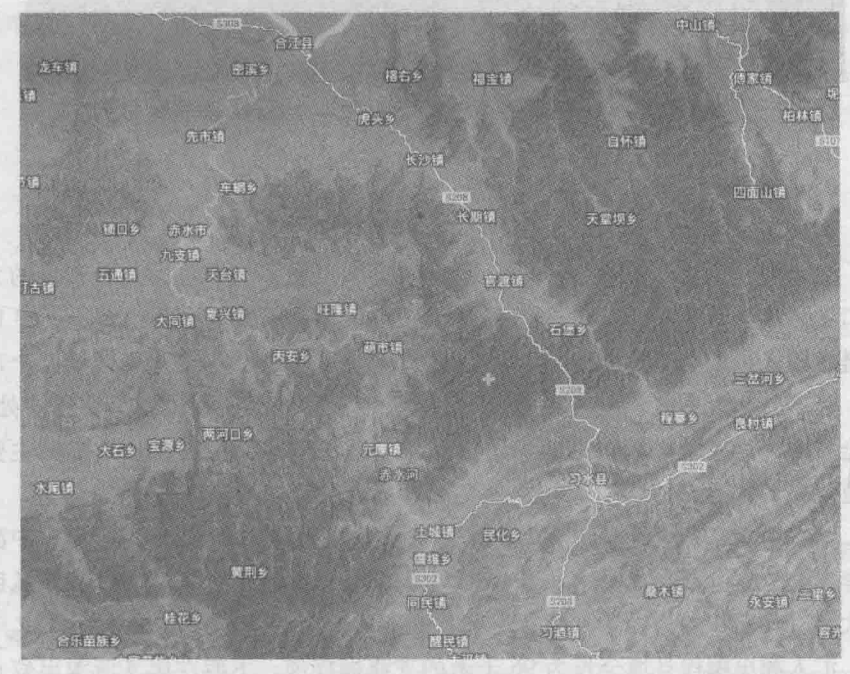



图 5-3-13　Google 卫星地图截图（合江—复兴—丙安—元厚—土城）

① 光绪增修仁怀厅志。




图 5-3-14　卫星地图（土城—二郎滩—马桑坪—茅台镇）

3. 仁岸系列古镇

（1）赤水河水系特征

赤水河（古称大涉水、亦名赤虺河），源出云南省镇雄县大湾鱼训乡的大洞口，东流至云贵川交界处的梯子岩后，迂洄于川黔边境，至赤水县下游 12 里鲢鱼溪入川，与合江交汇入长江。黔境内河段跨毕节、遵义两区域五个市县，经茅台、太平渡、土城、元厚、复兴、赤水等区县所在地及其集镇多处，为全省内河途径沿岸人口最为稠密的河系。明清以来，历为川盐入黔的主要通道。

赤水河在省内全境长约 298 千米，流域总面积达 2.04 万平方千米，中游右岸在吴公岩（镶刻着著名书法家邵华泽书写的“美酒河”三个气势恢弘巨形大字，其面积约为四千八百平方米，是当今摩崖石刻世界之最）以下 2 千米，汇入源出桐梓县境全长为 96 千米的支流桐梓河，下游左岸支流源出叙永境内全长为 41 千米，在切角垭汇入的大同河，习水河（又名高洞河）为右岸分流，在磨刀溪进入四川，至合江 2 里处三江咀再汇入赤水河。

赤水河流域，在地形区域上位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过度区段，切割于大

娄山脉尾闾与乌蒙山脉之间，海波从南向北由 1 500 米一直跌降到 300 米。流域分为五段，过去水文特征为：马蹄滩至大渡口段长 53 千米，落差 675 米，平均比降 1.27‰，为高原峡谷区，枯水期河宽 20~40 米，河槽多崩岩乱石。大渡口至合马段长 45 千米，平均比降 0.69‰，河槽较上段外朗，枯水河宽 40~60 米，水道弯曲，流势较缓。合马至二郎段长 23 千米，落差 624 米，平均比降 2.71‰，为崩岩峡谷区，河宽 20~40 米。尤其马桑坪至二郎滩 9 千米内最陡险，该段落差 35.4 米，平均比降 3.93‰，为 U 形河谷，两岸陡岩峭壁，河槽礁石满布，河宽 15~25 米，历为全河咽喉，其间溪口滩、崩岩滩、基石滩与卵石滩交错密布，滩滩踵接，礁石密布，航道狭窄。二郎至炳安长 78 千米，落差 78.5 米，平均比降 1.00‰，丘陵与峡谷交织，河槽宽窄无定，有大滩十余处，经常右岸发生大滑坡，阻断航道。炳安至合江长 82 千米，落差 28 米，平均比降 0.34‰，为低山丘陵区，河谷开朗，枯木期宽增至 70~200 米，水流下缓，两岸多蚀余山丘和冲积台地。

赤水河自明到清，虽历经张广泗、丁宝桢数次疏浚整修，但其滩多水急，基本状态未得到改观。



图 5-3-15 赤水河也称美酒河

(2) 赤水河为盐运而生之竹

赤水河岸青竹苍翠，层叠成竹海，不免畅思竹与盐运：赤水是全国重要的竹产地之一，素有“竹乡”的美誉，竹子种类之繁多，竹林面积之广袤，令人叹为观止。

用于盐运所需之竹主要为慈竹、楠竹、斑竹、水竹等，它们被分别制作成纤藤、箍头、篙杆、船席、盐勘和盐篼。

纤藤，一种用楠竹或斑竹为原料制作的拉纤用的竹绳，是赤水河盐运必需品。从赤水城至元厚的盐船，洪水时一个航次要有一根纤藤，平水时一根纤藤可

用两个航次，此段盐船最多时有120多艘，最少时也有60多艘。制作纤藤时，人们将竹子破成篾，每根纤藤用六疋篾起编，因篾长有限，在编的过程中必须加篾。编好后的纤藤圈成圈出售，因而人们将一根纤藤称作“一窝”。此外还有一种较小的，称作“飞子藤”，一般用于水流平缓、航道稍宽的河道，用慈竹或水竹破成篾编成，在赤水至猿猴段航道，每船每次要用半根。

箍头，是上下盐船停泊靠岸系船之物，形同纤藤，比纤藤粗大，其原料为慈竹或水竹。用篾比纤藤多两匹起编，长度比纤藤短，但编得更为紧密。从赤水至猿猴的盐船，平水时要用箍头5根半，洪水期间一个航次则要用12根，而猿猴上行至二郎滩的盐船使用较少，一个航次只用2根。

篙杆，盐船航行撑船所用的工具，帮助船舶离岸、靠岸、渡河及过滩。一般采用生长在山埂上或崖塄上的楠竹或斑竹为原料。分为大篙杆和小篙杆两种，大篙杆直径在2.1寸[①]左右，小篙杆在1.9寸左右，要求贯颠、无刀伤、无尿灌、无大弯等，从山林砍伐运至河边，捆扎成筏运至县城，用火将其烤扳伸直，在篙杆头部要装上“篙簪”（即铁尖和固定铁尖的铁箍），以增加篙杆的耐磨性，延长其使用寿命。赤水至元厚的盐船每个航次要准备篙杆2~4根（或“株”），元厚至二郎滩的盐船一般准备2根。篙杆竹除供赤水河上下各类船舶使用外，还运到合江、重庆出售。

船席，即船篷，主要用于盐船船员、纤夫夜晚休息时遮挡风霜雨露和为盐挡雨防潮。船席主要原料为楠竹，制作时先将楠竹破成宽约一寸的篾条，按宽约五尺的规格来编织，其长度根据不同船的大小而定，一般能遮盖住船即可。船席有两种：一种是在两张编好的船席中间夹蓼叶（用来编制斗笠，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叶子），被称作“草篷”；一种是在船席上用桐油、黄蜡（即蜂蜡，可作为防渗涂料）涂抹过，称作“油篷”。一般盐船为防雨水渗漏和使用时间更长，多选用油篷。船席制成船篷后，又因所在盐船上使用部位不同，有三种称呼：一为“座篷”，固定的盖在中舱和燕尾舱（亦称“脚窝”）上；二是“走篷”，白天收拢放在座篷之上，夜晚停泊或遇雨时放置于船临时搭起的拱篷架上；三是其他各舱的篷，即称为“拖篷”。在赤水至猿猴的盐船上，一般一航次要准备船篷17张，且航行一次十五天，损坏船篷1~7张，而猿猴至二郎滩一般只准备1张。

盐勘，赤水至猿猴装盐的主要用具，一般以慈竹为原料，将慈竹破篾后编织而成，呈圆形，高约两尺六七，四周有直径大约两寸的六角形孔，宛若过去

① 1寸=3.714 75厘米。

装炭的竹篓子。以前四川盐场为了方便运往他省的食盐长途搬运，将盐熬制成块盐，即巴盐。用盐勘装巴盐时，筋底要铺上一层盐草，以减小搬运时的碰撞摩擦，降低损耗，勘口用盐篾交叉数道封好，这被称作“捆”或“网”。赤水至元厚段险滩多，盐船经过大小丙滩、鳖滩、鸭岭三滩、葫市滩、石梅寺滩等都要将船上的盐卸下 30 多篓，由纤夫搬过滩再装船。到元厚时又要由搬运工搬至盐号去交秤，因此，不同程度造成对盐勘的损坏，一部分盐勘无法再用。盐船将损坏较轻的盐勘带回，交工人补缀后再用，一般每船回头盐勘需四天方可修整完善；不能再修者交猿猴“金火帮”烧灰熬盐。赤水至猿猴的盐船每航次需盐勘约 300 个，每个盐勘可装盐 100 斤。

盐篾，一般用慈竹制成，在赤水至猿猴段盐船的盐篾多用于捆盐勘之用，一个航次需盐篾 1 000 匹，制作盐篾者按 100 匹为一把捆扎出售。猿猴至二郎滩段盐船用的盐篾不是用来捆勘，而是作为制纤藤之用，同时，不以疋来计算，而用“圈”来计算，一个航次用 20 圈盐篾。关于盐篾的重要，曾经有一些四川商人来境高价收购，造成境内盐篾短缺。1945 年 6 月，太平渡商人就来到盐篾主要产地大同和复兴，高价收购盐篾，致使赤水盐船无篾捆，当时的盐船商业同业公会要求盐务局出面干预，后赤水县政府贴出布告，严禁抬价收购盐篾，以维持盐运正常进行。此种情况在猿猴也分别于 1941 年和 1942 年发生过。




图 5-3-16　赤水河航运展览馆





图 5-3-17　盐篾



图 5-3-18 盐均衡砝码

新中国的成立后，经营数百年的仁岸盐运因改道而结束，随着运输设备的改进，纤藤、箍头、船篷、盐勘也相继完成使命，成为历史。在如今的赤水河上，只剩下“篙杆”仍在顽强地守卫着过去，继续在航运事业中发挥作用。

(3) 赤水河盐运之留元坝

《仁怀直隶厅志·城建志·城垣》中载赤水古城留元坝的格局“周围四百七十五丈，计五里三分，高一丈四尺，垛口一千一百三十三处，水洞三处，炮台四座，城门四，城楼四。”其四道城门按东、南、西、北分别命名为“青阳门”、“南薰门”、“聚金门”和“天泽门”，东门在北门下游，是从长江来的盐船将川盐提拨转载到牯牛船继续上运的中转站，也是装运客货出河至合江、江津、重庆等长江沿岸城市的重要码头。

赤水市昔日的留元坝，因盐运而发达，曾建有“九宫十八庙”，可见其当年商贾云集的盛况。今尚存留在赤水河边的古老城墙、城门洞、偶存的一段红石板街还记忆着“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的繁荣景象，承载着源远流长的盐业历史文化。留元坝是仁岸的起运点，分装船从四川合江运至仁怀县城（今赤水市）东码头，将盐袋由大改小进行改装，再装入吨位稍小的牯牛船运至元厚。运盐船只达一百六七十只。每日清晨，码头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热气腾腾，转盐的、发船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船工号子唱出了赤水盐运繁盛的景象：“仁岸盐商聚赤水，东门码头闹腾腾。北门西门争泊岸，富坳铧剪把船停。”同知陈熙晋赋诗：“东门沱下水鳞鳞，浦树沙鸥画不真。邪许数声船舶岸，一篙犹带锦江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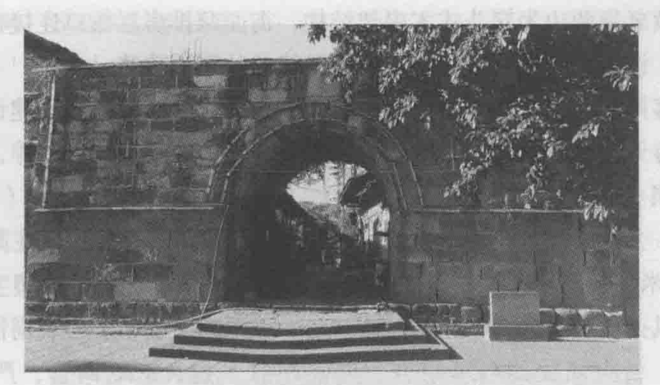


图 5-3-19 留元坝东门——青阳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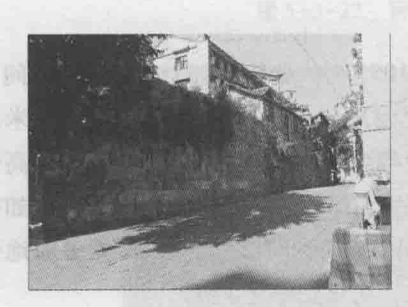



图 5-3-20 留元坝外城墙及盐仓




图 5-3-21 留元坝盐号与盐巷

(4) 赤水河盐运之复兴场

复兴场又称为“老仁怀”。在北宋大观三年（公元 1109 年）被设为新建的仁怀县治所，穿越九百年的悠远时光隧道。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7 年）平播战争中仁怀厅址被毁，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 年），厅址迁往留元坝（即今赤水市城）。它是川盐入黔第一宿站。贵州丰富的铅、铜、煤、铁等矿产品和茶叶、桐油、猪鬃等农副产品及土特产运销川蜀。明清以后，各地商贾云集，商号林立，一派繁荣。街中一处断桓是早年下栅子修建的门，原来书有“复兴场”三个金字。沿街而行，临河尚存两道石栅子，是通往河边和码头的

关卡。古镇老街两边为穿斗式木串架结构，街面两排房屋檐口连接在一起，为跨街凉亭，设有采光通风的天窗，是极具特色的街道建筑。

各地客商云集老仁怀。带来商贸繁盛的又一明证是明清时期建设的各种宫馆庙宇，有天后宫、南华宫、禹王宫、万寿宫、关帝庙、红岩寺等，旧说复兴场“十庙俱全”，建筑规模宏伟，工艺精美。现仅存的江西会馆（即万寿宫）可见一斑。会馆由前殿、正殿和后殿及左右厢房组成，28 根石柱高达 13 米，径粗 75 厘米，所有木梁柱均有雕饰，檐悬铜铃，脊有龙兽等泥塑宝顶，两侧有彩绘的风火墙。前殿楼上是戏台，戏台木雕精巧绝伦，多为戏剧情节，人物栩栩如生。台上演出的幕幕京剧、川剧好似“宛具悲欢离合，严然荣辱穷通”①。

（5）赤水河盐运之丙安

丙安地理位置位于东经 105°48′至 105°50′，北纬 28°27′至 28°28′之间。踏入丙安这个千年古镇，不由引发索古之幽思。小镇建在高居河岸 20 余米的山间台地的危崖累石之上，北面临河，沿半圆形的高台，千根立柱落地，高低错落地支撑起板墙青瓦的吊脚楼，有如在青山绿水间飘来的一处仙境，又如在巨幅山水画卷中凸显的人间圣地。清代诗人陈熙晋有诗慨叹：“无多隙地强安排，但有人家总靠台。笑批门前安乐水，从知安乐是生涯。”

从西面拾级而上，突兀在上面的是一座沙石拱园的城门，上书“太平门”。从门洞的石级上去，是一条仅一米多宽的狭窄街巷，街巷虽窄，两面却是一家紧挨一家的店铺，店堂灯火明亮，人头攒动，热闹异常，这便是“葫芦街”，狭窄的一段是葫芦的细颈。经过一个“之”字转折，一条较宽敞的石板街豁然展现在面前，街道两面是二层小青瓦木结构房屋，一层是餐饮、百货、理发、客栈等各式店铺，而最多的当是茶馆。当年，一拨又一拨的运盐马帮穿街而过，回响着叮当叮当的驮铃。成百上千的背子客，有七八岁的小孩，也有白发飘髯的老人。走过 400 米的街道，来到了东面的城门——东华门，此门至今保存完好，下完长长的石级，回首而望，古城门显得雄伟而险要。当地老人回忆，丙安当年是盐运的重要码头，丙滩未修通时，盐船到此也要下船转运过滩再上船运行。忆昔，每日丙滩上下码头，盐船桅杆如林，船夫、背夫如潮涌动。而今古镇溪流横亘着长 28 米，宽 1.4 米，桥墩与桥面均为巨型条石砌成的“双龙桥”，雕刻精美的两条石龙和两尊石狮在静静地倾诉着赤水河盐运凝固的历史。陈熙晋咏诗为证：“丙滩之下泻溒溒，十丈惊涛欲卷云。触屿

① 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 遵义市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游鱼齐折尾，鳛流只让水犀军。”



图 5-3-22　丙安沿河入镇盐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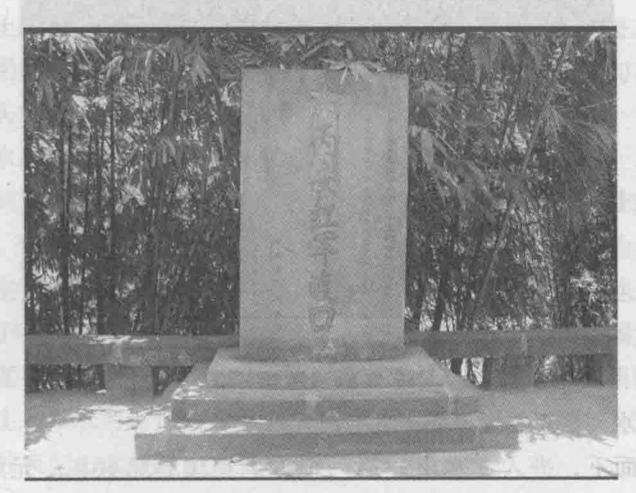


图 5-3-23　实地调研丙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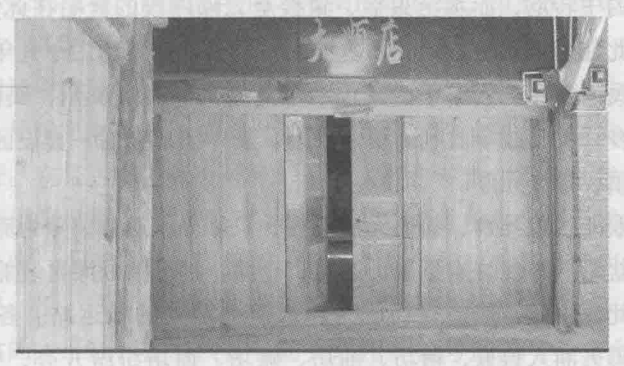


图 5-3-24　丙安大顺盐店



图 5-3-25　丙安盐路



图 5-3-26　丙安双龙桥

（6）赤水河盐运之元厚场

由上游而下，进入赤水市的第一个古老集镇是猿猴场。元厚古称“猿猴”，地理位置位于东经 105°55′~105°57′，北纬 28°21′~28°22′之间，为断航险滩处形成的中转港，赤水至猿猴、猿猴至二郎滩段的盐船在此停泊、倒载，部分食盐由此陆运至土城。元代属古巴蜀仁怀县。明万历二十九年时为土城里二甲，直至民国初年。元厚于清雍正六年随遵义府改隶贵州，民国初期设区，民国中期改乡，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名元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设区，撤县建市时改为市辖镇，即今元厚。

由于猿猴滩凶险异常，盐船无法通行，只好分段通行，分为赤猿段和猿郎段。上运的盐船只好在这里下船、起坎、仓储，越过猿猴滩再装船上运，下行的也只能如此。由此，使猿猴场成为赤水河上最大的转运站。各地商人、水手、纤夫、脚夫涌入猿猴，糟坊、油坊、碾坊、面坊纷纷开办，餐馆、酒馆、茶馆、烟馆遍布各条街巷，四川会馆、陕西会馆、江西会馆，三圣宫、紫云

宫、石梅寺等宫馆祠庙不断建立起来，形成了猿猴街市早年繁盛的景象。由于转运、分装，于是产生了大量的浸渍着丰富盐分的盐勘和盐草，它们成为熬制“锅巴盐”的原料，不少贫苦人得以谋生，也有人因此发福，也正因此给猿猴带来了灭顶之灾。民国三十六年中秋前夕，一陈姓红炉主窃盐号的盐草在自己的红炉上熬盐，引发大火，烧掉了猿猴场上的盐号，也烧掉了中街。《赤水县猿猴乡火灾救济启示》中说：“吾赤猿猴，适当水陆要冲，舟楫转运，地位重于它场，行商往返，繁荣有关县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回禄之灾再临元厚，烧掉下街，今之元厚，古迹遗存不多，只有盐运码头寂静地躺在那里，述说着当年的繁荣。以同知陈熙晋赋诗佐证“滩滩欢喜是安流，大别小别愁复愁。侬不愁风但愁水，郎船前月上猿猴。”

（7）赤水河盐运之土城

猿猴至土城段才 30 里路程，而盐船只能装八成载航行，还需三至四日才能达到。陈熙晋这样描述道：“黄泥滩石最嶙峋，一雨维舟动浃旬。咫尺土城天样远，关头望断算缗人”。

今属习水的古镇土城，地理位置位于东经 105°59′至 106°12′，北纬 28°15′至 28°16′之间素有“川黔锁钥”之称，无疑是赤水河沿岸历史最悠久、文化遗存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古镇。土城至猿猴间滩险密集，故成为猿猴至二郎滩段盐船的主要宿港和水陆联运码头，部分食盐由此陆运省内其他地区。

镇区处于我国南方远古民族发祥地之一的赤水河流域中段，属河谷丘陵地带，海拔高度 281 米左右，赤水河由镇区南部自东向西流过，铜溪河从镇区东部自北向南注入赤水河，形成东、西、南三面临水，北面靠山，“镇依山建，水绕镇转”的典型山水格局。

镇区风情揽胜：“万壑风清花世界，几河浪静锦乾坤”。这个临河而建的千年古镇，古老的戏楼、幽深的巷陌、沧桑的石板街、斑驳的封火墙，建筑奇特、风姿绰约。2006 年被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荣誉称号。古镇历史文化特点在于船运和盐运，至今保存完好的船帮和盐号位于下街半坡头。从中街石板路下行，抬眼见到的是一栋高大挺拔、东西结合的两层灰色砖瓦楼房，这就是土城船帮。它是古镇上保存最完好、最大的古建筑，石雕的拱形门廊和千斤立柱使这座建筑显得格外壮观，精雕细刻的木制檐柱、门窗、楼梯又将它装点得古朴而典雅。土城盐号紧挨船帮，这是个典型的具有黔北民居风格的四合院，盐号有甲、乙、丙、丁四个盐仓和记录、发条、支付工钱的柜台，天井中间有一口大大的太平缸，盛水供盐号防火之用。盐号后门与月亮台渡口相通，从元厚运来的盐，交到盐号后，又从这里背到渡口重新装船。高大的库房现在

已空空如也，但是依然可想见当年繁盛的光景，就连砌墙用的条形紫色沙石，在经过多年土盐腐蚀之后，随手拈上一些风化的沙粒放在口中，还能品出些许当年运往贵州腹地的锅巴盐的味道和背盐人的艰辛。

土城的茶馆与至今依然非常热闹的沿河街镇的茶馆一样，主要起源是于明清时期，随着船帮、盐号兴起而兴盛，成了船工、纤夫、运盐背夫们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和各类信息的集散地。终日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的各家茶馆成为古镇长街上又一道亮丽的风景，流露着赤水河特有的风情。这些狭窄、幽深，并且曲折多石级的昔日人喧马叫的盐运码头和商业文明长街，虽然随着水路转到陆路而沉寂，但船帮和盐号的遗迹记忆着盐运曾经的繁荣。

土城到二郎滩河道险滩虽少，但两岸怪石纵横，纤道险峻。陈熙晋这样写道："土城南去最嶙峋，乱石纵横不受凌。要试行人腰脚健，披毡带笠裹行縢"。




图 5-3-27　实地考察土城

（8）赤水河盐运之茅台镇

由二郎滩险过马桑坪，则到达终点"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茅台镇。

茅台镇位于经度东经 106°21′至 106°24′，北纬 27°50′至 27°51′之间。茅台镇地处贵州高原西北部，大娄山脉西段北侧，位于仁怀市区西北赤水河中游的马鞍山斜坡上。很早以前，这里是一个自然村落，所以大诗人郑珍诗云："古聚缀陂陀"。聚，即村落。该地可谓物华天宝，以其盐运和酿酒，清末民初就成为贵州著名的商业集镇。

茅台镇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上，它有过几个不同名称。古代世居着濮僚部落，马桑树漫山遍野，故名“马桑湾”。后来在河东岸发现了一股纯净的泉水，濮僚部落砌了一口四方形的水井，方便来往行人饮用，深得人心，时间长了，人们便习惯称此地为“四方井”，代替了之前的“马桑湾”。

往后，沿河地带人类活动频繁，逐步开发利用，历代濮僚人在街后筑土台，立灯杆祭祀祖先，对先人开荒破草表示崇敬，惯称“茅台”。在仁怀境内濮僚人居住过的地方，都有茅台的地名。如茅坝镇有九井八庙十茅台，坛厂镇、五马镇亦有茅台。

元朝以后，在县以下分设寨、村、坪、部，才正式定名为“茅台村”。最早记载茅台村这一地名的是元末明初怀德司安氏族谱（安氏一世祖安朝和葬于茅台高台）。后来又改称“茅村”（仁怀境内有安村、罗村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仁怀其他地区，一些年迈的老人仍习惯称茅台为“茅村”。

到了明朝，茅台街上修了万寿宫，在宫外建有一座极为罕见的半边桥，当地居民、过往客商通过半边桥去宫里烧香拜佛，因此人们又叫茅台街上为“半边桥”。

明代以后，茅台日益富裕繁荣，又在赤水河两岸修建了九座大庙，并在其中的观音寺、灵仙寺、禹王宫内珍藏了三面东汉铜鼓（现已出土一面），故而得名三鼓寺，茅台村因此又名“云鼓镇”。

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准开凿赤水河道，始通舟楫。四川食盐经赤水河运入，至茅台起岸，称“仁岸”，成为川盐入黔四大口岸之一。由于水陆畅通，八方商贾云集，运盐马帮和船只络绎不绝，市场繁荣，成为“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的繁华集镇，是黔北物资的主要集散地。因而一度改名“益商镇”，简称“益镇”。但终因人们习惯称茅台，已难以更改，因而仍保持旧称“茅台镇”。

清末民初，茅台镇是黔北重要交通口岸，贵州省三分之二的食盐由此起程运销各地，茅台酒亦远销省内外，并逐渐名声大振。

从茅台起，陆路盐运有三条线路：一是从茅台起运，经中华嘴（赵家坝）、沙坝河、茅坝、两河口，翻阳雀岩，入后山、岩孔，至金沙交接后，再运到烂泥沟（今黔西）至安顺，全部为人力运输。二是从茅台起运，经煤子坳、生界、鲁班、五马口、翻三等坡入岩孔，至金沙交接后，再运烂泥沟到安顺，多为马帮运输。三是从茅台起运，经石子坝、中米窝、岩崩口、坛厂、桑树湾、长干山、枫香，至鸭溪交接后，再运到刀把水转运贵阳。

上述几条运线，自清中叶一直沿袭到民国末年始崩溃。据民国末年统计的

运力状况：茅台至鸭溪150里，人力运输约1 000人，马500匹，以每人、马载盐量100~150斤计，月行约5次，月运量8 000担左右。刀把至贵阳242里，有汽车30辆、马车90辆，月行4次，月运量约6 000担。茅台至金沙150里，人力运输约1 000人，马530匹，月行4~5次，月运量8 000千担。

茅台镇因盐而兴旺，集聚了四川、贵州的大批盐商，这些盐商不少是陕西、山西籍的商人，人称“老陕”。清代著名诗人郑珍于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有“蜀盐去贵州，秦商聚茅台”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盛况。仁岸著名的四大盐号——“永隆裕”、“永发祥”、“协兴隆”、“义盛隆”在茅台村羊叉街竞相建仓筑舍，以至鳞次栉比，当地人称之为盐巷街。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仁岸有“永盛隆”、“荣盛通”、“大昌荣”和“新记”等四家大盐号营业。民国五年，茅台仍是水运转陆运的中转站，有九家盐商。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仁岸盐商多达十二家。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桐梓人周西城主黔政，他以整顿为名，狠抓盐税，重新规定仁岸盐商为十家：“衡厚”、“裕通黔”、“仁记”、“金裕”、“德谦”、“利记”、“裕兴隆”、“华昌”、“永清仁”、“庆丰”等。各口岸交税160万银元，按额分摊。盐商的税费负担加重了，他们只能转嫁给普通百姓。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仁岸有“世通公”、“裕通”、“利记”、“华昌”、“集大成”等八家盐商。至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王家烈主黔政，盐税同纳，盐价随之提高。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将“合裕祥”、“裕利祥”和“永丰裕”等盐号盐仓打开，救济民众，共计1 318包，每包180斤，计237 240万斤。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前，仁岸几乎全部是“商运商销”。同年四月三日，“仁记中华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茅台设立了分公司，才改为官运官销。

### （四）永岸入黔路线及重要古镇

#### 1. 叙永入黔盐运线路

明代，由自贡张家沱出发，经釜溪河入沱江，进泸州，然后到纳溪上岸，转陆运到叙永。

永岸盐道至大定的陆路为：明朝初期，叙永至马蹄入黔龙场营经果瓦、大岩头、大山、松树、星宿、百纳到大定。后于清初改由马蹄至普宜经大石板、瓢儿井、打鸡阆到大定。此条古盐道上沿途多高山峻岭、沟壑险峰，起伏连绵，崎岖不平。险峻山岭有后山铺、雪山关、猴子沟、干灰槽、山王坳等大山，如雪山关，海拔1 900余米，常年积雪。后渐分为七条。




图 5-3-28　明代毕节地区驿大道



图 5-3-29　永岸第一雄关“雪山关”

“犍为之盐运至叙永县，分五路入黔”，《四川盐政史》记载。在我们实际勘查调研后。细分为十条，甚至更多条古盐道：

第一条为叙永至瓢儿井。从叙永至瓢儿井一共有四个驿站：摩尼（今摩尼街上）、马店头（今大文村六社）、普宜（今毕节市普宜镇）和瓢儿井。

第二条为叙永至普安厅（普安厅，清代行政区划。嘉庆十六年以普安州改置，治今贵州省盘县）。自普市边城启程（公元前135年，唐蒙开辟西南夷，开工修西南夷道，全是石板路，路面7.5尺宽，宽阔坦荡一段，为毕节东路，后称盐马古道，该道横穿普市全境，南通贵阳近1 000里，北至成都1 160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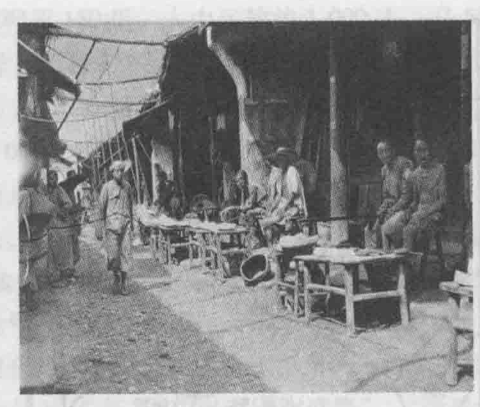


图 5-3-30　清末民初川黔盐道永岸叙永一瓢儿井（摩尼盐市一条街）



图 5-3-31　出售锅盐的盐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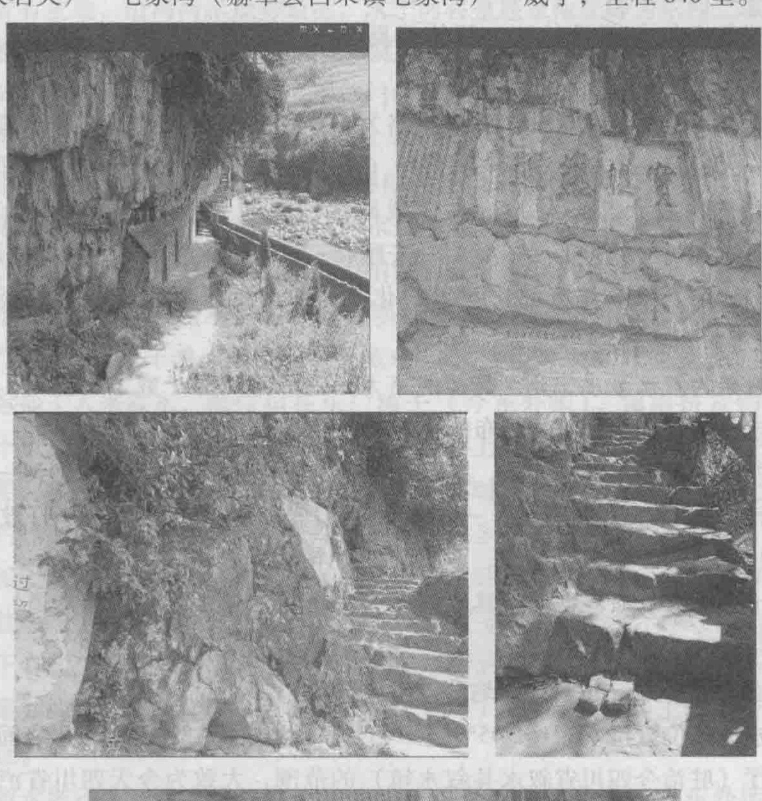


图 5-3-32　川黔贫民（背盐的“盐老二”）

经赤水河，翻越金银山经毕节，大兔场（纳雍雍熙镇，由于场期逢“卯”故叫大兔场）、南毗、水城、鸡冠营、代马到达普安（盘县），全程 910 里。

第三条为叙永至威宁州。具体线路为：毕节—七星关（七星关是贵州名关之一，遗址位于毕节市区 90 里的六冲河畔处，与娄山关和胜景关一起为贵

州三大名关）—七家湾（赫章县白果镇七家湾）—威宁，全程640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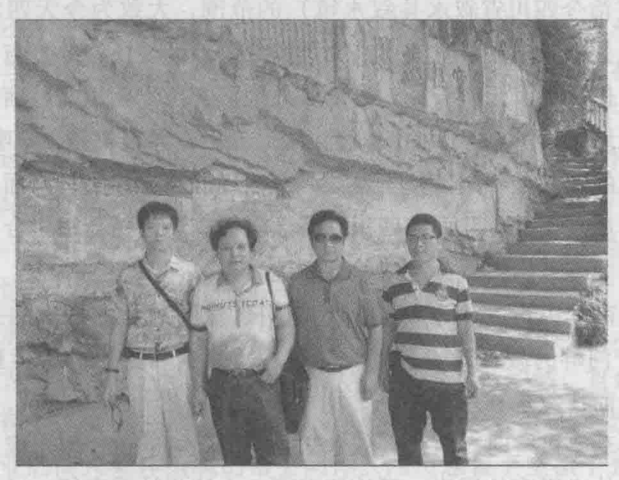


图 5-3-33　实地勘探大方县丁宝桢盐道

第四条为叙永至新城。具体线路为：七星关—挪呼—水城厅、八家寨（水城县阿嘎乡八家寨）—高石坎（纳雍勺窝乡高石坎）—立碑—地瓜坡（普

安县地瓜镇）—新城（今兴仁县），全程1 040里。

第五条为叙永至马姑河。具体线路为：七星关—黑童—马姑河，全程530里。

第六条为叙永至贞丰州。具体线路为：普宜（今毕节七星关下辖镇）—瓢儿井—大定府—免场—鸡场—郎岱厅（今六枝）—贞丰，全程共990里。

第七条为叙永至归化厅。具体线路为：瓢儿井—茶店（今织金茶店乡）—平远州（今织金）—三岔河—安顺府—归化厅（清雍正七年置威远营，八年置归化厅，1913年废归化厅置归化县，即今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全程共860里。

第八条为叙永至永宁州。具体线路为：三岔河（源于威宁三岔河）—镇惟州—永宁州（今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全程共730里。

第九条为叙永至打鼓新场。具体线路为：叙永—古蔺白沙—鱼塘河—清水塘（清池）—石革闹（石场）—沙溪（清道光初年改为平坝）—打鼓新场（金沙县城关镇），再分别向东、西南、西延伸数百里。

第十条：为叙永至贵阳。具体线路为：瓢儿井—马场（宝桢盐道）—扎佐—贵阳。

2. 叙永古镇——川黔边缘地带"双城记"

叙永地理位置位于东经105°9′至105°43′，北纬27°39′至28°30′之间。清代叙永厅（驻治今四川省叙永县叙永镇）的范围，大致为今天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古蔺县、纳溪县，宜宾市兴文县的部分地区，还有部分与贵州省毕节市、习水县、仁怀县及云南省威信县的临界地区，位于四川盆地南部向云贵高原过渡的边缘地带，"盖永宁北接叙泸，南通云贵，界壤相错，咽喉所系也"。

而今狭义的叙永是四川泸州下辖县，东面以四川古蔺县，南面与贵州毕节市，西面与四川兴文县，北面与四川纳溪区毗邻；东北面与四川合江县，贵州赤水市，西南面与云南镇雄县、威信县等地界连。

叙永厅内南北纵贯的永宁河是清代四川运输黔边盐的四大口岸之一，称"永岸"。永宁河畔的叙永双城是重要的川盐、滇铜和黔铅的转运码头和商贸集镇。外籍盐商在叙永县形成陕西、山西、江西、贵州四大盐帮，设立13家盐号，商贸活动盛极一时。清代，叙永知县开江门峡航道，叙永成为输盐于云贵之要道，船从自贡产盐区出，经沱江南下，入泸州纳溪南行，逆流而上进永宁河。到叙永上岸后，便由马帮负责将物资往云贵输送。物资交易有力地促进了双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功能布局的转变。

叙永城就修筑在永宁河切割的两岸阶地上，四周群山环绕，城建于丘陵地

带，皆有坡地，沿河两岸地势最低。永宁河将整座城池穿辟为东西二城，筑有蓬莱桥与永和桥连接之，西城北门原窝铅街（今陕西街）一带为重要盐粮码头。河水绕叙永西城西北而下，于江门峡合古宋河水，至纳溪注入长江，顺流可达泸州。明洪武二十四（公元1391年），曹震奉旨疏浚开凿永宁河至江门峡一带险滩，“水陡者平之，使舟楫得以通焉”，此后长期担负着盐粮、布匹、铜铅等物资由永宁河进入长江干流的水运任务。永宁河在历史上是叙永的运输命脉，川滇公路未通车以前，盐巴由纳溪到叙永岸口，全靠水运。但因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船只常有失事危险。明朝杨升庵曾在《咏永宁河》诗名中写道：“永宁三百六十滩，顺流劈箭上流难”①。这是对永宁河滩多水急的描述。码头运盐工人来叙永，都住宿在东门湾子（今东外街）、镇南桥及钓鱼台一带，十里长街两旁商店毗连，旅栈林立。码头上大小木船约二百艘，分为盐船和货船，盐船约占全部船只的百分之八十。其时，大的盐船每船可载盐二至三引，约计一百三四十包；小的每船可载几十包至一百包。每船有船工十至十五人。船上江门上滩时，需要有临时工人帮助拉纤，有时一艘船要动用百多人才能将盐船拉上大滩。盐船行业，约有船工三千余人，至今沿河岸边的岩石上，还留下有船工踏陷的脚窝和篙竿戳的密如蜂窝的石洞。“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窝”（苏轼诗《百步洪二首》之一）。这是广大船工辛勤劳动的历史见证。

叙永城还有古驿道通往贵州省的毕节。东城东门弯子（今东外街、坪上街一带）是当时由川南通往贵州和滇东北的主要大道，东城曾有十三家盐号林立，称之“盐店街”。川盐驮运至滇黔，返程驮回滇铜黔铅于叙永城交汇，再由水路转运入长江。今东城古道绵延三四里，具有川南民居特色的木板铺面、青石板路、青瓦平房、高门柱础、拴马石礅等还保留在老街两侧，陈列着昔日的繁华。至清光绪年间，赵藩为官分巡永宁道赋诗“负盐人去负铅回，筋力惟供一饱材。汗雨频挥搘柱立，道旁看尔为心哀”。

四川叙永是永岸盐运的始发点，以盐运为中心，明清时间，盐商帮派林立，相互间为争夺利益，钩心斗角，有的与官府、军队勾结，官商合污，狼狈为奸。光绪初年，叙永盐商组织创办永岸盐业同业公会（简称盐业公会），为经营盐运行业的商人集体组织的帮会团体。四川总督丁宝桢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整顿盐务时，叙永经营盐业的商人分为西、黔两帮，“西帮”有6家，为陕西、山西、江西籍商人组成，“黔帮”有7家，为贵州籍商人组成。

---

① 罗永忠. 叙永县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258.

两帮分别集资在东城购置房屋，成立帮会，西帮成立“秦晋公所”，地点在今叙永县人民医院右侧，后为历届盐业公会所在地，黔帮成立“黔帮公所”，地点在现人民医院住地（原忠烈宫）。民国初年，两公所合并，改名为“盐帮公所”。

在清光绪年间，云集在叙永的陕西、山西两省盐商，相约成“西帮”，为扩大势力、垄断市场，决定重修叙永县城的关帝庙作为会馆，祀供关羽神像。为了显示经济实力，秦晋盐商们筹集大量资金，斗胜显奇，以巨资请名工巧匠，历时6年修建春秋祠。其最引人注目的是木雕与石雕，在戏楼两侧走廊的8块装板上，用写生手法雕刻的“万寿朝霞”、“双桥夜月”、“铁炉晚照”、“定水晓钟”、“红岩霁雪”、“漫岭腾云”、“宝珠春眺”和“流沙悬练”等“永宁八景”尤为庄典，雕刻精美堪比颐和园排云殿。



图 5-3-34　叙永陕晋“西邦”合修的春秋祠堂

川贵同城的起始时间为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由四川永宁宣抚司改流设叙永同知（厅的长官）驻扎，与贵州永宁卫同治。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永宁卫改永宁县，属贵州威宁府，此时的川贵同治改由四川叙永同知与贵州永宁县分治双城，叙永西城叙永厅属四川治，东城永宁县隶属贵州治，由双城川省厅县分治演变到到直隶厅辖县驻治。厅治衙门与县治衙门在东西城交错互置，而且界壤相错，演绎中国历史上明清时期行政区划上的“双城记”，也是川黔人民血脉相连的见证史。

表 5-3-2　　叙永“双城记”空间布局一览表①

<table>
<tr><th>资料来源</th><th colspan="3">双城称谓</th><th>街署名称</th></tr>
<tr><td rowspan="2">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86 年）《叙永厅志》之《永宁疆域图》</td><td colspan="3">西城（四川城池）</td><td>永宁道署（演变至永宁县署）、永协署、中营守备、关圣庙</td></tr>
<tr><td colspan="3">东城（贵州城池）</td><td>叙永厅署、儒学署、右营署、左右营守备署</td></tr>
<tr><td rowspan="2">清嘉庆十七年（公元 1812 年）《直隶叙永厅志》之《双城记》</td><td colspan="3">西城（永宁县城）</td><td>永宁县署、县文昌庙、厅文昌庙、厅文庙、厅学、典吏署、参将署、千总署、守备署、常监仓、永税关、关帝庙、城隍庙</td></tr>
<tr><td colspan="3">东城（叙永直隶厅城）</td><td>叙永厅署、县文庙、县学、照磨署、东城汛、常平仓等</td></tr>
<tr><td rowspan="2">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 年）《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之《双城图》卷五</td><td rowspan="2">西城、东城即仍县厅分治</td><td rowspan="2">叙永直隶厅即驻治双城</td><td rowspan="2">永宁直隶州城即驻治双城</td><td>西城：永宁县署（迁古蔺）、参将署（后改叙永厅府）、县文昌宫、厅文昌宫等</td></tr>
<tr><td>东城：叙永厅署（后改参将署）、县文庙、县学等</td></tr>
</table>

3. 永岸盐运分流——瓢儿井

叙永至贞丰州和叙永至归化厅两条线路皆以瓢儿井作一里站，而到了清末民初，由于瓢儿井处于川黔要道上，入黔川盐则大部分囤积于瓢儿井，又由瓢儿井发往各地，这是瓢儿井特殊于其他里站的地方

瓢井镇地理位置位于东经 105°40′~105°42′之间，北纬 27°43′~27°45′之间。原名金狗场，因盐而兴，清道光年间瓢儿井集市至镇上开阔区域（原地在乐居乡境），沿用瓢儿井名。明、清至民国初年延续为黔西北商业重镇、物资集散地，为“永岸食盐运销集散之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因盐运改道，进盐数量锐减，瓢井盐业日渐衰败。最遗憾繁盛时期的古庙、古建筑几乎被破殆尽，仅仅见一些斑驳遗留的残痕。

兴盛时期全镇从事盐业人口多达五六万人之多。时至今日，镇中心人烟稀落，常住人口不到昔日十分之一，且镇上大半人祖籍是迁居而至的四川人，也可鉴，此镇是为川盐入黔盐运而诞生的集镇。

① 覃影. 边缘地带的“双城记”——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形态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1）. 有所改编。



图 5-3-35　大方县明清盐运瓢儿井段

《大定府志》载："故无桓产者日穷而日甚。转移执事，惟有负盐一役而已，故大定之民，幼者十二三，老者五六十，无不以负盐为业也。数步而肩换，三里而息喘，日食玉蜀黍之爆花，夜眠粗白菅之短席。一生无被，终岁衣缕。头鲜布巾，足惟草履。夏炙日，冬履霜。发岭穿林，冲风冒雨。一染寒疠，比户不休。此亦生民之奇苦者矣。"① 瓢儿井底层人民生活窘困，均是以背盐维系生计。瓢儿井至叙永的盐道，路径宽约 1~2 米，青石板铺就，数以万计的背盐人，长年累月，身体虚脱，气如牛喘，盘亘山间。每隔五百米，稍作歇气，不相识的背盐人的拐爬锥总叮在同一个地方，年长月久，便坑坑点点，在瓢儿井外围 140 千米山路的石头上，大小深浅盐运历史痕迹随处可见。通过实地清点，瓢儿井山王庙路段一块石头上竟有 47 个拐爬锥凿就的小圆窝。因之，赵藩在《永宁杂咏》一诗中感慨："负盐人去负铅回，筋力唯供一饱材。汗雨频挥揹拄立，道旁看尔为心哀。"确证明清时期运盐人真实生境。

表 5-3-3　　　　永岸运盐里程及运价表

| 交地 | 路线 | 里程 | 一担（100 市斤）运价（银元） |
|---|---|---|---|
| 毕节 | 叙永—毕节（12 天） | 360 里 | 5 元 7 角 6 仙（仙即分） |
| 瓢儿井 | 叙永—瓢儿井（13.5 天） | 300 里 | 4 元 8 角 |
| 赤水河 | 叙永—赤水河（8 天） | 185 里 | 2 元 9 角 6 仙 |
| 摩尼 | 叙永—摩尼（6 天） | 130 里 | 2 元零 8 仙 |

① 黄宅中. 大定府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0：258.

明代，往来于川黔的盐商皆为散商，各自负责购、运、销业务。至清代康乾时期，由于盐运业逐渐发展，盐运规模愈来愈大，为保证盐运安全，盐商自发形成联合体，分帮分派，各自采取措施维护自身的利益。

咸丰初年，井镇街上周次文等五姓人家获得盐业执照后，首批定名兴起的盐行有六家：一是周次文家，名为“万兴行”；二是王天福家，名为“永兴行”；三是吴复兴家，名为“复兴行”；四是黄永兴家，名为“黄氏永顺行”；五是盖鸿泰家，名为“鸿泰行”；六是王福顺家，名为“福顺行”。至此，瓢儿井街上，经过清初以来100多年的盐业购销活动，形成了有营业证照，有相当经营规模的盐业商人。

丁宝桢整顿盐政之后，实行官运商销，当地商人坐地进盐，又批发往各地，从中牟利。由于瓢井盐市兴旺，外地商人不断涌入，带进雄厚的资金，使瓢井的盐业更加兴隆，当地行商有的将证照转与外地商人，坐收盐利。从叙永到瓢井，每天有数千人运盐，井镇街上每天进盐60吨左右，又从瓢井发往大定、纳雍、织金、普定、郎岱、安顺等地。在盐的购销过程中，成就了大小盐商财富的积累。为了平衡势力，本省盐商和外省盐商在瓢儿井形成几大帮派，帮派垄断了瓢井的盐业市场。光绪年间盐商逐渐划分为“黔帮”和“西帮”，形成了八家大盐商，承办官运商销，史称“八大字号”①。黔帮4家，为贵州盐商：永昌公，华姓盐商，贵州遵义人；天福公，贾姓盐商，贵州贵阳人；崇修公，刘姓盐商，贵州安顺人；三益公，陈姓盐商，贵州贞丰人。西帮4家，为陕西盐商：永福公，常姓盐商，陕西汉中人；长生公（或黔福公），盖姓盐商，陕西石泉人；集成公，冯姓盐商，陕西三原人；吉利公（或天成公），曾姓盐商，陕西岚皋人。

由于年代久远，瓢儿井老人对八家盐号，只知其首创者、姓氏、籍贯和盐行称谓，其余资料不可详考。八家盐号的形成，标志着瓢儿井的盐运业进入了一个空前兴旺的时期。陕西盐帮公建春秋祠，贵州盐帮公建忠烈宫，又称黑神庙，为其兴盛时期代表性建筑。

清朝末年，八大家盐号逐渐分化演变，或资金短缺，或经营不善者，逐渐被代替或停业。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盐号撤商，取缔“官运商销”，改为“官督商办”。盐运政策的改变，使八大家盐号演变新增到十九家，代替了光绪年间盛极一时的八大盐号。具体见下：福泰永，属陕西帮，掌柜王甫臣；仲记，属陕西帮，掌柜李耀堂；豫记，属陕西帮，掌柜张绍庭；井锐记，属陕

① 《瓢儿井镇志》内部资料加实地采访汇编。



图 5-3-36　田永国向当地老先生了解瓢儿井盐运情况

西帮，掌柜朱锐卿；公合长，属陕西帮，掌柜席绍庭、张集贤；信诚，属陕西帮，掌柜朱常五；吉安合，属贵州帮，经理曾昭文；天顺成，属贵州帮，经理黄芝荣；恒泰永，属贵州帮，经理程华堂；裕厚，属贵州帮，经理熊作霖；恒合昌，属贵州帮，经理李辅弼；德厚长，属贵州帮，经理罗厚安；焦双发，属贵州帮，经理焦慎安；谦信通，属贵州帮，经理李茂兰；全盛，属贵州帮，经理刘国安；云福长，属贵州帮，经理刘杰堪、李汉民；永福祥，属贵州帮，经理高炳南；德福昌，属贵州帮，经理冯锡荣；兴顺荣，属贵州帮，经理樊耀堂；谦合永，贵州帮，张集贤、张柱臣。



图 5-3-37　当地人提交的瓢儿井“八大号”名单

瓢儿井盐号的增加，促进了各业兴旺。每天数千人马流，进出井镇街，人背马驮，络绎不绝。四川省的花纱、棉布、糖、油、纸张，长江沿省的化工用品、织布机床、苏杭的绸缎，沿海省份的海味等商品也大量进入瓢儿井市场，形成区域性综合市场。

1916年盐政改革之后，在叙永取消公司转运，实行“有限制之自由贩运”。散商经营，竞争激烈，瓢儿井各盐号商家各显神通，促进盐运业的极大发展。部分商人在瓢儿井和叙永两处设盐号，形成“钟摆式”经营。1931年，叙永盐号发展到50家，划分为“运商”和“销商”两帮，运商由犍为或自流井购盐运至叙永，销商由叙永将盐运往贵州瓢儿井、毕节、安顺等地销售。当时叙永有销商34家，其中又有兼营运商的，公合长掌柜席绍庭、张集贤在瓢井以公合长盐号为销商，而在叙永以公合长盐号为销商，又以“谦合永”运商牌名为运商，个人资金有大洋20余万元之巨，为瓢儿井盐业镇头。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四月，原来在叙永经营的销商的20家盐号联合，通过会议商讨，成立“永岸川盐运销商联合营业处”（简称“永岸营业处”或“永岸盐号”），决定实行“官督商办”的“统制商”（或称“捆商”）制度。根据各盐号原在贵州承销食盐地区，划分为“井”、“毕”两个组，承销瓢儿井方面的为“井组”，承销毕节方面的为“毕组”。

20家散商盐号合并后，整合为井组12家，毕组8家，其中又有3家井、毕两组皆有投资。川盐实行捆商，瓢儿井所有盐号合并为四个总仓。管理四个总仓的机构为“永边川盐营业处瓢儿井分处”，办事地点设于财神下过街楼（卷洞门）的老仁记内，经理张柱臣。1938年移设大定城内北街符姓房内，经理不变，副经理刘国安。营业处董事会设叙永县东城，董事长李复初，副董事长袁昭民。营业处总处设在贵阳福德街（今富水南路），总经理刘熙乙，副总经理孙蕴奇。



图 5-3-38　瓢儿井盐仓旧址

其间，四川盐政管理局要求销、运两商必须筹足资金大洋100万元，方能核准登记承办。销商资金，由20家散商盐号筹集，议定每家最少必须出资2万元为一股份，各自资力不同，有的出1份，有的出2份，有的出1份半，不

足1份的由其他资金有余的盐号代为筹足。其结果筹集资金72万元，只占20家销商资金的50%不到，有剩余资金的盐号，则将资金转营其他行业或购置田产，进行地租剥削。云福长李复初父子在贵阳安顺贩运棉纱入川，在叙永购买田地200余亩，购房10余间；谦合永张集贤、张柱臣2人在叙永合买田地140多亩，并将大部分资金调贵阳交该号主要股东席绍庭开当铺等。

盐业实行捆商，部分盐商从专营盐业转向经营多业，井、毕分组，标志着瓢井盐业由兴盛逐步走向衰落。井、毕分组之后，井组人员多系盐业界老手，行情熟悉，善于经营。如在川滇公路未全线通车以前，即在摩尼设立转运站，以此为运输中心，囤积大量盐斤，缩短运盐至瓢儿井的途程。因此，运盐及时快速，资金周转灵活，运、销两旺，获利匪浅。加之瓢儿井分处经理张柱臣，年富力强，指挥得当，井组获得利润远远超过毕组。

在此期间，毕组抬价售盐（超过官核最高价）。贵州盐局察觉，派邓长胜来毕节检查。经理刘熙乙出面求情，向邓贿赂大洋4千元，抬价之事烟消云散。同时瓢儿井方面个别人员也在大定抬高盐价。邓到瓢儿井检查，张柱臣因未参与其事，据理反驳。邓未得贿赂，遂迁怒于张，告到贵州法院，诬张“抬高盐价”，将其拘捕，解送贵阳判刑三年。不久，盐政当局突然提出，要求永岸盐号增资为法币600万元（时法币与银本位相等），并强制井、毕两组合并。永岸盐号于1940年底召集各分支处、站经理及股东到叙永开会。毕节分处经理刘熙乙掌握各股东状况，提出各股东能增多少算多少，其余的由他负责，当场得到孙蕴奇等人的支持。其时，井组股东（即叙永帮和西帮）由于张柱臣被关押，受到沉重打击，无论资金或人力都走向衰退，几年利润，绝大部分没收走，除以此转作增资外，已无能为力。刘熙乙玩弄伎俩，顺利地取得了永岸盐业的大权，占据了大部分股额，并通过会议决定：撤销井、毕两组，合并为一个统一核算组织，将总管理处迁移贵阳，叙永改为分处，迫使各股东“推选”他为总经理，孙蕴奇为副总经理；同时成立董事会，选举李复初任董事长，李厚芳任副董事长，董事会办事处设在叙永东大街。随即将瓢儿井分处改组为转运站，原大定、水城两转运站，改组为大定分处和水城支处。

瓢儿井改作转运站后，接受永边川盐营业处大定分处的领导。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大定分处改为“官盐永边销区营业处大定分处”，主任古玉臣，副主任程华堂。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管盐永边销区营业处大定分处由北门符姓房内迁到南街孙蕴奇住宅，主任孙昌贤（号际闻）。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名称未变。先后任主任、经理的有孙际闻、段承修、王栗初、刘尧年等。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巨商孙蕴奇由刘熙乙、伍效高和他本人集资办的仁岸盐业利民盐号分伙出来，开设黔仁盐业公司，不久其弟孙际闻又将永岸盐业垄断，开设新记盐号，孙际闻任总经理，周匡时任副总经理，总号设于贵阳富水中路，分号或转运站有重庆、自流井、五通桥、泸县、纳溪、叙永、毕节、瓢儿井、大定、安顺等处。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前后，黔仁盐业公司、新记盐号在重庆设的分公司、分号兼营存款储蓄汇兑业务。该公司、盐号以“子金”（利息）为诱饵，吸取市民、职员存款，以利其盐业资金的周转，便于调拨货币。因国民党人事变动，贵州省主席杨森调任重庆市长，刘熙乙、孙蕴奇失去了有力支柱，再加上货币贬值，物价飞速上涨，存款户不求息金，要求取现款，从厂上到销区需要大量资金（包括运费），造成盐斤积压，资金周转调换不灵，“头寸”（货币）大量奇缺，在几股麻绳一齐紧的情况下，首先重庆新记盐号宣告倒闭，不久沿岸各号亦先后歇业。

1942年川滇公路通车后，盐运改道，瓢儿井盐运业逐渐衰落。井、毕两组合并后，总号迁贵阳，总经理刘熙乙大权在握，将瓢儿井分处改组为转运站，盐号迁居大定。井、毕两组争夺的结果是，以刘熙乙为首的势力集团取得巨大发展，而以李复初为首的叙永帮、西帮（原井组盐商）彻底走向衰败瓦解。1943年，法币贬值数十倍之多，永岸盐号所赚的利润是几百倍，可是许多股东没有分到红，而是继续转作增资，待后来法币贬值如同废纸时，叙永、瓢井一些股东的投资即化为乌有，到永岸盐号结束时，有的仅分到一点家具，有的生活无着落（如瓢儿井分店经理古玉臣），有的回家无路费（如陕西人张诚久），有的死后无安葬费（如赵笃卿），境遇十分凄惨。部分盐商审时度势，归隐乡里，退出盐业后，安分守己，另寻谋生途径。大巨商刘熙乙吃掉井、毕两组，身兼数个要职，腰缠万贯，社会活动达到登峰造极。抗战胜利后，刘欲控制全省盐业，违规操作，被贵州省主席谷正伦、贵阳市长何辑五拘捕入狱。涉及瓢井盐业众多商人中，席少庭1935年卸去军职，移居贵阳，继续专事经营盐业，长期活动在贵阳、大方、瓢井一线，善识时务，守法经营。1949年11月大定解放，席慷慨无偿捐出川盐3 000千克，支援人民政府。

1947年1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盐政进行改革，场盐停止官收，停办委运，取消专商，实行盐运开放，对原有保障各盐区的配额、引岸、销区以及引票的一切限制，全予以取消，改由盐政总局视盐产及各集散据点需盐情形，随时布告招商登记办运。因此，原来的一岸一商专运制度已无必要，盐政总局令饬撤销统制商组织，永岸盐号遂于1946年年底宣告停业。

永岸盐号自1937年4月成立，至1946年年底结束，为时10年。在此期间，由于全体职工人员的积极努力，或支援抗日战争，或供应后方军民需用食盐。但在当时政府不断压榨及货币贬值的摧残下，无法继续扩展其业务。

1947年以后，刘熙乙、孙蕴奇在彻底取消统制商的形势下完全垄断了永岸盐业，重新组建永济盐号和新记盐号。其时瓢儿井与两盐号已无业务往来。伴随着抗战结束，长江畅通，淮盐上运，川盐外销受阻。至1949年6月，永济（后改为“永一”）盐号在困难重重中宣告停业。1949年11月黔西北解放，永岸大小盐商们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终究成为了历史。永岸盐商发展脉络是贵州盐商真实的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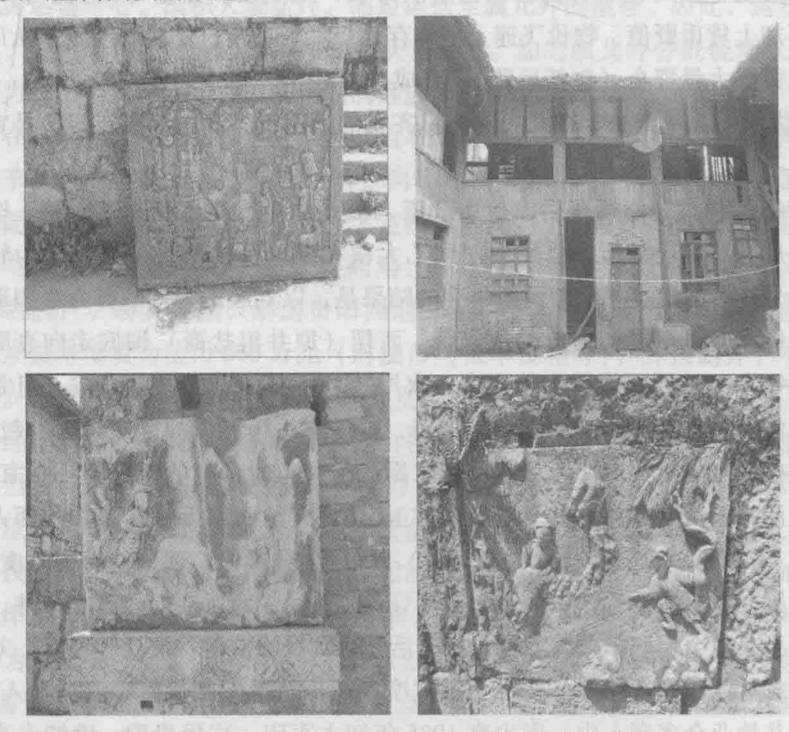


图5-3-39　实地考察瓢儿井盐号建筑残骸

4. 从兵营到商镇——九百年盐运沧桑打鼓新场

金沙城关镇地理坐标：东经106°20′~106°23′，纬度7°26′~27°27′之间。扼兵家之要地，通水东水西之盐道。北宋大关元年（公元1109年），牂州彝族首领额则割据一方，建立罗氏（亦施）鬼国，牂州彝族信尚鬼，号正祭者为鬼主，罗罗鬼主，世居大方。鬼主在矩、清、龚、义各设四大打鼓寨，保卫四疆。其中义州之打鼓寨，也即打鼓新场，东制播州道，西通姚州鬼国行政核心地带，南奔姚州黔西区域，北控蔺州（四川古蔺县）。城镇西乌蒙高原，东瞻



图 5-3-40　现在的瓢儿井全景

一马平川，溪流广布，交织成网，为兵家扼要之塞。

如前所述，元爱努开乌蒙出兵湖江抵达叙州（今宜宾），荡平乌撒路，十七年（公元1280 年），发兵千人协同洞蛮开道，缔清罗氏鬼国土寇之乱，拉通思播之间通道，十九年（公元1282 年），元廷调四川、云南、湖广军进讨罗氏鬼国部族亦奚不薛，开道水西与云南驿站，连通湖南经平溪 、镇远、黄平、播州、水西至乌撒的另一条东西大道。在打鼓寨以东 3 千米的沙溪河玉屏山南麓低丘平地，水西通往播州的主道，设置沙溪等处长官司驻所，其也是明代沙溪巡检司驻所。同时由湖广商人开创兴起了商业集镇——水兴场，这就是打鼓新场之老场。

此场开至明代 50 年后，商道兴旺，已经有较大规模的盐行（包括仓储、转运、批销），为川盐行销水东、水西（宋朝末年，额果濮贤以鸭池河为界，将贵州分为水东、水西两部分，因慕俄格的政治中心在水西，所以后来“水西”一词就演变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区域名称，即彝族阿哲部贵族长期统治的区域，后世也就称慕俄格家为水西家。水西势力最大时，不仅统治着“今大方、水城、黔西、六枝、纳雍、织金、金沙、威宁、毕节等地，还包括今息烽、修文、清镇、平坝、普定等地；今鸭池河以东贵阳地区及龙里、贵定和惠水等地称之为水东）的连接通道”①。永兴场呈扇形分布，地脉辐散，人脉辐辏，四川、湖广商贾云集。永兴场先后经历了唐、何、骆、刁姓场主，经营最为成功的商家是骆成香、骆应麟父子。

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6 年），打鼓寨张姓为场主，首开新场，与永兴旧场同赶集，每逢三、六、九，且打鼓新场地理位置更为调适，西、南面为乌蒙

---

① 贵州省金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金沙县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212.

山区，西北、北部为低丘田坝，新场胜过老场，商业兴旺。

新场地扼要川、黔孔道，开场后近300年，恒为川盐运黔主要转运倾销通道。在清光绪以前，盐业散商，陕西、四川和本地盐商就在新场骡马街设大盐行（后叫故号），来盐地点不定，四方汇聚。有直接从自流并、页井起运的，有在泸州、叙水等地接手转运来的，盐路主要是如前所述。永岸盐号站：叙永—古蔺白沙—鱼塘河—清水塘 —石革闹 —沙溪 —新场，再由新场如盐流如扇形向东、南、西南、西各方延伸出去数百里。光绪十二年（公元1876年），四川巡抚丁宝桢统配永、仁、綦、涪四岸盐销，此地则为仁岸盐的号站：茅台—打鼓新场—滥泥沟—卫上—定番。

当时盐远使华联辉在新场骡马街开设有协兴隆、永隆裕、义盛隆、水发祥4家盐号，川、陕盐商和本地盐商集资开设有荣顺通、水盛隆、大吕荣3盐号。接收出茅台同号起运来盐，又发往滥泥沟交同号秤收，每日交盐和起运盐，人背马驮，在镇上形成长长的盐队。盐的运销是打鼓新场古镇繁荣的主业。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后期，川黔、川滇东公路陆续修通，仁岸盐只运到新场，新场盐务的范围有今县城及黔西三重堰、中平，遵义鸭溪、凤香、马蹄和萍水。

明清以来，打鼓新场已经串通经遵义过桐梓至綦江止重庆之路，开辟了由岩孔到茅台经赤水抵合江之道，凿通由石场穿清池涉鱼塘河达古蔺之径，连接跨黔西达毕节达安顺之途，理顺越黄沙河过九庄汇贵阳之路。

由上可见，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至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打鼓新镇已经成为以仁岸为主道，永岸为偏道的食盐集散地。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盐商筹资培修茅台经鲁班达枫香盐通，这一时期经安底的境内盐道逐渐形成，且盐号增多，活跃了新场盐市。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继修长岗、枫香盐路达马蹄、中渡到安底，使安底逐渐形成仁岸另一趸售站，广设盐号，商势繁荣，于民国初建成新街。贵州半个省的食盐几乎均由新场趸售站和安底趸售站中转、出售。打鼓新场由此而成为黔北第一商镇。

### （五）綦岸系列盐道古镇

#### 1. 綦岸盐运古道

綦岸由自贡张家沱出发，经釜溪河仙市进入泸州，然后到江津、重庆，转而南下，到达綦江，溯綦江上运至贵州省桐梓县属的松坎起岸，再陆运到遵义、正安等县的部分地区。因这条运输线路，既要经过四川省的綦江县城，又由北向南贯穿綦江县境，故名曰綦岸。

綦岸的盐运，从自流井将食盐船运到四川省江津县的江口，然后沿綦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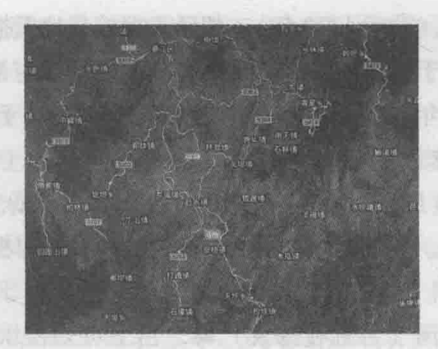


图 5-3-41　綦江—松坎为綦岸盐运主脉

（贵州境内称松坎河）上运。从綦江与长江的交汇处到贵州桐梓县的松坎，水运路程约为 150 千米，分为三段进行运输。首站从江口出发，经綦江县城到达羊蹄洞。在羊蹄洞将盐包转入稍小的木船，经赶水等地继续上运至盖石洞。再次换成更小的木船，经界牌入贵州境，到贵州桐梓县属的松坎起岸进仓，然后陆运至各销售地区。陆运道路主要有四条道路：第一条，由松坎至遵义城全程约 150 千米，经红花岗、板桥、泗渡、排军、蒙梓桥等集镇到达遵义城。然后从遵义外运湄潭、息烽、瓮安、黄平等县。第二条，由松坎一路去绥阳县的食盐销区。第三条，由松坎途经蒙渡、新站、楚米鳙、元田坝等集镇到达桐梓县城——娄山关镇。第四条，由松坎入正安县。松坎通往正安县的陆运盐道有两条，一条到正安县城凤仪镇，一条直达正安县属的安常镇。专供销售正安、道真两县绝大部分地区所需食盐。

据《贵州省工商史料汇编》记载，从清代中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的近两百年中，綦岸食盐的销售地区除黔北的桐梓、遵义、正安、绥阳、道真、湄潭、凤岗、习水等县外，还有其他地区的息烽、清镇、平坝、龙里、贵定、福泉、瓮安、黄平、施秉、镇远、三穗、玉屏、锦屏、合江、剑河等县。1935 年川黔公路全线通车后，綦岸的食盐开始用马车、汽车运输。抗战时期，綦江的羊蹄洞至松坎段河道，亦曾多次进行修整，使盐船能顺利进入黔北的桐梓县境内。

2. 千年古镇——桐梓松坎

桐梓松坎古镇地理位置位于东经 106°50′~106°52′，北纬 28°31′~28°32′之间。

桐梓是唐代的夜郎。唐贞观十六年（公元 642 年）设置的夜郎县，史学界称之为“唐夜郎”的桐梓经历唐、五代、宋存在了 478 年。早在秦汉时期，川黔古道经由夜郎、荣渡、蒙山、娄山过县境，以连接云贵川至中原，已经形

成雏形。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朝廷于桐梓县地置播川驿、桐梓驿、松坎驿，后增设夜郎驿于播川、桐梓两驿之间。明朝廷平定播州杨氏，“改土归流”后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置桐梓县，隶属于遵义军民府（后改称遵义府），归四川市政使司辖制。“县治初设桐梓驿（今县境中部新站镇郊），以驿名为县名，后迁播川驿于毛田冬青坪（今县城）筑城没治。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随遵义府改属贵州省至今。明清时桐梓一直为兵家必经之要地。”①

松坎镇位于松坎河（古称夜郎溪）畔，由上可知松坎一词载入史册是明洪武六年以辖地置播川、桐榨、松坎弹。因其扼川黔咽喉，早在唐朝，古道改经松坎入四川。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松坎设安边厅。明末“改土归流”，设松坎汛署、巡检司。綦岸开辟，为川盐入黔第一镇。亲眼目睹运盐艰难景象的佚名诗人在《松坎擢歌》中叙：柜岩北去水越低，舟小能翻万仞梯。可叹波涛如此险，行人犹羡夜郎误。下水船飞似羽翰，上水船移寸步溪。去船遥指来船说，明日回头总一般。

清朝道光年间，三四千人来往熙攘，每日停泊盐船数百艘，库盐再由牛马车、鸡公车，或肩挑背扛运往黔北各地。

3. 黔北商镇——湄潭永兴

（1）永兴场的商业地理位置

湄潭永兴镇地理位置位于东经105°33′与105°35′，北纬27°51′与27°52′之间。

永兴场，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实行“屯田制”而渐兴起之村落。古称马桑坪，居于遵义至思南、铜仁入湘鄂的咽喉要道，素有326年“一脚踏三县，三个菩萨面对面”之说，因屯兵，分别隶属石阡、施秉、湄潭。

湄潭县15条驿道，共计803千米，途中皆有渡口、关隘、桥梁联通驿道，每距7.5千米或10千米左右设置驿站。马桑坪位于遵义至铜仁驿道，东北向经凤岗穿过铜仁区域可达湖南，正北向经正安过道真可抵重庆，西南向贯湄潭、瓮安通贵阳，东南向连湄潭通余庆穿黔东南达广西。可谓“四正四隅，互联八达”②，具有良好的商业地理位置。

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七月二十二日开市更名为永兴场。从明代中叶以来，随着江西、陕西、山西、四川、湖南、广东、广西等外省的商人涌

① 犹海龙. 桐梓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12.

② 湄潭县志编纂委员会. 湄潭县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25.

入，永兴的商业空前繁荣，成就为“万商辐辏，百货云集，黔省一大市镇也”。

（2）永兴场盐业盛衰历程

永兴镇是黔北四大商业重镇之一，成为盐筵售站节点。明朝盐商起平越卫仓（今福泉），过瓮安，至袁家渡（今沿江渡），穿湄潭县城，抵永兴场分销。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采取“划定边岸官运商销”永兴场，归于綦岸范畴。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准同永兴场商运商销。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剿灭黔北号军，用炮船济运袁家渡至湄潭盐船。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盐政大臣载泽奏准朝廷将食盐“官运商销”改为“盐道专司，俾专责成。”

为了安抚边境，朝廷时松时紧对黔减关闭卡，从永兴场可见。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兵部向朝廷《防止类似播州叛乱六策》中奏请“召回中使，收拾人心，停止课税”。康熙十一年（公元1682年），湄潭知县杨玉柱向云贵总督上疏条陈：“商贾宜通，应减关并卡，统一课税……课无亏，百货集，民商余。”① 总督万员部院批复：“作何裁并，择定饬行”。雍正年间，地方官员增设关卡，强征课税。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下诏令默省“山场小税已经征收大税，若分贩小场又复抽税，重叠征敛，催头衙役更得借端索要，甚为不便，着照黔省通例，一并加恩豁免。”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户部又恩准“小民零星用，自应革裁”。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九月，针对遵义、湄潭等地方官府衙役私设关卡从19处增至40处，道光下诏令“严行革除”。光绪三年，诏令对征收盐税实行“统一抽厘，禁止一切私索”。

暂时行政的宽松政策，带来了永兴场盐市的繁茂，到清朝晚期，永兴场的盐源来自松坎，在湄潭马头山场设置中转站点，永兴场有十几家盐号。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湄潭县长严溥泉令永兴区长任宅三选址筹建“世美盐号”，为川盐运销局第二营业处。负责转运瓮安、凤冈、余庆三县食盐。因地址窄小，为稳定物价，“世美盐号”只求承担永兴食盐批零，永兴盐号及盐商逐一在历史沧桑中沉没。

（3）永兴场传统空间特色

永兴场呈柳叶状脉络，“一街八巷”的立体空间布局。网状的街巷纵横阡陌交错，永兴的巷“宽窄兼备，深短随宜”，巷里有院，院内存巷，巷院相连，院巷相通。院巷回环曲折，达到“移步换景”的视觉享受。

---

① 周开迅．贵州商业古镇永兴·穿越时空的财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79.

气派典雅、精细幽深的深宅大院错落其间。典型有李氏古宅、欧阳曙宅、李家院子和安家院子等，保存下来的均以砖木结构为主，规模宏大，基本轴线对称，主次分明，院落精细幽深，室内装饰华丽，厅堂的梁、枋木雕优美，门楼砖雕工、艺精湛，保留着大量精美的窗花，兼具北方四合院的方正大气、南方苏州园林的柔美风雅。

形制朴实，经世耐用，宽敞大度的临街铺屋严整有序地在柳叶街延展。古镇内大量留存的是形制朴实的临街铺屋，一般以木结构一进为主体，间或穿插两开间或者三开间。一般为两层，一层大都是可拆卸的排式板门，比较开敞，方便经商；二层为居住空间或者作为储物空间，相对封闭。这些前店后宅或下店上宅的临街铺屋沿街巷密集联排，平铺式展开，形成了有序的群体空间。

永兴场的街巷、深宅大院、临街铺屋似凝固的咏叹调，在感伤一个盐运时代的流逝，在默默延续永兴场的文脉与商脉。

（六）粤盐销售路线系列古镇

前述“粤盐入黔的运行线路是梧州、柳州，又分别经长安镇至古州，一经庆远、怀远、六寨、独山至贵州省黎平府隶属的古州及兼销永从、独山、荔波，属大江埠引地范畴。粤商运盐至梧州而止，自梧州由贵州行商再赴各荒远之区；以古州为总埠分拨三个子埠销售，设置丙妹（从江县丙妹镇）、来牛、三脚屯（今三合，山都县境）三埠销售”。

1. 古州总埠

古州（今榕江）地理位置位于东经 108°45′~108°6′，北纬 25°36′~16°27′之间。

清朝嘉庆年四年（公元 1799 年）、七年（公元 1802 年）两任古州厅同知在其《古州杂记》中叙“境内有溪河三道：一车江，发源于正北之巴王，育洞；一都江，发源于独山州属烂土司地方；一榕江，发源于西北之崩坡塘。三江水分流至东，汇会合流直入广西界成河”①。古州所在之地，八开河（都江）、寨蒿河（车江）、平永河（榕江）奔涌而汇入三江口，当时形成宽约 250 米的深水水域，使之成为天然良港和黔桂水上重要交通枢纽。

“黔省向食川盐，古州距蜀较远，限于负贩。开辟后改食粤盐，由广东运至古，运商武林俞氏领行转运，责成古州同乡督销，设有总埠，黎平、丙妹、三脚屯分设子埠，源源接运，遂成水陆通衢。境内除镇标兵丁及屯军外，悉系苗人流寓，汉民绝少。自设盐埠以来，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贸迁成市；各

---

① 贵州省榕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榕江县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223.

省具建会馆，衣冠文物日渐饶庶。今则上、下河街俨然，货物流通，不减内地。”航运开通，盐运繁盛，四方盐贾蜂拥而至，三江口水面“百舸争流，千帆竞发”。道光年间，码头停泊盐船近300多艘，货物年吞吐量1.7万吨。正如清文人郑子尹所云“三江尽朝东，货转无诸城；咽喉导黔粤，管钥通梁荆（指京城、湖北、湖南等地）”。“生苗巢穴，梗隔三省，遂成化外”，以至“叠方石筑城”，建成“苗疆第一防区”，一跃成为都柳江流域东部三县（黎平、从江、榕江），辐射黔南三县（荔波、独山、三都）重要“财源茂盛达三江”的盐运码头。

盐运码头充分利用地形，建于三江汇合之处，长约150米左右，正中并两排红砂条石砌成的30级梯形阶步，左梯道宽约4.4米，右宽10.7米。左右设月芽坪、方形坪坝各3米，以利于卸盐停货。

典型的盐运建筑有两湖会馆、福建会馆、广庆会馆、贵州会馆、广西会馆、江西会馆与四川会馆，并且有保留完整的贵州古衙门建筑群——古州镇总兵署。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设置古州镇，兵营辖制都匀、从江、黎平、天柱、镇远、台江、凯里、黄平、台拱等州府协营。



图5-3-42　古州两湖会馆（乾隆年间建造）

两湖会管经同治十一年、光绪十二年、民国五年、民国三十六年及2012年多次维修，成图片塑型如图5-3-42所。会馆坐西朝东，建筑格局中轴对称，过去完整建有牌楼大门、戏楼、两厢、正殿、后殿，占地1 226.4平方米。

2. 黎平翘街

黎平翘街，原称“东门街”①。街顺坡势而建，因两头高，中间低，形似

① 黄家服，段志洪. 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光绪黎平府志（一）[M]. 成都：巴蜀书社，2006.04.

翘起的扁担而俗称“扁担街”。始建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经数百年的发展，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历史街区风貌，街道两边明清古典建筑林立，至今保存完好。清朝至今，翘街是黎平城商贸活动中心，其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市井繁华。翘街巷道主要有马家巷、姚家巷、张家巷、双井巷、大井巷、左所坡等，巷道之间卵石铺漫，石梯连接，两边封火墙林立，古色古香，是黔东南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建筑群和堂匾、字号来看，当时翘街盐店铺林立，成为南侗地区的食盐交易中心。



图5-3-43　黎平翘街街景

（七）明清淮盐口岸古镇系列

前述淮盐以湖南省辰溪为口岸分三路运黔：一路溯辰水（又名锦江）至铜仁，沿大道分销松桃、玉屏等地；一路溯沅水至镇远集散；一路溯清水江船运至邦洞起岸，沿驿大道陆运至天柱、锦屏、黎平销售。

1. 铜仁古镇

（1）铜仁古镇的地理位置位于东经107°45′~109°47′，北纬27°7′~29°53′之间。

《铜仁府志》载“铜仁居省治东北偶，西南与思南、石阡接壤，北则蜀，东则楚”。黔东北门户——铜仁，东面与湖南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怀化市接壤，北面与松桃县、重庆市秀山县毗邻，西、西南与江口县、黔东南自治州岑巩县相接。

明朝嘉靖年间乡贤蒋其才云：“铜水交流汇两川，光涵晓翠日浮烟。柳荫疑占西湖地，花气微醺二月天。夹岸香风吹馥郁，四周山色染鲜妍。渡江应有寻春客，玉管今宵坐满船。”

一碧锦江婉约穿城而隔两岸。“铜仁江（锦江）有二：一曰‘大江’，一曰‘小江’。大小江皆发源于梵净山以东。大江有支二：一出刘家溪，入宇罗

江，迳太平场；一出太子石，迳金盖坪，入交界河。二江合于江口，至府治江宗门外，与小江汇此。其小江出腰带山，入寨英河，迳桃映、客寨，由府治西南入大江，汇于铜岩下。”① 大小江东流经文昌阁入湖南省境内，至辰溪汇入沅江。锦江干、支流全长 416 千米（铜仁辖区 279 千米），其中干流闵孝河至辰溪长 305 千米，支流寨英河至铜仁长 81 千米，小江口至两河长 30 千米。

“二水潆洄昼夜流，跨鳌亭高江心峙。”三面滨水娇柔秀美的铜仁城，水上交通通达方便，有如“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利为舟楫”，舟楫之利兴旺铜仁。“地居辰、常上游，人多好巫信鬼，贤豪亦所不免，颇有楚风”，具有浩荡的胸怀铜仁，汇众溪成河，集商流成市，俨然成就为一方“舟楫所通，商贾所集”之地。

锦江在明清承担着繁重的兵要辎重、军民粮食、食盐、木材、汞的运销。上溯宋代锦江水系已经凿通达洞庭湖，粤、湘、川、赣客商逐利而趋，坐地收购，常逆水船运日用百货、食盐、陶器换取当地土布、桐油、花生、五倍子、土碱、牛皮等土特产后顺水而出。明、清旺盛时期，江面“商贾帆樯、络绎不绝”，素有“黔东门户”、“商镇重地”之誉。

清末至民国中期航运最为鼎盛。锦江河城内流域仳秩然有序地排列在下南门、中南门、西门、江宗门码头。船舶昼夜穿梭，船号子声音此起彼伏，江面星火闪烁。湖南上来犹如沈从文《长河》第六篇章所描述的“大帮船”，在纤夫明确导引下抵达铜仁府城大江流域河宽水深的中南门大码头，“大帮船”悠然靠岸，经过水警盘查后，组织卸货，顺路搭载客商顺之下船。随之，逆水进入小江西门码头。首先装载屯货于西门码头货栈、商号中从大、小两江用小船运来的地域土特产，装好货后驶出码头停船杨家河坝，再候小船去中南门调回日用百货。

据《黔游纪略》记载：“铜仁滨河……船舶往来，日凡数百十号，商务不衰。外商在铜开设洋行五六家。”合计，清末城内有大中商户 400 余家，成为黔东和川东一带各种土特产和省外常德、汉口等地工业品的集散中心和销售市场，年销桐油 3.5 万千克，牛皮、五倍子、生漆、土碱、吴茱萸约 100 万千克，百合粉、洋芋粉 2 300 多担，水银 27.5 万多千克，朱砂 2.5 万多千克。1915—1918 年，城区人口由 1.2 万余人猛增至 2.3 万余人。商号经过明清整合，开始走向专业化、集团化、垄断化，铜仁老“八大商号”“高灿顺”、“杨

① 中共贵州省铜仁地委档案室，贵州省铜仁地区政治志编辑室. 铜仁府志［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124.

恒源”、“庆元丰”、“徐夏隆”、“朱志大”、“洪兴德”、“罗志成”、“湛裕隆”，披荆斩棘，迎势而出。1919 年，仅经营山货土产一项，八大商号获利都在 10 万大洋上下。加之出于商业利益角逐均衡，每家均有专项商业盈利，或粮食，或布匹，或朱砂，或鸦片黑货，每家盘总均在 50 万大洋左右。

铜仁至湖南常德流程长达 465 千米，有急流险滩数百个，其中仅铜仁至漾头 29 千米航段即有大小险滩 24 个，平均 1~2 千米就有一处。较大的险滩有王灵官滩、东关滩、鸭棚滩、施滩、桶滩等，每个滩上礁石林立如同刀斧，破碎的崖层半隐半现于水中，形成道道“门坎”，俨如处处“索命关”，航道十分窄曲凶险。清同治三年（公元 1865 年），铜仁商界合力并举集资开发湖南境内的高溶水道，以求避滩走溶，关水放船。但放船行水十分紧急，“拦头工”和“舵把子”稍不留神偏离航道，造成船毁人亡。因此，在船民中流传着“行船三分忧，走水死中求”的悲歌。

“沿河居民惯习水性，操舟者多，巨津大河，深资利济。”确保行船安全的锦江河船夫、纤夫最为艰辛和繁忙。遇涨“绿豆水”小水，航道拓宽，欢声雀跃、水急船快，下至楚地只需半天。逆水行舟，最是艰难考验时，船夫、纤夫一并合力协调操作。“拦头工”手使一“抵竿”全凭力量与经验技巧驾船，首先，双手使劲，竿一篙插到河底，单肩深嵌入月牙木柄，双脚成“前弓后蹬”使出“弓箭步”功夫架势，控制身体重心前倾，后发力蹬船头枋，使船缓慢前行；然后，换手抓船邦，换脚致身体略与船板平行成一字形发全力撑船；岸上见势，一声号响，纤夫们赤足在炙烤的太阳下沿着山崖的岩壁纤道边喊号子整齐聚力，统一弓背前倾，手抓岩壁脚蹬鹅卵石全身聚劲，待使竿人从船头移位到船篷边，又回船头开始抵竿，如此反复数百次，驶过险滩区。

由此，锦江船工们创造了横稍号子、撑船号子、上滩号子、平水号子、盘大滩号子等，号子的节拍强弱、曲调高低、唱词长短等音乐特性随水情的变化均呈现不同音乐特质。横稍号子是下水或逆水平静时，艄公在船上领唱着极慢的叙事号子，其声悠扬婉转，轻松柔和，句尾岸上纤夫有一长音衬腔烘托，句间休止较长，可迎来清楚的山谷回音，音乐气质辗转婉切、回肠荡气。撑船号子是撑船手不使船搁浅，使劲用力抵住船岸或河底，顺船缘往后退，独自一人唱。上滩号子由于乌江滩多水险，拉的时间长，歌词也显绵长，第一拍用领唱，二、三拍用节奏旋律围绕徵调主音在上下四度内跳进，号子流畅自如，张弛分明。平水号子多是在船工们轮换休息或开怀畅饮时，这时也唱一些带有情节的“数板号子”，以调节生活。盘大滩号子是船过大滩，生死攸关，船工们巨大的号子声扎实铿锵，高亢激昂，能压过咆哮的江水声，远传数十里外。它

没有弱拍，没有领唱，也没有歌词，分三组五声部以衬腔呼应。整个号子均以和声式进行，宫调原位和弦、转位和弦交替出现，透视出声部，明亮而强烈。进入高潮时，节奏加快一倍，气氛更加热烈。船过滩一瞬间用长音结束，滩头船上、岸上顿时一片雀跃欢腾。

关于行船的传统规矩，船家在开船前须用三牲供天后宫以求妈祖神保佑，过黄腊关时，必须泊船在“伏波”庙上香祈愿行船顺当。

清末民初，国难地乱，兵匪交加，航运艰难。在湘黔交界的几十里水道上，横行百年的水匪（铜仁江湖名气大的有杨胡子、吴水鬼、李赶水、李麻子、杨豹子、苏快抢等）常在水流缓慢处鸣枪叫停，在低山洼地明抢。船家只能停船任其劫掠，否则船毁人亡，不少外籍铜商因此倾家荡产。外籍铜商由商会内部组织结伴而行，拼货组成几十乃至上百只船的船队，浩浩荡荡，人多势众，小股水匪不敢袭击。

北伐战争，贺龙两次在铜扩军、驻军，明示公告全城商家，派遣军队定期护航。此举令全城大小商家欣幸，纷纷倾其城乡库房存货，或相互拼货租船，一时船只供不应求，出发时竟集船百余只，首尾相接数里，在贺军武装保护下驶出麻阳境外。当时设置东西关卡，东关税卡设在漾头，西关设在江口专治大江，遇船则鸣枪叫停，停泊交税后，船头或篷上插一小旗，以示完税。商船满载地域特产，运至常德为贵州专设码头售卖。此码头是铜仁府松桃商人杨芳向常德知府所讨一箭之地专为铜仁商家所建。临码头之街为大河街，铜仁“八大商号”先后在此设分庄、货栈、外驻商办。

乱世聚敛财货有度的“余兴和”、“义友海”、“孙盛记”、“谢衡长”、“余德和”“刘义泰”等中期崛起“八大号”商家，居住在铜仁府城中南门一带，一时“近则生聚蓄衍，货物俱备。百工咸集，以行而计，不啻千百计”格局。新中国成立前夕，铜仁县城“罗裕顺”、“封木昌”、“高裕兴”、“郭福化”、“金寿路”、“邓怒高”、“周普联”新“八大号”字号移居清浪街、十字街一带，形成了新的商业繁华地段，如下圹坎的米糠行、北门城外的寿材行、杀牛坳的柴炭行、白家巷的水果行、桐梓巷的猪行。每逢花生成熟之期，西门码头为最大交易市场。大宗的商品如木竹、材、桐油、水银、朱砂、药材、花生均由几家商号分别垄断或半垄断，由水道运出铜仁，移交驻常德、汉口的庄号处理。

民国时期，铜仁民间商会在太平街（中南门）成立，各行业的鲁班会、南货会、纸会、五金分会相继成立，无形中瓦解了过去以籍贯形成的常德帮、汉口帮、丰城帮、宝庆帮、川帮、湖帮等帮会组织。后水门王家是会长，有大帮船十只，其余船老板船只不等，一统三江流域，大江到江口闵家场，小江至

客寨、牛郎。铜仁城以锦江航运之便，进而招来川、湘、鄂、滇、黔五省边区之货主。当时有4~15吨级大、小木船400只，航行于江口、松桃、麻阳、常德一带，水运盛极一时。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交通部所属川、湘水陆联运管理总处从沅江经锦江运闵孝起岸的军需物资，陆运至思南大坝场，再沿乌江下长江，直达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铜仁城原东、中部及沿海地区迁来的工商企业纷纷迁出，加之通货膨胀，经济日益崩溃。但由于1940年6月玉秀公路的通车及“黔东门户”的特殊地理位置，地处湘、黔、川、鄂四省边贸重地的铜仁，尚维持着“虎倒不失威”之局。1949年，铜仁城仍有较大商业行号27家，中小个体工商业户783家，摊贩201户。



图5-3-44　铜仁中南门浮桥

铜仁中南门街东依东山，西接府台衙门，南临锦江，过去占有很大的地理优势。中南门街紧靠中南门码头和渡口，水运的货物进出方便，人流量大，成了商家的首选之地。民国期间，铜仁城的老八大号和新八大号，大多聚集在中南门一带，成为铜仁城三街六巷繁锦之首。

2. 镇远古镇

林则徐诗云：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

镇远山险水雄，民族强韧，历史积淀深厚，为贵州明清盐运一大重镇。

镇远之名从宋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赐名“镇远州”起，至今袭用了745年。镇远的建置历史从秦昭王30年（公元前277年）定巫，设镡城县开始，至今年已有2 280年历史。从唐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在镇远建舞州，至州府迁到凯里止，有1 252年的历史。

(1) 镇远沿革历史溯源

镇远史称“舞阳城”，水称“舞阳”、“舞阳河”，因一水得名，为五千年

“武溪蛮”先民世居之地。春秋时镇远属楚巫中地，战国时属楚黔中郡。秦昭王30年（公元277年），定“巫”（镇远）建镡城县，始置黔中郡。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二月改思州、思南二府设流官制，属贵州布政司。思州府同时从镇远卫城至田坝一带迁到龙田，后迁思阳，辖长官司四个。从此，镇远府脱离思州府单立，辖镇远、邛水、施秉三县。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降镇远府为镇远州，随后恢复镇远府。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改设镇远县，隶属镇远府。清朝设镇远府、镇远县。民国三年改设镇远道（黔东道），随后又改设为第八、第七、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

（2）一河兴城

舞阳河源于贵州省瓮安县谷才村，贯通黄平、施秉、镇远、岑巩、玉屏县境，蜿蜒流出湖南新晃、黔阳等地汇入沅江注入洞庭湖，全长400多千米，舞阳河镇远以东的数百千米河段，河宽水瀚波平，唐代已成为我国西南边陲连接中原腹地的重要航运交通路线。镇远循水路往东可径达洞庭湖，陆路往西可通达贵阳、云南至缅甸。商路畅通，大批商人如针附磁，纷至沓来，或坐利于镇远，或行贾于黔滇。

1413年，明朝在城里城周的一些水陆要隘处所配套修建了文德关卡、铁山关卡、北律关卡、大河关卡、小河关卡、九曲关卡、镇西关卡、镇东关卡、大码头卡、周街卡、北门关卡、南门关卡等一批军商兼用设施，强化镇远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地位。清盛世把镇远演升成为西南黔东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

（3）古迹——永恒的历史

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为防铜仁“生苗劫掠”，湖广都司兵备赵之屏、镇远知府程节奉诏在镇远府署背北石屏山顶建城墙，修城楼三座，即东门“水固楼”（“永固通津”，亦名“铁三关”、“铁壁三关”）、南门“水安楼”、（“永安通济”，又名“北津关”）、西门“永定楼”（“水定通衢”，又名“定西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苗袭府治，贵州巡按冯奕垣奉王命檄镇远知府张守让于“城外筑石”建墙，在小径“为石圈洞门”，又于山间空凹处“垒石塞之”。

镇远是重要的湘、黔、滇陆路要驿关节。其关隘雄峻、古驿道通达四方。现存有镇东关及其驿道、铁山关及铁溪驿道、文德关及关前驿道、北津关及九曲岗驿道、镇雄关及相见坡驿道、思南坡关隘及其驿道、鸡鸣关及其驿道。

镇远又是明清重要水驿。界分为卫城军用码头和商用府城码头，早期兴建的商运水码头有20余处。而今保存完整有府城大码头、大河关码头、禹门码

头、复兴巷码头、冲子口码头、米码头、城隍庙码头、天后宫码头、卫城大码头、吉祥寺码头、上北门码头、老西门码头、杨柳湾渡口码头等十三处。

明清镇远街市错落有致。众多码头连接延伸，渐渐演绎为街市，有以府城大码头为起点依山势，曲折舒缓延伸至石屏山下，总长245米，以古泉四方井而得名，古朴幽深的四方井巷道；有与城隍庙码头相对，全长221米以“三十二蹬坎”而出名的复兴巷；有相应冲子口码头，全长249米的冲子口巷道；有与米码头相映照，东西分支伸展，总长231.6米的米码头巷道。所有巷道皆以方青石铺筑，两侧四合院风火墙壁立高耸8~10米，堪称曲径通幽，质朴美观。

商流交汇，盐商荟萃。江西会馆、两湖会馆、江南会馆、四川会馆、秦晋会馆、福建会馆、两粤会馆等，号称“八大会馆”便在镇远城络绎而生。清末民初，镇远出现了松柏、长青、益昌、协和、隆义生五大商行，还有陈大商栈。广而延之，形成了棉布、食盐、百货、杂货、旅栈、饮食、屠宰、酿酒等二十多个行业，以至于达到民谚说述“镇远街，人撩人。挑窑罐的被撞破，招桐油的挤不出城”摩肩接踵的拥挤街景。

镇远民族杂居，军民交往，共茂商市。“明洪熙六年（公元1431年），贵军乏食，乞运龙江仓及两淮盐于镇远，易米给军”①，镇远的商业在明清战旗辉映下日益繁盛。明万历年间云贵巡抚江盈科诗词曰“彩绳贯见苗姬饰，蛮锦裁衣卫士装”，描绘商人把贩运来的彩色丝线和贝壳等卖给苗、侗妇女做装饰品，采购苗、侗人民纺织的锦绨布匹来缝制兵勇士卒军装的情形。映照出民族融合、军民协调的历史场景。

明清时期保存下来的道观寺庙、楼殿馆阁、古民居、古码头、古桥梁、古城垣、古驿道、古碑刻、古墓葬等国家级、省级、县级各类保护文物共有160余处，其中70%集中分布在镇远城区及其近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古建筑群，是贵州建筑规模最大、布局最奇的古建筑群落，雄伟壮观，造艺精湛。佛道儒三教合一，和平共处。

林则徐赞曰：“一县好山留客住，五溪秋水为君清。”“古、险、奇、雅、秀”的古盐镇——镇远而今迈上了新的发展台阶。

（八）因盐运而兴的盐镇特征

1. 盐镇分布格局

贵州明清古盐道纵横穿越在川、渝、黔、湘、滇、粤之辽阔的崇山峻岭和

① 贵州省镇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镇远府志［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1983：156.

深切峡谷与河谷地带，跨越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两广丘陵及洞庭湖平原。

北部东北—西南走向大娄山脉（乌江与赤水分水岭）、东北部东西走向武陵山脉（乌江鱼沅江的分水岭）、西部西南—东北走向乌蒙山山脉（由滇延伸入黔，是牛栏江、横江、北盘江、乌江及赤水河分水岭）横亘省际，苗岭（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分水岭）雄耸中部。山峦连绵起伏，地面崎岖破碎，喀斯特地貌发育，切割较深，相对高差大。

盐运皆顺着地势前行，或翻山越岭，或跋涉过河。在肩挑马驮的历史场景下，常人负重步行每日一般不过30~60里，在地势、地形崎岖和人的体能阀值局限下，叠加受民族传统习惯的定势影响，以及当地经济发展启动速度等变量因素，贵州山区按照盐运生理节律30里设置一小场，60里设置一大场。所以在高山的谷口、山隘、桥梁、渡口密布着大大小小的苗族、仡佬族、侗族、仡佬族、彝族、侗族盐市或盐镇。

一些山间坝子或较为平坦之地，虽然不在盐道干线上，由于商业的集聚效应，形成盐巴、桐油、粮食、茶叶、布匹、生漆、木材等土特产互易综合市场，尤其明清民族大融合，在以土家族、汉族为主体的平地集市吸引更多的山地居民族汇入盐市商流。因为盐运路线走向最终也是为销售，所以盐道在盐运几千年历史的进程中，不断修正调适。

贵州古盐镇的分布就是在自然地形的反向局限力，在盐运人畜动力系统的反向制约力，在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力，在民族团结的正向融合力，在盐运与销售的正向趋近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演进中的控制力等五大系统合力指引下，在贵州的蛮山野岭中，在河网密织的低丘、峡谷域，在盆坝镶嵌的高原上，星罗棋布播撒盐运文化，把贵州高原点缀得精彩纷呈、光耀辉煌。

2. 盐运、盐商移民文化使贵州古镇五彩缤纷

盐业利润的丰厚，吸引着倚背政治势力，或胆大冒险又工于心计，或拉帮结团组织群势，或恶霸盐市强取豪夺的盐商蜂拥而趋。众多的制盐工人、运盐工人为谋求基本生存，因盐而聚。依附在盐体产业上而衍生的第三产业——产盐区域农副业的激活，水陆交通因盐而畅旺的网络以至随之繁荣的戏剧、结社等文化的滥觞，都直接、间接地推动盐业建筑兴旺。

如《云阳县志》载：“于县境食货，实为人家，利之所凑，食其业片，自卤主、煎户、运商、肆伙、汲拽、都养、舟挽、驮驱、转移执事于其间者，无虑数万人……亦为县境一大都会。”

尤其明清移民以来，各省因盐聚财佼佼者，藉以会馆、宗祠、家宅以显示能力、财势，达到联络乡亲、告慰祖宗、遥祈桑梓、扩大势力，需求精神的归

属和圣灵的佑佐。于是在盐业中心、在盐运网络之地大兴土木，相互攀比，掀起一浪高似一浪的建筑热潮，张扬和传播故土文化的精髓，成型卓绝，形成从单体风格发展到群体组合空间的营造建筑艺术。

各种宫、庙、馆、寺、堂、观、院、殿、祠、坛、庵、阁、洞、府，诸如道教宫观、佛教建筑、儒教寺塔、本土祠堂如春笋滋生，与日俱增。万寿宫、川主宫、禹王宫、文昌宫、帝主宫、真武宫、三元宫等，三义庙、三观庙、五显庙、关帝庙等遍布各古盐镇。

3. 因盐运而兴古镇建筑特征

明清贵州盐镇蕴涵古老盐文化。在我们所穿越的有限区域内成型的古盐镇均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商业重镇，首要防卫得当。镇子周围筑有相对坚实的围墙，镇内街道呈现或“T”或“Y”或“井”字形，构成外封闭，内也能截段闭锁构成“布袋陷阱”的防卫体系，功能是为了防匪、防盗。如福宝镇、仙市镇、寨英镇等。

其二，所谓“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熛焚”。明清古镇以木质或砖木混合结体，均把建筑防火放在重要位置。建筑的结构柱也往往由砖墙包封，古民居大门在木基门板上镶上水磨方砖，并用圆头铁钉固定，或在木基门板上包铁皮，使之达到耐火极限。防火墙的设置有多种：一种是在并排着的建筑物中，中间空着一间，在里面填土，火灾蔓延的一个障碍；第二种是让屋顶两侧山墙高出屋面，随着屋顶的斜坡而呈阶梯形，这种墙即为“风火墙”或“封火墙”，当房屋着火时可以有效地隔断火路，将火灾限制在有限空间内。每家每户皆备大水缸，一为防火，二为“聚宝”活风水。思南周家盐号的水缸寓意深刻。

其三，坚实通道街面，均用大块方青石铺就，构成“三尺道”、“盐夫路”、“骡马道”，而且以老街为中心，向周围线状延展，但都进行建筑截防。街面或周围石径具有相当明显的背老二“铁打杵”留下的历史坑窝。均有与盐相关的街道名称，如“盐店街”、“盐务街”等。

其四，临街建有盐店或盐号，后院或背街皆修有大型囤积、储存和转运食盐的盐仓。

其五，修建有大型显著会馆、寺庙系列、筒子楼等建筑。

石板路、寺庙、祠堂、学堂、书院、戏楼、寨门、会馆、桥塔、风火墙、盐号、盐仓，以及镇内七八十岁老前辈均有运盐、销盐的经历，这一切构成了贵州因盐而兴的古镇显性文化特征。

# 第六章 明清贵州盐商与盐夫——盐运主体考

## 第一节 明清盐商，三位一体

通阅《史记·货殖列传》《平准书》《汉书·货殖传》与《汉书·食货志》，倾国倾城的富商巨贾，几乎都是依靠煮盐、冶铁为支撑而起家。特别是《汉书·食货志》中所记的那些“役财益骄”而又“不佐国家之急”的商人，完全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盐铁业。

### 一、盐政与盐商

纵观中国历代之盐政，盐业经济是维系国家财政收入的命脉与基础。因为“税赋是国家机器运行的经济基础”，在中国明清皇权专制控制下的财政经济下，为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利益的需求，缜密思考，反复研究探索密布如丝交织成网的攫取盐课最佳的方案，形成层层叠叠的盐法。“其利广者莫如盐”，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饰、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唐代刘晏任盐铁使盐课收入六百万缗，是国家税赋一半；北宋庆历年间高达715万余贯；南宋户部侍郎叶衡说，“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元代盐课折钞最高达766万余锭，国家财政支出80%依赖盐课收入；明代因巩固政权，军费甚多，“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荚……并其银数，实共该盐课银二百四十余万两”①；清初，“盐筴之为额贡也，居税赋之半”，此后年代，逐渐减少，清末民初，在关税出现新的财源情形下，比例有所下降，盐税大约占全

① 梁太济，包伟民. 宋史食货志补正［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235.

年收入四分之一，但清代实行官督商办，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三四倍，根据清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盐商》记载，推算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①。

盐利丰润，商趋利而进。自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沿用855年，至明万历时代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开启了此后绵延300余年专商引岸独擅盐利的官督商销权力寻租时代。自袁世振，以“正引现支，挎销积引”为导矩，疏通积引，创“纲网法”开创了中国商专卖制之滥觞，十字纲册订立，留给商贾，永永年年，据为“窝本”，商人借窝本之说，专引岸之利，子孙相承，世袭其业，崛起了“边商”（边地商人）、“内商”（食盐在指定引岸行销的商人）、水商（水运销岸商贩）。清对“纲网法”加以修正，产生了“垣商”（盐场立垣向灶户收盐者谓之“垣商”）、“运商”（向销区行盐者谓之“运商”）、“业商”（占岸者曰“业商”）、“租商”（租引者曰“租商”）、“代商”（代租商办运者曰“代商”）。此时，官视商为利薮，商视官为护符，官商勾结，因循苟且，抗拒改革，直至覆亡。史称“专商积弊与清代相终始”。

## 二、“扬一益二”的天下盐商

### （一）富可敌国的扬州盐商

扬州盐商明清盛极一时，成都盐商，亦即自贡盐商排在第二，二者均处于当时我国两大盐都。

“两淮盐，天下咸”。扬州汉代成为江都，又称广陵。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历经四十余年的经营，出现了“以故无赋，国用富饶”的强盛局面，开启两淮盐业丰产之先河。元代实行商运商销，两淮盐的产销量最丰，远销两淮盐的商人辐辏而至。元朝诗人杨维帧在《盐商行》中云：“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② 但元末期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率领盐民起义，元朝失去两淮盐场，同时两浙盐场为方士珍所占，元朝财政崩溃，崩解加速。

明朝重新恢复繁茂。两淮盐课额占明朝全国盐课总额，洪武时期（公元1368—1398年）为30.69%，弘治时期（公元1488—1505年）为28.16%，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为28.67%。明人何孟春说两淮“实得三分之一有

① 黄均宰. 金壶浪墨8卷［M］. 上海：文明书局，1900：213.

② 潘同生. 中国经济诗今释［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79.

奇”。扬州商贾自然肥沃，以徽商、晋商、陕商资本最为雄厚。明人汪道昆也说：“新安多大贾，其居盐策者最褒，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座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芳华盛丽非不足也。”① 少为纨绔子弟的张岱感慨扬州清明情景超过了西湖之春、秦淮之夏和虎丘之秋，一派豪奢极乐景象。顺治二年（公元 1645 年）四月清兵南下，即使徽州盐商王文德以 30 万金犒军“乞王勿杀无辜”，但还是阻止不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大屠杀，两淮盐业中心再遭洗劫。

经过清朝初期的整顿与扶持，康雍乾是两淮盐业的鼎盛时期，两淮盐商也在这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明人宋应星估计万历时扬州盐业个人资本总量为三千万两，而清人汪喜孙估计为七八千万两，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 年）户部历年库存银七千八百余万两相当。两淮盐商真可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时人评说：“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甚至雍正在一道论旨中指斥扬州盐商：“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技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处宦。”②



图 6-1-1 扬州盐商奢靡生活场景

乾隆时期，全国的盐课总额是 700 多万两，而两淮每年上交清廷的盐课就达 400 万两左右，除正课外，另上交朝廷的杂项征收每年也达 100 多万两。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驻跸扬州，盐商耗费巨资，大造离富别馆、亭台楼榭，取悦帝心（在瘦西湖畔矗立着一座白塔，据说是当年乾隆在此游玩时对陪同官员随便一说，这里很像北京北海的琼岛春荫，只是差一座白塔，第二天皇帝推轩

① 王瑜，朱正海. 盐商与扬州［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45.
② 王瑜，朱正海. 盐商与扬州［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23.

一看，一座白塔已赫然矗立湖畔。原来是盐商们为取悦皇帝一夜之间用珍贵的食盐暂时砌了一座白塔，不禁使龙颜大悦。而后盐商们又仿照北海白塔一丝不差地砌筑了如今这座白塔）。乾隆一面感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另一面以军需河工、赈济、备公等各种名目要商人“踊跃报效”。清朝，陈锋先生的《清代的全国盐业》中统计清朝全国盐商报效的总额是 8 100 余万两，而两淮盐商报效额为 5 400 余万两，占全国报效总额的 66. 7%。

“扬州繁华以盐”，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战火延及两淮产盐地区，伴随盐业衰落，扬州过去的繁华已经成为历史的浮萍。崭新的扬州，新中国再续历史辉煌。

一部分两淮奸商之伎俩表现在收购领域：其一，通过大桶准盐。据乾隆三十一年两淮盐政普福奏称，两淮盐商“惟知自利，不知灶艰”，以自制大桶量收灶户食盐，与盐场通用之桶相较，“每桶实多一二十斤不等”。于此，两淮盐商一年就可获得纯利润数百万两白银。其二，所谓压低收价。乾隆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奏称：“（两淮）灶户所卖之盐、腌盐计二百五十斤为一桶，一桶可得大制钱七百文，而盐商买每桶只给银五钱，或乘其急需而给四钱，仅敷工本，其戥头银水更多克扣。”按当时大制钱七百文合白银一两计算，盐商向灶户收购食盐，最多只给一半价格。其三，重利收其债。清人王鼎在《两淮盐法志稿》中说：盐商唯利是图，“称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就是说，盐商还通过高利贷形式来剥削食盐生产者。

而且在流通领域的售卖阶段采取克扣斤两、囤积居奇、任意涨价和掺假等手段来剥削食盐消费者和小商小贩，以攫取大量的货币财富。

两淮盐商奢侈性消费的经济来源，是他们凭借食盐运销的垄断权和手中的雄厚资本所攫取到的巨额垄断利润。而这巨额垄断利润，主要是通过剥削食盐生产者和食盐消费者而得来的。他们攫取利润、穷奢极欲的过程，也就是食盐生产者和食盐消费者遭受剥削而日趋贫困的过程。归根结底，是盐业经济市场不平衡交易的结果。

### （二）清朝崛起的自贡盐商

#### 1. 王三畏堂——王朗云

王三畏堂存续时间 79 年（公元 1850—1929 年），其支脉王达生堂（继承人王德谦）再起至破产又 20 年（1929—1949 年），前后延续 100 年。

王三畏堂在咸丰年间，因“川盐济楚”之机遇，经营得法，家业兴隆。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即 1853—1863 年，与其他几个盐业家族类似，骤然地暴发。王三畏堂以盐业生产规模之大、井规灶号资产之多、资本之雄厚，尤其是

在官场上之影响声势，被人们尊称为自贡盐场“四大家族”（王、李、胡、颜）之首。

王三畏堂发迹人王朗云（公元1813—1884），因其是中落盐业世家，少时家境衰败。他为了恢复和光大旧业，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倡议三房分产分居，提留祖遗部分田地、山场及新、桐、龙三垱（当时富厂以地段划分为桐垱、龙垱、新垱、长垱、邱垱等五垱）废井数十眼，高山井、扇子坝（又名大冲）即在其中，永作玉川祠熬尝。此项产业由他经营管理，他以土地及废灶基，招商引资，引进陕帮商人开凿盐井，利用“川盐济楚大好”契机，大量运销两湖两广销区，获得巨利，一跃而为聚资千万富甲全川的巨富豪商。终朗云之世，全堂拥有卤井、瓦斯井数十眼，开设盐号遍及重庆、宜昌、汉口、沙市、洋溪等地，田地、乡庄广散于官顺、威远、荣县、宜宾等数县，年收税一万七千余石。

王朗云在盐业生产整个链条上，盐井、枧、灶、号实现独立经营，对盐业生产相关的物资及金融周转同时设号，把盐业发展所需土地产业、工业流程、商业销售、银号经营联结成为一体化，这样，并获盐业生产上、中、下游利润。产盐总额占整个自贡12%，运盐中仅楚盐一项占12%。

王朗云致富后，立即纳资捐官，获江西候补道虚衔，保持已得专商特权，集大地主、大盐商、大土著武装头领于一身的三位一体独霸一方的豪强。富顺县县官也尊称其为“朗翁”、“王四大人”。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陕西巡抚刘蓉奏请筹办川省盐厘，向井灶抽收，一备筹措陕南军费，四川总督骆秉章在自流井蚊虫嘴设立水厘局，井户每推汲卤水一担，征压金铜钱一二文。朗云会同颜晓凡和其他厂商，捣毁水厘局，被扣押入狱，恰这年顺天、直隶、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及四川等省大闹灾荒，朗云倾资助赈费七万金。奏闻，清廷加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及三代一品封典。朝旨既下，由二监搭天桥于监培之上，戴红顶花领，高视阔步出狱。与骆秉章斗法，完胜。

朗云于同治五年（1866年）五十三岁铺张祝寿，云南迤西兵备道翰林院编修赵树吉（朗云表侄灾宾人）为之撰书寿序，武英殿大学士（清廷汉人入相的首位）、上书房总师傅、国史馆正总裁贾帧，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瑞常，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编翁同龢等或称侍生或称愚弟列名拜祝，刑部陕西司员外朗云表侄赵树宜，工部虞衡司主事表侄赵熙亮等也参加祝贺，可谓人脉之广，官脉之深，极一时之盛。

朗云极具运转“人势”之筹划，平时资费栽培族内及乡里中穷苦读书人，

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作了京官，再由他们联络川籍京官，不时予以“小恩小惠”金钱馈助，形成庞大在京“关系网”。人脉散布在各个衙门内，广通声气，有事皆为其用。特别是那些都察院的“都老爷”（即御史），能够“风闻奏事”，随时传递朝中信息。对于权重朝中大臣，通过各种关系攀附施予重金拉拢，其中还不乏宗室亲贵。丁宝棚后来奏他“富甲全川，私通六部”不是空穴来风。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两江总督曾国藩恢复淮盐销楚，抑制川盐。先后于健乐、富荣厂创办官运，在犍、富两地设滇边和黔边官运局，实行官运商销（在岸上招商承销），从中垄断渔利。

王朗云筹计，场盐官收，不能操纵盐价，岸盐官运，危害自己运权，打破了自己多年垄断盐业运销的商业模式链条，决定具状上控户部及都察院，达到阻挠官运之目的。掀起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四川官运、总督被控的京控官司。

前期，朝廷准了郎云的案子，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清廷以每日行程四百里驿传由军机大臣字寄丁宝桢：“承恩等奏，川省官运局经灶民呈控多款，请饬妥为区划，或由官运，或改官督商运……据实具奏，不准稍涉回护。”① 朗云在京人脉同声相慨，密切配合，大造舆论声势，指责丁宝桢举办川盐官运是祸国殃民，殆害一方。各衙门御史，绘声绘色，交相弹劾丁氏，宗室亲贵在慈禧太后身旁，不时吹阴风、放冷箭、散流言、点鬼火。丁氏政敌趁机而起，借题发挥，同声指责丁氏举措轻率、擅改盐政、罔置盐法、漠视君威、撼动国基，在底层民间也杜撰竹枝词诋毁丁氏“岂唯殃民还误因，不独凌寡更欺孤”。清廷惑于上、中、下层的舆论，准定宝桢举办官运处置乖方。为恐因此引起事端并为平息朝廷官民情绪，乃将丁宝桢降四品顶戴，革职留任，并严旨访责，着依前谕迅速明白奏复。

丁宝桢有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依旧留在总督职位，照常任事，理解上谕“明白奏复”，并未指明停办官运，而且官运开办经年，初见成效，疏销裕税，具额可考，有具体数额可供考成。在官运极盛时，年收税款650万两，解京饷、东北固本饷、云南、贵州、甘肃、陕西等省协饷各数十万两。川盐税款收入，解送户部，例有印收，官运政绩不言自明。随后，将官远前四川盐务的种种积弊及必须办理官运之理由，详细缕陈，具奏朝廷，并且对王朗云之捏词耸听加以驳论。

清廷根据丁氏奏复与户部议奏，准予丁宝桢开复原职。四川官运事宜，仍着悉心办理，不得稍有疏怠。对于王朗云则革职，交丁宝桢确切审办，以示儆

---

① 王思琦. 中国盐业中的国家与社会——自贡盐业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04.

惩。王朗云逃匿。“成也官，败也官”。遂此，王三畏堂溃散。相关盐业企业全线瘫痪。

2. 李四友堂——李详庵、李德山

明代初年，李家入川始祖李元庆开始在四川自流井经营盐业，明末李氏十三代李果育成为自流井区盐业代表人物，其中李氏家族李芝研究盐业生产，撰写了《盐井赋》，载“夫盐井者，潜穿地穴，倒嗡洪涛。山泽通灵，水火相遭。熬波成石，熔液为膏。虽沿象于凤沙，实寓巧于褰刀。”① 把川蜀井盐生产主要流程——凿井、吸卤、煮盐作了生动形象的记录与描述，成为当今研究川盐的重要历史资料。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介绍：“凡滇蜀两省，远离海滨，舟车艰通，形势高上，其咸脉即蕴藏中。凡蜀中石山去河不远者，多可造井取盐，盐井周围不过数才，其上口一小盂覆之有余，深必十丈以外，乃得卤性，故造井功费甚难。其器冶铁锥，如碓嘴形，其尖使极刚利，向石山舂凿成孔。其身破竹缠绳，夹悬此锥。每舂深入数尺，则又以竹接其身，使引而长。初入丈许，或以足踏碓梢如舂米形。太深则用手捧持顿下。所舂石成碎粉，随以长竹接引，悬铁盏挖之而上。大抵深者半载，浅者月余，乃得一井成就。盖井中空阔，则卤气游散，不克结盐故也。井及泉后，择美竹长丈者，凿净其中节，留底下去。其喉下安消息，吸水入筒，用长絙系竹沉下，其中水满。井上悬桔槔、辘轳诸具，制盘驾牛，牛拽盘转，辘轳绞絙，汲水而上。入于釜中煎练，顷刻结盐，色成至白。四川有火井，事奇甚。其井居然冷水，绝无火气。但以长竹剖开去节，合缝漆布，一头插入井底，其上曲接，以口紧对釜脐，注卤水釜中，只见火意烘烘，水即滚沸。启竹而视之，绝无半点焦炎意。未见火形而用火神，此世间大奇事也！凡川滇盐井，逃课掩盖至易，不可穷诘”②。

工序就是凿井、采卤、制盐。中国的井盐凿井技术发展，经历了手工开凿、简单机械凿井和机器钻井三个阶段。明清至民国，在井盐生产的发展过程中，自贡的凿井技术不断完善，工艺流程为定井位、开井口、下石圈、凿大口、下木柱（竹柱）、凿小眼等，见图 6-1-6 至图 6-1-14。

---

① 彭久松，陈然. 四川井盐史论丛［M］.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49.

② 宋应星著；管巧灵，谭属春点校注释. 天工开物［M］. 长沙：岳麓书社，2002：168.




图 6-1-2　开井口图解　　图 6-1-3　下石圈图解

图 6-1-4　凿井图解

图 6-1-5　制木竹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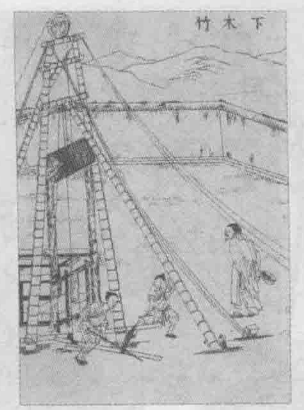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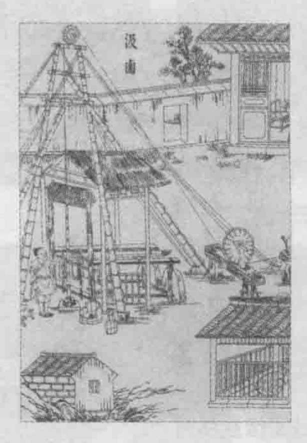




图 6-1-6　下木竹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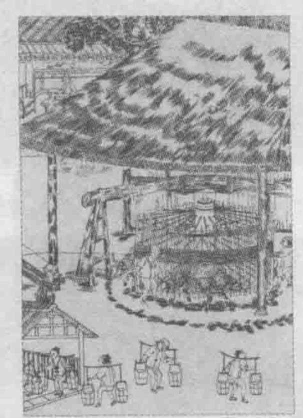


图 6-1-7　吸卤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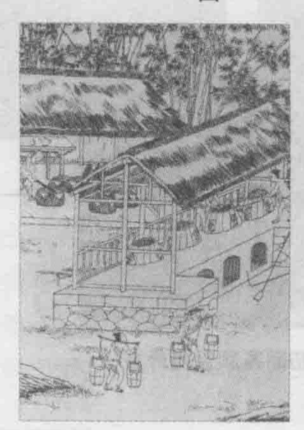






图 6-1-8　场灶煮盐图解





图 6-1-9　火井煮盐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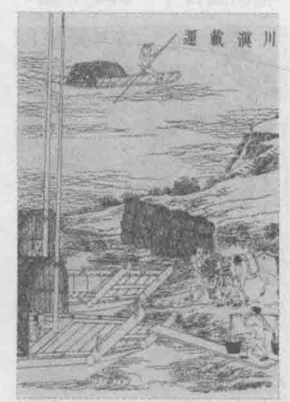




图 6-1-10　川滇运盐图解



图 6-1-11　民国初期富顺盐场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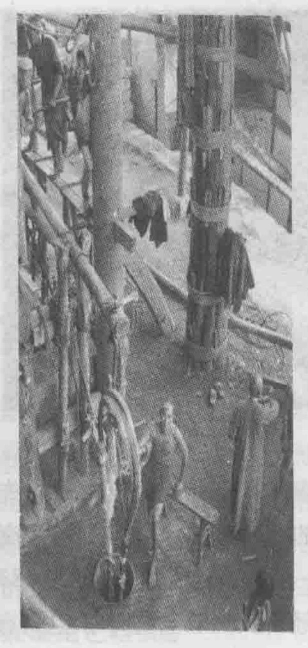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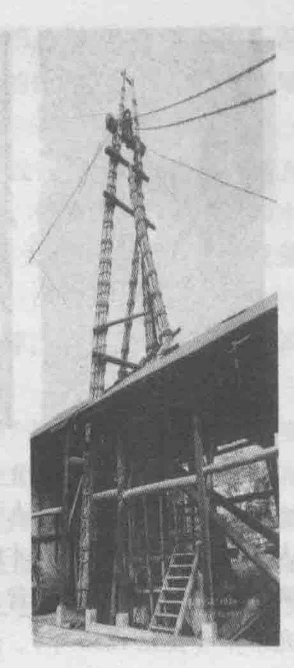




图 6-1-12　开凿卓筒井图解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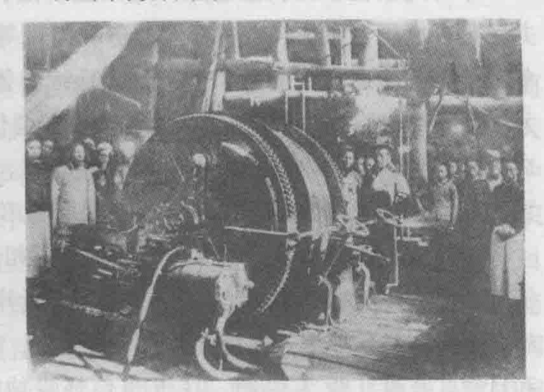



图 6-1-13　光绪初年推卤牛车 、蒸汽机采卤车并存

① 相关图片来自孙明经等摄影，参考孙建三，黄健，程龙刚. 遍地盐井的都市——抗战时期一座城市的诞生［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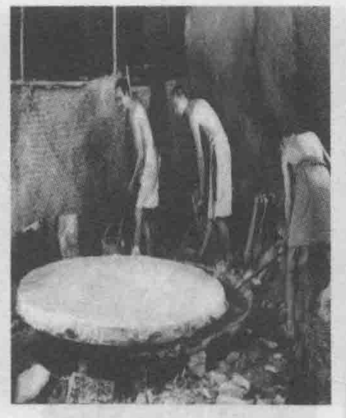




图 6-1-14　熬制锅盐

回叙李四友堂创始人李维基一脉，凭其直系祖先三世孝廉和李氏家族不少人做官及他本人又是秀才的社会公信度，引进陕西商人高氏原始资金白银 3 千两，经过十年的辛勤经营，于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 年）建立四友堂，到道光末年（公元 1850 年），经济实力日益雄厚，但只有井灶和部分田产。

李详庵接任李四友堂总办，趁川盐济楚良好销盐时机，通过大量开凿新井，创办卤枧，系统经营和管理灶房和卤枧等策略，从咸丰元年（公元 1851 年）至同治十三年（公元 1874 年），延续李德山接任总办。光绪十六年（公元 1890 年）通过三十九年艰苦的跋涉中和两代人辛劳的积累，李四友堂发展成为井、灶、视、罢俱全的大盐商、大运商。在当时的自贡（也是全川）盐场，成为仅次于"富甲全川"的王三畏堂的第二号盐业资本集团。

李详庵生前与亲家三畏堂的王朗云和王相荣、陈辉廷合资组织盐号，运盐济楚，组织创立了祥兴泰盐号，做楚岸、计岸、边岸盐销。李德山继任总办后，因势利导，取消祥兴泰，并且一分为四，在重庆设字号大生厚，专管楚岸和计岸，在綦江设大生美，在贵州仁怀设协兴隆，分别经营綦、仁边岸的业务。

川盐入黔边岸运销过去一直是陕西商人掌盘操纵，李四友堂创办边岸一切管理体系采用了陕商的做法。当时，陕帮田、刘两姓也想在边岸做行商，为了保证业务顺利，一直在政场上寻找依靠。他们了解到李德山的堂侄李裕如从云南宁州知州升石膏井提举，为云南盐政负责人之一，并为当时云贵总督王文韶所器重，因此联络李德山出资二万两，合组字号协兴隆，经营仁怀边岸。

在仁怀的盐号不少，其中资本雄厚的有两家，即田、刘、李的协兴隆和王相荣的仲兴样，尤以协兴隆资本更为充实，业务飞跃发展。协兴隆的总号设仁

怀县，它的子号达七十多家，分设于从仁怀到贵阳的沿途州县。每家子号不但自置办公房屋、盐仓和“丘二”（职员的一般称呼）的住宅，还在于号所在地购置田产，所收租谷足以供给字号全年缴用。

在綦江设立的大生美，由四友堂独家经营。总号设在綦江县城，是一座五重堂的大建筑，全部用砖建造，周围有高大的风火墙，修建的盐仓可储盐二十儎（每儎花盐十万零八千斤，巴盐十二万五千斤）。大生美的脚店也遍设綦岸，但较协兴隆在仁岸为少。

协兴隆和大生美都有自卫、护运的武装力量盐警，由总号出资招募、训练，统一指挥。

随着川盐济楚时代的结束，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起，四川总督丁宝桢实行川盐官远商销制，在泸州设官运总局，在井灶集中处设厂局，各岸设岸局，各场产盐，只能按规定的价格由厂局收购，运往岸局，由岸局转而售给销售商。清政府全盘控制运输盐价，官局收购时又往往指价买盐，而实行官运制后，税厘大增，名目繁多的加价、捐、厘等等达到二十余种，比官运前增加了数倍。李四友堂黄金时代逐渐褪色暗淡。

（三）明清盐商简论

1. 天下盐业商帮

明清时期，著名的商人组织有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龙游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宁波商帮等十大商帮，而且各地域盐商彼此内部相互勾结抱团。所谓商帮，是指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互扶持为宗旨的自发性商人群体。这些商人组织都是在具有共同的地域和血缘关系上的商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大大加强了成员彼此之间的合作互助和自我保护能力。血缘和地缘关系不但使商帮成为惩罚违约等欺诈行为的有力实施者，而且也起到了规制成员行为，解决集体行动协调问题的作用。商帮的功能不只是处理成员之间的商业纠纷，更主要的是谋求如何在与其他商帮进行竞争时立于不败之地。商帮可以促进成员内部相互合作、壮大自己的力量，以期挤垮其他竞争对手。例如，商帮通常为在外经商的成员建立会馆。客居在外的商帮成员可以在会馆中互相交流经验、寻找机会，同时也能有助于克服因各种地域文化差异、语言差异给商人造成的压力和困难。同时，盐商组织在结交官府、构建保护伞的过程中也会发挥它的组织协调功能，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

天下盐商主要以陕西盐商、山西盐商、安徽盐商为主流，陕西与山西地域相近，性情相仿，世人往往合称“西帮”或“秦晋大贾”。陕商、晋商和徽商

盐业辐射大江南北，江西、两广、浙江为辅流，辐散范围相对较为狭隘。

明朝实行“开中制”和“商屯制”，身处边境的陕商、晋商与徽商走上盐业历史舞台大显身手，当时山西的晋南是产粮区，山西人又长期从事河北、河南、山东等北方产粮区的粮食贸易，他们或往边镇贩运粮食等物资，或在边地屯田，从而从明政府手中换取盐引，销售食盐，大获厚利，利用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国家盐政的需要，成为“纳粮中盐”的商人主体，逐步形成重要的商业集团。

明朝中期，“开中制”演变为“折色”制，伴随“兑支”、“代支”盐制政策的出台，商人分化为“边商”与“内商”。晋商中的盐业大户也纷纷迁至扬州，同时，他们逐渐转向经营钱庄。另一部分中小盐商仍在边境地方纳粮换引，成为边商。边商缺乏资本，内商资本雄厚，内商以低价收购边商的盐引，边商衰落内商壮大。“边商听受值于内商”，内商“坐致富饶”，内商演变为明代盐商的主体。在两淮盐区，徒移而来的拥有雄厚资本的秦、晋、微商，他们改业内商，控制了两淮盐区盐的运销，形成了地域性的群体，成为明代内商的骨干。“纲网法”创立，以圣、德、超、千、古、凰、凤、扇、九、围命名。政府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及持有的旧盐引数量，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每年对其中一纲的旧引支盐，对其他九纲按新引支盐，以 10 年为期，把旧引完全疏清。又规定，在疏清旧引之后，按纲册所记旧引数分发新引。册上无名者，没有领取盐引的资格。意味着，未入纲者无权经营盐业，形成已入纲者的盐业垄断。纲册是政府编制并发放的，与官方有勾结的大盐商就垄断了盐业经营。如此巩固了徽商和晋商盐业地位。这一地域性的群体一直延续到清朝。

清朝前中期主要是徽商主宰盐业舞台，在盐业专卖制度下，徽商经营盐业当然少不了官府。徽州人让子弟读书走科举之路固然有文化传统，但更现实的还是子弟当官后作为徽商的后盾。乾隆七次下江南，接待者主要是徽商，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对皇权的崇拜。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了寄籍扬州的徽商的奢侈生活，美籍华人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指出，这不仅是他们追求享受、炫耀，更主要是为了交结、拉拢官员，为垄断盐业创造条件。徽商还大量向政府捐赠，换取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这是经商的需要。清道光年间，盐业专卖制度改变，盐商垄断的特权被废除，改行票法，运销分离之后，徽商就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了。

叶显恩认为，徽商兼具盐商、地主、官僚三位一体强烈的封建特征。赚取的巨额利润，既没有多少向产业资本转化，又缺乏更多的供其贩卖的商品与更

大的市场，因而很大部分被封建王朝在捐输报效的名目下囊括而去，从而加强了封建国家的财政经济。或则耗费在“无妄费”上，或则用之于“肥家润身”，尽情享乐。徽商的巨量利润投入捐纳、捐输、建祠堂、修坟墓、建会馆与义庄、置祠产和族田、叙族谱、订家法宗规，开办学堂、书院、义学、试馆等。一方面，他们力求向封建官僚转化，跻身缙绅行列；另一方面力倡程朱理学，强固封建宗法制，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徽商投入这方面的资金愈多，商人与官府、地主结成三位一体也就更为牢固。一言以蔽之，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势力就愈加雄厚。这对坚持落后的生产关系起了恶劣的作用。因此，徽商在历史上基本扮演保守的角色。其只是一家之言，徽商的“徽骆驼”，即踏实的营商精神内涵也是一股强大的支柱。

在中国盐业史上，食盐的行销区域有着严格的规定，即行盐地界制度，称之为引岸，或引地。某一盐产区的食盐，限定行销于某些区域，有一定的疆界，越界有禁，出境受罚。引岸制度不完全出于地理环境的考虑，更多是习惯使然。引岸制，为江西、湖广地区商人经销淮盐，创造了有利条件。

前述明代成化、弘治以来，从边商中分化出内商，后来又从内商中分化出水商。水商多江湖行商，即长江中下游江西、湖广等地的盐商以及全国各地驻点代销小盐商。

2. 官商合一

食盐专卖，其中专卖古称“禁榷”，禁的意思是禁止，榷的意思是独木桥，禁榷合起来就是自己独占，不允许他人涉及经营。盐商们为了食盐专卖的“独木桥”，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大都善于权变，在处理“钱”与“势”的关系上，游刃有余。通过依附、逢迎与仰攀封建政治势力，为其行商打开途径。基本方式有：经济贿赂——明来暗往；联姻攀附——盘根错节；捐献行媚——大彰政绩；跻身仕林——获求自保。

基本上做到官商一体，借势行私。但财富积淀深厚的拥有感和时时危机感迫使盐商不得不花重金去勾结、攀附那些达官显贵，期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然而，封建体制的官僚大都朝不保夕，一旦出事，“前期投入”不仅血本无归，甚至还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了长久之计，一些大盐商便通过捐输的方式谋取“官商”的地位，使自己也晋升为封建统治阶层的一员。世人遂模仿刘禹锡《陋室铭》作了《陋吏铭》：“官不在高，在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唯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人枰青。谈笑有盐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

远公庐（署印官有借佛寺为公馆者），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①何堪封建国体不亡之速？

官商一体的特殊身份使大盐商终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低级官僚的敲诈与勒索，从而保护了自己的利益，且官僚的特殊身份还使得盐商从政府手中得到了种种特权。明清朝盐商如果没有政治身份和政治后台，很难在盐业中占据一席之地。

但盐商也有其一般传统成功商人的共性：其一，工于心计。“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致饶；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势伸缩。”尤其精通陶朱《商经》，人谋、市谋、物谋；货略、价略、市略，掌握“三谋”、“三略”之精髓。其二，精于计算。“综计精确，不屑较锱铢，每年羡于人所不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②其三，家族经营，父传子习。其四，不辞辛劳，周转四方。

## 第二节　贵州盐商，双重道德

### 一、茅台盐商

1. 王天合号——王振发

白手起家王天合号创始人王振发（1793—1857 年），祖籍江西，家境贫寒的王振发年轻时候，因逃荒而流落在茅台街头，以乞讨为生。茅台张家客栈老板悯其悲凄，见其年轻力壮，遂留王振发在客栈里做伙计。

手脚勤快、头脑灵活的王振发感恩张老板，越发起三更赶五更，不辞辛劳地为客栈忙前蔽后，颇为张老板赏识。

凑巧，一陕西盐商投宿张家客栈，王振发躬前躬后，悉心侍候，在彼此攀谈过程中，王振发从简丝粹语中间接获知，陕商即将报团南下，组建分号，意味着茅台镇盐号即将重新整合，盐价上涨。

王振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张老板，并建议倾其所有资金将茅台镇上盐店食盐收下囤积，应用“囤货居奇”商策，以待陕商进入茅台镇。

茅台镇上盐仓积之粟粟，食盐储量极大，囤货不仅需要大量资金，而且存

① 王仁湘，张征雁. 中国滋味——盐与文明［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11.
② 宁一. 中国商道——晋商徽商浙商货通天下商经［M］. 北京：地震出版社，2006.

在商业风险。张老板缜思细磨，盘算日久，决定听从王振发的建议，倾其家当交了定金，将镇上食盐囤积起来。不久，贵州食盐价格果然一路猛涨，张老板的商业冒险得到了丰厚回报。此举大为张老板赏识，慧眼识才的张老板决定将独生女嫁给王振发。

翁婿之间相互信任，入赘张家的王振发，大展商才，吃小攀大，用高价收购小盐店囤盐，同时与陕西商人建立暂时商业联盟，创立王天和盐号经营盐业，迅速斩获成为一方巨富。

王振发经营盐业致富后，在茅台黑箐子选址修建宅院。宅院规模宏大，即使到民国末年家道衰落后，占地尚有20余亩，居室、粮仓、圈舍一应俱全。新中国成立前，宅院朝门石柱上刻有“靖节雅栽陶五柳，行踪常植晋三槐”的楹联，横批署“三槐别墅”四个耀眼大字。

发迹后的王振发需要打点四方，经常宴请分店盐商，于是在宅院附近靠赤水河的区域修建了酒房，自己酿酒宴请客商和亲朋好友。酿出的酒品质上乘，客人饮后赞不绝口。盐业兴盛后，酒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烧房的规模也有所扩大，于是再创立天合号烧房，王振发进京朝拜必带天和号烧房所酿酒为上贡给朝廷的土特产。

王振发发迹社会底层，为人实在，经商诚信，立下商规：做诚信生意，童叟无欺；对家里的帮工、伙计，一律不得打骂、欺凌；要善待佃户；对上门乞讨的穷人尽量施舍。这些家规一直延续到王家的后面几代人，他们遵循祖训，恪守诚信，在商场中安身立命。道光年间，王振发经营的王天和盐号在茅台镇已站稳了脚跟，在数十家盐号中，王天和盐号历史悠久，资金雄厚，是当时较大的盐号之一。于此，王振发家产积聚，成为仁怀名副其实的首富。

2. 贵州儒商——华联辉、华之鸿

“世为江右望族”华氏祖籍江西临川，华问渠世祖华步周、先祖华铭轩，颇具扁鹊之韵，悬壶济世于遵义南平乡平水里（平水里在今遵义县团溪镇一带），以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闻名于遵义府各地。平素给人看病总竭心尽虑，务求康复。“凡遇贫困，慨不取资”，长期思泽地方，深受乡邻敬重。黔北号军攻打遵义，以“华家系一方善士，伊家住宅不许焚毁为令”，华家未受丝毫损失。

华联辉（1832—1885年），字桎坞，生于遵义南乡平水里。光绪乙亥（1875年）恩科考试中了举人，同治初年，贵州各族大起义，避乱徙家贵阳，崇儒学贾而业盐。且读且贾，十余年经营积攒数万金，然后全部把财产分给亲戚朋友，乃至乡里乡亲，重新返困，然则淡然处之。常云“人者，万物皆备

于我，应当博施济众，充满乎仁义立达之量。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济于世。否则虽苟富贵何益。”① 时人莫能识之，惟同郡人唐炯明白其心胸之博广，胆略见识之韬雄。

远至今日，何人能识华君之高义，懂得聚财、散财的辩证内涵呢？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体恤贵州百姓食盐困苦，奏请改革盐政。盐利大部分落入地方官吏和盐商之袋，变本加厉，盘剥百姓，盐价日日趋高，黔民受困，国课空虚。丁氏百思不得其理，始终抓不住要领。四川候补道员唐炯（1820—1910年）向丁宝桢推荐华联辉：“自古有治人而后治法。遵义华某者，于盐务利害至精熟也。今公欲扫桑孔之豪析，规刘宴之常平，将非其人不可。”丁宝桢立即去函邀请华联辉去四川，共商盐务大计，与华氏一席座谈，大叹“果奇才也！”犹如刘备三顾请出诸葛。此后，盐政之事由华氏专一操办。

华联辉到四川后，竭诚赞画，巨细躬亲。“抄二纲九目”，“始变法改为官运商销，事不更州县之手，举百余年中饱，悉夺而予之官”。他的这一政策极大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地方官吏的强烈反对。一些地方官吏怨恨在心，设法抵制改革；一些豪商巨贾议论纷纷，等待观望。最终导致官府损失了30多万两白银，华联辉的首轮改革遭到挫折。

丁宝桢疑惑问之，联辉云：“公此举裕课恤商便民，深合大学理财之道，非聚敛掊克比，法无可疑者，今独商情未达耳，某愿亲赴各岸一行，与之区划，保为公成之。”

华联辉征得丁宝桢同意，亲自赶川黔各大盐运口岸，“划策沟通，晓说利弊，狐犹冰释”。同时，他在泸州设立了官运总局，自任总办一职，统领川、黔、滇三省盐务。在产盐地区则设立厂局，派人收购井灶（四川为井盐）所产食盐。在仁怀、綦江、涪陵、永宁四个口岸设立岸局，销售食盐给商人。并派武装人员从厂局（产地）押送到岸局（口岸）销售，防范土匪抢劫和商人囤积。总局在各路关口要隘设置关卡，专门负责监督稽查。设置裕济仓，专门存放食盐，以备平抑盐价。设大盈库，接受委输，调剂银两，并将各种课税、厘全都纳入成本中核算。这一政策施行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大有所斩，获利40余万两白银。

盐务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岁增银百余万两，户部恒倚以为重”。从此，“商无私估，官无外取，引无留滞，课无责逋，利归公家；而市无腾涌之患。

① 林建曾，肖先治，等. 贵州著名历史人物传［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方是时，黔、滇两边商号林立，不仗官法之能行，而恃君一方以为身家进退之计”。

华联辉任官运总局总办之职多年，从未领取薪俸。丁宝桢对华联辉取得的成绩十分满意，因此奏请清廷破格以知府留于四川补用，获得批准。但是，华联辉坚持不受职。不久，因终日操劳过度，积劳成疾，遂辞官回到贵阳家中休养，并潜心经营永隆裕盐号。

华联辉在丁公颁布新法时，即取得仁岸食盐专卖权，当时仁岸协兴隆、义盛隆、永隆裕和永发祥四家获专卖。前两个商号是陕商开设，后两个商号，都是华联辉独资经营。后来，华联辉把永发祥并入永隆裕，以便统一协调管理。

仁岸承担销制川盐的几家盐号在赤水都设有总号，在四川自流井设有分号，办理销售和纳税事务。永隆裕总号设在贵阳盐道街（今中华南路南段），这里是贵州食盐集散的枢纽，行商坐贾云集，商业十分繁华。永隆裕盐号的总号是这条街上最大的盐号。茅台永隆裕盐号设在茅台街上（今茅台酒厂一车间附近），也是茅台镇最大盐号。永隆裕盐号在茅台、鸭溪、滥泥沟、遵义、团溪等设有夯售站，在刀把水设有转运站，经乌江、息烽、扎佐等地，运达贵阳。沿途设有分站，有专人负责管理，并配备了押运人员和背盐夫役。这些分站设有铺面，配有仓库以供存储、栈房以供夫役食宿。交易量较大的分站有十余间。其中，鸭溪、刀把水、团溪等站房屋众多，设备齐全，交易最为频繁。

在华联辉制定的新法中，各口岸运销川盐都按照其销售区域规定了限额。限额以每人每天吃盐 3 钱计算，各口岸销售区域不同，所得专卖权也就不同。仁岸月销量为 22 载，每载由自流井起运时为十万零八千斤。仁岸 4 家盐号中两家归华联辉所有，永隆裕盐号每月销量为 11 载，即一百一十八万八千斤。盐由官运局运到茅台后，永隆裕盐号分运到各站。除各站分别销售一些外，大部分运往贵阳总号销售。

从茅台起，陆路盐运有三条线路：一是从茅台起运，经中华嘴（赵家坝）、沙坝河、茅坝、两河口，翻阳雀岩入后山、岩孔、至金沙交接后，再运到滥泥沟（今黔西）至安顺，全部为人力运输；二是从茅台起运，经煤子坳、生界、鲁班、五马口，翻三元坡入岩孔至金沙交接后，再经滥泥沟到安顺，此线多为马帮运输；三是从茅台起运，经石子坝、中米窝、岩崭口、坛厂、桑树湾、长干山、枫香至鸭溪交接后，再运刀把水转运贵阳。

永隆裕盐号各分号、分站独立核算，所得收益除去成本后均换成纹银交到贵阳总号。市场交易有散碎银两和铜钱，在交总号前，要将散碎银两铸成银锭，铜钱也要换成银两，以便装箱运送到贵阳。永隆裕盐号解缴自流井官运局

和运到贵阳总号的银两，每次都有纹银万两以上。数额如此庞大的现金，运送全靠人挑马驮，而沿途土匪出没，为了防止抢劫，每次运送都请官运局的盐防军护送。每万两付给盐防军“保运费”200~300两，并招待其沿途食宿。华氏家族后来虽曾经营酒业、印刷出版等，但资本积累靠的是盐业。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华联辉病逝后，华国英（字建庵）继续辅佐其子华之鸿经营永隆裕盐号，其时，华家已积累家产多达白银数十万两。

华联辉谨守孝悌之道，某日祖母彭氏偶忆茅台镇某种口感极佳之酒，嘱咐联辉采购，但此烧房经战乱已经毁掉，联辉向官府购置了变卖的土地，寻回当年的酒师，在旧址搭建简易作坊，试行酿制，经彭氏品尝，正是年轻时喝过的好酒，而且味道更为醇香。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彭氏逝世后，因酒质优良，求酒者甚多，本不对外销售的茅台酒，开始扩大作坊，进行规模化生产，定名为成裕烧房（后更名成义烧房）。可见茅台酒乃“仁义之酒”、“孝慈之酒”。

华之鸿（1871—1934年），华联辉之子，字延仪，又作延宜，晚年改作延厘，年轻时“心思细密，事理通达，已有老成气度”。华之鸿善于理财，长于经营。在继承家业后，在短短的数年间，永隆裕盐号的食盐专卖店在贵州城乡遍地开花，营业收入年达百万两银子。每年端午、中秋、腊月底三个关期缴纳盐税时，运送到官运局的银两少则数十挑，多则百余挑。运送队伍绵延数里。“华百万”的名声逐渐传遍川黔各地。

华之鸿“心性和平，律己严肃。家虽小康，而服食自奉素极俭朴，但遇公益事件辄慷慨捐输，虽巨万金，毫无吝色，其吝以约己丰于济人，大率如此。居恒黎明即起，端坐书室，矩步规行，不苟言笑，在人之初识者，第见其温恭俭让之致，似乎与人无争，与世无忤者。然一察其应事涉世，遇有非义之举，则虽刦之以威，动之以利，亦不能稍易其正见而示人以苟同，其特立独行之操，每于临大事决大疑时见之，此其学养之深，询非常人所能几及。民国以后，见于国家多故，人心陷溺，不乐仕进，思欲以佛氏慈悲仁爱之说，挽救颓风，特建大觉精舍，拟迎请佛经储列，任人观览，其博爱平等之观，晚年尤为浓厚。”

华之鸿为我省近代民族工业创始者之一，华之鸿一生以经营实业为主。1909年，其从日本引进印刷器材，在贵阳创办“文通书局”，开贵州近代民族工业之先河。他还提倡教育，兴办学堂等，对贵州文化事业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以上是贵州名流络绅为扬其“功德”，于1934年向国民党中央政府申请褒扬该绅之呈文，为持身、居官、兴学、交通、实业、纾难、慈善七个方面中持

身一部分节选。由此可知，华之鸿其贵州一代儒商之品节。

3. 打鼓首富——骆成香父子义举

明朝末年，骆成香祖辈从四川内地迁住贵州省沙溪永兴场（今金沙县城关镇玉屏村）经营盐商，致成巨商大富户。成香曾任打鼓场第三任场主。成香之子骆应麟于明崇祯年间以四川籍中举，京会试中状元，做了三年京官及钦差大臣，明末父子同归隐打鼓场。

沙溪河上，往来行人涉河困难，尤其涨水时节阻断交通数日甚至十余天，行人贸然涉水，常发生溺毙事件。骆成香见此深感痛惜，他时常感叹“取财有道，当散之于民”。于是倾其钱财修建一座五孔水中大桥，以便利遵义至大定的交通。原本计划以彼家资可以修这样的桥约十座，成功后，再继续沿河修筑系列桥，联通两岸。殊不知修建期恰逢多雨时节，河水经常涨溢，眼看将要竣工，又被洪水冲荡掉，连番折腾修了多次，才竣工合龙，这时他家财已罄，无法再续修其他的桥梁。

晚年生计困难，只得归去四川老家，独留一座大桥在贵州沙溪河上黯然畅思，近四百年昂然长存。

骆家桥雄跨于沙溪河上，沙溪河以北属当时四川省遵义府遵义县，以南属贵州省水西宣慰司领地（未建府、州、县），骆成香居住水西辖地，故无可考史志记载。

4. 瓢儿井盐商领袖——周次文

周次文（1793—1864 年），男，汉族，瓢儿井街本土人氏。生于盐业世家三代，幼立宏志，疏通文理，尤其对于“四书”、“五经”，渗透涵泳其间，使其皆具“儒”、“商”特质。道光初年，因学文参试，获八品官修职郎，在瓢儿井一带享有盛名。次文幼小受父辈熏陶，于盐业经营之道颇多精习，及年长成人，营商之策更是宏达广通，能驰骋进退于官场世事，可谓“人情练达皆即文章”。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正值贵州全域盐业生机盎然的时期，瓢儿井蓬勃发展成为川盐入黔永岸的紧要孔道。当时桑梓有识之士邀约商议，计划请求主办盐政的官府颁发营业执照给井方盐商（即零售商），变零售商为岸盐商统一运销，把运销联通为一脉，改变运和销脱节条块分割局面。主议筹划的有瓢儿井街上周、张、李、熊、刘等十姓商家，营销执照顺利办妥，时隔不久，盐政主管部门指示批准设立盐行。但事发突变，节外生枝，当时在大定府刑庭为庭官的郭某并其子郭兆熊（号谓占）与大定郡守相互勾结，将瓢儿井盐行执照扣押不发。郭氏父子密谋，妄图将瓢儿井的合法藩照（执照）由郭兆熊全握，

到瓢儿井独揽盐行，企图独家垄断盐行。

瓢儿井想经营盐行的十姓人家，向有关方面呼吁，请求伸张正义，由于官场黑暗，官司九易寒暑，耗费白银上万银，毫无结果。时间长，花钱多，十姓人家五姓泄了气，其余五姓以周次文为代表，不愿半途而废。次文召集五姓父老，对大家鼓励道："官场腐败，不足奇怪，头上有头，天上有天，大定府黑暗，总还有能治它的地方，我既有微薄功名，就要为桑梓父老讨个公道！"

次文到大定城找到简大昭。简是道光壬午年以优秀禀生考中的乡试举人，在大定府城颇具活动能力，并深通大清法律，精晓诉讼门道。简对周次文说："欲返秦壁，非上诉到云南都察院不行，原因是贵州已是郭兆熊辈的势力范围，再去叩求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受困。当今趋炎附势的官署，大多数都是以有功名的面目出现，应当援例缴纳钱粮，才能作有效活动，免遭侮辱，否则，事难成矣。"

次文采纳了简大昭的建议，以八品职衔同简前往云南，上诉到都察院，详细地向官府讲述其执照被扣押始末，结果得到了都察院支持，当时即行文来贵州抚台转饬大定府退还执照，并责令严办郭兆熊一伙。周次文与简大昭由云南转贵阳回大定府结理，郡守给照谕赏。

次文历经艰辛，终于为瓢儿井街上志在经营盐业的乡亲讨回了公道，各盐行陆续开业，瓢儿井盐业进入兴旺时期。行众为感谢周次文，公推其为"行长"，于是川盐乃定周氏行名"万兴行"。以后六七十年间，瓢儿井街上"万兴行"一直生意兴隆，经久不衰。

周次文是将瓢儿井盐业引向兴旺发达的重要人物。



图 6-2-1 贵州盐商（蜡像）

5. 协兴隆盐号——股份制经营

"协兴隆"盐号由陕商刘绍堂、田荆荣与李四友堂总办李德山各出二百两

银子联合兴办经营。清代，陕西商人在淮扬盐场的势力衰微，陕商弃淮入川，在四川经营井盐。井盐生产投资量甚巨，凿浅口井需银两万两不等，凿深口井·费银七八万两不等，设灶一座需银千二百两，加上常年费用，每井需银至少不低于十四万两。同时井盐生产还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有挫一二年或三四年不见功者，有半途而废者，有功亏一篑者"。面对高投入、高风险的井盐生产，陕西商人创造了以契约为中心，机动灵活的"契约股份制"。这一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集资机制被广泛地采用，以致出现"未闻有一人独享一井之权利者"的状况。

协兴隆盐号名下共70余处分号，从四川自贡一直到茅台延伸到贵阳各地。

### 二、贵州地域盐商的双重性

贵州盐商是封建落后性与历史的进步性双重交织的产物，因为他们成长的土壤或是明朝封建社会，或是清朝和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封闭以及不稳定发展，相应在他们身上烙上了深深的经济文化演绎印迹。

他们受时代经济制度的局限，相信金钱政治，相信权术政治，相信派系政治，相信强势政治，相信皇权政治，相信独裁政治。在他们取得政府盐生产、运输、销卖专利过程中，更相信"钱是万能法则"，多数不择手段，颠倒黑白，玩弄权术，使用上沟下联等不良竞争手法，但其中不乏受优秀传统文化政治思想熏陶规矩之卓越者。同时又有民族独立性，和兴昌地方经济文化的善举，通过赈灾济贫，修桥铺路，开办义学，践行献金爱国等公益活动。

他们行为是时代矛盾的对立体，通过捐官贿官追逐权力，攀附权贵，寻求"以权换利"，圆滑巧妙地应对各级盐业官员和地方黑恶势力纠缠，为自己的商业利益开道。同时在正常良心和不当利益之间寻求心理平衡，以米百余石、铜钱千余串持续济贫，四处开设医馆为民免费诊治，对无力婚嫁、丧葬者随时周济，开办地方书院，学校遍及全省各地，尤其在国难当头，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纷纷慷慨献金。

历史在沉思，中国商人如何身心合一？

## 第三节　底层盐夫，盐运脊梁

### 一、自贡盐工

自贡是明清贵州盐运主要基地。自贡盐工具有开拓精神和奉献品质，是他

们用脊梁托起盐都的兴盛，保障了川盐的供给。累积历代盐工的智慧和心血，自开井以来延续到抗战时期，共开采 1.3 万口盐卤和天然气，是他们的奉献，保障了贵州明清以来的盐运的物质基础，他们时代相承，开拓创新一整套巧夺天工的井盐生产技艺和工艺，使自贡采盐技术在明朝、清朝早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准。

在近代，自贡井盐按照生产流程分为井坊、枧坊、灶房三大部门，三大部门分设掌柜、经事、管事、外场院等职，组成严密的生产管理机构。自贡盐工按照工种，从明清到民国逐渐演化为“十大帮”，即山匠帮、机车帮、车水帮、山枧帮、转盐帮、捆盐帮、装盐帮、扛运帮。

回顾中国手工业历史，自贡盐工之工作力度、强度、时间度、负荷度及综合辛劳指数最为典型的超常。我们截取几处场景，以供佐证，如提卤工人用赤脚踏水车把卤水运至高处、烧盐工人睡眠，图 6-2-2、图 6-2-5 和图 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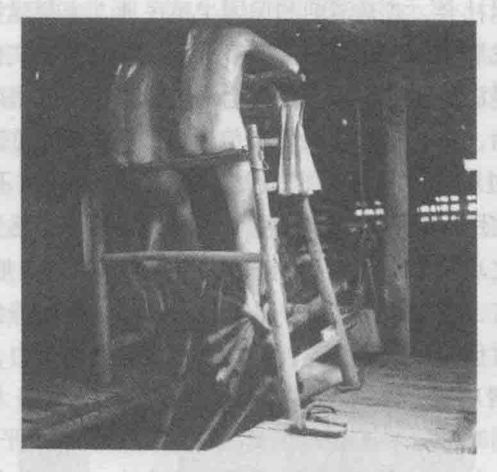


图 6-2-2　自贡盐工赤身脚踏水车提卤

所有盐工在极大强度工作下，身体变得畸形不堪。尽管他们劳作辛苦，尽管他们生活贫困，尽管他们已经不分白天和黑夜、春夏与秋冬，但他们能分清国仇与家恨。1942 年，在抗战艰难时期，自贡盐工积极响应《新华日报》的“献机运动”，他们慷慨捐款，购买“盐工号”与“盐船号”两架飞机。1943 年，响应冯玉祥“节约献金救国运动”，自贡盐工以 8 月份食米差价津贴作为捐献，共献金 50 万元，占全市献金总额 200 万元的四分之一。1944 年，自流井盐工每人捐端午节的口食费 40 元及节约 6 个月的牙祭钱（每月三次），零工及转运工每人捐献 100 元，捆工每人每月捐献一天工资计 6 个月，共献金 680 万元，贡井盐场其余工人共献金 340 万元，合计 1 020 万元。抗战期间，自贡





图 6-1-3　自贡盐工裸体提卤



图 6-1-4　自贡盐工挑运卤水（两只桶重 380 斤）

市盐税达 20 966.8 万元，合计自贡市人均献金 500 元，创造抗战时期“盐都献金甲天下”之壮举！

壮哉！我中华自贡盐工！他们以其佝偻而萎缩的身躯扛起了四川“抗日救国”这面大旗，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事实！

## 二、涪岸—龚滩之纤夫与背老二

乌江盐运虽然河谷狭窄、水流湍急、险滩众多，航行十分危险，但在明清水运毕竟是最廉价、最有效的长途运输方式，是唯一深入贵州内陆的航道，因



图 6-2-5　夏季烧盐工人睡眠图（煮盐工人一年四季没有睡床，夏季就睡在六寸宽、六尺长的睡板上。没有枕头、蚊帐、被子、竹席）



图 6-2-6　冬季烧盐工人睡眠图（冬季睡在“坐包”上，两尺见宽的竹篼包，中间开孔，放几把稻草，就叫坐包）

此乌江在酉阳的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酉阳、黔东北乃至湘西部分地区所需的食盐均要从龚滩输入，同时输出桐油、木油、生漆、五倍子、猪鬃、牛羊皮、兽皮、粮食、中药等农林产品。

1. 乌江行船

涪陵以上经常行使可以到达龚滩、彭水的木船共有 450 余只，分为厚板船、杂货船、船笼子和蛇船四种类型。其中厚板船是乌江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

乌江中游的船称歪尾或歪屁股船（亦称厚板船），船板较厚，强度好，能承受急流拍击；干舷较高，过滩不易上浪；头尾高翘，首舱设有前梢，尾部向右并高于船头，上架后梢，驾长在官舱顶篷高架上操作，视野开阔；后舱又置偏梢辅助，故自重虽大，操纵亦称灵活。道光年间，沿河县船民丁大用驾驶歪尾船至四川涪陵，开贵州乌江船舶航行下游的先例。

上行装载的货物都是食盐，一只船一般可以装载 19 吨。下行装载的货物有粮食、桐油、药材、生漆等，洪水时可以装载 25 吨，枯水时最多只能装载 18 吨。厚板船承担了涪陵到龚滩一线一半以上的货运生意。而龚滩以上到贵州思南、潮底等地的船只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统计，有经常行使的货船 10 帮，合计 70 余艘盐船，型式与载量和涪陵到龚滩的船只相似。

2. 乌江纤夫

乌江上的木船航行一般不使用风帆，上行都由纤夫拉纤前进，一艘船要配备十几个纤夫，一天只能上行十几千米，而乌江两岸都是陡壁悬岩，纤夫们行走都十分困难，更不要说拉纤了。洪水时，江水往往把纤道淹没，船只无法上行，不得不停航，称之为“扎水”。枯水时，船只过滩需要大量人力帮助，这时，一只船上的纤夫根本不够用，船只往往结帮而行，每帮 8 只，一百多个纤夫才能把船一只一只地拉过险滩，所以上行最短需要一个月的时间，长的两三个月之久，下行只需两三天的时间，但是水流湍急，沉船撞礁也是平常之事。

我们十年以前田野作业，采访了乌江边上最后一名纤夫——冉启才，他 16 岁上船，从四川酉阳涪陵到贵州思南 100 千米水程，他熟悉每一段水情，哪里有漩涡湍流、哪里有暗礁险滩，哪里需要拉纤过船，他均了如指掌。从龚滩到沿河 170 多里水程，需要一个多星期，每位纤夫得准备十多双草鞋，每顿均吃有些泛馊味的豆渣饭，过大滩“打牙祭”时，有几片手抓肉。

纤夫的一生，注定与狂风叠涛为伴，注定与悬崖峭壁争道，注定背勒篾纤、脚踏大地如希腊大力神海格力斯一般，与命运拼搏，与死神战斗，与一切自然的伟力抗衡。

3. 乌江“背老二”

龚滩背夫每天背着背篼，拿着“打杵”，将货物从一个码头搬运到另外一个码头，两个码头之间距离六七百米，搬运时必须经过龚滩老街，繁忙的时候

昼夜不停。而龚滩的老街阴沉狭窄，空气恶劣，阳光不足。为了使搬运不会因天黑而停止，在龚滩街上出现了“檐灯”（盐灯），沿街的每家每户都在屋檐下挂着一盏，为背夫照明。

龚滩到酉阳、龙潭及秀山运输的背夫人数则更多，龚滩除了靠乌江与外界联系以外，道路不畅，没有公路，周围山区极为落后。因此龚滩与其他地区的陆路运输均靠人背肩扛，在这些地方连挑子都是无法使用的。所以龚滩的脚力背夫被称为“背老二”，因为他们的运输工具主要是背篼。他们一般上身披着棕片，下身穿着半截裤，脚上穿着草鞋，用背篼背货，手持专门制作的“铁打杵”（打杵上端用自然呈“U”形的木质弯棒做成，其垂直方向装有一木把，长约二尺许，把的下端镶有一铁箍，铁箍中间固有一锥形方铁），背运途中休息时，可以把背篼放在打杵上端，用手扶着打杵下端四方铁即押在某地不动，人可以得到休息，沿路上都有密密麻麻的打杵坑，可见背夫的艰辛。“背老二”的装备还有一个竹斗笠和小方席，即可使货物不受雨淋，又可使人不淋雨。“背老二”大多是酉阳及黔东北各地的农民，盐巴一般重约三百斤，行进起来，如同背一座小山，盐较重时不得不“三步两打杵”，做到“篓不离背，背不离篓”，前躬后蹲地在崇山峻岭中穿越。

平时，“背老二”是由各个盐行自行雇用的，但是在抗战时期却出现了一支由政府组织的准军事组织——东川陆运总队，专门负责食盐的运输。由于战争，原来供应湖南的淮盐运输路线被切断，改由川盐供应湖南，运往湖南的食盐必须由涪陵运到龚滩，再由人力背到龙潭然后装船顺龙潭河运至湘西各县，这样就使龚滩到龙潭一线的运输非常紧张。为了保证食盐的运输，国民党第六战区成立了陆运总队，从酉阳、秀山等地征召了六千多农民，分别编成大队、中队、分队和小队，负责运输食盐。当时酉阳有两个大队（二大队和三大队），二大队有 4 个中队，3 000 多人；三大队有 3 个中队，2 000 多人。每人每次一般要背 200~300 斤左右，数百万公斤食盐就是这样靠人力从龚滩运到龙潭，再转往湖南，从而保证了湖南的食盐供应。

龚滩“背老二”，是他们用坚强的双肩，活跃了川、黔、滇湘明清时期的经济，在抗战时期，依然用背篓，肩负咽喉运输的重任，对稳定抗日战局做出了应有贡献。

### 三、永岸辛苦人——盐帮

永岸盐道至大定的陆路，最早是叙永至马蹄入黔经龙场营、果瓦、大岩头、大山、松树、星宿、百纳到大定，后于清初改由马蹄经普宜、大石板、瓢



图 6-2-7　盐路打杵遗留坑点

儿井、打鸡阆至大定，由叙永到大定属瓢儿井场，全程为 280 里。这条古盐道上沿途多高山峻岭、沟壑险峰，起伏连绵，崎岖不平。较著名的险峻山岭有后山铺、雪山关、猴子沟、干灰槽、山王坳等大山，如雪山关，从关脚到坡顶，就需大半天时间。

如果把永宁至瓢儿井的主要地名汇集在一起则为“三关、四水、九坡”。三关即苗儿关、石关、雪山关；四水即滴水、一碗水、望天水、方便水；九坡即渡船坡、青杠坡、长坡、望城坡、刺桑坡、豇豆坡、连山坡、溜山坡、稀饭坡。盐工们串编了顺口溜和歌谣：“占底上来狗弯弯，把哥送拢营盘山。过了营盘山，吹吹打打过石关。要吃凉水一碗水，要吃麻汤半边山。”“黑坭哨，两头挠，中间出龟子（小偷），两头出强盗。”“风水桥，两山高，十个婆娘九个骚。银子钱米都不要，只要二两盐巴下海椒。”“雪山关是个名，磨盘山冷死人。”昔日背盐大道已残缺不全，被岁月的青草全然覆盖，寻迹仅存赤水河延伸至高山铺之间约有 1 千米保存较为完整的古盐道。

因为路途凶险狭窄难行，原贵州代夫袭贵州宣慰使职的奢香夫人（系四川永宁宣抚司、彝族恒部扯勒君亨奢氏之女。是彝族土司、贵州宣慰使陇赞·蔼翠之妻，婚后常辅佐丈夫处理政事。明洪武十四年，蔼翠病逝，因儿子年幼，年仅 23 岁的奢香承担起重任，摄理了贵州宣慰使一职）建筑了永宁至瓢儿井、永宁至毕节（两头从雪山关分道）等多处驿站和背盐小道，大大改变了原来的艰险路况，其系用石板砌成，石梯路宽约两米。

宽一至二米石块铺砌成瓢儿井至叙永不规整的盘曲盐道，蜂屯蚁聚，数以万计背盐人如蚂蚁搬物一般在盐道形成复线串联，成年累月跋涉其间。无论是前行或是歇气，依赖“丁字拐爬”助力，铁锥重重叮在石头上，便坑坑点点，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方，有的圆，有的深，有的浅，280 里坚硬石板山路上，随处可见这些小圆窝。

川盐入黔，人背马驮。成年青壮男人一般每人负盐约 80 斤至 100 斤之间，



图 6-2-8 现存的运盐古道

特别强健者可负100多斤以上，妇女、儿童及年老者体弱者，负重情况不一，30斤至50斤不等。每匹马驮盐100斤至150斤。背盐人绝大多数为男子，但也参有极少数的妇女和尚未成年十二三岁的少年，窘迫生活所致，不得不与丈夫或父亲一起，出卖劳动力以求全家糊口活命。运盐人常以“帮”为组织单位，集体行动。同寨同邻、亲戚朋友或熟人组成一帮，一帮约十余人以至二三十人，数量不定。团帮运盐，有助于防匪患，增加安全系数和互相帮衬照应。帮中由“领帮”负责统率调配，无论休息、住宿、领盐和交售，均由领帮负责联系。

板凳儿和背篼是背盐常用工具。木制板凳儿，上边两根主木弯曲成弧形支撑成架，上端钉一横木盖于头顶，下端四根木柱装于一块木板上，底端四周嵌上小木板，成一小木盒，盒内可放置碎块盐自食，或置其他食物、物件于内。底端木板，用以歇气时放背子。板凳儿四根木柱，前两根长，为贴背面，后两根短，上置一横木板，作为放置盐巴的地方。背篼又称背篓，竹制工具，背盐时适合妇女儿童使用。另外还有工具拐爬子（类似龚滩的打杵），上端为一半圆形木枋，中部打孔，串进一棵圆木棒，木棒直径4~5厘米，长与脚往上过臀部齐，以使用者个子高矮而定，下端顶装上铁锥，便于触地时稳当，用以支撑板凳儿或背篼重量，可让人休息片刻。再还有用竹制半环形的“汗刮刮”和布毛巾，用以揩去迷糊眼眶的汗水，方便行进。背盐巴的人，由于负重大，

又是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走起来是三步两打杵，汗水出全身，走几步就要用拐爬子支撑着歇气换气，一般是上七下八平九步就需歇气，然后继续前行。背盐规矩规定，盐负在背上，除住宿和吃中午饭外，不能卸下息憩，只能用拐爬子拄地支撑着歇气，所以一天到晚，人人气喘吁吁，挥汗如雨。时有谚语说："早上神背，中午人背，下午是歪嘴老妈背。"可见其劳动之艰苦。

运盐人群中，最为苦恼的是女人，并肩与男人蹒跚同行，在盐运行列队伍中，倘若要小便，需找僻静之处，而身上沉甸甸的盐巴又不方便卸下，只能站着掏出自备硬竹笋壳慢慢引便，窘态百出，足见其心理的难堪和身体的不适。背盐人穿山越岭靠的是硬软底草鞋，从家中出发需编织几双草鞋随身携带，随烂随换，脚底足面尽皆厚实老茧。无间冬夏，衣服一厚一单，盐篼一上肩慢慢就发热，马上衬单，间歇休息，强汗逐敛，立即添厚。吃的是生、硬、冷干涩的包谷粑、苦荞粑、红薯粑等，晚上盖的是秧毡、破絮。其生活之艰苦不堪言状。

盐民疾苦，令人悱恻，我们不是在玩味"文革"中的忆苦思甜回忆，只是在弘扬一种"贵州精神"——一种在生存逆境中坚忍不拔的精神！

中国西部山坳上贫穷的贵州，在明清的苦难岁月里，极度饥寒的家庭，只能用一根细麻绳将石头一样硬的灰白色小块盐块吊在屋梁柱子上，一家人望盐止"渴"，实在忍受不了体质的虚脱，才用盐块在汤里面搅和几遍再津津吞咽，俗称吃"吊盐"，也谓"涮锅盐"。再者用纱布裹紧盐块，隔着纱布冥想一番，浅尝试舔一下，又称"舔盐"。更有甚者，家中痴儿哭闹寻盐，设法去河边捡一块类似盐巴的白色鹅卵石在锅里来回翻滚几番，权当哄骗小孩的办法，俗称"打滚盐"。甚至连装载过盐的竹篾条，也变成众人争抢的稀罕宝贝，因为烧成灰烬，经过淋溶，也能熬制成盐，基本上能解决一个月的食盐所渴。背盐工辛劳后最大的享受就是能吃上几天"饱盐"。

追溯几千年，贵州普通百姓一直过着能吃上盐就好比过年的"盐饥荒"的悲惨日子。贵州近代也曾闹过两次大的盐荒：一次是清嘉庆年间苗民起义盐路断绝；一次是1951年国民党政府败逃台湾后川黔盐商歇业致盐路断绝。在贵州省大定县城"抢盐风潮"中，无数蜂拥尾至的百姓将盐巴仓库木地板底下泥土疯用手指挖抢一空。随即，往嘴里塞进大把大把含有盐分的泥土拼命吮吸，其情景之悲戚令人惨不忍睹。

## 四、仁岸运盐人

据《贵州文史资料三》述："二郎滩周围六七十里内的人，大多数以背盐

为生，不论男女，从七八岁就背盐，直到不能行动才停止。"[①] 可见盐工之苦。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川盐入黔的故事，同时还流传着许多反映盐运工人悲惨生活的民歌，如《拉船歌》："手扒纤道背朝天，纤绳搭帕不离肩。双脚踏陷青石板，纤夫常年在河边。"又如《背盐歌》："盐巴老二度时光，起早贪黑背盐巴。养家糊口为买米，半夜三更就嘈起……"这些都充分映照了船工、盐工饥寒交加悲惨艰辛的生活，赤水河古盐道演绎的是两岸贫苦人民明清几百年辛酸的生存史。

历史在沉思，任何性质的政权均不能把日常生活必需品作为垄断，应该作为福利，否则会民不聊生，政权结构也会失去根基，加速其崩解过程。

## 五、盐运在继续，盐道在延伸

盐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催化剂，盐是解读贵州历史的管孔，盐运文化浸润每个贵州人的心灵。它是一首生命不屈的赞歌，是贵州"克坚攻难"精神的历史写照，自贵州建省延续至今601年漫长岁月，贵州在不断地凝聚，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思索。

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激励我们：贵州已经进入后发赶超、加快全面小康建设的重要阶段。要创新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不是要把它破坏了，而是要把它保护得更好。要树立正确发展思路，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要扎实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把扶贫开发工作抓紧抓紧再抓紧、做实做实再做实，真正使贫困地区群众不断得到真实惠[②]。

贵州前面的路还很遥远，任务艰难万重。我们需要的是发扬盐运精神，继续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社会目标。盐运在继续，盐道在延伸……

---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

② 见《贵州日报》之贵州已经进入后发赶超加快全面小康建设的重要阶段，2014年3月8日。

# 第七章 贵州明清盐运史考与制度经济启示

通过时空维度结合，探索中国榷盐史上封建专制皇权集团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缜密制度设计的轨迹。用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和“管制与俘获”理论解析榷盐体制。以历史演绎和田野实证结合，解构贵州明清盐运体制的动态变迁，梳理川、粤、淮、滇盐入黔路径。整合贵州明清传统经济区域通道。提出构建贵州盐运文化旅游品牌的现实价值，为构筑贵州通道经济提供历史借鉴。

## 第一节 中国历代榷盐史考溯源及启示

### 一、盐定乾坤、盐立政体

黄帝与蚩尤在今解池近域展开围绕盐资源争夺的民族生存的涿鹿之战，其后尧、舜、禹建都皆均衡布局在解池周围。夏商周二千二百六十九年及隋文帝至唐初一百三十九年，合计二千八百零八年是中国盐自由贩运无税时期，其余历史时间，演绎着不同朝代相异政权疆域之间，皇权集团、豪强贵族、显官爱宦、机巧盐商、碌碌平民之间的利益博弈，中央财政与地方经济之间，省界区域彼此之间利益平衡的协调，制度管制与双向俘获种种变式。

春秋，管仲推衍“官山海”之控策，以官制为主，辅以民制，民制之盐，纳官收买，官控运销，寓轻税融专卖之中，使民不觉累赘，称其为部分专卖制。至秦朝，商鞅盐政强力实施“盐铁专卖”，通过控制盐业生产，征收昂贵的盐专卖税，再转发给盐商销售。

### 二、两汉两晋，榷盐变幻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桑弘羊采取国家专卖制，统制盐业经

济，尽控全国盐资源，设置盐官三十七，分布于二十七郡区域，榷定“均输”、“平准”之策。东汉采纳“民营官税”之政。西汉、东汉盐制主脉为混融型专卖。

三国时期始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曹魏控制河东盐池，政府专营盐业，展开“盐屯”。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蜀辖川康、云南盐之利，尽收盐铁之利，孙吴尽得淮、浙、闽、广产盐，裨益国家经济，盐资源均衡成就“三足鼎立”之势。

三国归晋，杜预乃“较盐运”，“制盐调”专卖制度，规划营销，第一次榷定全国性计划，整疏盐运。

宋、齐、梁、陈（公元420年—589年，共历169年）的南朝，名门豪族东掠西侵，豪霸国家盐业产、运、销命脉。北魏经历短暂“藏富于民”的盐的自由经济时代后，被豪强贵族趁势控盐，西魏严峻盐税，东魏分区梳管，北齐循东魏盐律，北周展开征盐税。

**三、隋唐盐政，坏在赋外**

隋唐初期为盐政史无税期。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第五琦尽榷天下盐，以“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挽救战时经济。随后，刘寅开创“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盐法，奠定唐朝经济的基业；贞元十年至十五年（公元799—794年），王纬、李琦以“赋外羡余”尽敛天下盐利，盐制平衡崩解，私盐枭雄王仙芝、黄巢成群聚啸，其后藩镇割据，世界性强大的封建帝国唐朝，因盐制败坏，其政权存在的时空被摧毁。

五代十国，官商并卖，巧立名目“屋税盐”、“蚕盐”、“随丝盐钱”、“两税盐钱”、“盐米法”、“产盐法”、“过住税法”等，极尽盘剥之能事，为历史盐政最为严酷寒冬季节，自然更迭速度加快。

**四、北宋南宋，榷盐界分**

北宋代盐制，首先“计产行销”，在全国设置“官卖地域”、“通商地域”界分，并存“民制（官制）、官收、官运、官销，民制（官制）、官收、商运、商销，民制、官收、官运、商销，民制、商收、商运、商销”。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范详以四道程序发钞、支盐、引运、驻卖，改行“钞盐制”，蔡京以“换钞法”、“循环法”全然破解其榷盐宗旨。南宋国土破碎，更行“对贷法”、“贴纳法”、“循环法”、“正支法”，苟存延喘。

## 五、辽金元朝，败在钞引

辽初期为了倾销宋国盐业经济实施“税而不禁”征税制。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金国蔡松年持繁琐严密的“钞引法”使盐课叠增。元通盘整合全国为十盐区，以民制、官收、商运、商销为主体，榷定元盐“引法”，通过“批引”、“掣验”、“凿角”、“水程”、“退引”完成商运商销程序，但国内货币“钞法紊乱”，烧盐工“十八扁担起义”撼动元朝根基。

## 六、明清盐制，网织榷严

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全国构架七个盐课提举司，一名盐课司，演变宋朝之“折中制”为“开中制”。在“纳粮支盐”的基础上，以“纳马中盐”、“纳草中盐”、“纳布中盐”、“纳铁中盐”互济。后为“占中”、“抱中”破局，用“常股”和“兑支”一法解决滞存之盐引，全国盐商遂分为“边商”、“内商”、“水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叶淇改尽“本色”变“折色”，皇亲国戚、内宦外官为了奏讨残盐蜂拥相趋，以旧引买余盐，私盐猖獗，空引赘存。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袁世振立“纲网制”变革盐政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

清朝废“开中”，把“边”“内”“水”商整调为屯卖场盐的“场商”与转手运销场盐的“运商”，调修“网纲”制，严禁盐官例规，予以废除，酌留归公，商人随引带纳。对于长卢、两淮各区之网商，实行滞岸引盐，畅岸通融代销，作为一时权宜调剂。对于广西由于地缘偏僻，改商办为官运管销，福建则裁商废引，盐课摊归各场，由州县征解，县域附近和边远地区进行官卖制。四年后，又更改为就场专卖，广东场盐改为官收，裁废场商，仅留埠商运盐办课。甘肃土盐因为侵销官引之盐，将引课纳入地丁，按数摊征，废引裁商，随民自由贩运。同时在东登、莱州、青州三府，删除商销，改行民运，应征课额。商人承受课项、帑利与报效款三重压力，积欠过多，各省盐务陷入泥潭，呈不可收拾之局面。道光十二年（公元1882年）陶澍以“归局不归商，改道不改捆”宗旨改革两淮盐制，曾国藩以“报价”、“整轮”整疏盐运。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李鸿章以“厘盐”专招财力、势力强大的盐商实行“循环纲网法”。光绪之年，叠层交加，厘价合计超越正课，盐价伴之倍增，正盐日贵，私盐就倡行，官不敌私，俱废引岸，形势所迫，又不得收拢聚集，转归官办。整个清朝呈现出“官运官销”、“官督商销”、“官运商销”多种盐制并存的复杂格局。

## 七、榷盐轨迹，体制反思

古代常称“榷”盐，榷字说文解字解曰“水上横木……为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纵观中国榷盐史，在中国传统皇权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往往缜密设计出“垄断”重要生产与生活物资的政治化经济结构，阻碍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最早，最普及的是“盐”、“铁”，盐铁当时是人类社会基本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源，全国产地有限，生产工序相对复杂。

上述齐国管仲“官山海”，主要是控制盐流通的下游运销，由国家统一销售，控制商人利益，转为国家利润，同时实施“外因于天下”的盐政，“贱卖贵买”或“贱卖不卖，贵买不售”，通过盐资源外贸商战削弱相邻敌国经济力量。

战国末期至西汉，垄断松弛，其间出现一段盐铁自由经济时代，盐铁豪商累积“与王者埒富”，“拟于人君”的资产。形成于朝廷均衡的派系政治力量。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仪和富商之子桑弘羊并力之谏下，展开“专卖制度”，尽榷天下之盐，实施国家专卖制，统制盐业经济，对生产及流通过程全线挟控。唐代从盐铁扩展到茶，宋代由盐铁延伸到酒、矾、醋等，元明清效样增扩垄断范畴。

在相对不增加土地赋税的同时，通过对盐业的部分或全部垄断来实施盘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相较直接递增土地或其他直接生产税缓和许多，高明巧妙融化于无形之中，“赋不增而用足”。取用委婉的无形“掠夺之手”，从经济层面上，可以大肆增强国家财政硬软性收入；从政治维度上，可以巩固坚实中央集权体系；从社会结构稳定层面上，可以调控国家与商人阶层的利益分割，可以暂时性麻痹与缓和平民阶层与国家盘剥尖锐矛盾，可以阻缓商品经济发展；通过“抑商重农”，“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宏观上把持商人财富流向、流量，减轻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强度，缓和社会矛盾。

所以封建王权统治者一直沿袭几千年，维持对盐业的巧妙经济制度构架。

但是，这种掩盖式的盘剥制度设计，增加了市场盐的最初交易成本，而且是通过非生产性的利益再分配而增加统治者租金，促使统治者追逐租金利益最大化与国民基本民生利益之间产生矛盾，破坏了自然经济秩序，窒息了中国传统商业经济正常发展的态势。

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既是行政机构，又是经济机构，政经合体。通过垄断盐业，组织生产，指挥控制盐商业活动，形成大批官吏商人一体化模

式操作。竟然连皇帝也参与其间，明武帝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开“皇店，至京城九门外至张家湾，河西务等处，拦截商贾，无不索钱”。说明，皇店就是行敲诈勒索之极处。即使在清明公正的康熙王朝时代，刑部尚书徐乾学也把本银十万两，交盐商项景元在扬州进行盐交易，每月收三分利。可见，在封建制度的皇权政经结构体系下，“管制”与“俘获”普遍存在，封建政府管制制度的设计，显性层面是为了大众利益的均衡，其隐形层面是为了皇权利益和特殊官僚利益等相关集团利益服务。通过立法俘获、执法俘获、变式俘获，达到隐蔽性借法牟私，操作性执法谋私，利益关联变渠道取私的目的。

再论盐运销划界，从宋制定官卖和通商区域界分，至元明清设置严格的引地、引岸分界，统筹全国形成若干产销割据行盐区域。如淮盐有淮界、川盐有川疆、粤盐有粤边，彼此之间倘若越省界、州府界皆定为“私盐”处理。虽然权衡了区域空间之利益，更便于中央集权量化谋财，但严重隔断了商业正常流通的渠道，阻碍了平民正常索盐的通道，也是集团利益群博弈平衡的外在显性象征。

通过中国榷盐史的梳理，使我们认识到，一般经济学家将技术创新推广、规模集聚经济、教育与资本的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因素在长期经济变迁中起主导作用，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因为制度因素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提供了激励与保障。正如明朝末期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所述，海水盐、池盐、井盐、末盐（土盐）制盐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高端。但反思明朝百姓依旧普遍缺盐，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朝“家天下”的皇权政治、僵化的官僚体系、割据的行盐运销体制、腐败堕落的上层建筑等。

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深水区，贵州正处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避免掉进“后发悲哀”，被暂时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暂时成果所蒙蔽，而忽略长期效益的经济制度结构改革？在技术创新和制度移植变迁中，如何权衡中值？如何避开“管制”与“俘获”陷阱，彻底粉碎“权力寻租”？如何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从而激活商品经济市场活力？如何使民生利益最大化？种种如何，伴随经济发展的进程都需要我们贵州建设者慎重地思量与解答。

## 第二节 贵州明清榷盐体制下的盐运梳理

### 一、开中折色，官运商销

元代时，贵州行政板块分割隶属四川、湖广、云南三行中书省，既无独立行政权，又无食盐管制权。明以前，榷盐混沌，定则不强。

贵州榷盐与全国同步。明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开中"制正式拉开序幕，以"纳粮"与"中盐"并举，"开中"与"屯田"并行之策勉力支撑贵州卫所。明弘治以后，由于"占中"、"报中"之赘生漏隙种种弊端，盐课"开中"渐层败坏。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贵州和全国同步，悉数尽改"折色"制，肆售盐引过多，又用"余盐"补仓，全国盐法大为紊乱，贵州也陷入无序状态。万历年间推行"纲法"，开启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盐商大都在贵州直接募民垦田，称之为"商屯"。

清代初期，废除"开中"，整饰盐商秩序，采用"坐商收盐法"和运销食盐"纲网法制"。为了安定政治局面，在贵州全面实施解决贵州"食盐难"的系列相对宽松的"官督商运"盐制。中后期，各级盐商"报效"，准予运盐"加耗"与盐价"加价"，盐价层叠上升，加之国体破碎，社会矛盾激化，政治经济格局不稳定，盐以病民。光绪三年（公元1876年），丁宝桢盐政改革举措妥当，实施"官运商销"，惠及川黔，但在盐政历史进程中，实属浮萍。

1915年贵州各级运盐公司成立，尽改"官运商销"为"官督商办"，由公司专卖，次年取缔公司，敞开任商自由贩运达10年之久。政局叠生变幻，军阀自行征收盐捐，不问官私任盐运销，故滇、粤、淮盐并至，川盐销量相对递减。1927年复改为包商专运，称"认商"，"即包认省税的专商"。1933年取消"认商"制度，1935年复行"包商专运"，次年又彻底取消"认商"，再行自由贩运。20余年间盐制翻云覆雨叠生变迁，清末推行的官运商销已完全取消。国乱盐制焉存？可见清末民初，多数时间均处于自由贩运之状态。

### 二、政经融合，拓展驿道

明清伴随贵州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多维融合进全国。政治"改土归流"的宏观决策的演进，军事巩固西南边陲的战略筹谋，相继对旧有的陆驿和水驿进行整治和疏浚，客观上整疏了维系民生的盐运网络。

明末贵州已经建成总驿干大道三十余条，形成以为贵阳中心联络省内各

府、州、卫的驿道干网，可北达重庆、南川、彭水、泸州，东通湖广辰溪、靖州，南至广西庆远（今广西宜山）、田州（今广西田阳），西达云南交水（今云南省沾益）、罗平，西北连通四川叙州、筠连、云南乌蒙（今云南省昭道）。

清廷通过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分兵规取贵州，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九月平乱刘鼎，荡平"安坤之乱"，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改土归流"及"控制西南"进程展开，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和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镇压乾嘉"苗民起义"，咸丰年间贵州各族大起义等系列大型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形成了黔境密植的通道网络系统。重建了湖广至昆明和川黔驿道，新建遵义—水西—毕节—威宁抵昆明、邕宁（今南宁）—安隆所（今安龙）—罗平—昆明的两条驿道，开辟贵阳广顺大道，整修黔西驿道，开辟了定番（今惠水）至罗斛（今罗甸）大道，改线湘黔、滇黔驿道，沟通了县与乡、乡与乡之间的通道。

明清展开了对黔境大型河流水运疏浚与整治。

### 三、航道疏浚，港埠兴盛

乌江流域大型整治源于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经贵州布政使郑雯、石阡知府郭原宾疏浚，石阡河通航。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贵州巡抚周人骥与乡绅盐商协力上游，航道输运使用"歪屁股船"，由此兴盛了龚滩、思南与石阡。

锦江河治理起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因辰水至锦江运输军粮需求，雍乾时期再次疏浚，清末盐商、船夫再次合力在高溶开凿铜漕溶。闸坝蓄水行船。"麻阳船"是主要的运载工具，带来铜仁府与省溪（江口）的商贸的辐辏。

舞阳河于元代开始整治，明代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设置五开卫至靖州十二水驿。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贵州巡抚郭子章，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卞三元开发上游河道，雍正四年鄂尔泰强化了湖南与贵州水道畅通，道光十九年廖维勋开槽100余丈，使用"鳅船"、"麻阳船"与"翘脑壳船"，黄平、镇远、思州（今岑巩）等地宏发一时。

清水江流域整理始于明英宗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在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光绪末年，分别由湖广五开卫、云贵总督鄂尔泰、贵州总督张广泗、黎平知府徐立御、都匀知府邹元吉、贵州境内绅商进行了疏浚。船可直达湖南靖州。淮盐入黔可借此水道而行，使用"麻雀尾船"运盐。

明代，铜鼓（今锦屏）、新市镇（天柱翁洞）先期崛起，清代都匀、下司、施秉、清江（剑河）相继商势宏盛。

明代后期，都柳江流域黔桂边境已经通航，航道整治起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鄂尔泰从广西运输军粮，疏凿碍航礁渍。乾隆三年、八年，张广泗再组织施工。光绪末年，三脚屯盐商胡德金伤折左臂奋力组织施工，开拓新漕“胡公太平溶”，古州（榕江）、三脚屯（三都）、八洛、丙妹、都江港埠集镇兴起。

赤水河航道开拓始于清代，乾隆十年，张广泗采纳吴登举之谏，开航道300余里，从上游白沙河至中游二郎滩抵猿猴实现通航。光绪四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整治茅台至二郎滩河段，航道运输船只主要以“鳅舡”为主体，“牯牛船”与“关刀船”辅之。仁怀、复兴场、丙安和葫市、猿猴、土城、二郎滩（兴隆滩、茅台镇兴起）。

川景侯曹震疏浚四川叙永达于贵州边境永宁之航道，开辟了“永岸”。丁宝桢于光绪六年疏浚綦江河河道，凿通綦江至松坎清水溪段，并使航道沿松坎而延至新站段。綦江河段盐运以“软板船”为主。

**四、川粤淮滇，广布盐道**

盐运通道在明清朝廷政治整合力、军事掠侵力、商贸聚合力、文化融合力、盐运人畜动力反向制约力、自然山水阻力、民族商运习惯等影响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合力整合在贵州境内崎岖的雄山崖壁之间，在遍布险滩暗礁的九大流域，形成了以下盐运脉络体系：

1. 川盐入黔通道

（1）涪岸盐运

自贡张家沱起运，经釜溪河仙市转入沱江，到泸州、重庆，至涪陵转口岸，入乌江龚滩。分两路进入贵州。主脉是龚滩—沿河—思南—石阡。

（2）仁岸运盐

自贡张家沱出发，经釜溪河仙市入沱江，分运到宜宾、泸州。在泸州的合江转运然后经赤水一路南下，到达赤水市，再经习水、二郎滩，最后到达仁怀县的茅台镇。详分为七段水陆联运。

（3）永岸输盐

从叙永分十条支线入黔。

（4）綦岸盐运

由自贡张家沱出发，经釜溪河仙市进入泸州，然后到江津、重庆，转而南下，到达綦江，溯綦江上运至贵州省桐梓县属的松坎起岸，再陆运到遵义，正安等县的部分地区。分为四条、四段入黔。

2. 粤盐进黔通道

粤盐入黔的运行线路是起于梧州、柳州，分别经长安镇至古州，一经庆远、怀远、六寨、独山至贵州省黎平府隶属的古州及兼销永从、独山、荔波，属大江埠引地范畴。粤商运盐至梧州而止，至梧州由贵州行商再赴各荒远之区。以古州为总埠分拨三个子埠销售，设置丙妹（从江县丙妹镇）、来牛、三脚屯（今三合，山都县境）三埠销售。

3. 淮浙盐入黔通道

淮盐以湖南省辰溪为口岸分三路运黔：一路溯辰水（又名锦江）至铜仁，沿大道分销松桃、玉屏等地；一路溯沅水至镇远集散；一路溯清水江船运至邦洞起岸，沿驿大道陆运至天柱、锦屏、黎平销售。

4. 滇盐入黔通道

一路沿黔滇驿道（北线）经沾益入贵州普安厅集散，行销于北盘江以西一带。另一路沿黔滇驿道（南线）经罗平、江底入贵州黄草坝（今兴义）集散。

贵州全域盐道跨越不同经济区域、文化区域、民族区域、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区域，既涵盖了军事通道，又内蕴政治、文化层面的交流。因此具有历史垂悠、交流连接广泛、跨文化地域、以盐贸易为主导功能复合型的通道文化特征。

川、粤、淮、滇盐在贵州运销配置量和行盐区域及盐价的衡定，随着明清行政区域界划的变化，政府机构全国销盐的宏观调配，以及战争演变对食盐的需求急缓，而呈现此长彼消、条块割锯、高低起伏的混沌变化态势。

盐政的扭曲，禁锢了盐业自由商品经济发展。由于盐道的错综复杂，入盐路径的错根盘节，产生了泾渭分明的“官盐”与“私盐”。通过谎报盐井产生盐源地私盐——“灶私”；通过影射重照、正引夹带、废引配盐等不良手段，滋生引商走私——“商私”；零星私贩求生存——“贩私”；雄霸一方的大股“枭私”；越界倾销——“邻私”。且私盐销量与官盐平分秋色，甚至在朝廷严酷紧榷的时期，超越官盐销量。

## 第三节 贵州明清盐运传统区域经济研究

### 一、商贸繁盛，商流拓展

明朝贵州在政治层面上的封建领主土司制度、奴隶制度、原始公有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逐渐分崩离析，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土地在军屯、民屯、商屯的基础上，激活了垦殖力。中原外来农耕技术、手工技术、矿业技术广泛推广，盘活了贵州自然资源的禀赋力。水、陆驿道的开辟，城镇枢纽体系的构建，使贵州整体商业经济空间产生了集聚力。贵州自明代起，商业逐渐与中原接轨。

在城市商业推动下，商业集市迅速发展。形成以行政中心辐射力，以卫所屯堡人口聚集力，以土司政署为主导力，以驿道、驿站为聚合力，以水陆联运码头为核心力，以物资集散地为汇聚力，以节日节庆为汇集力，以宗教庙会为重大商业契机的种种商贸市场。

明代贵州的商业贸易活动流通格局中，以粮、盐、马、茶、皇木采购及水银、朱砂贸易最为凸显，引导整个贵州商业态势走向。盐有榷盐之法，马有马政之制，茶有茶法之束，朱砂、水银榷定坑冶之法，管理甚严，由明各级官府官采、官运、官销。由此形成了与川、滇、湘、粤相邻省份之间“茶马盐互市”、“土特产与盐互市”、“盐油（桐油）互市 ”、“木（木材）盐互市” 等。

清朝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为了巩固基业、安抚边陲，政治层面上，在水西继续展开“改土设流”，随即在贵州全面“改土归流”。经济层面上，减租免税，招徕垦殖，奖励垦荒，免征租税，兴修水利，扩展水稻种植，鼓励桑蚕养殖，储种林木，倡办采掘冶炼，促进工矿开发，通过盘活商贸集市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商贸进一步发展。贵州区域山间坝子与山地结体错落有致。垂直生态差异明显，立体地形、立体气候形成立体型经济结构，从而形成独特西南“山坝”商品交易圈次结构体系。并且通过以下水陆商运大动脉，融入全国传统商业市场体系：

其一，通过滇、黔、湘跨省驿干道，输出贵州一部分桐油、土特产。同时，逆向为黔西输入滇盐，黔东输进汉口、湖南、江西的棉纱、大米、瓷器和重要的淮、浙盐。

其二，通过綦岸与关联驿道延伸连接长江上游商业中心重庆。输出遵义府

的丝绸、柞蚕丝、五倍子、生漆、杜仲、牛羊皮、猪鬃等畜产品，输入川盐、洋纱、药材、海鲜、粮食、棉、烟、布匹和绸缎等。

其三，通过永岸与相关联驿道与昆明和泸县之间川滇驿道沟通威宁、毕节、永宁，成为滇黔铜入京通道。

其四，贵阳至广西两条驿大道。一条由贵阳起，经龙里、平越、独山、荔波，抵广西庆远，另一条由贵阳起经古州达广西桂林，形成黔、桂、粤商路通道。

合计总共有十多条大规模通往外省商路，在此不再赘述。这些正是基于贵州不产盐，“黔民不知盐味亦久也”极度盐荒状态下，贵州人民奋力开拓出来的生命通道。

### 二、融进全国，商机尽失

贵州盐道的开拓，明清盐运的展开，在经济层面上作用主要体现在：

其一，如上所述使贵州经济融入了全国体系。但由于缺失政府引导下开创大型商业集散地，均呈现为自然“山坝型”交易市场，因此没有形成具有商业集聚力的历史性区域交易中心。而且大型商流皆为国家统制经济，当政权不稳定，商流与商脉皆成为历史。在民间尤其缺乏商业意识。明清时期，贵州地域性集“商人、地主、官僚”为一体的巨贾盐商也是凤毛麟角。在明朝“开中”时期为“陕晋西帮”的“秦晋大贾”主导。清朝“官督商销”和“官运商销”时期，贵州盐业为“徽商商帮”、“川商商帮”、“江右商帮”、“两广商帮”主流。运盐历史在为贵州惜之，丧失商业发展的契机。

其二，盐运入黔带来了贵州沿线城镇的兴盛和相关联产业的发展。如川盐入黔的仁岸和永岸的挺立，使黔北四镇“一打鼓、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骤然崛起。镇上酿酒业、客栈服务业、造船和航运业、农副产品生产、钱庄与借贷等产业蓬勃兴盛。但当盐运公路改道，主导激活商业因素丧失时，便一蹶不振，古镇慢慢在历史的哀叹中丧失其光亮的本色。因为贵州商人在明清历史中没有形成互帮互济产业联动关系，同时封建保守执着于“守业”，忽略“创业”，他们相信金钱、权力、强势、派系、皇权、独裁政治，但缺乏商业转型、商业宏观运筹思维。

## 第四节　课题建议

本课题研究完成了以下内容：榷盐之政——盐运乾坤全局考；贵州明清盐

政之格局——盐运制度考；明清贵州盐政评述及私盐研究——诡谲盐运考；清末民初以川盐为主体入黔销售区域及路径 ——盐运血脉考；贵州明清盐道——盐运历史文化线路考；贵州盐商与盐夫——盐运主体考。

综合上述论证，提出以下建议：

**一、盐运通道，既是经济通道，也是文化通道和旅游通道**

围绕盐道展开对湘黔、滇黔、川黔、粤黔旅游文化线路的规划与设计。因为盐道支脉延伸主要分布于生态资源优美丰厚的大西南区域，同时集文化古镇群、青石地板文化街群、古商会会馆群、红色文化群、盐运文化群、民族原生态文化群于一体的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历史科考旅游的拼盘。可以初步尝试性建构“乌江道盐运旅游”、“永宁道探险旅游”、“合茅道美酒河旅游”。在此基础上全面整合出盐运旅游智慧化平台，力争申请国际文化线路遗产，创造贵州旅游品牌效应。以此带动贵州城乡一体化建设，开创贵州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

**二、通过贵州盐运史的挖掘，整合贵州地域性特色历史商脉和文脉**

使地域历史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一定历史经验借鉴。对贵州明清盐运经济的沉思，在新时期我省应构建通道经济，创新西部发展的区域经济模式。打破省际、地区界商贸割据的经济性、行政性、法规性制度堡垒，避免我省与邻近省之间在西南区域形成各自独立循环的经济圈，独立则会在同一经济实体发展造成整个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低下，重复基础建设。地方政府不能为了图“短期效益”满足分利集团的“权力寻租”，谋一时政绩，大肆搞“诸侯经济”“分割经济”“行政经济”。在转型经济进程中，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实则是“制度”的融合。

我省通道经济的构建，要避免掉入通道经济中的“锅底效应”，注重培育经济增长中心。一是要完善城市体系，加强小城镇建设，增强城乡联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功能，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强化综合城市群的经济功能。二是促进产业集聚，建设有利于接受产业转移的区位，利用现有的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特色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营造产业发展的局部优势，增强对相关产业的吸引力，重点做好产业服务环境、交通与信息建设、信用环境、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和政府环境的建设，从而形成若干有竞争力的优势区位，使之成为接受东部发达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总体而言，就是要创造区位优势，形成重点突破、等级推进的产业吸纳与扩散的空间体系和格局。

# 参考文献


一、档案、史料类

[1]《贵州省统计年鉴》。

[2]《贵州财经资料》第八卷《盐务》。

[3]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 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1卷［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4] 景学钤. 盐政丛刊二集［M］. 北平：盐政杂志社，1932.

[5] 景学钤. 盐政丛刊（盐政杂志增刊）［M］. 北平：盐政杂志社，1921.

[6]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 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7] 赵尔巽，等.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8] 万斯同. 明史稿（影印本）［M］.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8.

二、文史资料类：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毕节县委员会文史办公室. 毕节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赤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赤水文史资料（第1、2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

[4] 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贵阳文史资料选粹（上、下）［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5] 政协思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思南文史资料选辑［Z］. 1981.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沿河文史资料（第1、2、3辑）［Z］. 1990.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遵

义文史资料（第 2、3 辑）[Z]. 1983.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织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织金文史资料选编（第 1、2、3 辑）[Z]. 1985.

[9] 政协榕江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榕江文史资料（第 1、2、3 辑）[Z]. 1990.

[10] 铜仁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邵冠群. 铜仁文史资料选辑（第 1、2、3 辑）[Z]. 1984.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石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曾君坚主编. 石阡文史资料（第 1、2、3 辑）[Z]. 1989.

[12] 政协黔东南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黔东南文史资料（第 1、2、3 辑）[Z]. 1985.

[13] 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田文镜. 州县事宜 [Z]. 1933.

三、方志类

[1] 贵州省盐务管理局. 盐政实录贵州区分志 [Z]. 1944.

[2] 贵州省毕节地方志编委会. 毕节地区志. 商业志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3] 六盘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六盘水市志. 财政志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4] 云南省地方志编委会. 云南省志（卷十九）. 盐业志 [M]. 昆明：云南出版社，1993.

[5] 贵州省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志·交通志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6] 榕江县志编纂委员会. 榕江县志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7] 仁怀县志编纂委员会. 仁怀县志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8] 赤水县志编纂委员会. 赤水县志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9] 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 思南县志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0] 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 遵义市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11] 镇远县志编纂委员会. 镇远县志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2］独山县志编纂委员会. 独山县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13］郑珍，莫友芝. 遵义府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14］黄家服，段志洪. 中国地方志集成. 贵州府县志辑［M］. 成都：巴蜀书社，2006.

［15］姜玉笙. 三江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16］曾汉轩，等. 酉阳县志［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17］故宫博物院. 柳州府志［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四、专著类

［1］欧宗佑. 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中国盐政小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2］曾仰丰. 中国盐政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宁德，林振翰. 中国盐政纪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4］蒋静一. 中国盐政问题［M］. 南京：正中书局，1936. .

［5］李洵著. 明史食货志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宋应星. 天工开物［M］. 长沙：岳麓书社，2002.

［7］陈锋著. 清代盐政与盐税［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8］陈衍德，杨权. 唐代盐政［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12.

［9］郭正忠. 中国盐业史（古代篇）［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0］陈其泰，刘兰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魏源评传（上）［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袁庆明. 新制度经济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2］卢现祥. 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3］常璩辑. 华阳国志［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03.

［14］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明实录. 贵州资料辑录［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15］李三谋. 明清财经史新探［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

［16］田雯编. 黔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范同寿. 贵州简史［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18］《贵州通史》编委会. 贵州通史简编［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19］李振纲，史继忠，范同寿. 贵州六百年经济史［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20] 朱式毅．中国商业地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

[21]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2] 靖道谟，等．贵州通志［M］．北京：京华书局，1968.

[23] 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4] 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5] 肖良武．云贵区域市场研究（1889—1994）［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

[26] 石奕龙．文化人类学导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27] 耿相新，康华．二十五史．清史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8] 化涛．权力视域下的政策调整与思想论争——《盐铁论》的政治学解读［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五、学位论文**

[1] 吴海波．清中叶两淮私盐与地方社会——以湖广、江西为中心［D］．上海：复旦大学，2007.

[2] 姚美玉．丁宝桢与地方民生［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3] 陈涛．明代食盐专卖制度演进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07.

[4] 李平毅．四川自贡仙市古镇聚落景观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

[5] 李志坚．明代皇木采办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

**六、期刊论文**

[1] 鲁子健．试论丁宝桢的盐政改革［J］．盐业史研究，2000.

[2] 刘森．明朝官收盐制靠析［J］．盐业史研究，1993.

[3] 马琦．清代贵州盐政述论——以川盐、淮盐、滇盐、粤盐贵州市场争夺战为中心［J］．盐业史研究，2006.

[4] 赵逵，杨雪松，等．川盐古道文化线路之研究初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

[5] 顾文栋．对清代前后期贵州盐政评议［J］．盐业史研究，1999.

[6]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淮界”与私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 后记

贵州明清盐运史考简介：研究空间尺度是贵州全域，时间维度聚焦1413—1912年。在堪考中国榷盐史的基础上，推衍循证贵州明清盐政演化变局；疏导出盐运之格局，进而条分缕析仁岸、綦岸、永岸、涪岸、淮盐入黔口岸、粤盐入黔口岸、滇盐入黔口岸运输线路的变迁、整治、运销等历史特征；再由盐运路线扩展整合贵州传统商路、历史区域市场；叠层深入，评述贵州盐政史，史考贵州明清私盐诡谲之谜；进而将理论演绎回归实地田野作业，重点考察从四川境内延伸入黔四大口岸，以及由盐运而兴的古镇，串联而形成的盐运文化线路；最后回归史考盐运主体之商人与盐夫。综上所述，本专著通过三大篇章——中国榷盐历史基础篇章、贵州盐运理论史考篇章、贵州盐运实考篇章，较为全面地对贵州明清盐运进行史考。

由于时间有限、史料有限、人力有限、笔力有限、思维穿透力有限，对川黔、滇黔、粤黔、湘黔盐运文化整合力度不够，对贵州明清盐运历史挖掘浅显。今后，通过定性加定量研究，把盐运通道与旅游通道融合起来，构建贵州外向型旅游经济格局是下一阶段展开的工作要点。

本项目主要成果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完成榷盐之政——盐运乾坤全局考。回溯中国榷盐历史，用盐制解读中国专政历史，用制度经济学重点解构历史误局，刊写了《辽、金、元榷盐体制辨析与制度经济交易成本的关联》、《明清榷盐体制中管制与俘获经济理论的勘察与启示》、《中国盐运体制与构建区域通道经济》、《贵州明代民族区域商业格局研究》四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北大核心期刊《商业时代》、《甘肃社会科学》、《贵州民族研究》上。明确指出降低交易费用，为经济提供服务，为合作创造机会，提供激励机制，外部收益内化均衡，抑制机会主义者行为；粉碎制度租金体系，建立租金消散机制。为中国市场经济建立提供历史借鉴。

（二）完成贵州明清盐政之格局——盐运制度考。动态史考贵州明代“开

中”—“折色”—“纲运”，贵州清代“官督商销”制—“官运商销”制，民国“自由贩运”—“任商”制—“包商专运”—“自由贩运”盐运制度的演变。以历史发展为线索，还原贵州盐运历史场景，完成对盐运通道梳理。并且创造性地从五个层面展开对贵州历史商业地理理论建构基本框架的探索。

（三）完成明清贵州盐政评述及私盐研究——诡谲盐运考。在分析明清王权统治者是为其权力集团谋求最大利益化而实施榷盐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剖析了明朝私盐主体为王府私盐和内外官奏讨盐贩卖。“以史为证”鉴定了清朝贵州境内私盐类型有灶私、商私、官私、贩私、枭私、邻私。

（四）完成清末民初以川盐为主体入黔销售区域及路径——盐运血脉考。得到结论，川盐是入黔最大盐源，在清末民初占80%，四条入黔盐运路线单线合计达10 175里，是维系贵州食盐的主动脉。其跨越地域辽阔、盐路崎岖，与工具原始、效率低下形成反差，盐运是贵州人民取盐的万里长征，是贵州精神的真实写照。

（五）完成贵州明清盐道——盐运历史文化线路考。溯源梳理了战国“五尺道”—汉朝“石门道”—唐朝南北大道拓展—元朝两条东西向驿道、三条南北向干道，同时阐述了贵州驿运功能结构。转而进入实证考察阶段，以四川境内富荣和犍乐盐场为起点，依次重点考察涪岸、仁岸、永岸、綦岸，遍及粤盐、淮盐销售路线系列古镇，凝练其中盐运文化。由此可见，贵州盐道跨越了不同经济区域、文化区域、民族区域、不同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区域，元、明、清朝形成清晰的线路特征，具有实体文化线路特征。

（六）明清贵州盐商与盐夫——盐运主体考。在全面论述中国盐商皆具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封建特征基础上，以扬益二州为导入点，点例解析贵州地域商人发生发展的历史，最后以盐夫艰辛的盐运生活描述为研究终宿，启迪发扬贵州精神为建设贵州而奋斗。

本专著第一次全面论述贵州明清盐运文化，所有的研究皆立足于历史循证，且结合实地佐证。为疏通贵州传统商业通道、文化通道、旅游通道做了前期工作，为科学构建农村集贸市场作了相关探索，为强化贵州历史文化研究，重塑贵州精神做了相关铺垫。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书具体分工为：赵斌老师、田永国副校长负责设计具体的调研方案，赵斌撰写第一至第六章主体内容，田永国副校长通贯全书脉络，总结撰写第七章，并协同负责全书文字的审核、修改、定稿和出版事宜。在田永国副校长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的引领下，在其高尚人格感染下，笔者酷夏远赴赤水河谷，严冬跋涉乌蒙山地，一日纵横五千余里，三载春秋凝练稿。

本书著述过程中参阅了大量书籍、借鉴了一些科研成果，采集了网络信

息，在考察进程中获得多部门工作人员的协助和良师好友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笔者学粗识浅，导致历史地理研究碎片化，经济史研究分隔化，尚需笔耕砚拓，趋于至善！

作者

2014 年 6 月